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红墙纪事 (下)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红墙纪事

第二十一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共和国危难之秋，中南海巨星陨落。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1975年11月2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一辆红旗牌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所宅院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青年人从车里迈出来。他是毛远新。

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他刚到毛泽东身边生活时，还是一个刚刚带上红领巾的娃娃。他比李讷还小一岁，是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连李讷都称他为“小豆豆”。他那时也是最矮的一个，比李油还低半个头。

朱丹华——毛泽民烈士的妻子、毛远新的母亲，1946年7月，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多次交涉下，告别新疆4年铁窗生活，领着5岁的儿子毛远新，经过长途跋涉回到延安。而毛泽民、陈潭秋二位党的重要领导人则已被反动当局用尽酷刑后，于1943年秘密处死在新疆。在延安，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战火纷飞的年代，常常是打起背包就出发，为此，她把远新送到中央托儿所抚养教育。

1946年底，由于胡宗南将进攻延安，部队转移到河北平山县一个村子里，办起了一个小学，这就是育英小学的前身。1949年北平解放，这所学校即迁入北京。毛远新便在此上学。

1949年春，全国妇联在北平成立。在热心的帅孟奇等老大姐的撮合下，这年端午节，朱丹华与方志敏烈士的堂弟、当时正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方志纯同志结为伴侣。随即南下到江西，方志纯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丹华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

不久，康克清派人将正在北京育英小学读书的毛远新及方志纯的女儿方玲玲送到江西父母身边读书。但毛远新仍怀恋育英小学的集体生活和长期在一起共患难的小伙伴，便时时向母亲要求回北京读书。

1951年赴京开会的朱丹华带着毛远新同行。康克清大姐见了，笑着说，“开会怎么还带个孩子，我把他送到他伯伯那里去吧。”

会后，朱丹华见到毛泽东，并告诉他，远新要回到北京来念书。毛主席说，“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坚持着对伯伯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此后，每逢星期天，毛远新便与同校读书的李讷姐姐回到主席身边。一到寒暑假，主席便派人将远新送到南昌家中。

毛远新长大成人后，对他的婚姻大事，毛泽东曾多次过问，他对毛远新说：“干部子弟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找对象不要找干部子弟，要找工农子弟。”伯父有言在先，毛远新只得遵从。干部子弟不能找，一般工农子弟哪个敢斗胆向他求爱？于是毛远新30多岁尚未结婚。

当时，毛远新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始终独身一人。有关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军区参谋长杨名迪和夫人刘刚（任军区陆军总医院内科副主任）商量，欲替“远新首长”选美。决定假工作之便，在陆军总医院物色一个合适人选。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仔细察看比较，刘刚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人选。此人是该院的一名护士，名叫全秀花，原籍浙江宁波，工人出身，现在家住上海。全秀花的长相在总医院数百名女兵当中可称首屈一指，料定毛远新定会看中。然而好事多磨，当

刘亲自找全谈话时方才知晓，全已是有夫之妇，其新婚丈夫是该院一名军医。刘大失所望，不免扼腕叹惜，谁知当全弄清究竟，马上告诉刘刚说，她有一个小妹，尚未成婚，若论长相，比自己还要漂亮。

1971年下半年，刘刚便以学习的名义抵达上海，借口探望本院干部家属来到全家，见到了全秀花的小妹全秀凤，果然生就一副丽人佳色，不负所望。且全秀凤祖辈三代都是出大力的工人。祖父是踏三轮的，父亲在沪一家工厂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属低而下之，恐怕做梦也不敢想象日后能和他们每天敬祝“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沾亲。刘刚匆匆回沈，先和丈夫商量一番，夫妇认为，全的家庭出身正合毛泽东为毛远新所定的调子，全秀凤本人的长相无懈可击，唯其文化水平较低，又是一个普通女工，能否配得上毛远新尚有些拿不准。不敢冒昧。最后决定，先把此事告诉毛远新的秘书李金德，让他非正式地打探毛远新的态度。不久，李回话说：“首长有意，要看看全秀凤的照片。”刘刚夫妇如接圣旨，喜出望外。亲自写信给全秀凤，要她火速寄一张放大的近照来。但不知何故，竟无回音。

以后，刘又接连发出两封信，仍是泥牛入海，刘急不可耐，遂同李金德商量，索性亲自去一趟上海，直截了当向全秀凤讲明，并把她带到沈阳，让毛远新亲眼看看。就这样，1972年11月，刘和李一同赶到上海，将全秀凤带到沈阳，住在刘家，接着安排毛、全两人见了面。毛远新时年32，全刚刚20。毛远新见了全秀凤，为她的年轻姿色所动，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李金德暗示，尽快结婚，要在毛泽东80大寿之前抱“孙子”。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事不宜迟，全在沈阳住了10天，便安排她回沪办手续，马上来沈阳结婚。

1972年12月24日，毛远新和全秀凤在沈阳军区第三招待所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毛远新即带全秀凤进京去见了毛泽东和江青。毛泽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且专门和全秀凤交谈了10分钟，用全秀凤的话说：“这是她一生中 happiest 的时刻。”

全秀凤和毛远新结婚的同时，便被批准参了军，以后被任命为宣传干事，行政23级。谁料，好景不长。1975年9月，毛远新被急调进京。第二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而远在沈阳的全秀凤对毛远新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入冬时，还托人给毛远新捎去一套毛衣、裤，另有两条高档香烟，表示对丈夫的眷恋之情。谁知不久，竟被退了回来。正当全满腹狐疑，中央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也接到通知，毛远新作为“四人帮”的一员新干将，同时被抓。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全秀凤茫然不知所措。经过与姐姐、姐夫商量，全秀凤向组织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并表示坚决同丈夫划清界限，还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同毛远新离婚；二、将她与毛远新怀的胎儿打掉；三、复员回上海，重新当工人。

全秀凤提出的三条要求，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堕胎问题。有关领导对全的离婚与回上海暂未理睬，只答覆说：考虑到全已怀孕7个月，不能堕胎，全只好怀着毛远新留下的这颗不祥的种子，在极度惶恐不安中苦熬度日。1977年1月，全秀凤临产，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全莉莉。女孩长得酷似全秀凤，十分漂亮可爱。但不久便发现，莉莉原来又聋又哑，这是因为全秀凤在保胎期间服用了过多的药物，使这个无辜的生命受到严重伤害。1978年，全秀凤被定性为“说错话，做错事”，可以保留党籍，复员回沪。上海有关部门将

她安置在针织×厂第二车间当一名收发员。1989年走出监狱的毛远新被安排在西安居住。于是全秀凤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前不久她带上女儿由上海迁居西安，同毛远新团聚。这是后话。

毛远新生得体态健美，一表人材。“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印发了一个《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他的大名才借助毛泽东的威望，飞扬四海。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辽宁省宣传部门的首脑，后来爬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他起初像崇拜真神一样崇拜伯父毛泽东，同时，也像尊重生母那样尊敬江青，把她奉为自己的保护神。1973年，他帮助江青发动了学校中的“反回潮”运动，把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类的新造反派推荐给江青，这使江青大为赞赏。毛远新几次来京，得到伯父母的照顾，便以“东宫太子”自居，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坐镇辽宁，同时遥控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实际上成了东北三省之“王”。有人封他是“东北的太上皇”。他也逐渐学会利用手中职权，“指挥”别人。在生活上也向江青学习，从大连外轮上进口外国香烟、外国影片和录音带。江青看到有这样一个成器的侄儿，暗自高兴。她自从与毛泽东分居后，一直担心无法接近和操纵病中的毛泽东，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她相中了毛远新。也为了隔离丈夫前妻所生子女接近毛泽东，当然更为了瞒上欺下、操纵局势的政治需要，她同3个“男臣”精心策划，于1975年9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病榻前，充当一名特殊的“联络员”。当时83岁的毛泽东病情日重，老态龙钟，别说巡视大江南北，到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说话吐字、饮食走路都日感困难。出席会议、接见客人也越来越少，确实需要一个联络员。于是毛远新成了最好的入选。

唐代女皇武则天曾经有过野心勃勃自视为太子的侄子武三思。江青这个70年代的“女皇”也效法武后，把崭露头角的侄儿毛远新看做自己的“太子”。毛远新受宠若惊，完全拜倒在“妈妈”的膝下，唯命是从，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和黑帮的骨干。毛远新进入中南海之后，在毛泽东的卧室另装了一部电话，归“联络员”专用，一头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了。

对于毛远新进中南海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许多政治局委员不以为然。这种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无力去制止，正如叶剑英后来所说，毛泽东病重以后，除了“四人帮”之外，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照顾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

11月，北京已进入冬季，冻手冻脚。中南海游泳池旁的毛泽东卧室内，已经供应暖气，但是年迈多病的室主人仍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出外活动。

2日上午，毛远新来后不久，毛泽东醒来。听到室外风声阵阵，轻轻移动身子，干咳数声。

在这里照顾他的有女秘书和医护、服务人员。但亲人之中除毛远新外，再没有别人。儿子、女儿和儿媳、孙儿都在很远的地方，只有经过“批准”，才能来探视。那个久已分居的夫人，早已在钓鱼台独享清福，即使回中南海，也有她单独的住处，而且也是不经“批准”不能前来，当然，如果不为要钱和找别扭，她也是绝不会来的。

“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

声音很小、很慢，且含混不清。毛远新听惯了，也听懂了，但他不想在自然气候上谈论太多，而是想遵照江青“妈妈”早已吩咐过数次的话题，谈谈政治气候。

“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

“什么风啊？”

毛泽东虽然听力下降，但那惯于思考的头脑依然很清醒，很敏感。他立刻嗅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政治动向。

“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听是“文化大革命”，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的最后一件，而且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虽然他已觉察有些问题，但毕竟功大于过，不失为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反修防修”的成功之举。即使有错，也要由他自己来承认，不许别人指责，更不许别人纠正！他挪动了一下身躯，半卧半坐，让毛远新细说下去，认真倾听起来。

“联络员”难得这样的机会，于是将准备已久的“状纸”，逐条地和盘托出：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第二，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第三，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第四，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第五，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已经感到问题严重，但他多年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还想了解风势的来头、规模有多大。

“这股风刮得厉害吗？”

“这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泽东自然清楚1972年这股风指的是周恩来。他听说比那次还凶，就习惯地紧蹙眉头，双目贯注，让毛远新继续说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毛远新压低声音，神情紧张他说出了关键的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主席讲的三项指示，”毛远新停一停说，“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的心跳加速，脸发胀，开始喘粗气。

他不能容忍歪曲他的三项“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只抓生产，而下抓其他，这是不要阶级斗争，实质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他早已有所察觉，不久前，康生带病受江青之托前来“告状”，就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吹风，提供“情报”……别人讲，他还有些怀疑，而病人膏肓的“康老”前来“忠告”，则不得不考虑了。为此，毛泽东最近已找过邓小平谈了两次。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是从下隐瞒自己观点的“钢铁公司”。毛泽东相

信自己的侄儿谈的情况，有些对的。不过，他对邓小平仍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为此，昨天晚上，又找他来谈了。不知态度有什么变化？……

毛泽东想到这里，自言自语地说：“有两种态度，一个呢，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究竟是哪一种呢？”他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命令式地对毛远新说：

“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们。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之后，他又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几个开个小会吧，把你的意见全讲出来，讲完了再来。”

11时刚过，毛远新从毛泽东住所走出来，他急匆匆的，脸上表情激动、严峻，同时又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立即办理。不料，在当晚的会议上，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毛远新开过会，又向毛泽东作了加油添醋的汇报。

过了两天（11月4日晚），毛泽东又找毛远新去，布置中央政治局开会。

毛泽东定了调子：“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领会了意图，核对式地请示：“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毛泽东点头：“对。”然后特意嘱咐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毛远新却人速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透露给江青一伙。“四人帮”就好像掉在深潭里的人抓住了稻草，庆幸自己从政治危机中再一次得救。于是，在钓鱼台连夜开会，商议怎样在邓小平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让他彻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

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

“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肯让步的。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婉言拒绝了。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由清华大学开始转向全国，掀起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风波，11月初，在江青一伙的推动和操纵下，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4人信件的批示。在那批件上用铅笔写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以后毛泽东又批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四人帮”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抓住“鸡

毛当令箭”，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北京市委负责人亲自坐镇指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先召开了有 1300 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把矛头对着邓小平。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霎时间，狂风大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美丽的清华园顿时成了“批邓”的战场。“四人帮”迅速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

1975 年 11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 130 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由毛远新整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上述讲话，并且提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说“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紧接着，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于是“打招呼”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全国上下都在“打招呼”，人人都忙于“打招呼”，“听招呼”。

“打招呼”成了“批邓”的代名词，在全国吹响了“批邓”的号角。

人民的总理鞠躬尽瘁

1976年1月9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数九寒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冷得令人忧郁，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当天空还是漆黑一片之时，一个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

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终年78岁。

人们震惊了。匆匆赶路的人流停止了脚步，忙碌的人们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们被惊醒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不，决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应该去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这样的擎天王柱倒了下来，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可怎么办呀？国家栋梁邓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马的危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这“四人帮”正虎视眈眈，剑拔弩张，阴谋接管天下，在这祸不单行的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你与世长辞，大不是时候了。老天爷真瞎了眼，人们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当人们证实周恩来总理去世是千真万确时，犹如晴天霹雳，人人目瞪口呆，头晕目眩，不知所措，震惊、痛苦、悲哀，交织在一起，一个一个地身心变得空荡荡了。神州大地被悲痛、忧虑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立下了盖世之功，且下去说了。最令人怀念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当道、忠臣遭殃的黑暗岁月，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草臣”的时刻，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支撑着这所将倾的大厦。这一切，人们都历历在目。

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13”是个凶数。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干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候，叶剑英叫工作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下按铃不许进，他向周恩来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

你们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不可能干天守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人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着。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淡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元帅，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工作人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1976年元旦，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雪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广播员用庄重的语调朗诵完这一首《重上井冈山》之后，变换着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诗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听到广播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给买来诗词，并让护士读。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工作人员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护士将诗词放在枕边。

若干年后，有人对这件事作出种种猜测，编织出奇妙的神话，甚至有一位外国作家说，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在“编织”故事，周恩来到最后“辽在演戏”。这当然是无根据的。事实上，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保持着当年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厚谊，同样也喜欢他的诗。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们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地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下呻吟一声，有的瞪出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给自己一个痛快了结……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整个病痛期间，没发一声呻吟，没流一滴泪；如果你一直在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医务人员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的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出痛苦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20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

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颖超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下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两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老师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眶，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医务人员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医务人员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医务人员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他虽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能够为他人良苦用心。他是不想让同志们替他分担痛楚，他宁肯独自去承担一切。……

“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邓颖超看不下去，声音颤抖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大难受……”

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大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全体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剑英也是这么说的。

人民离不开总理。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陈医生定时将配制好的高蛋白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的胃中。病房里清洁，但是也有一种不祥的阴森气氛笼罩。身边医务人员的泪早已流尽，只觉得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

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在周恩来病况日渐加重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秘书张玉凤还能听懂毛泽东的话。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她就得以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毛泽东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十几小时内，他的病情报告不断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方案、抢救方案。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得知周恩来逝世噩耗，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大厅，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一沉痛消息，纸条放在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纸条叠起来，放进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读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毛泽东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小孟泣不成声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始终不说一句话。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秘书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她这个普通人的心理，一直存在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她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她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张玉凤意识到他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接着毛泽东不无歉意的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张玉凤后来回忆时解析，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

间。她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毛泽东听着，不再默默地，而是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华国锋出任代总理

周恩来逝世后，中央实行“丧仪改革”亦即丧仪从简，早不改，晚不改，偏偏周恩来逝世时改，分明是“四人帮”搞的鬼名堂。江青一伙千方百计地限制人们对周恩来作悼念的表示，人民群众极度不满，自发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以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

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像人们悲痛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安街上，百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伫立在街道两旁，扶老携幼，翘首以望，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轻轻驶过，“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你啊！”哭声惊动天地，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嚎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周总理的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抗议！

从1月11日至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四人帮”开始将周恩来的遗体移放到北京医院后院一间狭小的“太平间”里，后来虽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仪式，而吊唁的人数又由6万压到4万，许多人失去了与总理最后告别的机会。14日傍晚，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了，工作人员和许多人不走，在那里等候着，6时30分，邓颖超由两名年轻女同志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面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语音未落，全场失声痛哭，一齐向邓颖超涌去，人们继续悼念周恩来，纷纷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广场顿时成了灵堂。这是一片由无数花圈文织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联、誓词、诗文、白花、素纸，伴着人们的泪雨，从白茫茫的太空飘飘洒洒飞落下来，覆盖了神州大地。

“四人帮”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和政权力量，极力干扰、破坏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连新华社1月11日所发的首都人民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报道也一压再压，一砍再砍。其中记述当天下午首都人民扶老携幼，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的一段文字竟被砍得一干二净，只字不留！为了再现当年这一悲壮情景，特将砍去的这一段血泪文字重录如下：

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了。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长的大街的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里呼唤着：“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总理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周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这是古今中外从没见过过的送灵场景啊！

不仅如此，连百万群众十里长街哭送灵车的照片也不准刊登！仅1月13日这一天，姚文元就一连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压制悼念周恩来和宣传周恩来丰功伟绩的报道。

丧心病狂的“四人帮”预知悼念的风暴就要来临，抢先在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文。这伙黑帮妄图以此

筑起阻挡泪海大潮的堤坝。人们被激怒了，用双手把它撕得粉碎。一个又一个抗议电话，接二连三地飞进了报社。愤怒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恶毒诽谤，再也不能允许对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横加阻挠。他们擦干了默默的眼泪，收起了无言的青纱，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

1月15日下午3时，五千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作悼词，还有一个斗争的小“插曲”，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也只好作罢。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不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他们多么希望从此邓小平能接替总理，领导大家干下去啊！

然而，人们的善良愿望，常常受到恶人的挑衅。人民群众越是爱戴邓小平，“四人帮”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劲地要把他拉下来。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对当时的形势，有一个估计。他写道：

邓小平的悼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次是他以后几年里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

“四人帮”的宣传机器立即急忙开动起来。它宣称，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计划。

就是这样，“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一天也不能让他再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右政局了。他们在打击邓小平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仍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这两个人是在周恩来逝世后阻挡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被他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妖风”。与此同时，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四人帮”继续在他们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的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

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则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月23日到2月3日先后印了三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要登几个整版！

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局风云发生骤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他们时而交谈几句，时而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边走边谈。这个宽敞的四合院，同样显得空落落的。灰色的围墙，绿色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外面的街道名曰“宽街”，实际并不宽，在它通往地安门的马路上，时时传来嘈杂的声音，更使他们心烦意乱。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提出了同一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叶剑英。这是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过生死考验建立起深度信任感的两位老战友。邓小平多年以来十分爱戴叶剑英，尤其在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危难时刻，更觉得需要倚重这位对党忠诚、才智过人的老师。叶剑英虽然比邓小平年长7岁，年近八秩，但他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和才干，非常尊重这位几起几落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两位老革命，眼看急剧恶化的形势，感到太突然了，简直不可理解。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叶剑英也许不相信。就在近两年，他还不

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一下子来个 180 度大转弯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以致“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怎么办呢？”叶剑英商量着问：“要不要我们再去找主席呢？”

“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斗下去，义无反顾。他坚定地回答：“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力争！”

“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如果真正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停下来，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师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老师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两位老革命家重新陷入在怀念周恩来的思绪里。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患病中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大伤脑筋。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于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这位善于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大师，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华国锋。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至少，从这以后，华国锋已经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了。

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对于当时这一决定的政治背景，一位外国的传记作家写道：

妄图操纵患病的毛泽东的“四人帮”，当然不是想为华国锋这位人们不大熟悉的“外地”政治家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们疯狂地反对邓小平无疑有利于华国锋的晋升。邓小平的坚定不移的务实精神使毛泽东感到不安，因此，从1975年秋起再次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但他清楚地了解其夫人以及上海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在幕后搞阴谋活动，并有政治野心。“四人帮”垮台后公布的语录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的有利条件正是在于他不参

加任何一派，而是长期无限忠于毛主席。

这位作家列举了华国锋的身世和职务之后，特别提到：

重要的是，他是务实派和激进派都能接受的人。因此，4月间，党的主席委托他负责审查“邓小平案件”。

外国人谈论中国现代政治总喜欢分成什么“务实派”和“激进派”，这是他们的观点和习惯，且不过多地去评论它，但把“四人帮”说成是“激进派”，显然是不适当的。

历史的辩证法，后浪推前浪，新人超旧人。但是这种“超越”常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超越。新人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谦虚谨慎，是可靠的优秀接班人，使交班人感到放心，甚至自愧弗如。正像叶剑英在一首诗中说的，“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另一种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人们多么盼望有更多的前一种接班人啊！

关于华国锋的身世，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正式传记加以介绍。但是外国人却有不少文章和著作问世。如伦敦赫斯特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华主席》、奥克森伯格与杨赛强著：《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在湖南，一位政治通才的成长》，此外，还有香港出版的《华国锋传》，以及《华国锋同费利克斯·格林的会谈》，等等。这著述有褒有贬，讹传甚多。

华国锋是冒着抗日战争的炮火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家乡山西交城县遭到日军铁蹄践踏，他扛起上枪上山打游击的时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17岁的热血青年。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和抗日将领的名字，充满了崇敬心情。作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荣进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行列，和这些“大人物”平起平坐。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直到1940年才投入党的怀抱。一个人的命运，很难由自己掌握，常常由偶然性的因素所摆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抽调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当时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第一个报了名，先到湖南湘阴县，后任湘潭县委书记。“华政委”便由此扬名。1954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国有句名言，“人杰地灵”或“地灵人杰”。湘潭——毛泽东的故乡这个“地灵”，培育了一大批“人杰”，其中也包括华国锋。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大跃进年代，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的名字，同毛泽东家乡的名字并驾齐驱，随着伟大领袖的威望的提高而日益显露。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轰动全国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颇为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华国锋。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外电称华国锋为中国的“农业专家”。

不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夸奖他是个“老实人”。1959年盛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湘潭的家乡之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怀乡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由于视察湘潭家乡比较满意，自然还有其他原因，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每到湖南，华国锋总是热

情相待，虚心求教，毛泽东常当人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秋，华国锋到广东参观学习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稳固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修一条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他得到红卫兵的信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很快当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毛泽东和斯诺一次谈话提及华国锋，使得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而扬名海外。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意图，时常有机会到北京向伟大领袖汇报和请示工作。他那纯朴的“三忠于”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泽东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因此，在“接班人”林彪1971年叛逃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那时已接替病逝的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不久任国务院副总理。直到最后毛泽东几次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

对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后来便成了他的罪状之一。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春桥是个善用心计的人。他在“有感”中写的去年的“一号文件”指的是什么呢？那是：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是这个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在这里“一箭双雕”：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他要来一个总清算，“总把新桃换旧符”，实现他“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还传出一个笑话，有人悄悄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最前面，于是变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的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一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

就在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里，有另外一项重要通知：

“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想到，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老师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剑英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剑英办公室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半信半疑。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了是非。“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正确的。“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种现象总的说并不存在。对“大官们”要作分

析，决不能一概否定。有了“好房子”等等得不出“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结论。“打倒一切”和“全国内战”就不只是“三分错误”的问题。最为严重的错误，是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作了这样的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了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邓”不只是错误地批判一个人，而且是错误地否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会上，根据毛泽东上述谈话精神，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解决“转弯子”的问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回去以后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讲话提出了政策界限，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要求“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下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批邓”的问题正式在党内公开。

“四五” 霹雳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整倒邓小平，整倒党的一批老干部，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在 1976 年 2 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 月 2 日，江青擅自召集 11 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3 月 10 日，毛泽东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 11 省谈话。”

为了大造舆论，江青一伙授意并亲自审定发表了一大批文章。1976 年 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2 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3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4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4 期发表了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剖析》。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的学校和教育说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 17 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关于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的荒谬主张。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意见提出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文艺界的“黑风”的风源，为 17 年修正主义黑线和旧文化部“扬幡招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今后 25 年内的一个根本任务批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3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下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攻击一大批老干部，江青一伙制造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私自召见上海亲信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2月底3月初，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经姚文元审定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也在3月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从分析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暗指邓小平）所走过的道路吗？”把民主派（即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说成是普遍规律，是“20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理论是极端荒谬的。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党的斗争历史，丑化了党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形象。

江青等人还向文艺界布置赶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2月1日，江青对于会泳等人说，现在演的戏，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这怎么行？要他们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紧密配合“当前的斗争”。2月6日，张春桥又向于会泳下达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他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写这种题材，概括的广度大些，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征。2月16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该书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种会议加以落实。3月2日，反党影片《反击》由迟群筹建班子开始炮制（6月4日正式开拍，9月完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且布置了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8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12部。6月，反党影片《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开始拍摄。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折磨和痛苦，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传单：

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

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全国各地愤怒的人群起来了，投入战斗了！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贵阳、重庆、太原、西安、广州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挑战。

祖国大地在燃烧。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立刻变成巨大火球，燃烧爆炸。

这种引爆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4句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至第4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经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3月25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1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好像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

在江苏省哺育过一代伟人周恩来成长的大地上，在南京，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势。

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在各个主要街道，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师生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员工的帮助下，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广大旅客的护卫下，将列车厢上的标语，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花圈、小字报……从天而降，一场大风暴席卷而来，遍及全国各地。

悬在太空的陨石和蕴藏在地下的岩浆同时爆发。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它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底点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程。

也就在同一时间，躲在阴沟里玩弄阴谋的“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惶恐万状，疯狂地进行反扑，妄图迅速扑灭这场

熊熊大火。

于是，反“四人帮”的斗争和“四人帮”的反扑开始了大搏斗。双方都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一方积蓄力量准备掀起更大的斗争高潮，一方调兵遣将，东堵西截，妄图阻止人民运动的兴起。

“四人帮”在钓鱼台的指挥部灯火通明，他们研究对策，紧急部署。北京公安部门指示天安门派出所将送花圈的单位、人数汇总上报；派出“便衣”，跟踪人群，观察记录。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他们关闭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祭奠用的纸张。3月30日，王洪文给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报界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疯狂地叫嚷：“那些贴大字报的，是力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内容的群众抗议运动是取缔不了的，南京中山东路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人们在制作悼念周恩来、杨开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民族的圣地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祭坛，在人民的心中闪闪发光。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进入4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热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请看清明前后几天的大事记录：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传抄最广的小诗贴在纪念碑前：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山西的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专把它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并强调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都要坚决搞掉！”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议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方式，不搞游园活动。讨论结果，会议认为，“五一”节活动可以改革，但今年改变不利，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并建议邓小平不出席。会后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发出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

大标语，并要彻底追查“谣言”。

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这一天晚间的政治局会议。这一天，叶剑英像往常一样十分关注天安门的动态。办公室人员悄悄去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看小字报，听演讲，抄录诗词，叶帅看到传抄回来的“扬眉剑出鞘”这首诗，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用4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游行队伍，高擎着诗牌，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还胡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警告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成立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采取措施，制止悼念活动，并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

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的警告和阻拦不予理睬，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碑、挽联、传单有增无减。诗词内容也不断升格。“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野心家”、“阴谋家”等等以及许多谐音同，成了“四人帮”的名词和专用语。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卖力地贯彻中央电话通知，开始驱赶镇压革命群众。南京人民群众不理这一套，继续抬着花圈游行。虹桥、兰桥等地出现了反对张春桥、捣毁《文汇报》的标语传单，南京大学出现了“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迎着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天津、湖北、安徽、陕西、沈阳、哈尔滨等地的人群，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清的悼词、诗文、传单，有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在诗山词海中，出现了驳斥“四人帮”谬论的篇章：“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许多人当众朗诵长篇悼词，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出现了万人合唱的动人场面。

“四人帮”加紧了反扑。这一天凌晨，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回去后，给他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要他们赶快到天安门去拍照“反动诗同”，以备将来好“破案”。姚文元把许多大标语定力“反动口号”，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果然“四人帮”就要杀人了，他们部署“便衣”人员紧急出动，拍照、跟踪、

绑架、逮捕。到夜里，被捕的群众已达 26 人。

4 月 4 日 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一天首都天色灰蒙蒙，气候乍暖还寒。一排排树木，瑟瑟地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一座座高楼，孤寂地耸入寒风翻卷的高空。“路上行人欲断魂”。宽阔的长安街上，人们低着头，默默地前进，一切都是那样沉寂。不在沉寂中逝去，就要在沉寂中爆发！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首都各界群众，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涌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入群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到达这个庄严圣地的人数总计达 200 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许多老将军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

关于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童怀周所著《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作过生动的描述：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巍然耸立在万花丛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许多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耀眼的大字下面，安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条用大朵白花装饰着的黑布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皑皑白雪；系在铁链上的白花像一条白色的素带，环绕着纪念碑。

在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写的诗文。纪念碑上花圈挨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面都挂着巨大的横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的国旗杆下。国旗旗杆的基石上，放着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着金丝绒台布的金属制的小桌子上。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在广场中央，放着一个东风电视机厂敬献的盛着巨大万年青的花篮，上面系着的挽联上写着：“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

广场的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

广场上空，迎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几个青年带来的。气球上面悬挂的白色飘带上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真实写照。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涌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人。北京不愧是文化古都，中国不愧为是诗人之国。“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蛾欲出笼，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被争相传抄，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童怀周先后编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文选》等书收录了几乎所有的诗文。这是丙辰清明的忠实纪录。作者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述：

“愤怒出诗人”。愤怒的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流氓、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一首诗词是一把火炬，使人们对“四人帮”

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天安门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有些马前卒被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惊呆了，预感到末日就要来临了。江青一伙及其死硬派并不服输。他们极力给下面压惊打气，妄图挽回败局。这伙黑帮借助手中的权力，施展淫威，进行疯狂的反扑和镇压。在这场“扼杀战”中，“金棍子”姚文元特别卖力。他和张春桥通过《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等渠道，制造“理论根据”，出谋划策，为天安门事件定性，提出“制服”群众的紧急措施。姚文元笔杆一摇，多次批道：“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四人帮”不但继续指使在公安部的党羽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揭撕诗词，跟踪群众，还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联合指挥部”总指挥下达指示：“要注意是否有开大会或冲击什么地方的苗头”，“要研究战术”，把“力量穿插进去，分割开，然后抓他，声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奉“四人帮”之命，紧急部署公安部门，准备好车辆、拘留所、收容所。北京公安部门还召开会议布置，要有目标地打击反革命坏分子，查出下落，搞好材料，报请处理，准备捉人。于是，民兵的棒子马上派上用场，在“抓反革命”的嚎叫声中，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扔进事先准备好的囚车。

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4月4日清明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情况。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根据“四人帮”提供的材料，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4月3日那天有20万人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日有7~8万人420个单位送450个花圈。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的（点了一些单位的名）。有的煽动、演讲，反动的实质很清楚。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已经采取措施：当场取证、拍照。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10个人。已经投入了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分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对外部进入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火车站刷掉。他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当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他马上告诉江青。江青借放

大吵大闹，压别人表态，说什么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转走，要抓那些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在江青等人的压力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组织好首都工人民兵，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会议主持人最后说：“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3月6日、24日的文章来骗人，说是攻《文汇报》，实际上是攻中央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将中央政治局4月1日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同意。”接着，毛远新又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首先列举了几日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然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结果被打伤。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的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导致战斗。

.....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党内民主生活的极端不正常，颠倒了正常现象，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

4月5日凌晨1时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余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点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广播讲话，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增越多。

晚9时30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部熄灭，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如同白昼。“四人帮”早已组织好，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经过一番苦斗，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五”的运动。

“四五”运动，以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而载入史册。“四人帮”想抹煞这一段历史，在当天的深夜里统一调动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一伙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历史是掩盖不了的。

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1976年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出：“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决定组织30000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

凌晨3时许，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的基调与会议纪录相同，只是做了更多的渲染，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如说，“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在这句后面，特意加上“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在“内容既恶毒又隐晦”的后面，更明白地挑明“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其用意很显然在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

再如诬蔑群众是“法西斯”，加了一大段这样的文字：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毛泽东看了看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批语：“士气大振，好，好，好。”

第二天早晨8时05分，毛远新继续向毛泽东汇报。

当他再次提到“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时，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

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

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早已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待：“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这样，就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使他再次与中南海绝缘。这也许是不久前叶剑英和邓小平谈话时，所估计的第二种可能“一批二保”。

对于这件事，一位外国传记作家曾作过这样评述：

国防部长叶剑英（他在1975年至1978年间担任这一职务）为邓小平保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这位年迈的元帅是党的最高核心——政治局常委的五位成员之一。他说，如果把邓

小平开除出党，他就辞职。在当时，这会起非常大的震动。如决定同时罢免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军队中的大多数人就会起来反对，国家就会分裂。要得到叶剑英的支持，就得保留邓小平的党籍。根据北京的官方材料，未发生这种冲突，简单他说，是毛泽东建议保留邓小平的党籍。

这位作家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时叶剑英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尽管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保”邓小平，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他“自身难保”。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确实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种办法，不只对邓小平，对其他人也使用过，如1959年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也同样用过类似的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出这个提议和决定，有历史文献可以查考。

当时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高兴他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似乎还不放心，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高兴他说：“好。”继续编造情况告状：“上次开会，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来当纳吉。”

谈话已经持续一小时，毛泽东感到累了，但他仍然坚持打起精神，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然后，掰着指头，归纳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他的话很简短，说到最后挥挥手，表示要“赶出去！”

毛远新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立即应声道：“应该赶出去了！”然后灵机一动，站起来说：“我马上找华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叮嘱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远新随机应变，马上开列出要找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其中包括叶剑英，只邓小平、苏振华除外），用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慢慢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指着一个人的名字说：“叶不找。”

毛远新会意，用铅笔划掉叶剑英的名字，然后又核对一遍：“除这三个人外，其他同志参加。”

毛泽东说：“好。”接着又交待：“华国锋任总理。”

这句话太突然了，毛远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张春桥为什么又一次换成了华国锋？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议说：“国锋同志的任命和中央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答：“对。”

毛远新坚决执行，起身要走：“我马上去通知华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挥手：“决！”望着侄儿走出去，又交待一句：“谈完就来。”

毛远新刚向华国锋等传达过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在党史上是个破例，从未有过。这使毛远新等更加不解了。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曾经给他一再出过难题：不愿意参加接待外宾。他们摆出的理由是：“不好见报。”华国锋代总理，他二人，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常委，名次不好排。有的省给中央写报告也写王洪文副主席，不写华代总理。毛泽东想到：王、张之外，还加个江青，

都看不起华国锋，而大权又不能交给“上海帮”，于是下了这个决心，在副主席前面加个“第一”。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十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中央的这两个决议，国内议论纷纷，国际舆论也有许多“坚持不同政见者”。美国的一位传记作家抱着怀疑的口吻写道：

关键一步是毛本人授意开除邓。虽然他明显已病得不能参加这次极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但他通过其侄子毛远新向会议转达了他撤销邓的意见。

据说政治局全体一致决定开除邓，这不可信。难道军界元老们——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也投票开除自己吗？“全体一致”，意在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已经反对过毛的意见。

洪水般的反邓商品带着毛的商标，《人民日报》抑扬顿挫他说：反革命分子赞成邓小平，并试图让他“扮演纳吉的角色”。毛还是生活在过去之中，他仍做着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的恶梦。

以下几点表明毛赢得的胜利代价极大：——极左派没有击垮邓；邓的盟友为他赢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利，“以观后效”。

——邓出来了，但极左派并未进去；毛把正在下降的权力授予了模棱两可的华。

——军队的元老们为目前的事件不快，但他们极少隐瞒在等待良机这一事实；他们等着毛去世，等着在他之后平息极左狂风（镇压纪念周时骚乱的不是军队，而是极左派的民兵；一般对这种骚乱，军队只要几分钟就能使它平息）。——社会舆论无疑完全接受毛撤销邓的意见，中国的舆论已达到一种虔诚的程度；不过，在中国已经传闻毛可能也不知他正在干什么了。

官方对邓的点名指责“死不悔改”倒是事实。邓没有全力反击毛——他正在寻求的是维护他今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他们讲你是一个走资派，这就是说你在做一件好事。”

可是肯定地认为，这句话在当时不是轻视毛的，就是轻视毛思想的。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的两个决议，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这篇报道竭尽颠倒黑白、造谣诬蔑之能事，把群众的抗议运动说成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群众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从此，中国出现一个“四人帮”操纵下的短暂的恐怖时期。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

知 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篇文章说：

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文章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是完全错误、危害极大的理论。“八亿人口”为什么就要“斗”呢？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一个批示印发全党。这个批示指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印发这个批示的目的，也是为了攻击邓小平。

中央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梁效的《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4月28日《人民日报》）；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4月5日《人民日报》）；池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5期）；梁效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5月18日《人民日报》）；方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6期）；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红旗》杂志第7期）等许许多多“大批判”文章。“批邓”运动实际上为江青一伙所掌握，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意图进行。报刊上发表的上述带有全面指导性的批判文章，更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组织、授意、审定的。这种批判狂热地宣传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加以发挥的。这个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这个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步削弱了，他们名声很臭，不可能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

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内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显然，这个理论是混淆是非和敌我的理论。把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人说成“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搞“修正主义”，说成“党内资产阶级”，是荒谬的。

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还会有新的政治代表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迟群在几次讲话中露骨地提出：“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会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7月1日姚文元审改的《清华大学党委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一文，特别强调，要警惕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为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四人帮”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和整理诬陷这些同志的大量材料。王洪文调阅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办等单位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月的部分文件和会议简报，拼凑材料，“四人帮”的亲信把持的上海市总工会，断章取义地整理印发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材料43种，25万多份，被点名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副总理、副委员长15人。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辽宁省委书记杨××在会上发难。根据王洪文的指使，黄×整理了20份材料，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7月16日，黄×在会上首先提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力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台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7月20日，杨××也在会上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会议期间，王洪文4次到京西宾馆向黄×了解会议情况。20日下午，杨××发言以后，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将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取汇报，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又说：“要斗，不斗就不能取胜，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按照王洪文的旨意，黄×和杨××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张春桥则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有意见让大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在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这时王洪文公开支持黄×等人的发言，说，“有

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开了一炮，开的好！”由此可见，黄×、杨××在计划会议上发难，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进攻。

“含和堂”主人留下深深的遗憾

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中心偏西处，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后，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年的7月6日，朱德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关于他戎马一生，大战三百，小战五千的事迹一直广为流传，但他在10年逆境中的高风亮节，却鲜为人知。解放军报社纪学写了《最后的十年——康克清谈朱德同志》，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系统地记叙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的文章。现全文照抄如下：

尽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志就怀着深重的忧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而又正处在劫乱中的人民，但他和蔼的形象，他光辉的业绩，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对康克清同志来说，自然更是如此。

朱总诞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见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相随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们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却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总和我们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她，最了解朱总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高风亮节。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总，康大姐说：“运动刚开始时，朱总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

显然，对于那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朱总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常委去委员长，也不能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无言之中偶尔流露出心中的怀疑。一次，他突然问道：“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

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煽动造反，点名批判，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及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师的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时候，朱总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在中南海里看大字报，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要么无言地愤感，实在气愤极了，才说：“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但然他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总当了中央书记，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

定会弄清楚的。”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朱总充满信心他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朱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又接着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3岁的朱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次朱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极不承认。他又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罗！’”

“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总说：“不要理它！”到了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扬言“要准备打仗”。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真的要打仗吗？”朱总淡然一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听说要把朱总赶出中南海。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这样，朱总说，有这个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朱德要被“疏散”离开北京。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总沉思一会，无奈他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呵！

就这样，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朱总从广东回来，再没有住进中南海）。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不愿多说。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当朱总坐了3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被直接送到了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有康大姐。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逼中，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心着生产。担心生产受到破坏。1972年9月以后，他以86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康大姐说：“1974年1月，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会，回到家对朱总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沉思一会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江青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去？”

周总理逝世后，朱总万分悲痛，经常两眼直直地望着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时地念叨：“恩来，恩来在哪里？”康大姐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

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朱总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那一晚，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在向遗体告别往返的路上，朱总一直在流泪。那些天，朱总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但他仍然执着地投入国事活动。别人劝阻时，他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以90岁的高龄，带着病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处理日常事务。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一天，他收到揭发“四人帮”的一封群众来信，毫不迟疑地转呈毛泽东同志并郑重附笔：“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他接到成仿吾同志寄来的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着阅读了一遍……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总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人民，还是革命。

6月12日，朱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埃·拉齐拉卡。

6月21日，朱总病重了。按照原来安排，他要会见外宾。人们劝他休息，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他没有同意，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时间的改变，朱总在设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加重了他的病情。

6月25日，医生会诊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说：“不要紧嘛，等到明天我见完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

6月26日，病情突然恶化，朱总才不得不住医院治疗。

7月1日，除肺炎之外，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一直不退。这天，朱总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所听。”

7月初的一天，朱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弥留之际，朱总对周围人员断断续续他说：“革——命——到底！”……

“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是都没有能够如愿……”

说到这些的时候，康大姐的语调更加沉痛。这不难理解，失去亲密伴侣的创伤，是时间无法平复的。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语重心长他说：“对先行者最好的怀念，不能只是泪水，只是誓言，而是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你说得对，大姐！朱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奋勇前进！

“四人帮”庆幸朱德去世，他们在走向篡党夺权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

块“绊脚石”。于是，趁热打铁，紧锣密鼓，表演大乱中华的丑剧，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公布朱德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同时，在第一版发表《发扬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介绍解放军驻井冈山地区某团指战员“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一是学习当年红军战士同反动派斗争的坚定性，树立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地主武装“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历史教训，提高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觉性……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除了利用舆论阵地，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批邓恶浪之外，他们还利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之机，唆使上海、辽宁等地的“亲信”和“骨干”炮制了20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黑材料，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追查所谓“风源”，向中央领导发动攻击。

叶剑英没有出席这次计划工作会议，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这位老革命家，凭自己的政治嗅觉，已经预感到“四人帮”在发动新的攻势，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帮”经过密议，拟定了一个以王洪文名义提出的全面篡夺党政军权的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就要抛出来。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应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为了配合这个“计划”的实施，王洪文在这期间还口授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让秘书班子代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老一辈革命家提高了警觉，加紧了串连活动。朱德逝世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十五号的住宅，乘车向西疾驶而去。

人们熟知的这位著名的红军“女司令”，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以后，拼杀在井冈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义勇队，在一次次的枪林弹雨中，唤醒了无数个同胞姐妹，使她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挣脱出来，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女战士和共和国的栋梁。在长期的作战与革命斗争中，她与朱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迫害的那些苦难岁月，她支持朱德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持不懈

的斗争，为其分担忧愁，给以朱德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成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后盾。

这位伟大、坚强的中国女性，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送走了亲人后，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愿和最后嘱托迅速转告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7月，天气闷燥。她冒着酷暑，坐在车上，满面愁容，一颗带伤的心早已飞上了西山。

叶剑英走出门外，亲自迎接客人，他带着康克清走进客厅里边的小办公室里。

两个人坐定以后，顺手打开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剑英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这才领会，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诉叶剑英：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克清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朱德还是说：“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剑英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德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康克清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朱德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剑英，离开十五号楼，转向一号楼，去看望聂荣臻，又向他表达了朱德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充满斗争胜利的信心。

两位老战友正做深谈的时候，叶剑英也急匆匆地过来了。康克清看出两位老师有机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间同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话“家常”去了。

灾难降临唐山

历史将永远深深地铭记着这一时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53.8秒。

夜幕笼罩下的唐山市，万籁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蓝色闪光刺破夜空，紧接着，天穹旋转，大地抖动。随之，街道、铁路、楼房，在强烈的摇撼之中错位、变形、倒塌……

23秒钟内，一座年产值约占全国百分之一、拥有百万人口的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幸存者惊慌的脚步声，沉重的喘吁声，和遍布残垣断壁中的具具尸体！

不久，新华通讯社报道，这次地震震级为MS7.8级，死亡24万（其中市区人口14万），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亿元。外电宣称：“中国唐山将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7.28”大地震！这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当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紧接着派出了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帮助灾区奋起抗灾，重建家园。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在地震中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在这场灾难到来之前，是他们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严重干扰地震预报的分析研究。就在7月12日，唐山地震前16天，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还在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距地震到来前17个小时，在预报人员一再要求下，地震局领导才有功夫坐下来，听取分析预报室的汇报，但是为时已晚。地震那天夜里，他们吓破了胆，江青钻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后来进了地震棚，还感到不保险，专门作了一个大桌子，四周放了不巧巧克力，光练习钻桌子就花了半个月时间。而在地震过去之后，“四人帮”竟摆出“中央首长”的姿态，假惺惺地表示“极大的关怀”，以借机宣传自己，而在幕后却大刮阴风：

“全国有8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

“唐山地震不过100万人的事，唐山才死亡10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8亿人的大事！”

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根据姚文元在一次编前会上的讲话，说什么：“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姚文元抄了太平天国时的一首诗：“地转实力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他指使别人写进文章里。上海《学习与批判》第9期发表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引用了这首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人利用地震“复辟资本主义”。

8月，江青等人把未定稿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诬之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根据江青等人的意图，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出版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个小册子。并在全国各地发行。出乎江青等人的意料，三个文件受到很多人的赞许。许多单位以不同形式抵制了对三个文件的批判。

毛泽东的最后时光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照十二属相，辰属龙，故曰龙年。

何物为龙？有说是蛇的化身，巨鳄之演化，野猪之变形，还有说是松柏之常青……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诸如“恐龙说”、“龙卷风说”、“雷电说”、“华夏图腾说”，种种不一。帝王们都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吹说黄帝乃中央之龙，颡顼、帝喾、尧、舜等四龙分治四方。炎黄子孙皆为龙子龙孙。神话终究是神话。而在辞书上也多解释龙为天上的星宿：“天宫东方之星，尽为苍龙之宿。”据说，龙属鳞虫之长，是一种有鳞有须、变化莫测的神异动物。古人描述它的特性有数端：一、生于深山大泽中；二、与云相属，能升天；三、与水相依，能潜渊；四、从风能长吟；五、不吃不睡不息，常与风雨为伍。总之，龙能腾云驾雾，上天下海，兴云布雨，有天威神力。龙颜大悦，会利万物，造福人类；龙霆震怒，会冷众生，降祸人间。星移斗换，紫气东来，十二年一个轮回。1976年这一年又轮到中华民族的图腾年，或许该由龙来统治。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灾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有句民谣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来临了！1月8日9时57分，人民总理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3月8日，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报载：这天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着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磨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15时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幅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稍大块的直落在金珠乡九座村、南兰村；最大的3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摊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冲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达480平方公里，其间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乡，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中国科学院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工作。收集的陨石有100多块，总重量力2600公斤，其中最小块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3块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比美国诺顿陨石重691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吉林陨石收藏在吉林市博物馆，设有展览专馆。这次陨石雨无论在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方面，都是世界罕见的。

陨石雨的降落，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善于联想的人们总喜欢把“天上”和“人间”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种种猜测，许多荒诞离奇的传说不径而走。

“天上降下了克星，不知又落到谁的头上？”

“天灾人祸，不知哪方又要遭殃了！”

“准是那几个狗男女折腾的太厉害了，老天爷怪罪下来了！”

“看吧！中国肯定要出大乱子！”

4月5日，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四五”运动。这一天，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

7月1日，党的55岁生日这一天，中国老资格共产党领袖之一张闻天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含冤逝世。

7月6日，“红军之父”朱德与世长辞。

7月28日，唐山发生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后果的地震。

然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再一次惹怒了“苍龙”，这年9月，龙头一摆，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人间。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沉浸在悲痛之中。同时，人们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切担忧。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这个文献宣告毛泽东逝世，又说：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主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时候，有一次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个重要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他深为未来忧虑。他对华国锋等人诉说衷肠，希望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很清醒的。他悲观了。

《青海日报》1987年8月14日刊登了《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一文。作者舒群披露：

1975年12月26日，是他的第82个生日。

他居于中南海游泳池，冬季温度保持在 25 以上，人愈老愈病愈怕寒。

他久病由肺气肿渐转肺心病，喘息、咳嗽、吐痰，只有医生护士探头探脑和出入探望、送药、诊脉、试温。偏午之后，新贵毛远新引着风云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模大样来过。但见他在床上睡着，便悄悄溜之乎也。此外还能有谁来过呢？

他吟呻着，吃语着。半睡半醒，模糊瞥见听见，有一个站在他身前的警卫干部的影儿与声儿。

“报告主席。”

“……说……说、吧，”

“有个农村妇女非要见您不可！她说，她是来给主席送寿礼的。”

“不收礼嘛……”

“我们也是这样说的。”

“你再、去说，我谢、谢她……让她、走吧……”

警卫干部去而复转。

“不管我们怎么说，她坚决不走！她说，她奉父命遗嘱，来见主席……”

“她父……是、是谁？”

“她父亲过去是西柏坡老支部书记……现在，死了三四年了吧？！”

“怎么……死、死的？”

“造反派打死的！……”

“岂有、此理？岂有、此事？……你们对她呢……”

“我们只能劝说她走呗。”

“她呢？”

“她要引火自焚！”

他一听一怔，一鼓作气坐起，大睁眼睛，他醒了。

“你们见死、不救吗？”

“救、救了……我们让她进了门房，问过她。她说：‘1948年的今天，她代她的父亲——西柏坡老支部书记，一大早送寿礼给主席。第二年建国，主席派车接她上过天安门城楼，赶上观看庆祝晚会的焰火。那时，她小名叫小樱。’”

“……我记得她……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你回来……你对她，要和气，要有尊重的礼貌……你说，我请她呢！”

当目迎着走进来的小樱的时候，只见她面黄肌瘦，额纹深深，两肋瘪瘪，瘪成了穴……

从一进门，一看到他，一声未吭，跪到地上，站不起来了。直到被他拉起来的时候，她才放声嚎响畅哭。

他望望她，颜面抽搐，眼圈发红发湿，不胜今昔之感，感慨、感叹……“这、么、多、年了……你……你怎么、不来、看我？这么多、多年了……你生活、生活可好吗？”

“不好……”

“你全村人呢？”

“那哪全村人？”

“西柏坡嘛！”

“我早不在西柏坡村了。”

“为什么？”

“因为家穷……早把我嫁到外地去了……”

“哪个地方？”

“延庆县一个小村。”

“不管、西柏坡村、还是延庆县小村，我问的是、农村生活！”

.....

“你怎么、不说话？”

“我不敢说话.....”

“为什么？”

“人家私下说，毛主席变了，脾气大了.....人家都不敢说话了！”

“那你、你怎么、还敢来、看我？”

“我是受我父临终的托付，叫我来看看您.....我自己也想来看看您，老早想来看看您.....说话，我就走了.....可是.....我看见您了，又不敢说了.....”

“你说吧.....说真话.....说实话！不管说、什么话、我都不怪、你、你。”

“那我就说！我说农村生活不好，很不好！”

“可是，我听的、我看的，大不相同，完全相反！”

“您听的、您看的，是假汇报、瞎宣传.....”他的神态声势骤变，冲动激动，双拳捶胸。因此，他更加喘息急促，更多咳嗽吐痰，更深更重长吁短叹；他一仰头，倒在床上，挺了颈，合了眼。

她被吓呆了，不知所措。

“毛主席，醒醒！毛主席，醒醒！”

“.....我.....我.....没.....睡.....没.....睡.....”

“我.....我走吧？”

“不.....不.....你讲.....你讲.....”

“我没讲的了.....走了，走了！”

“小樱，小樱！”

喊话声音进来，随着进来的是江青。

他被她的喊声惊开睡眼，一见是她，便又把双目闭紧。

她一瞥他，也未加理睬，仿佛未见着他似的。小樱站起，向她行个礼，只见她穿了一身高贵的戎装，一双闪光发亮的筒长到膝盖的大黑皮靴，目光灼灼，神态自恃，好不威风也。

“阿姨，不，首长.....”

“我可不敢当，不敢当。你阿姨不过是一名文化大革命的流动哨！说真话，听说你这位稀客来了，我才来了！不然的话，我也不敢随便来呢.....这些年不见了 你的生活好吗？”

“.....好.....好得很！”

“是啊，全国人民生活都好，你当然也不会例外嘛，你说是吗？”

“.....是，是。”

“坐下，坐下。咱们都坐下，坐下说话嘛！”

“不，我该走了！”

“干嘛，我一来，你就要走了？”

“我跟毛主席早说过了，我要走了.....”

此刻，毛主席蓦地睁开眼睛，睁大眼睛，发挥发光，烁烁熠熠.....他醒了、苏醒了、清醒了。伸出手拉住小樱的手。

“不、走，吃、饭，留、宿，歇、息.....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她听到感人的肺腑之声，憋不住心中隐情热情激情的潜流，哇的一声，又哭起来。

“.....不.....不.....感、感谢.....感谢毛主席.....”

他喊来警卫干部，要他去通知准备客饭、客房。

“是，有贵宾客房。客饭也不必准备。今晚为主席设有寿筵.....”

“噢，你不说，我倒忘了、今日.....今日是我的生日.....好吧，好吧.....小樱，今晚、你与我同桌.....同饮.....”

“不……不……”

“怎么？”

“我……怕……”

“怕？既不怕自焚，还怕什么？什么……”

“住下，不是扣下吧？！”

“你放心！……谁敢动你、一根毛发……我就敢动她、一颗脑壳！……现在……我还有这点点、发言权吧？！”

“不……不……”

“你听我的话。我明天还要与你谈话呢！”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自己晚年错误有所觉醒的蛛丝马迹。

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半睡半醒状态中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紧急搬到中南海另一个别墅式的小庭院。这里被称为 202 号，据说可以抗八级以上地震。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房前搭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地震棚。此刻，这位伟人躺在宽大的床铺上，忧思百结，心事重重。他已经预感到马克思在向他招手，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地震灾区的人民怎么样？有多少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亲人？华国锋亲赴救灾前线解决问题，虽然提高了威望，但以后会怎样呢？老同志们会真心拥戴他吗？江青和张春桥会服气吗？……他一想到江青，心里就一阵绞痛。越是怨懣这个女人，越是怀念过去的两位妻子：坚贞不屈的杨开慧和刚毅温情的贺子珍，尤其对贺子珍总觉得有些内疚，但为时已经太晚了。当女儿李敏来看他时，只能含着眼泪握住她的手，问候她的妈妈，说出她准确的出生日期，嘱咐好好工作、学习，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8 月下旬，地震救灾告一段落。9 月 1 日，在召开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叶剑英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来自唐山、天津、北京抗震救灾第一线的 3500 多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抗震救灾取得了伟大胜利，“灾区广大群众，联系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抗震救灾的现场，变成批邓的战场，到处是一派革命景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宣告抗震救灾已经取得胜利，并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丰硕成果，是对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就在开过这个大会的当天晚间，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五名的江青在钓鱼台 17 号楼召开紧急碰头会。

室内灯光幽暗，显得阴森森的。

几个“男臣”外加“东宫太子”屏住呼吸，望着“女皇”杀气腾腾的白灰色的脸，预感到有些不妙。

果然，坐在长桌后面的“女皇”大发神威，破口大骂：

“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辽发表重要讲话？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太不公平了！”

几个男人一听，吐了口气，知道她的脾气是朝着华国锋和叶剑英发的。自从华国锋当上国务院总理和中央第一副主席之后，江青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讨厌，何况在今天的大会上，他俨然摆出中国“第一号人物”的架子，对她

的威胁太大了。使她难以忍受。她坐在大会主席台上，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偏偏他的浓重的山西口音在空中飘荡，使她神经发痛，头都要爆炸了！

江青瞪了一眼王洪文，发狠地说：“我真看不惯你那副毕恭毕敬的尊容！你是大会主持人，何必对他那样低三下四呀！”

“敬爱的江青同志，”王洪文立起来，完全放下了“第二副主席”的架子，急忙解释说：“几千人民群众大会的场合，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那还不是逢场作戏！”

江青听了并不满意，毛远新一旁急忙岔开，打圆场：“那个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对主席的指示还是认真执行的。他个人算得了什么，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当然不能作得过分！”毛远新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开这个装着毛泽东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华国锋是要乖乖照办的。他凭着这个“衣带诏”，凭着“联络员”的身分，目空一切，根本没有把“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

江青听侄儿一番话，怒气稍解，但仍不放心，嘱咐说：“远新，你也要注意那个人，他表面看来老实，骨子里并不买帐，在大是大非上摇摇摆摆，主席百年以后，还谈不上怎样呢！你别太天真了！”

“是的，还是江青同志看得远！”正在探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经验的张春桥，干咳两声，摸摸深度的近视镜，摇头摆脑地说，“看问题既要看现在，又要看发展，主席百年以后，形势会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政治局还存在着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那个执掌军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好像十年前‘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一样的北京城，针插不进，水也泼不进，这是最大的祸害！”

江青对“军师”的话十分赞赏，又朝着王洪文说：“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上海没有问题。我刚回来，已经布置就绪。过几天，还准备再去检查落实。”王洪文踌躇满志地回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北京。如果这里的军队控制在我们手里，就什么也不怕了。”

“谈何容易！只要汪东兴掌握的 8341 能听我们的就行！”江青看看张春桥、姚文元，似乎在征询他们的意见。

“汪东兴靠不住，越来越往那边靠！”张、姚几乎同声回答。

“汪东兴的工作我正在做，凭我们多年的老交情，总会有希望的。”江青似乎很有把握，稍停一下，交代说：“这样吧，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她又望望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在主席身边值班可要注意，对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人也要严密监视，有什么异常，随时告诉我！”

说这话的第二天，9月2日，江青不顾毛泽东病情恶化，拒绝众人的挽留，带上大批辛信和演员、作家和外国影片，乘上豪华的专列，有7个车厢、两个车皮，还带上4匹马，跑到大寨去骑马、逗鹿、玩兔、赏月。她逢会必讲逢人心说一个永恒的话题：“女人掌权”。汉朝的吕雉、唐朝的武则天，是她极力推崇的。她布置写作班子加紧炮制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掌权执政的材料，什么《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介绍：吕后》等纷纷出笼。她大肆宣扬“母系社会”，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上论证：“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要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她究竟要干什

么？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9月5日，毛泽东病危。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工作人员一听这消息，好像天快塌下来似的，惶恐万状，去叫醒江青，声音都发抖了，但江青却若无其事，慢慢悠悠地起床，高高兴兴地打扑克，从阳泉上火车，打到石家庄，从石家庄改乘飞机，一直打到北京城。

9月7日，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在“202”号一间宽阔的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不祥气氛。医护人员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政治局委员来去匆匆，忙着料理后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提着一颗心，泪流满面，浸在悲痛之中，但是，江青一进门却连声说，“应当高兴”。一会儿又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不值班的，都出去！”她不顾医生劝阻，恶作剧式地给病人擦背、翻身、打粉、搜钥匙、找文件、发脾气，还给病人插上助听耳机，在一旁哇哇叫……像个女巫一样，继续折磨毛泽东。医生急得直哭，苦苦哀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意孤行，毫不理睬。她当着众人大吃其“文冠果”。说什么“文冠果”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掌权”，文官也就是“王、张、江、姚”，就是他们四人掌权。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清晨，江青又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继续请工人吃厚皮的“文冠果”，然后又去抓她的所谓“特务”去了。

医生发出最后病情通报。

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颤抖。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想不到昔日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昔日那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那蜡黄发灰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表情，黯然失神的大眼淌着伤感的泪水，半张开的嘴角抽搐着，似乎要作新的指示……叶剑英多么想多看他一眼，但又不忍多看。一股股热泪夺眶而出，一阵阵悲痛袭上心头。顿时涌出千言万语又无从倾诉。

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教诲。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采，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大家围过来，探询病情。叶剑英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

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9月11日至18日，首都隆重举行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和首都群众30多万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港澳同胞、解放军各部队分别发来唁电和送来了花圈。60多个国家、政党送来了花圈。200多个国家、政党、组织以及著名人物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会后，全国县以上地区召开了追悼大会。朝鲜等30多个国家和政党也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

毛泽东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天下大治”。

第二十二章 叶剑英午夜布兵，“四人帮”中计就擒。三 一医院特殊病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帅府来“客”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久，又横遭“四人帮”的迫害而退居家中。

关于这段时间的邓小平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非官方的说法出自广东和香港的渠道，外国记者更倾向于相信这个富于刺激的故事：

一个中午，一辆黑色轿车七拐八拐来到一所戒备森严的宅院门前，门“吱吱嘎嘎”打开了，黑色轿车迅速开了进去，铁门又马上关闭起来。过了一会儿，黑色轿车又开出来了，它迅疾地开过去，连红灯也不予理睬。交通警察愤怒，然而无可奈何，他似乎凭经验料知车上肯定坐着不同凡响的大人物。

车上坐着一位73岁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是叶剑英元帅下令，必须迅速及时把邓小平安全转移到“四人帮”所找不到的地方。黑色轿车忠实地执行叶剑英元帅的使命，把邓小平送到机场，邓小平登上军用飞机后，回头忧虑地看了一眼平静之中酝酿着一场大风暴的北京，转身钻进了机舱。

飞机起飞了。

在叶剑英周密计划下，这架负有秘密使命的军用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徐徐降落。

“首长，您受惊了。”一位魁梧的老军人来到飞机下迎接邓小平，他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在邓小平领导下的129师任过职，现在，他负责保护邓小平的安全。

邓小平就在距广州南边75公里远的中山温泉和广州市年度过这个夏天。忽然，一个中年军官来到许世友的办公室，在他的耳边细语了几句，许世友听着立即皱起了眉头，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娘的。”原来“四人帮”已估计到邓小平躲在广州，立即派了公安部副部长和几个得力干将，来到广州，任务是把邓小平“揪”回北京。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去了，许世友让他们吃了个硬钉子。

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失踪的邓小平秘密会见了叶剑英元帅和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邓小平斩钉截铁他说：“我们怎么能无权无势袖手旁观等他们来收拾我们？怎么能容许4个人把我们的国家倒退100年，绝不能！”

79岁的叶剑英悄悄回北京，一举把“四人帮”抓了起来。

这种说法，读起来过瘾，但经不起考证。另一种说法是来自官方渠道，并被邓小平自己所肯定的。他在日后会见一个外国客人时说，最后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

这位老革命家自从4月份被荣升“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之后，基本上被“软禁”在北京宽街一所旧式的庭院里。尽管多年来游泳的习惯被迫停了下来，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每天坚持散步，做自己编的健身操。夏天来了，院子里的园林树下，长满了尺把高的草。他看着有趣，便叫女儿买来一把镰刀，每天在院子里割草。此时，他每天生活仍然是充实有趣的，他还是睡觉前看书，饭后听儿女们说笑。他的冷静沉着，胸襟豁达，驱散了一家人生活中的阴霾。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经历一段政治上和地球上的巨大震颤，“四人帮”也许是因为忙于抢班夺权，把主要矛头转向华国锋；也许是以为邓小平已被“批倒搞臭”，成了“死老虎”，反而对这个他们一向最害怕的人有些放松了。

这一天吃过早饭，邓小平依旧在院内散步。突然，落在老树枝头的几只喜鹊唱起欢快的乐曲。

这种时候，还唱什么歌哟，莫不会有人来报喜？

果然是天随人愿，工作人员通报，王震将军驾到。

王震，邓小平的老战友，建国初期，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王震任新疆分局书记，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震十分佩服邓小平的工作才能。1969年，王震又同邓小平、陈云一道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恢复工作后的王震，曾利用汇报工作之便，在毛泽东面前力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再次出山立下汗马功劳。

此时过着“软禁”生活、消息闭塞的院主人，多么希望有个熟人来聊一聊啊，更何况是老朋友呢？他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

王震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一阵寒暄过后，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形，话题一转，突然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邓小平稍为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

王震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详细汇报。他告诉邓小平，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剑英从西山下来，经常住在小翔凤。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对叶剑英如此关心，问得如此详细，王震没有打听，不知用意。但他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

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所。

两位老革命家能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相会，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邓小平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被打倒之后，叶剑英虽然被宣布“生病”停止工作，但他利用尚未正式“罢官”的权力和影响，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通过子女的交往，与邓小平暗中通气，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坚持反对和制止江青等人妄图开除其党籍加以更大迫害的阴谋得逞。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今天才有可能“溜”出来与叶剑英会面。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小翔凤叶剑英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被毛泽东称为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经过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虽然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但他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不久后的一天，另一位老革命家陈云也来到了小翔凤，他也是由王震“串连”后，叶剑英派车把他接来的。这位开国元勋，也是几起几落，被毛泽东称为“老机”“老右”，长期搁置，弃而不用了。他虽然挂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头衔，在那些“势利眼”的人看来，早已无职无权，不屑一顾，但在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他并没有被遗忘。相反的，他越是冷落，越是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人们越给以更多的关心，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这也是历史的一个辩证法。

这位党的元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身体依然健康，神智依然清醒，

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焦虑。眼看“四人帮”无法无天，又不能有效制止，他又急又忧，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由于长期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非常盼望着有人来传递消息，议论国事。而王震正是替他“消愁解忧”的最好的一个“门客”。他时不时地来看望这位孤寂的老革命家。尤其在充当叶剑英的“联络参谋”之后，前来讨教的次数就更多了。

一次，王震驱车来到陈云家中，两人促膝而谈。

“现在的局势这样严重，总得想个办法，不能听之任之。”客人谈了时事见闻之后，又一次提出问题。

“是啊！你有什么妙计可以安天下？说说看。”陈云说道。

“我以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那几个闹腾最凶的……”客人把伸开的手紧紧地攥起来。

“那样，简单是简单，但不一定合法啊！”

“合法？！”王震毕竟是一位久于战阵的老将军，习惯于用武力解决敌我矛盾。听陈云提出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感到很有道理，他深深折服这位政治家想得深刻，想得周到。

“那么究竟怎样解决才好呢？”

“这需要找几个人议一议。”

“现在各在一方，又不好开会，只好个别交谈。”客人终于有机会提出建议：“我提议你串串门子，到小平、叶帅那里走一走！”

主人听了点点头。接着问了问邓小平和叶剑英的情况，然后说：“那好，他们出来，目标大，还是我去看他们，你先给我打个招呼！”

王震高兴地完成了“联络”任务。

叶剑英听说此事，便主动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他空着肚子亲候这位老革命家的来临。

陈云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一向十分敬重这位老革命家，把他看做是老领导。叶剑英想起，在毛泽东病重期间，陈云特意来到自己家里，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感到很受教益。眼下，他很想再听听陈云的意见。于是，摆了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遇到的棘手问题，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怎样注意斗争的合法性呢？这是非常难的问题。两位老革命家交换了意见，提出一些设想。这在当时各种条件尚不具备和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也只是“设想”而已。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价是‘半合法’，究竟怎样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颖超也来到了叶剑英的客厅。

头一天，叶剑英接到电话听说邓颖超要来，立即告诉秘书，转告邓颖超在家等着，他要亲自去看她。邓颖超知道叶剑英事情多，还是离开中南海，来到西山，登门拜访了。

在周恩来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邓颖超很少出访。她独自住在中南海西

花厅，沉浸在巨大的持续的悲痛之中。她对周恩来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在居室望着他的像，抚摸他的遗著，触动他的任何遗物，都会引起她的不尽思念。走出户外，那门前的苍松，伴着下沉的夕阳，似乎映照出他那和蔼亲切的面容；踏上林荫深处的小路，沿着他的足迹走去，微风拂来，又好似听到了昔日并肩散步发出的笑声细语……但是，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伟大的女性、杰出的女革命家，几个月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她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化悲痛为力量”，又起来战斗了。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眼看党和国家遭到厄运，她再也不能沉默了，不能等待了。一定得想办法除掉这帮害人精。而当前唯一能带头除害的人只有叶剑英。不久前，她已经去过小翔凤，向叶剑英讲过自己的想法。这一次，她又主动来到西山。

叶剑英知道邓颖超的来意。没等她开口，就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的想法来个“竹筒倒豆子”，全部交底。

“比较难办的是那个‘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她会利用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出一场‘贺后骂殿’。她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邓颖超对这个“演员”的戏路和演技实在是太熟悉了。

“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须系铃人。主席不是多次严厉批过她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她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叶剑英胸有成竹。

“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邓颖超又提出一个小丑。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个话要重新解释。”叶剑英回答说，“我担心的则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天安门事件，已经表演一次了。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点‘御林军’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邓颖超听了，十分钦佩叶剑英的韬略。是的，对眼前坐着的这个人的胆识，她是大清楚，太信得过了。自从大革命开始，她就熟悉这位文武兼备的“儒将”：云南习武，黄埔执教，东征北伐，坚持苏区，抗战统战……他长期战斗、工作在周恩来的身边，文韬武略，才智过人。尤其长征路上截获“密电”，智斗张国焘，挽救党中央的壮举，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受到毛泽东等的高度赞扬，周恩来称之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荇臣”，这些事，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至今她还记忆犹新。她凭经验的直觉，坚定相信今天要对付“四人帮”，只要他在，就会成功。

不过，有一件事，她还是不放心，故提醒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需要站出来。”

叶剑英知道她说的“这个人”是谁，悄悄地告诉她说：“请你放心，这个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的。”

邓颖超也小声告诉他说：“早在地震期间，地震棚在一个院子里，我就向他打过招呼，人家在搞鬼，要他提高警惕。”

谈到这里，两位老战友互相望着，会心地笑了。

他们的目光汇集在一起，眼前似乎出现一幅“钟馗捉鬼图”。

秘密“指挥所”

北京西郊有个绝好的去处，那便是“避暑胜地”——西山。

自古以来，西山为达官贵人游览胜地。金、元、明、清历代帝王都在此营建离宫别院，为各朝皇家游幸驻蹕之所。清乾隆十年（1745年），曾在香山大兴土木，兴建亭台楼阁，共成28景。解放后经过修整重建的香山公园、西山八大处以及玉泉山静明园、曹雪芹故居、卧佛寺、樱桃沟等处，都是西山的名胜。“西山晴雪”是燕京八景之一，“香山红叶”，更是吸引千万游人。

其实，西山不止是避暑胜地，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政治舞台。远的不说，19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就是以西山为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西山成了八路军、解放军、人民游击队和我党从事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

建国后，中央军委在西山另外开辟了一块军事“禁区”。来到“禁区”，通常在某一个路口竖起一块牌子：“此路禁止通行”。再往前便是几个哨兵，挡住去路。过了岗哨，再往里走，“白云深处有人家”便是所在了。提起“禁区”人们总难免带有点神秘感。其实所谓“禁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是新建了一些军事设施和几栋供临时来往的首长们工作和休息的院落。这一切都是为了战备的需要。人们也许不会料到，这个“禁区”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除了通过王震这个“联络参谋”继续沟通联系之外，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能够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的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他不仅约进来，也不断走出去，主动向一些靠得住的同志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净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叶剑英家里，会见过叶剑英。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刘志坚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机会、各种途径同叶剑英接触，各抒己见。

这段时间看望叶剑英次数最多的恐怕要属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单位的驻地毗邻西山，老师那红枫翠柏的“二号楼”就在他们的管辖圈里，更重要的是两位将军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需要随时请教并保护老师。

鲁迅有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76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在艰巨复杂的斗争漩涡里，叶剑英得了多少真挚的“知己”，能够互通心曲，共商大事啊！

他在酝酿锄奸，有意识地倾听各方面的心声。用现代语言来说，是进行一场多层次的“民意测验”。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现代工具，如电报、电话、传真通讯之类，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

相访问中才好面谈。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南京的许世友、武汉的吴克华以及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坚真等同志。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有一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望叶剑英。

叶剑英向客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一下子愣住了，他似乎没有听懂问话的意思。为了听清他的话，就动手关上收音机。

怎能关收音机呢？1976年以来，逆境中的叶剑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窃听。”

果然，叶剑英又故意打开了收音机，而且加大音量，让“样板戏”的高腔喊叫起来，他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并重复了刚说过的意思。还没有等李德生开腔，他自解自答地说：“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指的是“中央”。暗示当务之急要果断解决那几个人的问题。

李德生立即表示拥护。他谨慎地说：“现在抓组织，就抓到根上，但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招呼，我一定照办！”

……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叶剑英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然而，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

叶剑英认为，在这次斗争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这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于是，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困扰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剑英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去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了叶剑英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

“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汪东兴。

汪东兴，这位红军老战士，在长期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期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是“有功之臣”，随着“文革”中对“红太阳”信仰的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也在上升，到毛泽东卧病时，达到了高峰。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他对华国锋、甚至对中央政治局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人向叶剑英建议，一定要说服汪东兴，取得他的合作。

对于汪东兴，叶剑英过去了解不多。总的印象是个好同志。前一阵子，通过王震的摸底沟通和自己亲自接触，更加深了这个印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在保护文件等方面，汪对“四人帮”有抵制和斗争，彼此合作得还好。但是，现在要从根本上解决“四人帮”问题，他的态度会怎样呢？会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完全站到这一边来呢？

叶剑英带着这一堆“？”号到中南海来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来找汪东兴，问他知道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看了没有？那里边透露了有人有野心。并且专门送了一套杂志给他。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应该先把他搞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下行，这次谈话，后来汪东兴回忆说，对他思考如何同“四人帮”作斗争，大有帮助。在为毛泽东治丧守灵期间，还有些人向汪东兴提过类似的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一次听叶剑英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很险的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剑英又做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这个党中央的副主席选择了现代建筑水平很高的二十五号楼，一方面显示出他的高贵；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靠近叶剑英，便于加强监视。二十五号楼座落在西山半腰，在叶剑英住的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地方，王洪文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的人的行踪，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叶剑英深知其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王洪文的住所离叶剑英的住所本来只有几步路，这个新贵还是坐着他的

豪华气派的红旗大轿车驶进十五号楼院内。随身警卫打开车门，王洪文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从车里站出来，习惯地用手梳理一下又黑又亮的分头，一副十足的“奶油小生”派头。“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之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剑英虽然一看到眼前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想到他的来意，就不高兴，但又想到他来得正好，转而以礼相待，想摸一摸底细。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去上海转了转，刚回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支吾吾说上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不住地打量室内的环境……

他觉得自己的探视任务已经完成，便告辞了。

过了几天，叶剑英特意交代办公室，请几位技术专家来从周围环境、房上地下，直至下水道，里里外外，再细细搜查一遍，看青是否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才放心了。

然而，他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如今好端端的一个西山被一个“坐探”玷污，大煞了风景！王洪文那帮随员和“保镖”到处乱串，探听风声，真是像许衡那首西山诗所描绘的：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了。在这种复杂的困境中，叶剑英叹道：“大好山河惹人爱，也令人愁。不觉愁从何处至？觉得眼前都是。”

叶剑英此刻陷入苦苦思索之中。

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大战”

9月12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国锋被她缠得不过，就问她“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

电话里传来气势汹汹的声音：

“为什么开会，先不要说。”

“那么，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要讨论的问题多了，十分复杂……你来中央不，你不懂，也不可能懂！”

……

一方沉默。

“喂，你听懂没有？事情紧急，不能拖了，你要立即答复！”

一方不答。

沉默过了一分钟，这边的山西口音开了腔。

那么，既然要开会，总得通知人参加……”

“叶帅病了，不要参加！……洪文、春桥当然要参加，……我和文元也要参加……还有，远新也要参加！”

奇怪的逻辑：党中央副主席不参加常委会，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毛远新却要参加，这是哪一个党的党章党纪规定的？

没等这边回答，只听对方的电话卡嚓一声撂下了。

这就是江青向华国锋下达的一个“命令”！一个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发出的“通碟”！不，应该说，这是梦幻中的“党中央主席”向副主席作的“指示”！

华国锋被这位高贵的遗孀折腾得实在没有办法，当天下午来到人民大会堂躲风。他按原计划，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一起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又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华国锋无奈地拿起话筒，只听里面大声责问道：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

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汪东兴奉命回电话给江青。只听对方问：“姚文元来不来？”

汪东兴回答：“这个我不清楚。华总理没有交代，就说请你来。”

江青“叭”地摔下电话，气冲冲地来到人民大会堂。

张春桥、王洪文像迎接“尊神”般，请她就座。

华国锋请她谈谈意见。

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子整理保存丈夫的文件、书籍、手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国

际上也有惯例，列宁的文稿就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一伙对保存毛泽东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但她不好明说，一看华国锋不表态，就要个花招说：“这样吧，文件辽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立即表态：“这样好，大家都放心。”

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不同意。

江青让张玉凤给她当秘书这一招不成，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喊大叫：“哎呀！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于是江青给张玉凤秘书安了个反动头衔之后，又给她扣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说她很不可靠，毛主席的文件处在危险之中，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江青露出了泼妇本性，信口雌黄，发疯般地向人身上倒脏水。

华国锋一看这个疯子闹得没完没了，只好宣布暂时结束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都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等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

他想用叶剑英的利剑来镇邪，接着说：“汪东兴同志跟随主席几十年，对主席的东西非常熟悉。按党中央过去的决定，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并向中央写出报告，现在大家忙于治丧，来不及清理，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一听傻了眼，想不到华国锋还有这一手！她正想发作，张春桥站起来一摆手，给隔断了。

到底是“军师”鬼点子多。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嘛。”

江青一听，深深折服“军师”的高招，立即说，“我也参加。”

然后吹嘘说：“毛远新来最合适，他最懂得毛泽东思想，常来找我问这问那。我相信他。”

华国锋没有同意。

“会议”足足争吵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汇报，叶帅一方面感到华国锋、汪东兴顶得好，在与“四人帮”纠缠的道路上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感到忧心和气愤。“四人帮”如此嚣张，欺人太甚！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更不能容忍的，江青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哪里还有党规党纪可言呢？叶剑英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一定得想个办法收拾这伙败类。

然而事态还在发展，“文件大战”并未收兵。

9月21日，当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骗走的两个文件并未退回。一件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记录副本，另一件是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这是两份带有重要机密性的文献，一定要追回。

江青和毛远新赖着不给。经过一番“争夺战”，江青只好交回文件，说

这是一次“误会”，但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转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她写了一张条子给华国锋，提出了这个要求，华国锋没有理她，把文件扣下了。

结果，送回的文件，被江青改得一蹋糊涂，她同外国人谈话记录中美化自己、攻击别人的语言文字大段删除；另一份谈话记录则是经过伪造的。其中竟说1974年毛泽东要杨得志、王六生“帮助叶群”等等，而叶群3年前早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岂不是鬼话连篇！

最狡猾的人也是最愚蠢的。江青一伙原以为将文件骗到手，经过密谋篡改，妄图借毛泽东之手，来整军队领导干部，后来被迫退回文件，又慌了手脚，以假乱真，竟将1974年毛泽东谈话的日期改为“1976年”，更荒唐的是江青竟在这份“记录稿”上加了注释，还签了大名。真是欲盖弥彰。

关于这场“文件大战”的始末，张玉凤秘书曾经作过如下揭露：

“江青阴谋盗骗毛主席手稿和文件。主席逝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儿。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地（的）。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求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两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这是对江青阴谋盗骗毛泽东手稿和文件的有力罪证。

“四人帮”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在所谓“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文件大战”的同时，他们在保护毛泽东遗体方面，继续出难题，设置障碍。9月19日晚，确定转移毛泽东主席遗体，原来江青。毛远新说要参加，可是后来他们听说保存遗体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有问题，竟制造借口说，既然不让他们保管文件，保存主席遗体活动也不参加了。为什么对“文件”是那样热心，而对“遗体”又如此冷淡？这不值得深思吗？

无独有偶，就在9月21日，封存文件这一天，王洪文竟转移“战场”，悄悄返回上海。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分，在大力督办“第二武装”的同时，又大造舆论，到处散布说：“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春桥和我对有些人的疏忽很有意见。”他说的“有些人”就指的是华国锋等人。当人们关心地问怎么办时，他把责任全推到“中央”头上，说：“下一步，你们听中央的统一安排吧！”并以此为借口，要接受处理遗体的单位拖延时间，以便一旦遗体处理不当而影响保存时，就将反毛泽东的罪名加在华国锋等领导人的头上。这是从上海战场飞来的一支毒箭，又可谓“一箭双雕”了。

“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深切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该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认真考虑了叶剑英的意见，反复思索如何对付“四人帮”的策略。

是的，应当多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他已经主动找过一些老同志了。邓

颖超、李先念、汪东兴、苏振华、陈锡联等人都向他提出过一些建议，酝酿治国安邦的大计。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这位老革命家，虽然仍然挂着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但也只剩下一顶好听的空头“桂冠”，时而而在医院，时而而在家里“休息”了。他虽然被迫成了“闲人”，但人闲心不闲，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悄悄与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论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今天突然见到华国锋总理亲自来访，甚为欣慰。

华国锋进得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地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在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剑英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先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走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种“巧”多半是说编书人编出来的，而这里说的确实是真事。历史确有这种巧合。

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剑英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剑英。

聂荣臻自从毛泽东主席病重以后，就从西山迁回城里居住。下山之前，他与叶剑英依依告别，互相约好，有什么消息要多通报、多联系。他以一个政治战略家的眼光，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越来越感到“那几个东西”折腾得要翻天了。这一天，他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特意请到家里，面授机宜。

杨成武，这位出生在福建长汀农村、闽西红军的老战士，中国著名的现代军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聂荣臻领导下战斗，是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的著名将领。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军区和总部工作。不仅对聂荣臻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逝世后，他因为工作关系，常住在西山，与聂、叶两位老师接近的更多，更密切。聂荣臻下山之后，他很自然地成了两位老师的“联络员”。

“我离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荣臻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在西山仍住五号楼，离叶剑英的十五号楼也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剑英，杨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头满好的。”

聂荣臻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十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行踪不定。

聂荣臻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荣臻交待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剑英，并且

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荣臻，连夜上山，来到十五号楼，叶剑英听说“联络员”有要事转告，他怕隔墙有耳，领着杨成武到房前的小花园里，听完了汇报后，他高兴他说：“听明白了，明白了。”

西山的夜，宁静安谧。

叶剑英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望着眼前压满枝头的苹果树，暗自想到：熟了，熟了，就要成熟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你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找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9月24日下午，秋高气爽，日暖风情，正是出游的好日子。老革命家李先念以逛西山植物园为名，乘车在通往香山的大道上急速奔驰，过了颐和园、卧佛寺快到植物园不远的地方，他悄悄告诉司机迅速折回向北，直去西山深处。车子停在象鼻子沟。他吩咐随员，通知十五号楼，有事要去见叶帅。

警卫参谋接到电话，立即报告首长。

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猎犬”就在身边走动。见还是不见？本想下见，又觉得不妥。他犹豫了。叶剑英被宣布“生病”以后不久，李先念也遭到“四人帮”嫉视，因病“休息”。他冒着风险去看过叶剑英，劝他好好在京“休养”，不要轻易走动。两位老革命家密谈一阵之后，叶剑英告诉他，以后不要到家里来，也不要打电话，免得惹是生非。自此以后，果然有好长一段时间彼此没有联系。

现在隔绝好久的李先念来了，又是在王洪文监视之下上山来了！

“马头”又来报告：“首长，先念同志已经来了！”

叶剑英赶紧出迎。

“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叶剑英迎到走廊里风趣地问。

“当然是东风喽！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李先念幽默地回答。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着走进了内间坐下。

叶剑英猜老战友此时冒险而来，可能有要事相商，便郑重地问道：

“你是因为个人关系好来看我，还是奉命而来？”

“两者都有。”李先念环顾四周，爽快地说。

“啊！明白了。”叶剑英习惯地扭开了收音机，放大音量，《红灯记》的声音又高叫起来。

李先念压低声音，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一再说：“他的意思请你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才好。”

“好极了！”叶剑英抑止下住内心的激动。他盼望此刻已经好久了！需要他最后下决心，拿主意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他愤愤地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李先念也谈了对形势的估计，赞成叶剑英的看法。他们密谈一会儿，感到事关重大，需要妥善处置，周密部署，当机立断。尽管时间和环境不允许他们多谈，但这次关键时刻的会晤，对于促进叶剑英最后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送走了李先念，叶剑英带着亢奋的心情下山来到二号楼。在这里，他特意召见粟裕、宋时轮将军，向他们打招呼：“要加强戒备，在这个时候，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

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特来见叶剑英。叶剑英微笑着说：“你

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正在考虑聂总上次说的意见。”并诙谐地补充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叶剑英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过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到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他又叫人请来了“联络参谋”。

王震一向是叶剑英有令召之即来。来了以后又是深深一鞠躬。

“胡子，你的任务还未完成。”

“好，我这就去唱‘二进宫’！”

老帅悄悄告诉他李先念来过了，事情不能再拖了。王震即刻又到陈云那里去请教。

这位老革命家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新的“夺权战役”

且说王洪文一觉醒来，发现叶剑英在西山上消失了，大为吃惊。一打听，知道叶剑英搬到玉泉山，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往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只好向江青、张春桥报告。此时“四人帮”在活动方式上也注意“隐蔽”。江青自毛泽东逝世后，又搬回中南海，张春桥在钓鱼台坐镇，汇总情报，出谋划策，与王洪文。姚文元商量之后，再由他进中南海报告江青。

这一天，张春桥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王、姚碰头，王洪文谈了在西山、玉泉山所见所闻，“军师”发现“草包”受了骗，大为光火，三个“男臣”经过一番研究，密报“女皇”，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凌厉攻势。他们一方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事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拉不动。

与此同时，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他所说的“集体领导”，就是“四人帮”领导；“接班人”条件就是“四人帮”上台的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不放心，又派肖木送口信给上海市委领导人，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是个阴阳怪气、善于“正话反说”的大阴谋家。在这里隐晦地告诉上海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要准备“打仗”。他提出“问题是谁挂帅”？就是暗示解决“挂帅”问题，就要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张春桥的这个“口信”，实际上是“四人帮”要武装夺权的信号，也是给上海同党下达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9月28日晚间，张春桥悄悄窜到中南海江青住处201号。在这个古色古香和洋里洋气设备结合的高级“逍遥宫”里，当年上海滩的一男一女又窃窃私语，酝酿发动一个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午夜，时钟敲过11响。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想通过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她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良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

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多数委员心目中，过去碍于“投鼠忌器”，关照并谅解江青，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毛泽东选定了第一副主席以后，江青等人继续无理取闹，毛泽东逝世 20 余天，越闹腾越厉害，使人再也无法忍受了。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这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整人有经验，搞阴谋有经验，她什么本事也没有，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怎么能让她当党中央主席呢？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这完全是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说什么毛远新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已经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如果有事，他可以留下。这封信是个“问路石”，想试探华国锋，让他表态。其真实意图是要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烂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一听，气得“三尸神蹦跳”，连声叫嚷：“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强调说：“毛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也不示弱：“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下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

江青一听，被抓住了把柄，马上摆出泼妇姿态，大声狡辩，极力否认。但江青忘记了她说此话时，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都在场，而她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讲。

在会上，汪东兴出面作证，王、张一声不吭！江青立刻大哭大闹，撒泼地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会议陷入冷场。

过了一会儿，善于“揩屁股”的张春桥又摆出调解的姿态，开腔了：“还是这样吧，要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自知理亏，擦干眼泪，放弃对峙，来个鹦鹉学舌：“对！还是把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

叶剑英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一直在观察“四人帮”的表演。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四人帮”想把他留下，一起闹事，这怎么得了？何况毛泽东生前就叮嘱过毛远新，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而他又偏偏同她搞在一起！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和其他几应委员也都附议，支持华国锋。

“四人帮”继续纠缠，摆出种种“理由”，坚持要毛远新留下。

会议僵持不下，从头一天的午夜已经跨入了第二天凌晨了。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使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突然，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

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接着，几个男臣随着“女皇”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王洪文使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权威，也跟着喊：“无关的都走！”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且已宣布他退席，如果坚持不走，将影响华国锋的威信，又势必和江青一伙发生正面冲突。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好结果，再参加下去，将毫无意义。他从大局出发，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会场上只剩下六七个人。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

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有的委员在会议室外等了一会儿，看没有结果，又走进会场，说华国锋身体不好，会开长了不好，建议休会。

“四人帮”坚持不散会。

江青一看叶剑英和一些委员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毛远新帮助整理文件档案，所有文件应该统归她保管；一会儿又说要召开三中全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随着江青的调子，一呼一应，帮腔作势，起哄助威。华国锋、汪东兴等刚一插话，就被她强词夺理，从中打断。后来，他们以沉默相对，索性听对方讲，不吭声了。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有关三中全会问题“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连串诡计，再也不能迟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分，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站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使华国锋感到政治局会议无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否定了这种设想。能不能采取简

单的办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他找来了叶剑英商量，他们最后认为这个办法也是不可取的，到底怎么办？叶剑英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办法。那时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10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名，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以借鉴参考呢？叶剑英终于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召开什么样的会议？会议又由谁来主持？都要什么人参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叶剑英和华国锋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名义，讨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办理。至于时间，拟过了国庆准备10天，视情况再定。

反革命宣言书的出笼

1976年的10月是一个风雷激荡的10月、剑拔弩张的10月！

在这个月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杀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100条狗困难，捉1万个、10万个反革命容易。上海精选10万民兵，每人发给40发子弹。”

“四人帮”通过四条线把“帮精神”传到上海，与上海的同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几十月来，上海同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通电话）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丑恶表演。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上帝要那些人死亡，必先使他们发狂！”即将覆灭的“四人帮”完全疯狂了！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像、办公像，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像，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记者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这是骗人的鬼话！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像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他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拍照。这个一向穿着时髦、妖里妖气的“演员”，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了中山装，一本正经地照了17张标准像。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群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

权的战场！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等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从9月16日，抛出用黑体字印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后，第二天，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全国的《内部参考》上就定了调：“‘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从这一天开始，姚文元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反复宣专“不要怕重复”，规定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于是各种报刊像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大吹大擂，至9月30日止，只6种主要报刊不完全统计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236篇，占全部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导和文章的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作通栏大标题，有的把它当作毛泽东语录登在报头上，有的为此登了大幅宣传画……使人读不胜读，为了让人读懂，报刊上用醒目标题加以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革”的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总纲领”办。

华国锋很快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十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不料，这一“删”，却激怒了“四人帮”。他们经过紧急筹划，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他公然在文件上批，“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亲自出马找迟群、谢静宜，面授机宜，从经典里找根据，胡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更滑稽的是，她还要人写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坚持了刘邦的“既定方针”。果然，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照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

叶剑英一眼就看出了这篇社论的“背后动机”，如此露骨，如此恶毒！这不是一般的“社论”，不是一般的“黑文”，而是“四人帮”给大小喽罗们、“第二武装”的士卒们、效忠“女皇”的臣民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进军号令，他们打响了第一枪！我们怎么办？

这篇“檄文”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那里面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要准备“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又是斗谁？”……他越发觉得这场斗争就在眼前，是不可避免了！

叶剑英驻地的几部电话机，红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响个不停，秘书，参谋和随员们应接不暇，这些多半来自党政高级领导和老同志的电话，几乎是一个声音：

“叶帅看到今天的社论了吗？”

“首长审查过这篇社论吗？”

“叶副主席对今天社论有什么看法？”

……

这些电话最后总忘不了说一句，“祝愿叶帅健康长寿！”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像一股瘴天雾地的龙卷风，刮遍华夏大地。饱经十年浩劫的善良人们，又一次遭到了恐怖的袭击。

老一辈革命家和落难的“老家伙”们，焦心积虑，加紧酝酿着应变良策。

素有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的千百万干部和群众顶感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中国大地在颤抖！

“四人帮”在狂笑！

江青穿起黑“龙袍”，脱掉“连衣裙”，准备“登基”了。当代的“武则天”到处抛头露面，发表演说，大讲“相公堂子”和“女皇帝”。

姚文元关起门来，同他的文痞们加紧炮制各种“诏令”。

张春桥、王洪文躲起来摇着电话机，忙着发号施令，调兵遣将。

“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四人帮”放风，社会上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

余党们蛊惑人心，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里，鞭炮、红纸被抢购一空。

好一派热闹景象！

“四人帮”末日

黄昏。晚霞飘动。叶剑英坐进红旗轿车，向后望望西边落日，小声说道：“我们要来个‘夸父追日！’”叮嘱司机加大油门，要和落日赛跑，抄近路开往东郊民巷。

大红旗飞速急驶。在夕阳西下前，到达目的地附近，故意转了几个圈子，进到新八号院。

这是华国锋的新居，曾是西哈努克的豪华旧居。

华国锋在宽大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的“逼宫”攻势大伤脑筋。叶剑英的突然到来，赶走了满室的闷气，室主人顿时神情为之一振。

“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了吗？”

宾主落座以后，几乎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话题由此说起。叶剑英把这几天的所闻所见以及从各个渠道掌握的可靠情报，和盘托出。

华国锋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插话，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叶剑英，彼此交换着意见。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叶剑英怕对方未听清楚，又重复着说，“要快打慢，快打慢！”

很显然，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叶剑英在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华国锋脸上出现严肃的表情，沉思片刻，说：“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那就这样吧，”华国锋仍然不太放心，他想起不久前与汪东兴交谈的情形，说：“只是不知道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正说间，秘书来报告，苏振华就要来见。

叶剑英听罢起身：“我这就准备到东兴那里去。”

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负责就地解决。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几个死党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为了指挥解决“四人帮”的最后“战役”，为了保证这次“战役”大获全胜，万无一失，叶帅今天又上了西山。

这里，王洪文正忙着照标准像，早已离去。

这里，地下战备设施更为严密。

这里，层峦叠嶂，云雾统绕，比玉泉山更为深沉。

在这里，叶剑英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总理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梁必业这个“红小鬼”，早在中央苏区就熟悉叶“参座”，在红一军团，尤其在四野政治部工作期间，经常见到叶剑英，听取指示。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又一次当面聆听教诲，接受任务。他现在实际上主持总政工作，受够了“空头”主任张春桥的“闷棍”和欺压，恨不得一下子除掉“四人帮”。听叶剑英一说，便领会了意图，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当即表示全力以赴，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里，叶剑英又一次请来了杨成武。

他首先关心地问了问聂荣臻情况，然后说：“你可以告诉聂总，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杨成武还想再探听一下详情，未等开口，叶剑英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现在总参机关怎么样？”

“军队战备怎样？”

“没有问题。”杨成武满有把握。

“你要同可靠的同志个别商量一下，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像接受战斗命令一样，站起来：“请叶帅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在这里，叶剑英又拿起电话机，亲自给有关可靠的老部下通话。

一位空军的领导人深夜在卧室里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听到他亲切的声音，坚决表示：提高警惕，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10月6日，星期三。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风向北转南。

这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天。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个普通的一天。

这一天一切正常。

玉泉山九号楼的主人，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一切有序地进行着。

上午10时，秘书们上山来依次汇报，送批文件。

中央的、军委的、各总部的、国际国内动态和各种简报……

叶剑英元帅非常关注军事动态，认真听取，细心批阅。

中午，轮到“Teacher”汇报国际动态，叶剑英一边吃饭一边听。饭后，照样请他教英语。

文件处理完了，外语学过了，似乎没事了。不，叶剑英元帅心里装着一件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在等待电话通知。可是，桌子上的红机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动静。一小时过去了，二小时过去了……

3时30分。电话突然响了。

“晚八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马头”接到电话，立即报告叶剑英。

“好，作好准备！”叶剑英下令说。

整个下午，叶剑英元帅守候在九号楼，心情极不平静，但又显得平静异常。这是“决战”前的那种平静。他早已得到汪东兴的报告，一切都按照部署正常进行，结果如何？只须等待。他想起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战场上见分晓。是啊，再过几个小时便见分晓。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将对付的虽然只有几个人，可是牵连着亿万人民，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啊！每念及此，叶剑英一颗悬着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

晚上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

黑色的大红旗，向着西山落日相反的方向，直奔中南海。

晚霞满天，金风送爽，大红旗箭一般飞驰。

在车上，叶剑英元帅神态严肃，提醒警卫参谋，作好应急准备。

“马头”立即握好枪，觉察到今晚有点异常，心情有点紧张，但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一路上，你们要留心，看看有什么动静！”

叶剑英元帅双目直视车外，提醒警卫参谋和司机老赵。

车子临到西郊机场附近，叶剑英又叮嘱：“马头，看看机场上飞机有什么变化？”

老赵放慢车速，开到跟前，警卫参谋一架一架数过，报告：“19架都在，原来是20架，最近摔坏一架。”

大红旗全速行驶，路过五棵松。又听叶剑英元帅问道：“有什么变化没有？前面到木樨地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木樨地？“马头”和老赵有点纳闷。

“未发现异常。”

叶剑英元帅伸长脖颈，两眼一直盯着北边。来到木樨地路口，又叮嘱道：“仔细看看，北边过来车没有？”

“没有看见。”

叶剑英元帅松了一口气：“好，我们赶在前边了！”

原来他说的“北边”是钓鱼台，关心的是张春桥、王洪文的车子是否跟上来或超过自己。

大红旗走上西长安街，稍微放慢速度，继续观察未发现异常。到达六部口向北直插中南海西门。

“马头，怀仁堂你不是很熟悉吗？最近有变化没有？”

“马头”是从中央警卫局调来的。对怀仁堂非常熟悉。不久前，他还去过，没有什么新发现，便简要地作了汇报，但不知首长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说话间，车子驶进了中南海。夜色很美，天遂人愿。中南海的秋夜胜似春光。半弯弦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这样美好的时刻，庄严的“圣地”，将要发生一场特殊的“战斗”吗？千真万确。当年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叶老师，今晚却又一次亲临前线。不过他没有带来千军万马，也没有准备消灭万千敌军，只是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来到战场。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战场。这里，没有堑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肃穆安谧，灯光闪烁，在隐隐的月光下，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是那样和谐、平静、正常。

晚7时，叶剑英乘坐的大红旗停在怀仁堂门前。

叶剑英走下车，向随员打招呼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他望着幽静庄严的怀仁堂，疾步来到门前，那恭立在两旁的石狮，依然那样威风凛凛，栩栩如生。

警卫人员走过来向叶剑英元帅敬礼，并拦住“马头”不准入内。这时随员们才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太液池”平静的水面上泛起微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按常规，警卫参谋拿着文件包，是要送首长到会议室后再出来的。这既是为首长安全，也是为文件安全。“马头”拎着黑色的文件包，继续紧跟首长往里走。突然警卫科长又来“挡驾”了，说什么也不让跟进去，“马头”无奈，只好赶紧把文件包送给首长，正在拉拉扯扯，叶剑英急了，怕耽误时间，甩开文件包，独自进去了。警卫科长一看文件包落地，才让“马头”拾起来，快步跟上，并小声告诉他，送到正厅立即出来，这是纪律。

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华国锋和汪东兴已经在那里了。他们见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语。怀仁堂正厅，这个清朝慈禧太后用大量白银修起来的宝殿，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四壁空空，只在大厅中间摆着两个高靠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落坐。此刻叶剑英俨然是一位坐镇的大将军，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警卫躲藏在正厅屏风的后面；佐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正厅里鸦雀无声。时针指向8时。还算准时，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了。一进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对，嘴里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只见华国锋立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张春桥，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决定，立即执行。张春桥双腿打颤，如同筛糠一般，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从怀仁堂外边走下高级轿车，两手插在怀里，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完全出于他的意料，行动组的另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走过来。这个政治流氓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造反派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是他的武斗看家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了。这一次，上海的“第二武装”和小兄弟们一点也没帮上“司令”的忙，实在是可惜！警卫人员带他走向正厅。从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复仇的火焰，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待他爬起来的时候，大概是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扫地，只好乖乖地立在那里，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对于这个无赖小儿、政治扒手，叶剑英只能投以十分厌恶的眼光，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直到此时，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服气。王洪文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动手”晚了，如果早一步，今天怀仁堂这场正剧的表演就该颠倒过来了，坐在那里扮演主角的该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就在他被带去候审、离开正厅的时候，警卫人员听到他轻声地发出这样叹息，“没想到有这样快！”可惜，到了这个地步，快也好，慢也好，这对于他已无济干事了，这只能反过来证明一条真理，那就是对付他们采取“以快打慢”的战略

方针，该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送走张春桥、王洪文，时针已指向8时15分。

姚文元还不见来，这条“鳄鱼”为何未上钩？等待在正厅的人们有点发急了，是不是由卫戍区解决了？还是其他方面出了“故障”？事不宜迟，临时决定重新打电话通知姚文元本人，“请”他速来怀仁堂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其实，姚文元早就想来中央开会了。“四人帮”的这位大笔杆子已是手痒多时。自从10月4日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杰作”之后，他得意洋洋，在另一篇经过他三次审改的更重要的黑文上“批示”：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今天是6号了，他正等待别人欣赏这另一篇“杰作”，再炮制新的产品呢！今天迟到究竟是哪里出了“故障”，也不必追究。他接到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嘴里如是说，心里更是急。他这个“秃头”，平时外出，总要戴帽子，可是今天听说请他开会，一时发急，竟忘了戴帽子，忘了叫警卫，只夹上皮包，跑进汽车，匆匆赶到了中南海。

谢天谢地！这个自称“文元”的“无冕之王”，终于出现在怀仁堂，不知道是因为他迟到被“处罚”，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竟降了格：第一，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第二，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经过请示，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待到姚文元听到“决定”，弄清怎么一回事之后，这个“金棍子”立刻软了下来，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一样，瘫倒在地。无奈，行动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位卫士只好扶他起来，将他送到该去的地方。

这个混迹中国文坛的文痞，不愧是叛徒、特务姚蓬子的辛儿子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曾经长期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效劳，是反革命舆论的炮制者和组织者，他日记中曾向江青表过功，要用他的“棍子”“参战十年”，横扫一切！这个一贯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电子计算机”脑袋也满灵验：十年一到，寿终正寝！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执行同样任务的行动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特意安排了两名女警卫。

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中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大典，实在是太忙碌、太亢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她穿着绸子睡衣正仰靠在法兰绒的长沙发里，一边看着进口的录相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不过，此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另一位干部带几名警卫已经跨进室内，向他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蓦地站起来高声斥道：“你们快出去！”接着连连呼叫：“来人啊！来人啊！你们在哪里？”

然而，这个作威作福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一下子躺在地板上，声泪俱下：“主席尸骨未寒……”

行动组人员实在无心欣赏这场“龙床惊梦”的闹剧，还是请她快点收场，换一个地方。“女皇”不得不离开“宝座”，跟随警卫人员去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平时受够“妖婆”窝囊气的服务员们此刻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又吐口水，又扔纸团，送走了瘟神！

关于这位瘟神“秘史”，中外已有几部专著，均是长篇大论，自不赘述。“四五”运动以来，倒是有些无名诗人的词，如《三宠三哭》、《赠某女士》、《秃儿想掘坟》、《气死你》等等，写得满有趣味，脍炙人口，尤其那首《终身误》，据说是出自名家赵朴初之手，当时争相传抄，广为流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洒洒数百言，这里只好割爱了。还有一首也为人广为传诵的，那便是广东省文史馆胡希明先生写的七绝：

“银幕华灯迹未残，山呼万岁梦江南。

当年庆寿人如在，记得几家旧姓蓝。”

这首七绝妙在揭露了 30 年代蓝苹女士混迹十里洋场，为蒋介石庆寿的丑事。这是江青一大心病，为此她曾将知情者王莹、郑君里等老电影工作者置于死地。此诗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灯红酒绿的旧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怡生堂后院原是毛泽东的接见厅，小小院落，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花草树木，幽雅宜人。现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远新，此刻这位“联络员”已经无事可以“联络”，外间纷纷传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阳。其实，他并没有走。一来，“母后”不让走；二来，他自己也觉得重任在身，走不开。他的妻子远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原来给江青女儿看过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在电视机的银光屏上，看得入神。

晚上 8 时许，李连庆出现在门口。

李连庆是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常来常往。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联络员”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仔细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脱掉往常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觉得有点异样。

“老李，有什么事吗？”“联络员”有点坐不住了。

“准备给你另外换个地方住，不要在这里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还要带点东西。”

“不要了，什么也别带，现在就走！”

直到此时，“联络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你来抓我？”他霍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质问老熟人。

老熟人开始不客气了，只好实话实说：“你说得不完全对，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来奉命向你传达一件事情。”于是把中央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复述了一遍。

“联络员”还算懂事，没有任何抗拒。接着，军人们搜出了他的手枪，然后将他带上汽车，送到候审的地方。

至此，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跨了“四人帮”。

4 年以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1991

年5月14日，在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北京她的居处自杀身亡。1986年王洪文因患肝病被送进医院治疗，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死。这是后话。

解决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正厅。

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叶剑英元帅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他和华国锋、汪东兴及全部参加这次特殊“会议”的警卫人员，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晚9时，叶剑英和华国锋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在怀仁堂召见了耿飏，命他带上一个营的兵力，立即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关，然后又同汪东兴一起紧急布置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一个紧急通知发出了：请在京政治局委员立即上玉泉山。

“马头”按照吩咐，迅速通过保密机通知玉泉山九号楼：首长开完会，就要返回。

叶剑英又吩咐赵司机开车在前引路，请华国锋乘车同路返回玉泉山。

大红旗载着胜利的喜悦，风驰电掣般穿过黑夜，驶向光明。

玉泉山以它稳重深沉的身姿欢迎英雄凯旋，欢迎决定中国命运的人们上山集会，重整河山。

九号楼灯光闪耀，笑语人喧。

留守的工作人员很快知道了山下发生的一切，一个个笑逐颜开，连走路也觉得轻飘飘的。

叶剑英请华国锋进到自己的卧室休息。

“马头”端来了临时准备的夜餐。两位领导人边吃边谈，商议即将召开的会议议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党中央主席的入选。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

叶剑英命令“马头”派老赵开车接几位秘书迅速上山。

秘书们立即带上战备和其他资料到九号楼。叶剑英见到他们高兴地说：“上海帮搞政变，让我们解决了。”随后告诉他们，现在辽需要极端保密，因为还没有发布正式决定。要立即与作战部、情报部等有关部门沟通联系，通知他们密切注意国内外动态，加强戒备。

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叶剑英终于想起了守候在山下，因失去联系而提心吊胆的孩子们。他要“马头”回个话，告诉他们：“放心吧，上床睡觉。”

随着时针的转动，政治局委员们从晚上9时以后陆续从山下奔往玉泉山，涌向九号楼。

九号楼的宽敞大厅灯火辉煌，顿时充满了紧张而热烈的气氛。由于紧急开会，内容保密，事先毫无准备，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叶剑英办公室奉命前来的几位秘书、参谋和领导同志匆匆忙忙投入了会议的布置工作。他们把原来的客厅临时改为会议室，从各个房间搬来沙发和椅子，围成一圈，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沙发前特意摆放茶几，充当会议桌。

会议室还没有布置完，委员们已经鱼贯而入。纪登奎和陈锡联来了。不一会儿，李先念也赶到了，这位老革命家很久以来一听说晚上开会，就顾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很关心叶剑英的健康，不知为什么这样急，是否叶剑英病重了……当他得知解决了“四人帮”之后，高兴他说：“真痛快！好

极了！”后面又有人来了，一时找不到座位。吴桂贤一边找椅子一边说，座位不够呀！陈永贵主动把沙发让给老同志，自己坐在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向汪东兴报告，应该到会的人员全部到齐了。

时针指向 10 时。叶剑英和华国锋从里边房间手挽着手，微笑着走进正厅里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庄严宣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开始。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 11 人。

会议主持人华国锋首先讲话，接着由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

会场沸腾了！

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与会人员听到解决了“四人帮”，欢欣鼓舞，异常激动。有些人流着热泪，互相握手拥抱，拍打着肩膀，嘴里不停他说着“好”、“好”，“这一下可好了！”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匠党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会议在叶剑英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对当时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告，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完全拥护政治局的决定。

会议从 6 日晚上 10 时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 5 时，整整一个通宵。

散会后，与会人员都安排在山上各号楼住宿。

千千万万正在梦乡里的人们，并不知晓这一夜在中国的大地上所进行的这一场“无声的战斗”，更没想到在祖国的“心脏”发生了比唐山地震还要强烈得多的巨大政治震颤。当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送走了黑夜，迎来黎明，蓦然间睁开双眼的时候，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奇观啊！

10 月 7 日。

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有多少事情需要急着去做啊！

这一天，叶剑英与住在山上八号楼的华国锋以及其他分别住在山上各号楼里的政治局委员们继续交谈，商量除旧立新的国家大事。

这一天，准备即将召开从上到下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

这一天，中央办公厅奉命通知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等立即赴京开会。

这一天，北京市委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配合下，以召开市委紧急会议的形式，召来了“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宣布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一向消息灵通的人士迟群，这两天竟害了“政治感冒”。前一天，他还在清华大学大肆吹捧江青，并带着挑衅的口吻大讲特讲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更迭的历史，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的赶下来就是了。”他断言：“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个原 8341 部队的宣传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扯着江青的“布拉吉”飞黄腾达，一跃而当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还嫌不足，正在梦想“二次革命”，乘机青云直上，他的梦幻彻底破灭了！

“四人帮”垮台之日，正是中国人民开心之时。

这一天，叶剑英想到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透露给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人。

邓小平对这个伟大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禁地向中央写信，高呼万岁！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师表示完全支持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断措施。聂荣臻向中央写信：“四人帮”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胡耀邦激动地说，叶老师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杨勇将军兴奋地说：“我原来准备同他们斗争十年，没想到中央解决的这么快！真是大快人心！”

因病休息一年多的余秋里，听到喜讯，立即表示：“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

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欣闻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拍手称快。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延续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整个算起来，“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据估算为人民币 5000 亿元。“大跃进”3 年的损失，则为 1200 亿元。

而从新中国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30 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是 6500 亿元，建设了大小 40 万个工交企业，固定资产约 4 至 5 千亿元。

由此可见，这两次折腾所损失的 6200 亿元，差不多相当于我国 30 年即 1949 年——1979 年全部基本建设的投资。

然而，林彪、江青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残酷地迫害干部与群众。

据粗略统计，其中“中共第 8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就占 76%，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占 82.6%，中央军委副主席占 85.7%，三届人大委员长和既是中央委员又是副委员长的占 70%，国务院副总理占 86.7%，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占 80%，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就占 75%。

要算一般干部、中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根据初步统计的数字，受到诬陷迫害的人数就有 70 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 34000 多人，而受到各种不同程度株连的多达 1 亿多人。

301 医院特殊病号的笑容

“四人帮”垮台之时，邓小平正在 301 医院治病。

邓小平为粉碎“四人帮”而兴奋，但也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着急。这一天，他将目光投向李维信。

李维信每周末 301 医院两次，探望邓小平，看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他从 1952 年进中南海，就一直为中央首长做服务工作，善于从一瞥目光、一个微笑或是一声轻咳里察知首长的想法和意图。当他的眼睛和邓小平的目光相遇时，立刻走到这位老革命家面前。

“首长有什么事吩咐？”

“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马上汇报。”

邓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虽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然夹着烟。他不慌不忙地将材料举在面前望一眼，然后朝李维信点一点头，李维信退到一边，邓小平开始看文件。他看得认真，可以说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加轻轻蠕动，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犀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当他的目光自上渐渐扫到下时，有时又跳到上面，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

他翻页时，神色凝重，一丝不苟，仿佛不是翻材料，而是在翻动历史，容不得那“历史的一页”留下任何一点折痕。

他终于读完了材料，放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重新将目光投向李维信：“坐这里，坐过来，”李维信坐到邓小平身边。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邓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烟，略有屏息，痛快地将烟喷出。长长的烟柱直撞到茶几上才翻卷着朝四周弥漫开。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没错，‘四人帮’，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早恨透他们了。”李维信说着，朝门口瞟一眼，忙起身让开一边。专家和医生们来查房，为邓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疗情况。他们脸上带了轻松的笑容。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舒一口气。

“小李，不要走。”邓小平招呼站到门口的李维信，“你也进来听听。”

李维信回到病房，听专家介绍病情和治疗结果。愉快轻松的笑声贯穿了检查和研究的全过程。

送走医生，邓小平两眼闪闪发亮，情绪很高。他将医生劝说少吸烟的话搁置一边，又吸燃一支香烟，兴致勃勃地问李维信：“再谈谈，外面还有什么新闻？”

李维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声。他生得肌厚肉重，开心时，圆胖胖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来，带着鼻音嗡嗡声气说：“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

呢。”

“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了？”邓小平的一双大眼闪烁出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维信做着手势说了那条“爆炸性新闻”。那是邓小平的女婿，骑了一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气缸爆炸了。金属碎片炸飞出去，炸到了哨兵。

“伤人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没伤。”李维信摇头，“气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腿上，没多大劲。”

邓小平松口气，随即感慨道：“咱们好多事情就是质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还一个劲自己瞎吹，那个‘风庆’号远洋轮，我说质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李维信本是随声附和，下意识地点着头，听到后面几句，哪根心弦被拨动一下，眼睛顿时一亮：可不是吗？“文化革命”10年，整天喊解放全人类，自以为最革命，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若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那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和解放？

“是这个理。”李维信相信地说：“我们老区不少地方到现在还吃不饱穿不暖。自己都没过好，还说别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解放，人家信吗？”

邓小平为这句实在话笑了，转个话题说：“我的电视机坏了，你帮忙找人修修。”

“没问题。”李维信像接受任务一般，“我找人修。”

他将电视机抱到广播电视部，找了一位管修理的熟人，说：“帮个忙，把这部电视机修修。”

“先放下吧。”

李维信把嘴贴过去，小声地，“这是小平同志的。”

“嗯？小平的！”这位熟人略一怔，马上来了热情。“邓快出来了，这是人心所向，我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电影。李维信拿来十几部解放的影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并未对这十几部电影获得解放感到满意。他说：“不止十几部好电影吧？过去许多片子都是好电影，都可以拿出来么演么。”

稍停片刻，邓小平带着回忆的神情，一字一板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多少烈士，我们活着是幸存者。老电影要解放出来，老同志更要解放出来……”

第二十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耀党史，红色巨轮拨乱反正。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

伟大的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转折。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徘徊，而且从根本上清除了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事业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和一切表现。同时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全会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与此相适应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党的十一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全会认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实行国民经济3年、8年规划和23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会公报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邓小平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遗留问题，开始了彻底纠正“文革”错误的历史进程。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提出力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全会把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会议认识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加以解决的办法，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制度。由此可见，我国后来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其原型都存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

全会对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十分重视，认为只有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下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全会指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9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全会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步清算了以往在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明确地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这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突破口。

全会高度评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打下了基础。

在组织上，撤销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有关彭德怀、陶铸等一系列重大冤案，增选了陈云、胡耀邦等人进入中央领导层。这次大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在1980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解除华国锋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点：开始全面纠正了自1957年以来在党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长期干扰，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确定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原则；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总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社会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大步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新生的土地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县甘地几个农民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这惊人之举挟重雷传到中南海，邓小平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于是他脚踏大地，在全国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变化。

为了寻求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管理农业的方法，各地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党中央支持农村干部和群众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发表不同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问题上，有些部门和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一方面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少数干部在群众的创举面前，忧心忡忡，甚至“顶牛”、“纠偏”。邓小平知道这个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使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人。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后，有的地方1年收入可以增加1倍。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干部、群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创造和意见，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分别到了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委托国家农委组织100多位农村工作者和经济界、理论界人士，分赴10个省、自治区的农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典型调查。

接着，1980年9月中旬，书记处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请到中南海来，专门座谈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为了节约开支，各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书记们，没有被安排住宾馆饭店，而是住在中南海的一些平房里。座谈会的会议室，就在中南海的院里。

中央领导人在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各种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反映了各地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承认这种不平衡。各地应该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办事，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种经验指导工作。

1980年9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中共中央1980年第75号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发展，它肯定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肯定了两年来各地干部、群众创建的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一种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一种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种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从政策上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在中央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形势迅速发展。到1991年，中国95%的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中国的经济始终建立在稳定的有活力的农业基础之上。

“包”字进城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而农村改革的成功，又对推进改革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改革呈现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态势和格局。

邓小平揭示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决策着眼点：“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从而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发展。

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他明确强调，“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在总结城市改革经验时，他指出：“深圳特区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而实行责任制，又在于把责权利结合起来。“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提出：必须巩固和发展经济体制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逐步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在继续执行现行财政体制和保障企业应有自主权的同时，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继续改革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以推动生产的发展。

十二大以后，工业改革以实行改税和用改革精神整顿企业为重点。

1984年5月，国务院在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精神指导下，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规定》，扩大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用、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10个方面的自主权。这对搞活企业、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商业体制、建筑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中国城市经济，在改革的大潮下，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基础上，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及时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小型企业和一些亏损微利的中型企业中实行租赁制；在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这无疑是对城市企业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出了号令。1986年以来出台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80年代初期的利润承包相比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强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二是更加明确承包企业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三是更加落实了承包经营的主体。正因如此，它一推行就深受企业的普遍欢迎，并引起国内外瞩目。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务院决定下发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向前迈出新的步伐。

从1987年5月开始，我国推行企业承包制有了突破性进展。是年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的面已达78%，其中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达82%，大中型商业企业达61%，全国供销合作社达90%，原定长期承包合同的大中企业占64%。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使城市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它改变了传统体制下企业作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依附地位，开始实现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使企业能按照国家计划和市场的需

要进行自主决策和自主经营。责权利得到进一步明确。从实质上说它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正确结合，一扫过去企业等靠要的不良习气，提高了企业竞争意识，开始以商品生产者的身分面向市场，不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许多城市还做了新的大胆探索。

一是股份制经济的试行。一些企业广泛推行两种形式的股份经济，一种是企业股份共有制，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所有生产要素都可入股。另一种是企业之间的合股股份制，这里有不同层次所有制之间的横向联合。具有代表性的是 1986 年 9 月成立的重庆包装印刷工贸联合公司。这个由市内外 113 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入股 413 万元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已成为重庆包装印刷业的主体。

二是租赁经营制。从 1984 年起，我国一些城市逐步在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中试行租赁经营。1986 年，有的城市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中，这是一种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进行转让的经营方式。其特点是上级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与企业生产经营和利益脱钩，而且因租赁经营对承租经营者采取的招标和投标制度，一种在平等基础上通过竞争选拔企业干部制度应运而生。

三是资产经营责任制。其目的是改变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一的经营方式，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经营者的责权利公私结合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与上述改革措施相配套，从沈阳市开始，各大城市还陆续出现了对那些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采取了破产警告和公开拍卖的办法。这无疑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新生事物。

总的来说，上述试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各有千秋，并有一定风险，但毕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可贵的探索，还应指出，即是具有重大的成效和历史功绩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也还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定阶段的选择，但绝不意味着最终模式。现实的问题和困扰，只能从改革中寻求出路，而决不能走“左”倾怀旧者的路，退回到旧的体制上去。

新的发展之路，只能在改革的进程中探索。

面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难局，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原则：“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

我们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者生，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崛起的特区

特区，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大思路的智慧的产物，是他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思路中，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不起来，不开放不行。

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办法。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时光到了1984年，由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的经济特区已诞生5年了，其效果到底怎样？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经过考察，邓小平对办特区有了新的看法，他于1984年春节在广州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他题的是：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深圳等特区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198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在海南建省，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国务院决定建立海南省筹备组，从1987年10月开始建省的各项筹备工作，1988年正式建省。海南和台湾同力我国两大海岛，面积相近，气候相似，自然条件大体相同。虽然经过建国后30多年建设，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还是落后的，与我国的台湾省相比，差别更加悬殊，因此，海南经济的腾飞，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再开国门

邓小平喜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海中游泳，水阔天舒，波涛起伏，方显出击水者的云水襟怀和刚毅本色。

1983年和1984年之夏，邓小平接近80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到渤海、黄海劈水击浪，从容泅渡。

1983年夏，邓小平的棒槌岛之游，留下了珍贵的摄影记录，从而使一切敬仰他的人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如何度过他的余暇。

是年7月，大连市延伸到黄海之滨的棒槌岛——岛上绿荫覆盖，景色宜人；岛外白浪滔天，气势壮阔。

邓小平是在到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之后来到黄海之滨的。他在长途跋涉之后仍然保持着浓烈的游兴。

棒槌岛的7天，除了一天因海上飘浮油污而没有下海外，他每天上午都投入大海，与风浪为伍，极目苍天，心旷神怡。

每天晨起，他照例要散步片刻。他穿着拖鞋，在林荫大道慢步。他不用人搀扶，相反地，却常常手牵着外孙女，信步而走。清晨树林中吐出的清新空气，驱除着污浊，增添着芬芳。

9时许，他和夫人卓琳，以及两个女儿和外孙、外孙女一起，登上面包车，向海滨驶去。

一下海，邓小平便从容地向海中游去。他头部露出水面，侧游着。碧绿的海洋，那样浩瀚，那样深沉，护卫着他，簇拥着他。有时，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借助风势，向他扑来。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劝他上岸。他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继续搏浪前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水调歌头》中的名句，概括了一切先行者、开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怀。要开创前无古人的伟业，要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怎么能没有风浪和雷电！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风浪，检验了和检验着每一个人。

已经入海游泳90多分钟了，大海拂弄着他的身躯，海浪吹打着他的肌肤。他没有疲倦。人们很难相信，他已经80岁了。

邓小平终于上岸了，他换好衣服，穿着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稳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有时，他和外孙，外孙女嬉戏。有时，他招呼着坐着轮椅的儿子朴方。有时他和女儿聊上几句。

他话不多，从来不喜欢多话、罗嗦。他的女儿描述她的父亲说：“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也许可以算作者人喜欢海洋的另一种涵义吧，邓小平再一次打开了国门，向大洋彼岸的国家开放，向全世界愿意帮助中国的国家和人们进一步开放。

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这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曾秘密南巡，视察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

30日下午2时半，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就要在这里诞生。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着重讨论如何加快步伐，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具体他说，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 4 月 19 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我国继 5 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这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

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 4 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根据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意见，党中央进而把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 年 1 月，召开了长江、珠江、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提出，先搞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对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有着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了会议纪要，并指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增加外汇收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还要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

这一决策，是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战略步骤，这个决定一出台，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对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果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我国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1988 年初，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大决策，中央领导人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要点是：（1）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2）沿海

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3）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广东、广西、山东、浙江、辽宁、贵州、内蒙等省区和上海、天津等许多沿海城市，都各自制定了自已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初步方案，并投入了实际的行动。

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在沿海形成了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这些重大战略步骤，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尽管有人把对外开放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声”，“特区姓‘资’不姓‘社’”等等。但是，开放的事业捷报频传，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巨变，现代化的新中国已起势腾飞，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

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是我党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客观基础之一。当今世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世界出口额为例，1950年世界出口额为579.2亿美元，1987年增加为24,000亿美元，37年间增长40多倍，平均年增长超过10%，若扣除物价变动的因素，实际的增长速度也在7%左右。以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为例，当今世界有一万多家跨国公司，它们在125个国家的地区设有9万多家分公司，雇佣外籍职工1,600万人以上。再以国际劳务市场为例，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86年各国雇用的外国劳力已超过3亿人，仅西欧国家雇用的外籍工人已达1,000多万人，占这些国家雇用工人总数的10%左右。总之，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已达到空前的规模并呈继续发展趋势。显然，我国要想取得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经济的有利条件，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客观要求。

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从直接向间接过渡，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步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个宏观管得住，微观搞得活的，能促进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新体制框架，而且我国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好，工农业比较发达，拥有较多的高校。科研机构 and 大批科技人才，这说明我国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能力。

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and 迫切性。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逐年告捷。

——对外贸易发展空前迅速。我国进出口总额，1950年只有11.3亿美元，1970年为45.9亿美元，1978年为206.4亿美元，1986年上升到738.5亿美元。1986年比1978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递增17.3%，大大超过前26年平均每年递增9.5%的速度。

——加快了引进外资的引进技术的步伐。从1979年到1987年6月底止，我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8,796项，协议金额5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19 亿美元。

——加强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截止 1987 年 6 月，我国已成立 70 多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约 4, 000 个劳务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达 72.5 亿美元。

当我们今天追溯对外开放的步伐时，一定不要忘记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起的窗口和排头兵作用。

中国的历史，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向前。

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

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以后，散步习惯虽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繁忙，散步时间相对减少了。而且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各种问题。他曾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干什么事情都一样专心致志，精神集中。他的桥牌活动是50年代在四川学的，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同时，他喜欢打台球，而且打得很出色，一次可以拿100多分的高分，有时，他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近两年来，尽管工作繁多，但邓小平却还是精力旺盛。有时，他可以同四五岁的孙子同室相处，孩子的干扰，分散不了他的精神，仍然入神工作。

为保持健康，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催促下，邓小平于1979年7月中旬来到黄山休养。

7月12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交谈起来。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

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浩渺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早晨7时半，邓小平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60里，邓小平虽已75岁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邓小平，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他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邓小平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千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邓小平宿住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

这次黄山行，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邓小平身体真是健康。而邓小平却想的是，他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老了，必须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开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解

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10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监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也是在同一个月，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完全赞成这个由陈云概括出来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被明确地肯定下来。

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同志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入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革命胸怀，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至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庄严朴素，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2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在讲台前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347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280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人们看到那些三十八九岁、40多岁、50多岁，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同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为全民族的解放建立功勋。如今已满头银丝的老红军、老

革命家肩并肩坐一起，手挽手亲切交谈的情景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实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列席全会的同志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 1700 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台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莫 200 来张靠背椅。十二大和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 70 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领导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 70 岁的领导同志，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而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一起，盘腿席地而坐。

1982 年金秋的下午，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见面。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时刻。

那是下午 4 时半。39 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入大厅。中央领导人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书记处的全体领导同志，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隆重而亲切的“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中央领导同志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 52 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邓小平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同志一样，原地站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 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人仔细地端详着这位 1966 年从大学毕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顶着“造反派”的干扰捣乱，团结广大职工搞好生产、精通本行业务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人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这 39 位同志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 46 岁的郝建秀，53 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 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 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 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 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 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 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 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 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 39 岁。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是 42 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现为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

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年轻人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递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它表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决心亲手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共产党人，逐步担当起无数革命先烈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开创的伟业的重担；年轻的同志决心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传帮带”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将近 1 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件毛泽东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任务。

没有军衔的“元帅”

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庆节。1984年。

这里，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全世界都瞪起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渴望刺激的眼睛。

至少在中国，能够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坐在电视机前了。如果统计一下，其人数肯定是空前的。因为眼下的中国，虽然每个家庭都在抱怨物价上涨，但是仿佛变戏法似的，电视机这种从前的高档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亿万人家。此前8个月，1984年春节前夕，并不富裕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曾发生所有规格、型号的彩色、黑白电视机销售一空的惊人新闻。

上午10点钟，实地坐在天安门前和通过屏幕仿佛坐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一起骚动起来。阅兵式开始了。

一辆黑色敞篷“大红旗”轿车驶到金水桥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挺立在车上，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响亮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庄严的注目礼接受了他的报告。这位当之无愧的三军统帅没穿军装。他是一位没有军衔的元帅。

黑色“大红旗”敞篷检阅车平稳、庄严地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他的四川口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统帅的威严与长者的慈祥，阅兵首长应有的标准化动作与老资格政治家的固有风度，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举止神态中。他使所有的天才演员都难以模仿。

情绪昂扬的受阅官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统帅，视线随着他缓缓移动……在同龄的中国革命家中间，他是最健壮的一位；在同等资历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在同辈的领袖人物中间，他是经历的历史阶段最丰富的一位——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给了他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现在，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他从草绿色队伍面前走过，像一座移动的青山，一座活的纪念碑。

他是一部活动的历史。

他正是以历史的冷静目光，检阅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凉”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

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国庆阅兵1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多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将军们戴上了金星肩章

1988年9月14日上午，怀仁堂里灯火辉煌。主席台的中央悬挂着大型“八一”军徽。大厅里坐满着人民解放军师以上军官。中央军委在这里隆重举行授予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高级军官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他们是中央军委委员供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授衔仪式由杨尚昆主持。

10时，授衔仪式开始，军乐队高奏国歌。接着，杨尚昆宣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场内全体陆海空三军军官起立。

第一个从赵紫阳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洪学智，身材魁梧，军容整齐。这位1929年参加革命、曾3次负伤、1955年就授过上将军衔的老将军，深感这次授衔意义重大，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实行新的军衔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对军队建设的关怀。标志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又迈出新的一步，为全军指战员展示了新的希望。”

第一个从杨尚昆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刘华清，1958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他虽然在人民军队度过了57个春秋，建国后担任过国防科委副主任、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要职，但他仍把这次授衔看作是革命生涯的新起点。他掂量着金色的肩章，恳切地说：“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也是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们要把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完成好。”

1955年获得中将军衔的张震把这次获得的崇高荣誉归功于无数牺牲的战友，他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出发时共有8.5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3000人，今天只有郭林祥同志和我，代表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接受这崇高的荣誉。这是我党、我军先驱们集体奋斗的结果。”他说：“这不足一两重的肩章重如千钧。全军在第一线工作的老红军只有10多位了。我决心在国防大学力培养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级指挥人才作出自己的努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年富力强的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和记者谈起接受上将军衔的感想时；引用了三国时著名军事家诸葛亮的一句话：“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先后5次负伤，9次立功受奖，曾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新将领，激动他说，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军好传统、好作风，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他把自己当作上将行列中的一个新兵。他说，我今天被授予上将军衔出现在老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要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为政清廉，严以律己，做人民的公仆，把力量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从普通飞行员成长力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驾机打过仗的空军司令。他1946年入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战绩，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以后当过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总司令员。他对记者说：自己成为空军唯一一位上将，这是

党和人民对空军指战员的巨大信任和更高的要求。自己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搞好空军现代化建设。他说，目前空军装备还比较落后，官兵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他决心和空军全体官兵共同努力，把人民空军建设得更加强大。

在镁光灯的闪烁中，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的最高将领们身着崭新的87式军服，佩带金色的肩章、符号，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向党和国家领导，向在场的部属们，致以庄严的军礼。

授衔仪式结束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身穿中山服，精神饱满地来到列队等候的上将们面前，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说：“我祝贺你们！”上将们向邓小平敬礼、致意。接着，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与上将们合影留念。

在此之前，全世界拥有正规军队的100多个主权国家中，只有两国军队没有军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而到这天上午只剩下了一家。

几个月前，西方记者曾评论说，中国的将军戴上肩章“标志着中国军队正规化的新纪元”。实际上，这“纪元”在33年前就开始了。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包括军官军衔制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同年9月27日，也是在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到1965年，共授予将官以上军衔1613名。

新中国没有大元帅，却有一副大元帅肩章——它陈列在天津南开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522厂的样品陈列室。30多年来，或许一直是一个“秘密”。

这副肩章是给毛泽东制作的。金黄色的版面。正红色边。版面上端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端绣银白色五角星徽，星徽外围绣银白色松枝。

这副肩章长14厘米，宽5.8厘米，边线宽0.25厘米，版面花纹宽为5厘米，国徽长4厘米，宽3.5厘米，是人工绣制的，星徽用金线，松枝用银丝。据说，当时全国人大决定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可是他拒不同意，于是这副肩章就摆在这里陈列了。

1965年，实行不到10年的军衔制度被取消。因为有人说，戴上肩章，劳动的时候很不方便；而实际上是将军衔与“资产阶级建军原则”等同了起来。当时没有人解释何以一支国家武装力量要以“劳动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兴废，更没有人说明现代战争规律是否因阶级而异。

1965年5月22日，那场大动乱爆发的前一年，《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获“全票通过”。

一个“纪元”被一只有力的手掌切断，然而，历史自有它自己的惩罚方式。

9年前，当中越边境发生那场“有限局部战争”时，在急行军的路上，成百上千台坦克车、运输车、炮车挤成一团，即使是军区军务部长亲自指挥疏导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人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谁也下认识你的军阶，下承认你的权威。

据说北京的老师们也通过录相看到了这一情景。在中国，没有准比他们更了解战争，更懂得军队制度建设对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了。

1980年3月12日，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

为此，我军统卒机关在8年内召开了有4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座谈会；

《军官军衔条例》先后修改 20 余稿。

1988 年 7 月：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以 122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制度也在与国际性的军事制度认同。

誉满中外

在庆祝建国 35 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大学生队伍中忽然展现出一条醒目的横幅：“小平您好！”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光明日报》曾载文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

这条横幅，是由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的同学制作的。9 月 30 日晚，他们为写这条横幅忙到深夜。写什么好呢？大家争先恐后地议论着，讲到中共在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力挽狂澜，大家想到邓小平；讲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大家又想到邓小平；讲到当前各项深得人心的政策，大家仍然想到邓小平。有人提议：“就写邓小平万岁！”但大家觉得“万岁”这两个字不够亲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小平您好！”

10 月 1 日凌晨，他们把横幅夹在鲜花中带进了游行队伍。当来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呼啦一下亮出横幅，高高地举向天安门城楼。大家高兴地说，“邓小平向我们微笑昔招手呢！”

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刘能源 10 月 2 日晚赶来祝贺他们，“你们的行动，道出了全国大学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

美国《时代》周刊第 2 次评选邓小平为 1985 年新闻人物。该刊从 1927 年开始每年评选 1 位对当年世界事务最有影响的新闻人物，到 1985 年为止，只有 9 人两次被评为新闻人物，邓小平是其中之一。1978 年，该刊曾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

《时代》1986 年第 1 期（1 月 6 日）发表“封面新闻”介绍邓小平，并刊登编辑部文章，说明评选的考虑，该刊说，参加评选的编辑们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倡导的改革在改变历史进程方面要超过 1985 年世界其它各地发生的任何事情。该刊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解放了 10 亿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改革成功，将在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和不可估量的后果。邓小平实行的改革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隔短短几年再次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难以相信。在改变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比得上邓小平。

美国《时代》周刊每年年终的挑选封面人物，是 50 余年来每年一件很重大的事。由于参加挑选意见者是该杂志的编辑与记者，竞争很激烈。驻地的特派员往往认为自己当地的政治人物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这类“偏见”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事。过分主观的意见就需要远在纽约的总部高级编辑来作审核，1978 年，邓小平第 1 次中选为封面人物，1985 年再次中选。董鼎山在 1 月 16 日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记述这次中选的经过，摘录如下：

1985 年度的选择早已于 11 月间开始。先是四五个高级编辑（副总编辑级以上者）随便闲谈，讨论《时代》各地记者与工作人员的非正式票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得到票数最多。由于南非的骚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黑人主教图图，以及关在牢内的黑人革命领袖曼德拉的名字也有人提及。里根总统的提名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并不引起《时代》各高级编辑的热心支持，原自不少。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人物，但是他在日内瓦与里根的会谈，并没有在核子裁军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此外，他不过是苏联的传统性领袖，并没有什么特色。

就在这个时候，在《时代》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时代》的首席驻外记者李却·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请他发表意见。邓肯举出下列几个理由，表明他推荐邓小平为 1985 年度《时代》封面人物的立场：

- 一、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 1/4 人员的生活将受影响。
- 二、世界 1/4 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 三、中共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 四、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这样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尚在犹豫不决、疑惑不定的几个高级编辑说服了。他们投票一致选择邓小平为 1985 年度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最后一关是要通过《时代》的大上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此职位原属已故创刊人鲁斯）。葛仑瓦德问了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答：中国一般人民似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答：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

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代表团于 10 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谈过。显然他自己也获得了深刻印象，用不着编辑们用大力来说服他。

“好吧，就用邓小平吧。”他作了决定。

世界 3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名青年 1985 年共同选举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 1985 年度“10 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这是“国际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爱德华·麦南理 12 月 30 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被列力本年度“10 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还有南非黑人领袖尼尔逊·曼德拉的夫人温妮·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的特来萨嬷嬷；以及为非洲灾民募集消除饥荒基金的爱尔兰歌星鲍勃·盖尔多夫等“一些激励人心的英雄们”。

“国际千年盛世协会”是一个由美国大学生发起的国际友好与和平青年组织。会员遍及美国和世界 31 个国家。1985 年中，该协会要求其成员选举本年度曾给予青年人以未来的激励的人物。结果，邓小平“因平静地将领导火炬传递给更加年轻、知识水平更高的新一代年轻人而于 1985 年享有国际盛誉”，被青年们共同推选。该协会认为，邓小平“与中国其他高级领袖们对于青年领导人所共同表现出的坚定信任是对全球青年人的一个极大鼓舞。”“点燃了如此众多青年人的希望之火，使其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被评上以后就接到一张请柬，邀请他去参加该协会组织的 1999 年除夕在埃及基奥普斯大金字塔旁举行的 2000 年到来的盛会。届时邓小平已有 95 岁了。

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麦克纳利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邓小平和 1985 评选上的另外 9 个人每个人都收到一张镌版刻印的请柬，邀他们去参加 1999 年在各金字塔旁举行的世界千年纪念慈善舞会。

麦克纳利说，该社在 31 个国家里的 3600 名成员选中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年轻的领导”。

麦克纳利说，千年盛世协会是 1979 年由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员在 6 大洲创立的一个国际性慈善团体。它的宗旨是要把 2000 年作为“国际上团结的时刻”来庆祝，计划在 1999 年除夕在全世界每一个时区都举行庆祝活动。

麦克纳利说，在金字塔旁举行盛大舞会的计划已经在积极进行。他说，他们协会已经同丘纳德轮船公司、埃及政府和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签订租用“伊丽莎白二世”号轮船、预定各金字塔旁的场地并为 1999 年的舞会进行其

他安排的合同。参加那次舞会的最终将包括 3500 位应邀出席的来宾。

他说，每年评选出来的 10 个人每人都可应邀前去参加这一舞会，全部费用都由协会负担。

该协会在 1999 年以前每年都将举行除夕慈善舞会，以筹集经费作为奖学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和千年盛世协会 31 日将在华盛顿主办第 2 次一年一度的舞会。

据北京社会调查所 1986 年对 8000 份问卷的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名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 71.78%，在中国政治家中占 87.52%。

这个调查是为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精神文明定量分析”课题而做的辅助调查。共计 31 个问题，其中第 25 题原题为“你最喜欢的在世名人？”在读者回信应答中，政治家、企业家、改革者、战斗英雄、文艺体育明星等各类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得票幸，其中政治家得票百分比最高，为 40.92%，企业家百分比最低，仅 1% 强。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1986 年 11 月一个晴朗的上午在这里把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领导人除里根总统外，就只有邓小平。有了这个徽章，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便可畅通无阻。

范尔霖高兴地对邓小平说：这表示你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欢迎，永远欢迎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来，永远欢迎你到美国金融市场来，也就是说，永远欢迎你到美国人民中间来。

邓小平说：“谢谢！”接着，两人隔着茶几愉快地握手。

这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范尔霖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该团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议。

在允许记者采访的 5 分钟时间内，范尔霖还告诉邓小平，“这次研讨会非常成功”。

邓小平问：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

范尔霖回答：出于相互学习和受教育，我们是来向中国学习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方面。我们中的这些人对美国金融市场情况很熟悉，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邓小平笑着说：主要是剥削你们，向你们学点东西。

这句话一下子把客人和记者们都说得笑起来，会见厅里洋溢着友好、愉快的气氛。

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83 岁的邓小平 1987 年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勋章。

在这天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院长阿卜杜斯·萨拉姆教授颁授了这枚勋章。邓小平委托国家主席李先念接受勋章并致谢辞。

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最近决定设立特别荣誉勋章，以表彰对第三世界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邓小平是第一个被授予这种勋章的国家领导人。

1989 年 2 月的一天，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丹尼斯·霍华德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代表邓小平领了奖。

世界桥联执委会于 1988 年决定设立荣誉金奖，以表彰对于推动世界桥

牌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在颁奖仪式上说：“香港桥协主席蔡国雄先生提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第一位获奖者，他的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荣高棠在颁奖仪式上转达了邓小平对霍华德先生和世界桥联的谢意。

颁奖仪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一行。霍华德在谈话中表示，中国有着发展桥牌运动的巨大潜力，世界桥联将努力帮助中国发挥这一潜力。说起桥牌，这里还有不少故事呢。

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牌艺。对此，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英国军队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亦是如此。

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桥牌荣誉奖，称他是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之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代表邓小平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授奖仪式，接受这一荣誉。杨小燕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的3月4日晚上。当时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美籍华人翁心梓夫妇。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翁的夫人季道基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的曾孙女。邓小平会见这三位华人，并同他们一起打了3个多小时的桥牌。事情的起源还要从1981年上海第一次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谈起。

这届邀请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城市20余个队报名参加。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3市，在翁心梓的努力下，组成4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领队，他们于3月3日乘飞机由美抵京，翁、杨提出希望在京期间与邓小平会一次面，或打一次桥牌，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把他们的要求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欣然应求，定在4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消息传到宾馆，他们都异常兴奋。最激动的要算翁夫人了，她整整花了半天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书店，到处寻觅《邓小平选集》，可是，当时《邓小平选集》尚未出版，最后她便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家觉得是个谜，因为她谁都不告诉。

4日下午5时，荣高棠为美国桥牌队举行欢迎宴会，翁夫人打开《周恩来选集》下卷，忙碌地叫大家在扉页上签名。宴会后，他们兴冲冲地赶到了养蜂夹道体育俱乐部。

8时许，邓小平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步入大厅：“欢迎，欢迎，欢迎大家，”翁心梓接过话题：“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邓小平笑出了声音，谦逊他说：“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话音一落，笑声四起，气氛是那样的亲切、融洽、活跃，这时，荣高棠轻轻他说了一声：“打吧！”并安排邓与翁结对，杨小燕与北京知名桥牌手丁关根搭档。杨小燕微微一笑，似乎也有点一本正经地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说：“行！”杨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和您结对？”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音：“好嘛！这样会更提高我的牌艺。”接着杨又问邓小平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小平回答说：“当然要精确叫牌法喽！”

这晚，大家的牌兴很浓，一直打到11点多。当邓小平向大家告别时，预先有准备的翁心梓夫人，急速地从皮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卷，双手

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邓小平欣然命笔，写下了苍劲有力的“邓小平”三个大字。此时，杨小燕似乎感到很懊恼，因为她没有这个准备，但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她手提包里急于寻找什么，看她急成这样，大家正在为她惋惜，终于在瞬间找到了她丈夫开份介绍办的复康轮船公司的介绍书一份，邓小平亦在这书反面签了名，杨小燕满意地笑了。

这是一次多么有意义的会见啊！翁、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便说：“桥牌就是一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引退内幕

198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中南海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个常委的面前。

这几位中国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者脸上都露出了庄严和崇敬的神情。这份辞职信出自邓小平之手。

自从1979年以来，事实上邓小平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内外都承认这一点。

有谁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自愿由大官回到普通平民的地位上呢。

邓小平做到了这一点。

辞职请求信是这样写的：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1月9日晚，电波传送出震动中外的信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广大人民群众对他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表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多少年，他自己一直就盼望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完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终于，85岁高寿的邓小平，实现了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的决定历数了这位经历曲折的职业革命家的功绩，其中提到：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

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

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90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还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邓小平含笑走出中南海。

生活在大家庭中

邓小平从公开活动中消失以后，他的日常生活成了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因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他的身体状况的猜测，经常影响到香港股市的涨落。

1992年12月底，香港《文汇报》刊登一篇题为《邓小平日常生活琐记》的文章，将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披露如下：

十分重感情 邓小平虽然较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的晚年并没有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据说，邓小平十分注重感情，极为看重家庭的团聚和睦，一贯主张全家人应生活在一起。

邓小平有5个子女，加上女婿、儿媳、孙子、孙女及亲属，一家上下共有18口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每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全部工资交给工作人员用于全家人的伙食开支，家里的伙食帐也由工作人员管理，月底将支出帐目公开。如果超支，由子女们出钱补齐；如有结余，则全家聚餐一次。

邓小平主张，家庭内部生活要“大集中、小民主”。所谓“大集中”，就是全家人要住在一起，吃饭时也最好在一起。如果有谁说好回家吃饭而没有按时赶回，全家人一定要等他回来才能开饭。但这一原则也不强加于人。家中有人认为当天的饭菜不合口味，可以单独去做，也可以到外面去吃。对于家庭成员中的个人爱好，邓小平绝不干涉，这就是所谓“小民主”。

邓小平重感情还表现在十分看重亲情上。他很喜爱热闹，尤其喜爱小孩。他常常动员全家人一起出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比如，每年一度的植树节，他都希望和全家人一起去。但他的子女们各有各的工作，很难凑到一起。这样，每次邓小平就带着孙子、孙女们去植树。孩子们不懂事，贪玩好动，不听管劝。但是邓小平不怒不恼，反而恳求孩子们要听话。邓小平说过，经常见到孩子们心里就有种平衡感，因为他们天真，有活力。

每天阅卷一大摞 和毛泽东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一样，邓小平生活也很俭朴、严肃，起居很有规律，在吃的方面没有过多的奢求。别人都爱吃好大米，可他却喜欢吃最普通的机米。过去，邓小平抽烟很勤，也颇有酒量。他常常一支香烟在手会见来宾。他最喜欢吸的是“熊猫”牌香烟。可是，据说在他86岁生日时，他终于断绝了吸烟，而且至今未见再吸。

不过，听说他现在仍然喝少量的酒，但已大不如从前。1986年英国女工访问北京，邓小平在钓鱼台养源斋设宴款待，宾主落座，邓小平举起一杯珍藏了20余年的“茅台”酒致祝词，然后一饮而尽，博得一片赞叹。

如今由于年龄的关系，医生对邓小平的饮食更严加控制。

每天在家中，邓小平最主要的事就是读书看报。他天天要看一大摞阅文，其中包括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各有关部委的选送材料和参阅材料。这些报纸和文件材料，是他了解掌握国际、国内最新动态的渠道之一。此外，他每年要花一定时间去外地走访考察，这也是他消息和信息的重要来源。

邓小平喜爱桥牌世人皆知，现在他仍然喜欢这种高智力的活动。尽管年事已高，但打牌时仍然思路敏捷，出手不凡。邓小平偶尔也搓麻将，却从不玩久，也不如打桥牌精心。麻将对他来说，纯粹是消遣性的娱乐，从未认真过。

对气功从不感兴趣 邓小平喜欢游泳，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避暑，在大海中遨游。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散步、爬山，也打高尔夫球。1992年年初，邓小平到广东深圳、珠海视察，参观游览，体力极佳，这与他平时喜爱体育运动不无关系。

前时海外有传言说，邓小平南行之时有气功高手相伴左右，时时发功为他强身健体。

据知情人介绍，邓小平对气功并没有一点兴趣，也从未做过任何气功。

不允许子女干政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次子邓质方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供职，长女邓林现为中央美院专业画家，次女邓楠现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小女邓榕至今则常常陪伴在父亲左右。

据知情人介绍说，在邓家的子女中，交友最广的是邓林，而且讲话也最随便，曾自称是家中的“政协委员”。长子邓朴方看问题则比较深刻，对于许多事情他都进行过深入地研究和思考。邓质方是学工程技术的，一心在自己专业上谋求发展。

邓小平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之前，他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出了问题他谁也不保。他的子女们都在社会上各有工作，回到家里总要对外面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进行评说。如某些社会现象，人们的思想情绪，各行各业一度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等，有褒有贬，有时也有牢骚。对于子女们的议论，邓小平总是静静地倾听，有时笑一笑，但从随便发表意见。子女们的谈话，是他了解外面社会的又一渠道。不过，议论归议论，邓小平决不允许子女们干涉国家的政治决策，他要求家中所有的人都要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利益。

子女出国要邓小平批准 邓小平在“文革”中落难，他的子女们均受到株连，有几位子女只好躲到平民人家。由于这一原因，邓家的几个儿媳、女婿。都出身于普通家庭，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是，凡接触过邓家子女的人反映，邓家人思想解放，他们从不歧视外姓人。

在当前中国人纷纷效尤“出国热”时，邓家的子女们并没有为之所动，因为，邓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们出国一律要经过邓小平亲自批准，否则难以跨出国门。以前有传言称，邓家的子女在海外有大笔存款，据知情人说，这是不可信的。

知情人透露，邓小平的子女们每次出国时所得到的收入和赞助，回国后一律要上交有关部门。长女邓林在香港办画展，每幅画售价极高，但她回到北京后，即将全部款项上交。邓朴方也是如此，他出国为残疾人基金会募捐，所得钱款也都全部上交用作残疾人的康复事业。这方面的事外界也有报道，确有其事。

第二十四章 华国锋定调“两个凡是”，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陈云重提六个历史遗留问题，两年徘徊时期终结

华国锋——毛泽东的影子

历史的发展本身是不会留有丝毫断层的。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也就是说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这期间的转换花费了整整两年有余。

在这个转换时期也留下了一位过渡性的人物——华国锋。

华国锋1921年生于山西，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当年毛泽东在上海南湖出席‘一大’时，华国锋才刚刚呱呱坠地。他与毛泽东相差28岁，属于两代人。

华国锋17岁参加抗日战争。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时，心情无比崇敬，那时他作梦也没想到38年后会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位接班人。

华国锋担任过山西文城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政委”就这么叫开了，他担任党中央主席后曾流行了“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大山岭住过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这首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国锋被调到毛泽东老家湖南，1952年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不久，被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而后是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位于的重要性。一年后，毛泽东见到他时开口说道：“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由于毛泽东对他有好感，华国锋进步很快。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修了一条铁路，把大批的红卫兵送到韶山。他得到了红卫兵的信任，不仅没有受到多大冲击。还很快当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升力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重新挑选接班人，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十大”后，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继任公安部长。

华国锋对毛泽东唯命是从。得到过毛泽东的很好评价：“你是个老实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既没有让有雄才大略的邓小平继任，也没有选择“有野心”的“四人帮”，而是出乎意料地把大权交给华国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毛泽东忧虑日深，病体更加沉重。一天，毛泽东把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找来，断断续续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咳喘起来，过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

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中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显然在诉说衷肠，希望华国锋等人能维护“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在后来的行动中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开国元勋共同决策，支持华国锋逮捕“四人帮”。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决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本来，时代把开拓未来的契机给了华国锋，假如这位“领袖”能“英明伟大”，也许今天就是华国锋时代了，也就不会有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三一医院中的邓小平什么事了。可惜又可幸的事，华国锋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一直走不出毛泽东的圈子。他穿上了毛泽东式的灰呢中山装，发型由寸头改成毛泽东一样的大背头，举手投足模仿毛泽东，为毛泽东修建纪念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选全集。巨人毛泽东的影子罩住了他。

粉碎“四人帮”过后，叶剑英派人通知了邓小平，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此可见，全党、全国人民渴望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尽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复出，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地原来的职务。”华国锋没答应。

北京西山，一栋别墅里，邓小平正坐在薄薄的烟雾中，思索那两封写给党中央和华国锋的信。

第一封信，华国锋反映冷淡。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批邓”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在他看来，邓小平复出必然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他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捉了“四人帮”，可不是为邓小平铺平上升的道路。

邓小平第二封信送出后，情况就不像开始那么简单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都希望小平出来工作。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逐渐向他逼来，要逼着他让邓小平复出，逼着他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看到了全国问题成堆，但他认为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于是，他的思想坚定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才是继承毛泽东遗志，坚持批邓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在10月下旬的一次听取汇报会上，华国锋指示汪东兴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派人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帅，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可是，等

到3月14日，华国锋却耍了一个小小的政治把戏，大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华国锋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会上，华国锋向与会者印发了一个所谓的“李冬民反革命案件”材料。他利用这个材料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卫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参加会议的老同志都看出来这是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制造障碍。有人站出来冲破华国锋的障碍了。

陈云是共和国的“五朝元老”，他了解并肩战斗过的邓小平，大是大非上不能妥协。他忿忿不平他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老将军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强大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然，他这个“时机”是有条件的。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经过长达9个月的等待，邓小平终于复出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华国锋的历史包袱并没有完全卸下，他继续推行“左”的路线，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论点。

“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

1976年一个阴沉的年底。

一天，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汇报后叮嘱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明白了华国锋的用意，点头答应。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这位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因捉拿“四人帮”有功，华国锋分配他分管全国宣传工作。

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很不客气地批评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讲话中，他还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搞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炮制的样板戏。他的理由是，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十二天后，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关。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隐讳地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他和华国锋是一个调：“要把‘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两个凡是”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

在这个阴沉的年底，人们刚度过“十月胜利”之后的狂欢，心情又被紧紧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全国人民深切愉怀周总理的情怀，非但没被时间冲淡，反而日益加深。

汪东兴请示华国锋，“现在《人民日报》社提出周总理的周年祭日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要准备发表，你看怎么办？”

华国锋果断地说：“悼念周总理要符合悼词的口径，那是毛主席圈阅过的，不能改。”

汪东兴领命而去。他指示《人民日报》社，不要发那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发四五篇就够，还规定，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经过毛泽东审查过。

《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接到电话后气坏了，大家气愤地说：“‘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总理，‘四人帮’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总理；不管他！发，发个够！……”

于是，《人民日报》连续地发表了悼念周总理的文章。1月8日这天，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周总理。

汪东兴对此很恼火，他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怎么？你们想推翻中央的悼词，给周总理另外写一个悼词吗？”

《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一听心里窝火，顶了他一句：“这是人民的意愿，你总不能不让人民说话吧！”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几天后。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部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过了几天，李鑫送来了华国锋要看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按照汪东兴的意见，集中强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汪东兴看后很满意，报经华国锋批准，批示2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至此，“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就在同一天，首都的其它报刊《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用同样的规格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

“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焦虑和不安，纷纷起来批评和抵制。

倍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当年4月，邓小平在未恢复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老将军工震来看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又是一通批评。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从王震的眼神里已明显表露出完全赞许。邓小平接着说：“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说，他自己也犯错误。一个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段话华国锋也听到详详细细的汇报。派去同邓小平谈话的人正是汪东兴和李鑫。

华国锋认真地听着，坐在沙发上好半天没有动。他无法反驳，只好默默承受。他也觉得，“两个凡是”的防线快要崩溃了。用“两个凡是”的观点来解释不批邓就首先解释不通，而为邓小平平反却是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的，自己首先就没有遵守“两个凡是”的要求。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提出的必须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去获得正确的思想，越来越得到思想理论界的支持。

1977年7月，邓小平的复出并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

“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正确认识，在公开场合批评、抵制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依然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8月18日，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大会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力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国的理论界不再沉默了，他们站出来提醒人们：什么是真理？是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

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率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是《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首都理论工作者张德成的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1000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发表后的一个月里，就陆续有20多封读者来信、来稿寄到报社编辑部，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显而易见，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已触及人们的心灵，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大解放的论战正在酝酿。

在这场大讨论中，最直接向“凡是派”冲击的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

邓小平再次复出，重新执掌大权后，有可个著名人物也随之复出。这两个得到重用的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胡乔木。胡耀邦接替郭玉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二胡”与邓小平关系都非同一般，“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尤其是胡耀邦，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上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上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胡耀邦复出后，在舆论上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

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国科学院时，就十分重视理论研究了。1976年复出初，已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其时，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他当中央组织部长后，更是举贤用能，当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就是其中之一。

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恰好《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空缺，胡耀邦考虑再三，调杨西光赴京任职。

杨西光到任不久，《光明日报》就发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的中国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1978年4月的一天，杨西光总编辑照例伏在办公桌上看大样，《光明日报》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由理论部送到他的手中，上面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特别醒目，按工作程序，必须由他审定签字后才能付印。

这篇文章下长，不到5000字，但是杨西光用了足足一个钟头。文章的

观点深深拨动他的心弦，他边看，边用手中的毛笔增删，口中不时叫道：“好！好！……”

看完之后，杨西光迅速在大样上写了一行字：“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

这篇文章最初的诞生只是普通的约稿。1977年8月，江苏省理论界召开了一次旨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讨论会，《光明日报》社受到邀请，理论部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到南京参加会议，并带去组织几篇稿件的任务。

在理论研讨中，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王强华就约请胡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答应了，两个月后，文章寄来了，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部经过5次修改，准备刊用，没想到被杨西光慧眼相中，决定放到一版。

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要冲破禁区，有利于拨乱反正，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于是，报社决定对文章进行大手术，把胡福明本人也请来。

文章定稿后，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送稿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完汇报，说：“别急，让我看看。”

十几分钟后，胡耀邦已通读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心论点是在否定“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坛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叫好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反对的。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晚11时，正在报社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他的前任尽管与他交情很深，但是电话里的声音很严厉，对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胡绩伟对听筒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5月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接到了《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来的电话。正是无独有偶！王殊批评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文章，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曾涛回敬他说：“我看不见得！”

王殊强调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汪东兴、纪登奎联合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关系其大，

后果堪忧，请示华国锋应付方针，不知是华国锋对问题的估计不足，还是觉得难以扭转，泰然回电：“且由他们去吧！”

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不能容忍大讨论如此蓬勃发展下去，他力主《红旗》杂志保持沉默，而且，多次公开批评这篇文章。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当时邓小平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反对派态度很强烈，就让秘书找来看看，他的评价很高，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道：“《光明日报》的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找到了支持的机会。在会上，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从理论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

之后，署名文章、讨论会不断出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氛围越来越深。汪东兴坐不住了。

6月份，汪东兴就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他的态度很严厉，人们惊讶一向温和的中办主任竟然动怒了。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讲到：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汪东兴火气很盛：“真理标准讨论是针对毛主席来的！”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红旗》保持了沉默。

《红旗》是党的理论刊物，华国锋、汪东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纷纷“背弃”后，牢牢掌握这块舆论阵地。

熊复是接替王殊后于5月17日到《红旗》任总编辑的。此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刚到《红旗》杂志社的当天，他就在见面会上发表意见。他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对这些文章，我也有不同意见。”

熊复对杂志社几位负责人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到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第二天，汪东兴来到《红旗》杂志社，赞赏了熊复的观点。平时很温和的汪东兴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马上动怒，他的火气很盛，用手敲着桌子说，“这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用十分坚定和信任的目光看着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

熊复有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更敢于公开他的办刊指导思想了。5月19日，他向杂志社的干部作了首次公开讲话

他说：“《红旗》的任务是完整而准确的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而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要注意党内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倾向。”

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各报发表文章，理论家撰文，科学家表态，中央领导表态，举世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7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在组织撰写文章之前，熊复已定下基调。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位被指定的副总编辑经过一个月苦战，在9月11日写出初稿。

初稿很快送到汪东兴手中。汪东兴起初不同意写讨论文章。后来经熊复再三请求才同意。当他看到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汪东兴不赞成，提议把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而且，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深入阐述实践标准问题。

但执笔者不同意，双方经过协商，最终定题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后来三易其稿，进行了多处修改，然而，最终还是流产了，没能刊用出来。

真理标准讨论不断深入，《红旗》杂志愈来愈被动。此时，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谭震林同志的一篇文章又给《红旗》带来一场麻烦。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日，12月份出版的第十二期《红旗》必须要有纪念文章，于是，编辑部从8月份就积极筹划，约请

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

谭震林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让他指挥组建中国二炮部队，挂帅进行核试验，但是，也受到过毛泽东当面严厉批评。“文革”中，谭震林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

接到约稿时，他坚决地对编辑部人员说：“文章要写，但是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谭震林文章的初稿 10 月下旬送到了《红旗》杂志社。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熊复看后主张删掉，但是责任编辑认为谭震林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增删应尊重作者意见。

正当《红旗》编辑部在争执未定的时候，谭震林又派人送来了修改稿，并附了一封信，说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阐述得不透彻，提得不突出，现补上加强部分。

熊复为难了。《红旗》编辑部派人登门告诉谭震林，中央明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

谭震林一听很恼火，气乎乎地对来说：“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在谈话即将结束前，他对来说：“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熊复对谭震林的态度是哭笑不得，只好把文章送给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党委审定，邓小平等人批示刊登，但是，熊复仍不能做主，又亲自写了一个报告给汪东兴

注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 85 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完，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他就是卷入。”李先念在 19 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少。”21 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汪东兴见木已成舟，只好说：“那只好这样了！”谭震林的文得以发表。

汪东兴觉得一直不顺畅，他的思想意志总是占不了上风，他把早就窝着的一肚子火发向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

建国后曾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在“文革”中被砸掉，粉碎“四人帮”后，拟定在 1978 年 9 月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 9 月 11 日出版。

《中国青年》第一期内容相当丰富，刊登了广大群众迫切关注和想了解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一章，介绍了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中，他坚定不移地同“四人帮”作斗争，面对

打击迫害坚强不屈。选登了倍受青年朋友欢迎的由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复刊后的这一期《中国青年》发行量巨大，仅北京的一家印刷厂就承印60万份，其他省市还有7个代印点，9月10日，北京市承印的已全部完成，而且有4万多份已通过邮局送至读者手中。

这天，分管中央工、青、妇工作的汪东兴也拿到了《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政治的敏感使他马上意识到，杂志有点走“味”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找到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很严厉地提出四点意见：

1. 《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2. 《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 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 为什么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韩英立即把汪东兴的批评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杂志社，责令杂志停印停发，等待中央指示。

编辑们对这一粗暴的干预不能接受，认为杂志内容没有错误或不妥之处，不买汪东兴的帐。

9月11日，编辑部代表全体编辑意见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中央正副主席每人呈送了一封报告，同时，还有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及负责人韩英也送了报告。

尽管杂志社极力申说，9月12日，韩英还是带着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条指示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在杂志社组长以上的干部会上，韩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求：一、由汪东兴出面清华国锋题词；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三、把《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部分“不妥当”的段落删去；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语。韩英还特别强调说：“关于‘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过态。现在《中国青年》的一些做法与华主席讲话精神不符，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损害了毛主席形象。”

第二天，汪东兴派人把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杂志社只好要求全国各地停印、停发，另外增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的三首诗词。

同时，编辑部一再要求《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最好不改。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二是已有4万多份发放到读者手中，删改后必将造成一份刊物两个版本，若是不能给读者以满意的解答，恐怕不利于安定团结。

《中国青年》一复刊就遇到磕磕碰碰，了解内情的群众十分不满，有人投书编辑部，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标语，呼喊“救救《中国青年》”。

得到广泛支持，《中国青年》再一次上书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最高领导，坚持认为汪东兴指示删改的两篇文章保留。

汪东兴恼怒了，9月14日，他指示韩英，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晚上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汪东兴脸色铁青地走进会议室，连开场白也没有，就开始了训斥：“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万1千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不要

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通过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备会。”

他说到这里，情绪更加义愤。他说：“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有通过筹备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为了证明他话的权威性、可信性：随手打开笔记本，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读了一遍。

他讲完了组织观念，又开始谈文章内容安排。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已出访），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定了。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面对韩英，像在责问韩英，又像在责问全体人员：“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

接着，他讲了第二条意见。他说：“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它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历史上有过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杂志社总编辑的思想不通也得通。火速派人赶赴印刷厂，让尚未发表的《中国青年》夹进华国锋题词、毛主席诗词重印。已发出的4万多份也全部收回封存。

华国锋检讨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真理标准大讨论充分显示了改革思想与保守主张的较量，大是大非即已分清。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也都开始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了。一些开始拿不定主意，立场上左右徘徊的地方大员陆续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对各路“诸侯”的发言，新华社统统播发消息，首都报纸则纷纷刊登。细心的人曾对新华社发稿时间做过统计，最早是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表态，最迟是11月23日，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表态，可以看出，同在一个地方，思想观点的转变也并不是同步的。

他们的表态时间依次是：

- 8月27日，汪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9月10日，廖志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 9月19日，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 9月24日，铁瑛，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丰平，第二书记；
- 9月27日，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3日，刘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5日，谭启龙，青海省第一书记；
- 10月8日 王铎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11日，霍士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12月，赵紫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14日，陈丕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17日，陈伟达，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杰刚，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 10月21日，许家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 10月23日，乔晓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26日，马力，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1日，白如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3日，王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5日，宋平，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7日，彭冲，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 11月13日，王恩茂，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 11月15日，任荣，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11月22日，段君毅，河南省第一书记；
- 12月6日，毛致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 1979年6月14日，万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 10月9日，李德生，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 10月19日，许世友，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向仲华，广州部队党委书记；
- 10月30日，萧华，兰州部队第一政委；韩先楚，兰州部队司令员；
- 11月10日，廖汉生，南京部队第一政委；聂凤智，南京部队司令员；杜平，南京部队政委；
- 11月22日，吴克华，成都部队司令员；孔石泉，成都部队第二政委；
- 11月22日，刘志坚，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委；李克忠，昆明部队党

委副书记、副政委；

11月23日，刘震，新疆部队司令员。

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两个凡是”的桎梏被打破，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时机成熟了。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强烈呼吁：“所谓‘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当肯定这次运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纷纷站出来支持。

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388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其后，中共浙江省委、江苏省委、河南省委也作出决定，郑重宣布为同类事件平反。

舆论界更为“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热情宣传。11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也分别发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永放光芒》等评论员文章。

强大压力一次次冲向华国锋，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他被迫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他说：“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是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同时，汪东兴也作了不太认真的检讨和说明。

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首先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从历史到现实，历数思想僵化、死守教条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他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的讲话归结到最终，还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同志的讲话，为5天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

陈云重提六个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按照华国锋的设想，会议主要议题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当然，经过邓小平，陈云老同志的极力争取，华国锋同意了首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

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的思想开始冲破华国锋事先定下的框框了。11月12日，在东北会议组，陈云一马当先。

陈云本来只是用平静的语气在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打算作更多的发言。但听到华国锋在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和稀泥”时，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重视这些问题，回避解决。

陈云忍不住了，在发言中提醒中央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列举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不能成立，他们出反省院是经中央和党组织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涉及到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也不是叛徒，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三、陶铸、王鹤寿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叛徒，应复查作出新的结论；四、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列举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敏感的、倍受关注的。而且，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各组发言活跃起来了。讨论中，大家又一次提起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等被颠倒的大是大非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代表的意见，11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二、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1975年下发的23、24、26、27号文件，1976年发的2、3、4、5、6、8、10、11号文件；三、“二月逆流”问题，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老师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四、薄一波等61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五、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予以否定；六、把陶铸定为叛徒是错误的，给予平反；七、定杨尚昆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八、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中组部抓紧审理。

紧接着12月8日至22日召开标志着改革时代开端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并且彻底扭转了党的“左”的思想。

在这次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对人事进行了调整。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检、政法等部门；邓颖超主管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组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长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调陕西省

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调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为中办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供销总社社长；任命刘澜涛为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保留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第一书记，胡耀邦为第二书记，邓颖超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至此，邓小平等走上前台，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结束了。

第二十五章 叶剑英问：“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邓小平接话，“我举荐一个人”。中南海来了“胡青天”

中南海的夜晚很美

在凉风习习的秋夜，那清澈如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在月光下显得分外静温和迷离。

穿过“菊香书屋”，在一个临湖的大院门。门上雕着“静谷”两个大字。院内松柏苍翠，菊花吐艳。这里便是毛泽东住的丰泽园。通常，他都要在月光下仁立一会儿，反剪着双手，仿佛在仔细端详一件艺术品似的欣赏院中的景色，然后，悠然地走进书屋，一直看书看到清晨方才入睡。

在这个院落里，毛泽东支持过江青、张春桥，接见过姚文元，鼓励过王洪文；在这里筹划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过刘少奇、陶铸、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是中国一切行动指令的中心。而今天，1976年10月6日，就在这个院子的旁边，毛泽东临终前亲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亲自指挥逮捕了他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人们在欢乐中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各种问题成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业停种，经济濒临破产，冤狱遍布全国。全国人民都希望尽快收拾好这个烂摊子，目光一起投向邓小平。可是，当时华国锋却不太乐意让邓小平复出。他把自己的发式改成向后倒，与毛泽东的大背头一样。穿着毛泽东式的衣服，模仿毛泽东的动作，到处挥手致意，严然把自己看成像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小平不出来，叶剑英心里可急呀！叶帅又想到闲着在家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叶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从大连刚回到北京，正在家养病。

叶选宁的到来令他非常兴奋。他招呼叶选宁坐下，马上说道：“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叶选宁高兴地认为，打倒“四人帮”，社会建设事业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胡耀邦微微皱起了眉头，说：“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呐！”

接着，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人心里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叶选宁临走前，胡耀邦问：“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回答道：“我让父亲去见他。”

“那么，请你让叶帅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他。”

胡耀邦的这句话叶剑英带到了华国锋，但华国锋听后只是用手抚了抚向后的大背头不置可否。叶剑英只好直截了当地跟他讲：“华主席，得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小平复出，人心大顺呀！”

华国锋不乐意听这话，但又不好讲，就把毛主席搬出来压邓小平，他说：“叶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现在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就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别人会怎么看？现在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吧。”

叶剑英只好说：“那可是要抓紧噢！”

华国锋嘴上答应：“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可他的心里却在筹划防止地位和权力陷落的防线，经过与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商量，出台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么一来，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千百万人的冤假错案，统统石沉大海！……

华国锋不仅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与胡耀邦提出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背道而驰。胡耀邦不懈地说：“‘两个凡是’哪是人心为上，简直是乱箭穿心嘛！”

经过叶剑英、陈云、率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终于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邓小平时代从此开始了。

邓小平一上台，就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宣传鼓动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颐和园旁的中央党校校门。

胡耀邦思索后的答案与老同志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明确批评华国锋：“‘两个凡是’不行”。陈云严厉指出，粉碎“四人帮”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杀气”。胡耀邦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杨逢春是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论水平也较高。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杨逢春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写什么？”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诉他。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杨逢春歉然道。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胡耀邦解释说。

杨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外，胡耀邦还找来了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胡耀邦为他们理了思路。

他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一次长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好这个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跨跨，得抓紧。”

胡耀邦是著名的“红小鬼”，对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总是念念不忘，所以，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就讲到延安时期。他非常激动地给大家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家常

便饭，党员见到党组织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话题收到当前。他说：“从1957年开始20多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必须要及时拨乱反正。现在真正要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基本构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着，他对杨逢春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文章可以写多长？”杨逢春问。

胡耀邦下加思索他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叶杨和陈中间：“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胡耀邦回答。

几个同志与胡耀邦谈了几次后，发现他对纠正混乱的干部路线的心情如此迫切，他们紧迫感也增强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来了。然后，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满意。

胡耀邦尽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当时思想宣传界还被“左”的思想统治，发稿的时间尚下成熟。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相机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历来坚决反“左”，他一针见血地在公开场合批评“两个凡是”。胡耀邦觉得这是批判“左”的东西的最好时机，认为应该让华国锋、汪东兴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点，抛弃原来的左的僵化的态度，化解与全国人民、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隔膜。

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华国锋从不提解放思想，从不提为被迫害、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许多还在“冰雪严寒”的同志有的开始失望了。

这时，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唤醒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胡耀邦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实，论理深刻，文词动人。文章的核心是论述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是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是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搞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制造谬论，传播流毒，对革命干部造谣、诬蔑、打击、陷害，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尽管现状如此，今天有些同志，特别是党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一部分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力度不够，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没有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使少数混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安然无恙。这一切都表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项严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

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心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投书、拍电报、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了两麻袋信件和电报。所有的来信、来电都对文章表示赞赏、支持、拥护。

有的人说：“文章说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说：“等了多少年，今天终于听到令人看到希望的声音”；有的人说：“希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继续大造，推动干部政策的彻底落实”；有一个被迫害的家庭写信说：“从广播里听到这篇文章，边听边流泪，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尽管顺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坚冰还没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谈何容易。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还在对着干。思想僵化的人打电话、写信到《人民日报》社厉声责问；一些地方打电话询问：“你们刊登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吗？”；态度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问题难办，不可操之过急。”

左的干扰使文章作者们对写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动摇。他们一起请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于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级台风”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长期笼罩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赏的军政干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于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他派到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把原部长安子文“揪”了出来，从此，掌管中组部的大权。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把持下，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借案持消极的、抵触的态度，并且发下话说：“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维持原样。”

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真正的“阎王殿”。对老干部的呼吁请求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要求组织上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还派人到中组部招待所把舒同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的6千多名中央机关于部被闲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图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视为“社会糟粕”弃之不用；被关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写信呼吁，甚至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对这些，郭玉峰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对原中组部和中监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也不给落实政策，仍然让陈野苹、张志杰、杨士杰等人天天扫院子，倒垃圾，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不准他们跨进办公大楼半步。

中组部有正义感，靠边站的人们愤怒了，纷纷起而抗争。人们采用了当时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贴大字报，一时间，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衙门作风，斥责郭玉峰的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行为，要求改变继续对人民、对干部犯罪的态度，强烈要求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同志妥善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大字报，有点着慌了，马上派人撕。就这么，前面撕，后面贴，中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积了好多纸。中组部的老干部把被撕下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又把大字报转给胡耀邦。

胡耀邦看着这些大字报，再听听同志们每天的汇报，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说：“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马上请来上次的几个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胡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等人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有关落实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开为干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面。”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文章题目叫作《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的言同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确，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篇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第二版也发表了5封读者来信，总标题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开始了。

此时，中组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撕了就贴，贴了又被撕下。有人觉得必须把中组部发生的斗争报告党中央。后来，有人把一批批大字报整理成情况汇编，通过《人民日报》社，拟出一篇题目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汇报，上报给叶剑英和中央分管宣传的耿飚。

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陈云和已复出的邓小平等中央老同志。几位党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识到中组部被郭玉峰搞乱了，工作搞坏了，12月初，经过党中央决定，把极左的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调走郭玉峰只是为工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叶剑英不无担忧他说，“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马上接上话，“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

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同意。

当中央找胡耀邦谈后，决定让他出任中组部长，胡耀邦一听，马上表态：“我愿意当这个包公！”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与全体同志见面。

欢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钟

12月15日早晨8时，一向安静得有些森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喧闹起来了。门庭前，一大群人个个手提鞭炮来到这里，他们有一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也有老干部、老同志，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买的鞭炮最多，10元多钱买了两大串。他们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门前地上争着燃放起来。

他们是来欢迎胡耀邦的。胡耀邦与他的秘书梁金泉在欢迎的鞭炮声中穿过人群，不停地与人们一一点头招呼，矫健地登上了办公大楼二楼。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办公室桌上，然后召开与全体干部见面会。胡耀邦说：“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影响最深，也是后来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话和两个要求。

他说的一句后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个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维艰，他是这样说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力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他的大胆令中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着大眼睛观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为了表明他坚定的信心，把手一摆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党内还有，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十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胡耀邦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索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

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高声呼吁：“要拨乱反正哪！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说着激动地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尤其是长期来一直“靠边站”的老同志，激动地淌出了眼泪。多年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话，今天胡耀邦说出来了，他们的心里感觉那可真痛快哪！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6麻袋。

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每一封写得都那么殷切。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写的联名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上干部100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他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副部长陈野苹和贾素萍、倪书林、曾志等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205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行动，深入到这些老同志家中，与他们座谈，听他们诉说“文革”以来遭受“四人帮”的压制、迫害。他们那充满感激的话语，他们那夺眶而出的热泪，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平反的心声，无不让工作组的同志一一铭记在心，工作组前前后后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写出了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简报后马上作了批示：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组充实人员，改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很快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同时，还本着对外文委同志的处理精神，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干部的工作问题。

然而，尽管“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坚冰仍旧没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还有少部分人仍坚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较“左”的“中央专案组”还把持各种申诉案和干部问题，使得许多案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给邓小平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的孟松涛，主张正义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但这时他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

邓小平看完来信后，在信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然后，让他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个申诉和批示都转到了中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组部无权审查处理应该处理的干部问题，而被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取而代之了。与解决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也都被“中央专案组”垄断，而对所有的案件，他们又要“维持原结论。”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远不止于此。“中央专案组”的个别人还对胡耀邦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异常震怒，大发脾气，道：“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面对着僵化而狂怒的面孔，胡耀邦毫不动摇。他决定越过“中央专案组”，直接向党中央汇报，争取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决定，支持中组部的平反工作。

此时，中组部的“党员之家”名声传开了。写信诉说冤狱的更多。

一天，中组部接到一个电话，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话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

“行！”对方很干脆。

打电话的人叫郑仲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

电话中，郑仲兵对陈野苹诉说起来：“‘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私下我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抵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陈野苹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后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让中组部的同志找到郑仲兵，对他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很快，公安部就为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名誉。

1978年夏天，73岁的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上访，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见到胡耀邦就说：“听说中组部的‘党员之家’真正成了党员之家，我就来了。”

“你可以把你的情况写出来，我们一定会为你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

恽逸群激动他说：“听到这话真让人高兴。1976年10月，党中央逮捕‘四人帮’后，我以为我天亮的时刻到了，我从江苏阜宁县的牛棚中跑出来，身无分文，一路乞讨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时我被赶出了中组部！”老人的泪光在眼中直闪。

胡耀邦听后心情也很沉重，他细心听着恽逸群对自己遭受的长达26年的沉冤。

恽逸群是一位北伐战争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元老。从1932年起，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

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新中国解放后，任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任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还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被开除出党。罪状很简单：一条是他同情其地主成份的姐姐，一条是把《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朋友开办小煤窑。不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杨案件”牵连被逮捕入狱。尽管后来公安机关查实他与潘、杨无关，还是把他当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3年。

刑满释放后，明确规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讲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经过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发放37元生活费。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斗、打倒、管制，几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着恽逸群的手，对他说：“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马上就会解决的。”随即，胡耀邦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认真解决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恽逸群的电话，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对他的错判，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恽逸群迫切要求发挥余热，安排工作。当年8月，中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先工作。

这天上午，中组部又来了一对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的60多岁的女同志扶着一个手拄拐杖、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同志。他们来到传达室问：“请问胡耀邦同志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志有个会。”门卫回答。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他。”

“好的。”门卫收入。

门卫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赶快把信送到楼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罢信，忙问：“人呢？”

“走了，留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胡耀邦长叹了一口气，说：“曾三、沈义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志啦！”

然后，他说：“会议暂停一下，我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听。”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

他用手不停地敲击桌子说：“曾三同志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贡献是重大的。这些当年我这个‘红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就这么一个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怎么会‘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呢？简直是莫须有！”

从批判“四人帮”联系当前，胡耀邦气愤他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下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马上在信上写上处理意见，让人送给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请求赶快落实平反。很快，曾三老俩口的问题解决了。

有人在中组部找下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里来，渐渐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

秦川，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处长，就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说了几句带疑问的话，被康生一伙诬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被定

罪力“右倾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一天，他来到胡耀邦家，要求解决工作，胡耀邦答应了他，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

一天清早7点钟左右，胡耀邦因头干晚上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钟才睡觉还没起床，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踏进了他的家门，朱鸿翔是为他的妻子周更鸣冤的，听了周更被“四人帮”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后，动情他说：“我一定要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

当胡耀邦带着朱鸿翔到小餐室吃早饭时，餐室里已来了好几位上访者。胡耀邦热情地请他们坐下吃饭，他坐在餐桌一头，其他人分坐两行。胡耀邦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先对朱鸿翔说：“我们一定会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更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好好好，非常感谢！”朱鸿翔连声应道。

其他6位上访者的意见，胡耀邦也都一一听了。

胡耀邦开始思索了，到中组部短短几个月，已有很多老同志登门上访，封件和电话不下千余，由此看来，有冤的老同志和干部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直接敞开心扉鸣冤叫屈，工作还得主动、深入。

他马上指派人员到中组部招待所找周扬、丁玲、林铁等尚未“解放”的老同志谈心，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采访他们。

胡耀邦听派出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还有不少老同志心有余悸，吞吞吐吐，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让这些调查的同志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老同志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做好对中青年的传、帮、带。这篇万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生定的“铁案”被翻了过来

一封于1977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信是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侦写的，事关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集团”的“六十一人案”，关系到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信中写道：“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歿，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写道：“这下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胡耀邦只道这个冤案的份量。康生“、四人帮”曾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帮”是如何精心炮制“六十一人”集团冤案的了。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帮”为了达到陷害党内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他们到处煽风说：“南开大学有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61人的‘叛徒集团’。”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得意洋洋他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并说：“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所谓“六十一人”集团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把他们统统当作“叛徒”抓了起来。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把正在疗养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红卫兵扭胳膊、揪衣领，推推揉揉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帮”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不久，就被押在德胜门外的监狱里，“罪名”一大串：“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狱中，薄一彼遭到审讯者的无数次毒打，但他坚持真理，勇敢抗争。

不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回北京，在火车上“畏罪自杀”，至今谁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杀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簿熙永、簿熙来、簿熙成，也都被残酷地投进监狱。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志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专案组对薄一波宣布：“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专案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

薄一波下愿再受人任意摆布和虐待，顶住不走。他要申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他转呈毛泽东。

尽管邓小平坚决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但是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仍然宣布审查结论，说：“薄一波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然后，还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每月发给薄一波200元生活费。

薄一波对“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诉。

8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们的结论。这个结论下符合历史事实，我不能同意。在取得专案小组同意的情况下，我写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查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

他和全国各地来京喊冤的上访者一样，亲自跑到中南海大门外，投了这封信。同时，他把信抄写了好多份，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传到毛泽东手上，使毛泽东了解他的冤情。

刘澜涛也是被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出来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在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拦住汽车，野蛮地揪走。

细心的人曾经作过统计，在“文革”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创下了全国记录。从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仅仅14个月里，遭受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红卫兵把他用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双手捆在卡车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从一个城市斗到另一个城市，从酷暑斗到严冬。每次批斗会，人多之时达24万之众，人少时几个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条混蛋的逻辑：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务”，因此，在把刘澜涛当成“叛徒”抓出来时，便无中生有，捏造诬陷说：“刘素菲是刘澜涛的老婆，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

造反派们闻风而上，不仅揪斗刘素菲，还对她拳打脚踢，残酷折磨。1968年元旦，刘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楼自杀。5天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不但不说明死因，不让刘澜涛向遗体告别，而且还丧失人性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几个孩子只好带着妈妈的骨灰转辗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陕北米脂老家。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也被揪斗，被逼得只有四处流浪。

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在草岚子监狱，是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1966年9月28日，也被当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犯给揪了出来。加给他的罪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1968年2月12日进狱，到当年11月8日，据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共被刑讯逼供，揪斗殴打194次。一次，在审讯中，专案组一个凶残的家伙对李楚离又是拳脚交加，罪恶的手指戳落于李

楚离的眼镜，戳进了他的右眼，李楚离疼得钻心，当场晕了过去，从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岚子监狱英雄的孔祥帧、冯基平也没有躲过劫难，都是先被关进监狱，后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这天应该是好日子，迷信点说全是双数，吉利，另外，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但对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来说，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创的“抓叛徒战斗队”扫地出门，有人鄙夷地指着一间茅房对他说：“这儿是圈狗的，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高仰云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现在竟去卧我们的狗洞。”

高仰云和妻子李琛遭到无数次毒打。高仰云的身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烧得一个泡一个泡，两颗门牙被打落，不能吃东西，不能讲话，他死后，造反派给他下个结论：“畏罪跳湖自杀！”李琛左腿骨被打断，双眼的玻璃体被打坏，差点儿被造反派用绳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长徐子荣，也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徐子荣被折磨死后，专案组向他的妻子孟松涛无情地宣布：“叛徒、敌特分子徐子荣的骨灰，一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里，三不能放在家里。”

孟松涛听后在心里哭诉：“子荣，你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泪和死亡写就的。

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成，不会提供给他们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还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但是，胡耀邦决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制造的冤案彻底平反过来。

得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天4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

为了减少阻力，胡耀邦叮嘱他们，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要审慎、深入、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贾素萍4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来到了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

在传达室，贾素萍等人一见面，便亲切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十多年来，造反派，专案组，不知多少次调查审问他1936年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情况，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声恶气，来者从不通姓名，更不会称他“同志”，这次中组部贾素萍等4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薄一波激动不已。

贾素萍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他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贾素萍几个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扫他的兴，就跟着薄一波来到他的房间，薄一波一打开话闸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狱经过，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诬陷全诉说出来，他一点也不

觉得疲劳，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北京的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稍为动一动就满身是汗。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在北京城到处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帮助他们平反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下马辉之，找到了刘有光、朱则民，然后，就一一与他们座谈，了解真相，倾听意见。

他们又找到了给党中央写信的孔祥祯，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那段时间的见证人。

听说是中组部的，是胡耀邦派来的调查组，早已残疾的孔祥祯马上请贾素萍等人进屋，并挣扎着与贾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祯激动地指着自己的残废的腿道，“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

他不知是身体虚弱，还是心情激动，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喘了两口气，稍做停顿，继续说道：“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于，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来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贾素萍4人在北京访问、调查整整忙了两个月。8月初，他们又奔赴到外地调查。

他们首先来到合肥。一下飞机，顿时感到好像掉进了火炉，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人皮肤火烧火燎，他们顾不上停顿休息，马上乘汽车赶赴安庆。

在闷热的安庆，刘澜涛还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当贾素萍等人说明来意后，刘澜涛也是异常惊喜，与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刘澜涛开口就吟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苍然，眼里噙着泪花。

他说：“康生、‘四人帮’诬陷我是‘叛徒’，关押审讯了我8年，1975年5月28日才释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不给我自由，不许我与孩子、亲戚，朋友、任何人见面。但是，我刘澜涛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的一颗赤子心永远是坚贞的。今天，见到你们，十多年来，才第一次见到亲人……”

老人呜咽了起来，激动的热泪滚滚，谈话不时中断。说完，他热诚地挽留贾素萍等人吃饭，说：“让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豆角，我烧的菜味道不坏！”贾素萍等人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听说中组部来人，猜想八九不离十是新任中组部长胡耀邦派来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过的种种折磨、摧残，头上一直被党内大奸康生和“四人帮”扣顶“叛徒”的帽子，以便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含冤衔恨过下去了。

贾素萍一见就问道：“安子文同志，你好吗？我们是来看您的。再请您谈谈您的情况。”

安子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亲的安慰，他忍不住呜呜呜地痛哭起来。他把十几年被揪斗，被踢、打、拧、掐种种遭遇一古脑儿全诉说了出来。

贾素萍等人接着又跑到山东、天津、吉林、陕西。10月中旬，来到西安访问唐方雷。

唐方雷和老伴赵辉被流放在西安郊县兴平县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他们的真实身分，只知道上面送下来时说：“这是个‘大叛徒’，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所以，村里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赵辉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双耳早就被“抓叛徒战斗队”打聋了，跟他讲话，只有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并让他看着对方的口形，才能听懂。

贾素萍等人赶到村里时，老夫妻俩正好到城里拉煤去了。两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不论吃的、烧的，都要往返50里路用一辆破架子车自己去拉。

赵辉听过贾素萍的介绍，抱着贾素萍，痛哭失声。他们的这个“家”——其实只是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农舍，一无所有，只有地上小堆红苕，就是他们全部的口粮。两位老人的处境令人心酸，贾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红润了。

贾素萍4人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他们每次回来都仔细的整理材料，撰写报告。胡耀邦每次都亲自听汇报，批阅送报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帮”对61位同志的诬陷的荒谬和令人发指。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中央常委参阅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帮”栽赃诬陷制造大冤案的丑行。否定了康生说的“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的谬论。

调查报告分为7个部分，讲了7个问题。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重大错案；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四、六十一人出狱后的情况；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六、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

中组部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及早平反昭雪。他们写道：“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平、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何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上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亲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5位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6月25日，为逝世的安子文举行追悼会。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相继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善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胡耀邦常常询问：“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尽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关心下情的作风始终没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人民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来信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说：“这个研究所是国家的重点所，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研究所的牌子还用‘革委会’，

胡耀邦愤怒了，他抓起毛笔，唰唰唰，奋笔疾书，写道：“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好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写完，胡耀邦抬头看看书案上的小闹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了。然而，他毫无睡意，又重新拿起笔，给中办信访局写出专门派人去天津调查的指示。

几个月后，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剧团一位女编剧，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爷爷”孙敬修老人的困境。这位女编剧来信说：“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积极为青少年编讲节目。但是，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给老人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希望中央能关怀照顾！”

胡耀邦看到信后，马上给中央信访办写了一长段批示：“全国只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并说：“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

北京市有关部门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后，十分重视，马上解决好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老人在元旦这天，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老人感慨万分地对人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同志读到这封信后，马上提笔批示：“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中组部组织局的同志带着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这里做好了组织工作。同时，根据这个事例，中组部总结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经验，帮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组织大门。

胡耀邦始终恪守一个坚定不变的信条：“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

1984年，由于少数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有人到北京上访20天，找了8个单位，无一处受理，令几人失望而归。

在近乎绝望中，他们致书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几位同志的境遇，更愤恨官僚主义害人。他在信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1984年10月，20多封农民兄弟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案头。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农民对胡耀邦说道：“我们通过勤劳致富，但是有喜悦，也有苦恼。农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车不行，我们想自己修路、买汽车……”

他又在来信上批示：“完全可以！”于是，从此民办交通开始发展起来。只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过问，海外华侨给他写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遣送农村管制劳动，年幼的弟弟韩仲元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给予关心，让有关部门给弟弟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

这只是一封极为普通的海外来信，而胡耀邦却认真对待，他写了批示让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到韩仲元所在的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处理这件事。

11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来到锦州，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与锦州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为韩仲元安排工作。韩仲元得到了工作，并且听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办信访局同志的手说：“请转告胡总书记，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

胡耀邦的一个批示又落实了，他很高兴，赞扬中办信访局同志工作做得好，在中办信访局送呈的落实报告上写道：“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000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从他到中组部上班没几天，就问中组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志：“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后五批摘掉帽子的，现在还有10万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胡耀邦神情严肃他说。

1978年春天，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胡耀邦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是让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同志带去了他的意见。

会上，杨士杰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右派分子’大多是学有所长

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所以，与会的听了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有人当时就对杨士杰及中组部展开批评。

胡耀邦听取杨士杰和陈文伟的汇报和书面材料后，吩咐他俩直接给中央写报告，陈述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个月后，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第二次专门会议，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论战仍然存在。有人主张：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清帐了。现在给他们统统摘帽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就足够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无担心他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下就乱了套了吗？”

“一点不错！”有人接过话头说：“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组部、代表胡耀邦意见的杨士杰则坚持平反，他手里抖动一叠厚厚的文字材料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后，五部门的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向中央报拟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划指挥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大规模的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据统计，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第二十六章 中南海档案柜破例打开，囚车驶进秦城监狱。法庭上，王洪文说“我认罪”，江青撒泼说：“打狗要看主人”

邓小平说：“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天后，全会公报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对“两案”审判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法制在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权威。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持废弃“文革”浩劫中所采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抛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的办案方式。

多年以后，一些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幕一幕。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的五层，人们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办公室。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这些人在为一个特别的节目庆贺。可知情人都清楚，这是在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腾出一个楼层，这个中纪委二办的具体职责就是，清理和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当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负责，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由黄克诚将军负责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由王鹤寿同志负责审查。

这就样，一场历史的超级审判序幕拉开了！

1979年7月28日，人们焦急等待的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组长胡耀邦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而严肃他说，“‘两案’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两个星期后，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胡耀邦把已复出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意见带到了审理小组。他在会上说：“要召开全国‘两案’工作会议，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讲，林彪同‘四人帮’这两个案子，要合起来通盘考虑，避免发生畸轻畸重，林彪、‘四人帮’这两个案子在国内国外影响都很大，不公开审理交不了帐。如果公审呢？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的确，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超级审判。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犯罪时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有着特殊的身分，16名主犯中三名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军界的主要首脑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此外，他们还把持

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

是的，尽管这只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审判，但它必定会如同“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样震撼中外。

三天后，胡耀邦又一次对“两案”小组作指示。他说：“这次对‘两案’的处理，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子孙后代查我们的档案，也会认为是公道的，没有冤案，没有假案……”

三次会议，三次强调认真处理好“两案”的重要性，工作紧锣密鼓，很快，胡耀邦把工作进展情况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9月3日这天，邓小平照例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紧张地处理送来的文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了。”

“哦！”邓小平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来与常委们一起听取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胡耀邦把近9个月来“两案”小组的审理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但是汇报完毕后，会议室里一片宁静，常委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邓小平，请他拿主意。

邓小平吸着特制的“熊猫”香烟，他猛吸了两口，在缕缕青烟中讲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判，按集团，起诉书把他们的罪行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把他们的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的罪行不一定那么细，不在于小的罪行。在于他的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邓小平讲完，又是一片沉静。

主持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望了望周围，他似乎在等着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但是，铺着猩红色地毯的会议室只有空调的清晰声，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做总结发言了。

他说：“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内纪律处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好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说到这里，华国锋顿了一顿，悄悄留心看一眼常委们的神色。很显然，大家都用略带惊讶的目光盯着自己，他也意识到会议室里的人们都在脑海中仔细比较刚才提出的“站得住脚”与中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本质区别。

他的话锋一转，用较为担心的语气说道：“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最后一句话，他的语气故意加重了。

见没有人插话，他又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了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这时，邓小平断然他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

但是，华国锋并没有消除疑虑，仍然坚持说：“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

胡耀邦马上说，“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

这就是由头。”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两案”的清理和审理工作大大加快了。1979年9月11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通知，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组织专人审查，起草黄、吴、李、邱的单人起诉书。

中南海档案柜破例打开

1980年3月底，在和煦温暖的春天到来之际，一项被定为“绝密”等级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它的主要内容是：一、“两案”小组对案子一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员会抓好“两案”的程序，要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三、对“四人帮”要专门组织一个预审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负责，抽6个省的公安厅长，每个厅长带3个人；四、彭真请求不担任审判委员会主任，但可以全面负责。

彭真对有关同志说：我看了对“四个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总之，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判，”

胡耀邦、黄火青、王鹤寿、江华等人一致同意彭真的讲话：要重视证据。人民等待着起诉，起诉代表着国家和人民。

很快，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的“两案”审判办公室成立，负责审判林彪集团案。与此同时，负责江青集团案的工作班子也在公安部大院内开始行动。

4月7日，浙江省副书记王芳、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洪沛霖、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卫之民、辽宁省公安局长左琨、河北省公安局长白均、副局长王文同等人，各带人员赶赴北京，参加对江青集团预审。这次借调的地方干部中，省委书记、省委、副省长3人，省公安局正、副局长5人，省局正、副处长、地市公安局正、副局长17人。规模、级别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拟定的“两案”主犯中，不断地变换着审判者的名单。经过五次大修改，原名单上的108名罪犯递减为80人，60人，40人，20人。最后，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鹤寿提议。特别法庭只审10名主犯，其他交各地方和军事法庭审判。

起诉书也从起草到第十四稿，材料，讨论，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罪行由八条到十条，又从十等到五条，到六条。一个繁忙而漫长的春季。

半年多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马不停蹄，为了弄清真相，审理人员深入河南访问林彪事件的见证人林立衡，询问曾是林彪贴身秘书的李文普……林彪集团案的罪证已在手400余件，证人证词111件，书证182件，同案犯交待162件，物证15件。

3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召开会议，讨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事宜。书记处成员胡耀邦、杨得志、余秋里、胡乔木等到会，彭真也被请来参加。

会上，气氛活跃，彭真、胡耀邦、杨得志等人各抒己见。最后，形成了六条意见：

第一，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

第二，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站得住脚，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

不仅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

第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

第五，根据中央的提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及王鹤寿、杨得志等同志参加；

第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4、5两个月做准备，6月初审判，7月底五届三次会议前结束。开庭审判时发一条简讯，审判后公布结果，由各界人士担任审判员。林彪等由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怎么审判，交政治局讨论。

13天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方案初稿形成。鉴于本案有“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特别及时”的三十特别，而且林彪案的被告都是军人，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初稿的内容还包括：建议审判人员从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选定，并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起诉，不公开审理。最后公开审判时，再组织万亲人参加大会。

这份初稿很快逐级上报到中南海。

一边是等待，一边是继续寻找线索。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被送上审判台的将是前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包括前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军界首脑及毛泽东的夫人。这是一场十分严峻的战斗！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到“两案”审判中。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高层决策者都认识到“两案”的审判将是国家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标志。

出于最稳妥的考虑，法制权威彭真被推到了最前线，被邓小平点将担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直至7月份，审判准备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尽管彭真曾多次在办公室和家中与审理人员讨论，但是起诉书对于许多罪与非罪还是难以确定，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原定的审判时间不得不再次往后推延。

“两案”审判虽不及“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具有世界意义，但是一向热衷于打探神秘东方的西方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一历史行动。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曾写过《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只好提前透露：“今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程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

时间不能再拖了！中央根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打破人为的“禁区”。

7月的一个会议之后，中央办公厅专门下达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准“两案”审判办公室为实事求是办案，可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有关单位查阅有关文件和材料。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机关的大门在法律的权威叩击下启开了，尘封了多年

的存放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央档案馆破例打开了档案柜。

为取证抽调的 14 名军官大多是师一级干部，个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出来的。

在进中南海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教育，晚饭早早地结束了。“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人黄玉昆、史进前将军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育。要求取证人员牢记保密条例：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下该知道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着，让他们把保密条例与党的誓词一起背熟。

当暮色刚刚降临，华灯初放时， 14 名军官分乘几辆轿车驶入中南海的档案馆。

每个门岗都要检查特别通行证，几经验证，他们被带进一栋不高的楼房。长期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地方，桌上摆满了厚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发言材料、决议纪要、文件批复等，中共最高层的每一次活动的历史印迹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囚车驶进秦城监狱

在京郊的昌平区有一座很独特的古堡式建筑。建筑物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平时总是紧紧关闭，一道灰砖拱形门更增加了它的威严。四周，警卫严密，防范设施齐备。

它就是中国的著名秦城监狱，以关押特重犯而闻名。现在，秦城监狱是关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地方。

可是，从1967年至1971年这段时间，这座享有模范监狱的著名监狱却成上演历史惨剧的场所，林彪集团的主犯之一王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是监狱负责人之一。据统计，这座监狱曾关押过高级干部500余人，其中，34人被整死，30余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有30余人被打伤致残。

历史有时确实令人难以看透。吴法宪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1年后会进入此地。

1971年“9·13”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其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被移送到这里关押，不久，“两案”的几十名案犯都先后送到这里关押。

秦城监狱的制度异常严格，尽管监狱事先得到提审犯人的通知，但是严格的检查还是一丝不苟。“两案”预审组的军官们从车上走下来先得到值班室出示身份证件。验证结束后，才通知警卫带犯人。预审组不准进入狱中，只能在专设的审讯室等候。

预审人员第一个提审的是黄永胜。

黄永胜仍旧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架势，对提审他的军官不理不睬、阴阳怪气，而且还吼叫道：“共产党的监狱是关反革命的，不是关浴血奋战的军队高级干部的。你们回去给中央……”

黄永胜不仅有一定的军事决断才能，而且是政治上的老手。面对“两案”预审组，他多次试图把他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划为路线问题。他十分清楚，若仅仅是“路线”问题上的错误，说不定有朝一日还可以东山再起！

李作鹏虽不像黄永胜那样顽固，但也是挣扎了一番才甘心认罪的。

吴法宪在监狱里非常乖巧，进门先喊“报告”，见人就呼“首长”，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中，态度是最好的一个。

邱会作与黄永胜玩同样的把戏，与预审人反复兜圈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罪行划为犯错误、不过，很快他就老实交待罪行了，并把自己干过的哪些坏事，连最残忍的恶行都写得一清二楚。

在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中，江腾蛟、李伟信坦白承认自己有罪，王维国、陈励耘等12名被告也承认自己有罪，但强调自己上了林彪的当，并且流下了悔恨的泪。王飞在逮捕证上签名的时候精神已经失常，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全部查清，共计630余份证据。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也基本查清。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出了新的审判方案。

9月8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

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正在听取彭真关于“两案”的汇报。

彭真近两年来一直负责“两案”，对案情相当熟悉，他手中拿着的材料都没有展开，就开始汇报说，“10个主犯情况基本查清楚，起诉书主要解决10个人的问题。”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今天，他的态度很严肃，态度也很果断。他说：“今天听取‘两案’汇报。关于‘两案’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10个主犯的罪行基本弄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主席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主席的总联络人；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的罪行都分下开。五加五，共10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提出只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9个人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十人判了，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的主要罪行基本弄清楚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原则是已报中央批准的起诉书，已把周总理列入了彼诬陷的领导人中。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要考虑。例如张春桥诬陷小平同志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行向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同意了。”

“纳吉”一词勾起了邓小平的愤恨。他用手弹了弹烟灰，不悦他说：“‘纳吉’的话，张春桥当面对我说了，可以不去掉。毛远新的记录，谁知道他是怎么去说的！”邓小平此刻既作为一个证人，更作为一位主要决策者在讲话。

彭真待小平讲完看着华国锋说：“我现在汇报几个问题。”

这是今天会议的真正核心，常委们都从低矮柔软的沙发里坐直了身体，准备凝神听取彭真的汇报。

彭真把一份起诉意见书草稿拿起来晃了晃，用洪亮的声音解释说：“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

他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缺点错误，都不提。比如说，整刘少奇时，抓了許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11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有个讲话，当时讲‘政变经’，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不能上。另外，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讲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材料，我们无法调查，查不清。”

彭真放下起诉书草稿前又说了一句：“历史问题不涉及。”

这个草稿共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四项罪行，60条罪状，在会前，草稿已送到常委们手中。或增或减都可能，今天主要请常委们定个原则性的调子。

“什么时候审？”彭真直接提出最具体的问题。

彭真紧跟着又追问一句：“是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台前审？还是后审？怎样做逻辑上比较顺当？”

彭真是主张先审的，从国内看，先审有利于解决好敌我矛盾；从国际影响看，可以以正视听，揭穿外国报纸胡扯我们审不下去的谎言。既然是定调

会，他就来个先人为主。交出自己的底。

他说：“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要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行不够，或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我赞成尽快审判！”

接着，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怎么个审法？是一案起诉，还是两案起诉呢？是一案判决，还是两案判决呢？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

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马上表态，他又继续讲下去：“这两个案子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算哪一伙的？一案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作贼上一致，分脏上有矛盾。”

至于为何要分庭审理。彭真理由是：“黄、吴、李、邱、江，军队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说到这里，他补充说道：“时间上一定要抓紧，9、10月份开始！”

他端起温热的茶杯，刚举到嘴边又停了下来，他突然又补上一句：“公开审判好！都公布！这一段时间工作，证据是站得住脚的！”

会议室出现短暂的寂静。有人已习惯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邓小平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左手中的香烟已烧到了烟蒂，他已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忽然，邓小平伸手扬起诉书草稿，果断他说：“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但是，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他像是提醒，又似乎是指示，他明白这几个案犯是不好对付的。

胡耀邦说：“外国人不能参加，这涉及到国家机密。”

“会议结束后，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只最后说：“还是一案起诉。10月初就审吧，不要再拖啦！”

邓小平呷了一口水，目光转向彭真说：“起诉书内容不要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定要特别慎重，否则，造成的后果难以估计。”

最后，邓小平又回答了彭真的问题：“先审！”“搞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李先念：“同意上面的意见。”

几天前，赵紫阳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资格最嫩，他说：“我没啥意见。”

主持人华国锋最后说：“那就这样定了。”

彭真代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人员表了态，说：“基本上就这样，经过我们的工作，根据指示，再推敲。”

会议开始散的时候，邓小平已经起身了，又补充了一句：“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员嘛！”

1980年9月28日，在公安预审和检察侦讯结束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出决定，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决定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

决。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

1980年11月8日下午，过早入境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悄悄从东北方向侵入北京城，天空中一片灰白，风不大，但很阴冷。街上行人都穿上厚厚的棉衣，马路两旁的警察比平时多出好几倍，威武地立定在原地。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并不在意，只把这当成一个普通的行动。

由1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的西北方向驶去。黑色小轿车窗帘低垂，沿途经过十字路口，一律绿灯闪烁。每隔几米远就立着的武装军人目送车子通过。

晚上8点钟，车队在严密的警护下驶到秦城监狱。监狱负责人已在事前接到押解犯人的通知，但是按章办事，仔仔细细，翻来复去验证来人的各种证件，在值班室办理了有关手续，车队才通过灰砖砌成的拱形门进入监狱。

监狱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已经吃过晚饭。押解人员告诉他：“马上收拾一下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准备出庭受审！”四人照吩咐的做了，随后，被押上汽车。

这次押解行动是由当时的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两案”审判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图们指挥的。

车队有前导车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两辆机动车和救护车守在最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押在一辆车里，每部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车队正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匀速向城里开来。

沿途两旁，哨兵排成两列，不许任何车辆和行人与车队接触，每个重要地段都布满了警车和武装部队的卡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巡逻车拉着警笛、闪着警灯，在路上来回巡逻。

当晚8时35分，车队顺利地驶入空军学院，图们将军高度警惕的心此刻才稍微放松一些，他让电台发出“安全到达目标”的信号。

两天后，囚车上的这十名罪犯将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十个铁格里站着江青等罪犯

1980年11月20日下午。深秋的北京翠柳早已被秋风吹黄，秋菊仍在挺立怒放。

在季节上说，这天只是北京的一个普通日子，但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异常凸现，这一天，开始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审判。

午饭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押上几辆轿车。紧接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白达也被武装人员押上车。

车子出了空军学院，沿着正义路的街道，缓缓蜿蜒而进。

小轿车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穿过行人与自行车的缝隙，很快，拐进一座灰砖砌就的拱门，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就是正义路甲一号，审判“两案”的特别法庭就设在小院的礼堂内。

先是从轿车上押下5名男子，接着，又是随车赶到的四男一女。这正是“两案”的10名主犯。

他们大部分身穿卡基布军装，但是没有佩带现役军人鲜艳的红领章，他们彼带进了小院子。

多日前“公审办公室”已着手考虑出席旁听人员了。凡是收到旁听证的同志都早早赶到小礼堂。

出席旁听的所有人都是怀着激动心情走进礼堂的。人们快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时地与老战友、老熟人点头招呼，互致问候。

在正式开庭前的这段间隙，人们有时间开始打量布置得十分庄严的礼堂。

主席台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别的大国徽，国徽下是台阶状地摆放着特制的，可供60人使用的桌子和椅子。在主席台靠近乐他的地方，围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杆，栏杆分成十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子里摆着一把木椅子。旁边竖着一块木牌，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这就是10名主犯受审判的位子。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能容纳千名观众的旁听席。

礼堂里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等待。随着一阵长长的警铃响过，人们顿时安静下来。过了少许几分钟，又是一阵长长的警铃声。铃声过后，身着统一服装的法官和检察官鱼贯而入，他们非常熟悉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们的两种颜色的服装把呈八字形的座席一分为二，左边的一半是法官，右边的一半是检察官。书记员和辩护律师也都分别在主席台下靠墙左右两侧的书记席和辩护律师席上坐了下来。

台下的观众开始屏住呼吸，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还是年纪轻轻的公务人员，都瞪大眼睛等待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耀眼的灯光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事先指定的摄像人员已打开机盖。此刻，偌大的礼堂只能听到人们手腕上手表的滴嗒手表的分针指向2时55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法庭庭长江华和检察厅厅长黄火青仅一步之隔。两人同时扫视了台前台下，然后目光相遇，在刹那的接触间，交换了同意开庭的意见。

2时56分，书记员郭文志用十分纯熟的普通话向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江华望了望摄像机的镜头，庄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这时，特别法庭里悄无声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肃穆的表情。

稍作停顿，江华大声命令：“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语音落下，书记员将提押票交给严阵以待的值班法警；法警旋即来到候审室，押解着王洪文，穿过旁听席中长长的走廊，送进被告席中的一个铁栏格子里，面对主席台站好。

这个以造反起家攀上政治舞台的家伙，当年英俊的相貌荡然无存，头发剃成了平头，脸上时而充满杀气，时而双眼无神。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油光满面的文痞姚文元。他始终一副脑满肠肥的红脸商人形象，只是一双金鱼眼皮比过去更鼓饱了。

花白头发的江腾蛟，矮小的个子，依然眨巴着小眼。

邱会作一脸阴沉，拖着腿蹒跚，垂头丧气。

绰号“吴胖子”的吴法宪架着肥胖臃肿的身躯，两片厚嘴唇始终半张着，走起路来活像企鹅左右摇晃。

然后依次是：黄永胜佝偻着腰，陈伯达缩着脖子，李作鹏垂着眼皮，张春桥阴阳怪气。

最后一个，江青被押了上来。她身着黑色上衣，头发梳得精光，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故意挺直腰板，扬着煞白的脸。她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慌张和恐惧。

10名被告依次带到席位上，这一过程似乎大迅速，以致观众席上许多受过迫害的同志因没能仔细瞅瞅这伙当年猖狂的家伙而深感遗憾。

大家看不见被告的脸，不过可以从背影上分别出每一个人。

也许是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显然比其他几名被告站得直。

江青仍喜欢招摇，站在被告席里还不时用手捋捋乌黑发亮的头发，似乎当众证明关于自己带的是假发纯属谣传。据说，江青生活上很会保养自己，每天炖8只鸡，只喝鸡汁，所以给她的头发带来光泽。洗澡也模仿杨贵妃，全部用的牛奶。

江华命令他们：“坐下！”10名被告才颓然坐下。

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3点。

江华大声宣布：“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3时许，对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依照法律程序，江华宣读了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及书记员、辩护人名单。

10名主犯听得非常认真，他们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名字，回忆这其中有哪些是他们认识的人。

江华、黄人青、史进前等人都是他们认识的，都受过他们的迫害。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法庭上主持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是与主犯罪行有李连的司法人员，打破了古今中外皆遵循的“回避”制度。

若干年后，一位外国记者向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提问：“‘两案’审判不采取回避制度下影响司法公正吗？”

这位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代表共和国起诉！”

是的，假若强调回避，中国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接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很长，共有 48 条。黄火青念到第二十条后，由副厅长史进前读完后面的 25 条。

最后，黄火青接过起诉书，用洪亮的声音宣读 10 名被告名单，并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其他案犯另行处理。稍后，他慎重地宣布自己的签名：黄火青。

起诉书念完，江华宣布：“对本案 10 名被告人，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被告人，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你们有辩护的权利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说罢，他命令：“把被告带下去，现在休庭。”

法官、检察官、书记员和辩护人按程序退庭。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押送回空军学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押往市内的看押点。江青则被押送回秦城监狱。

11 月 20 日上午当天的审判，除了在场的 1200 名观众直接目睹，许多人从电视或报纸上了解了主要过程。

在法庭旁边的观测室里，25 名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一些市民与游人得到消息后驻足围观，其中有外国记者与使馆人员。值勤的警察只好往外面轰。

几名神通广大的外国记者已开始拍摄停在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停车场上的高级轿车牌号，记录数量，日本记者星野元男趁警卫不注意，擅自用快速相机往公安部内拍照。结果，相机被没收，扣留了记者证。

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围着公安部转悠，大约 30 多人。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审判的新闻。

北京、上海、广州，及至腾格里沙漠深处，每个单位、每个军营、每个家庭，都把收听、收看特别审判新闻当成头等大事，以致在北京的一个新加坡代表团被中方陪员凉在宾馆，公务人员全部回家看电视去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就审判发表社论、消息、照片、特写。

国外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也刊登和播放了不知从哪条渠道得到的新闻。其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刊载了大篇幅的文章。英国 BBC 电视一台、瑞典电视台一台和二台、都播放审判经过，此外，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报刊也搞到了新闻来源。

这场世纪的审判震动了全国，轰动了全世界。

法庭上，王洪文说：“我认罪。”

时间真如白驹过隙，特别法庭自11月20日开庭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进入了法庭辩论。

面对被告的抵赖、推卸、狡辩，法庭将大量的犯罪事实列举出来，用事实进行裁判。

起诉书所列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经法庭调查，人证物证确凿无误。法庭宣读：在48条罪行中，林彪、叶群38条，黄永胜10条，吴法宪10条，李作鹏4条半，邱会作5条。

12月18日下午，黄永胜出庭辩论。在以后的三次辩论中一再强调：“现在我承认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我犯有严重错误，在若干问题上犯有罪行。我对自己是这么一个看法。”

黄永胜的辩论被公诉人出具详尽而确凿的证据，认定他为林彪集团主犯。

第二法庭审判长伍修权说：“在昨天法庭辩论过程中，黄永胜为自己的辩护结尾的时候，曾经说过还有补充辩护的，因此，我们现在允许你继续作补充辩护。同时，也提醒你，我们已经听了你接近3小时的辩护。所以过去讲的请你就不要重复了。对其它的问题，你要辩护的可以辩护，可以进行补充辩护。你现在可以讲。”

黄永胜把站着的身体调整一下，摆好架子，说：“我先说明一下，我考虑了，我放弃这个叫做陈述也好、辩护也好，我放弃这个权利。”

伍修权说：“那么，法庭认为你没有新的辩护，所以同意你不继续辩护。”

“那可以。”黄永胜应道。

接着，伍修权宣布：现在法庭辩论结束。根据法庭进行程序，被告人还有最后的陈述权利，你现在还有什么最后陈述的。黄永胜思考片刻，说：“我没有更多最后的陈述的。我从1971年9月24日被捕以来，10年中间我想了两句话，想在这里说一说，两句。”

“那你就说吧。”

黄永胜慢慢他说道：“惟有储衣供痍病，不曾滑埃答人民。”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辩护中，对起诉的罪行供认不讳，表示愿意服法。

吴法宪认罪说：“我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林立果，出卖给林立果，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实际上我就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他哭丧着脸说：“我罪恶这么大！这么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按照我的罪行应该枪毙我。”

江腾蛟出庭辩护，他一到庭就说：“我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他供认，林立果的“小舰队”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他是南方片的负责人，《“571工程”纪要》的指挥班子，1971年9月12日晚，谋杀毛主席的计划失败后，他与周宇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学院开会，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供认自己的罪行是反革命性质的。

李作鹏在法庭上供认写信诬告罗瑞卿，承认伙同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在1968年4月3日向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参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党反军”。

邱会作承认参与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诬蔑朱德总司令，承认曾指挥总后勤部的手下捏造事实，编印材料，诬蔑徐向前元帅是“埋藏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并提出要打倒涂向前。

法庭出示、宣读了 28 件书证、证词、指控：他在总后勤部指挥制造了 17 个反革命集团假案，直接诬陷迫害二级部长以下干部群众 457 人，在总后私设监狱，直接迫害干部群众 462 人，摧残死一大批同志。

在铁的事实面前，邱会作突然“嗷”的一声跪下，低头说道：“我完全认罪。”

第一审判庭比第二审判庭推迟一天开庭。

1980 年 12 月 24 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上午 9 时开庭，第一个被带进法庭的是王洪文。

上洪文没有要律师，他似乎认为要辩护人认罪的态度就不老实。

起诉书指控的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搞打砸抢，制造冤假错案，安插帮派打手，建立帮派武装，带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等 7 条罪行，王洪文说：“我相信事实，我认罪。”

他认罪如此彻底，也许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自己年轻，好态度可争取从轻发落，他日或许能东山再起。他没想到，法律是不讲情感的。

姚文元是与王洪文同时出庭的。

开庭后，姚文元一直歪着头听公诉，因为他的耳机坏了，失聪的左耳听不见，对起诉书上的每一个罪证，他不得不一一承认。

11 月 27 日上午，张春桥被带上第一审判庭的被告席。

这个出名的“狗头军师”始终用沉默来与法庭对抗。

法庭询问：“张春桥，你在 1967 年和 1968 年先后诬蔑朱德委员长是‘军阀’、‘老机会主义者’，有没有这个事实？”

张春桥不语。

公诉人王芳请审判长出示证具：

1967 年张春桥在上海组织“游雪涛小组”，制造冤假案件 26 起，陷害干部、群众 183 人，有 5 人致死。

1974 年 10 月 17 日晚，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 17 号楼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

利用“风庆轮”事件攻击邓小平……

尽管张春桥缄口不言，但证据在替他回答。

1980 年 12 月 20 日，公诉人在历数张春桥的累累罪行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你有陈述和辩护权利。”张春桥仍然不语。

曾汉周又重复一遍刚才的宣布。最后，曾汉周宣布：“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身穿中式棉袄，坐在被告席上咬着牙齿，仍旧一言不发。这短暂的两分钟对张春桥来说特别长，他的头脑中有如翻江倒海的波涛，难以抑制，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抖动，细碎汗珠从脸上的汗毛孔冒了出来。他也许想说点什么，但最终没开口。

陈伯达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都有关联。法庭出示他的 5 条罪行后，他只是简单陈述了当时与林彪、江青勾结的客观背景，别的不作辩护。当他低下头的时候，眼泪滚了下来，轻轻地咕哝一句：“如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的。”

江青撒泼说：“打狗要看主人”

“传被告江青到庭！”

审判长曾汉周一声令下，两名女法警把江青带上法庭，这一天，是1980年12月24日。

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11月26日审讯前的晚上，江青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她睡在床板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她想起了几十年来在政治风浪中几经沉浮，凭着自己的手腕和聪明，居然都挺过来了。她从山东诸城一个饱受凌辱的小女孩、30年代上海滩上争风吃醋的电影明星，一跃而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眼看着就要登上女皇的主座了，却被猛然中来的一个巨浪击倒，压进底层。

最让她气愤的是，原先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与干将，也变心的变心，投降的投降，王洪文还站出来揭发她。每当想起这些，禁不住肝火直冒，脸色煞白。

江青翻了身，面向墙壁，像是自言自语，又仿佛与墙壁对抗。她说：“哼！我从来天下怕！地下怕！怕你法庭？怕你砍头？”

稍停几十秒钟，咬着牙齿狠狠他说：“将来有朝一日，有机会我来个东山再起！”她像疯了似的大叫一声：“你们是什么人？来审判老娘？”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清算林彪、‘四人帮’犯下的血债！”……全国人民愤怒的吼声宛如滚响的炸雷，在她身边轰鸣起来，黑暗中，江青蓦地坐起，用手抚抚胸口，定了定神。

“明天就要上庭了，在审判台上的、在旁听席上的，肯定都是过去没有被我整死的那帮家伙，要我在他们的前面俯首贴耳，招供认罪，没那么容易！”江青咬了咬薄薄的嘴唇，暗自下决心。

11月26日上午9点，江青被第三个带上第一审判庭。

江青很清楚，在座的几百人的眼光都鄙视地盯着自己，但是她使劲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审判长开始审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晚上，你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开会，密谋策划是不是事实？当时，你们4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听这些问题时显出十分认真，她知道法庭又在审问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见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事，过去已被讯问、预审好多次了。

听完后，当庭狡赖：“这不是事实。”

她歪了一下头，摸了一下耳机，马上改口说：“我实在不知道。”

审判长曾汉周威严地问：“我问你，当时你们四人在一起商量了什么，策划了什么？”

全场鸦雀无声。

江青扶了一下眼镜，扁着嘴角，说：“我已经讲了不知道！策划了什么我怎么会知道？”

审判长进一步问：“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自己讲的总该知道。”

“我……我不知道。”江青一脸阴沉，还是咬住这一句。

在江青看来，这场审判无疑是权力之争后的报复，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审判、枪毙自然是当权者的事情。所以，她不愿意老实伏法。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接着，审判长又继续问她问题：“王洪文已经从长沙回来，向你汇报了毛主席如何讲的，你还要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执行任务时，再次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你当时交代他们两个要怎么说？”

江青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最后，她索性闭上眼睛，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审判长又宣布：“被告人江青继续否认起诉书上的事实，记录在案。”

审判员保持了沉默。一位检察员提请法庭出示证据、证言。同时，传证人出庭。

法庭投影仪上映出了王洪文亲笔写的有关材料，播放了姚文元有关这次策划的证词，和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海容、唐闻生的证言。

最有力的证人是当年江青向毛泽东推荐的“接班人”王洪文。

法庭讯问王洪文：

“你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事先和谁在一起密谋的？”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是谁召集的？”

“江青。”

“你们在密谋时江青说了些什么？”

“江青主要讲了‘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你去长沙，你们几个人是怎么决定的？”

“在研究邓小平的问题后，江青问我怎么办？是我提出到长沙告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同意。”王洪文态度很老买。

“要你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长沙见毛主席，是谁提出来的？”

“是江青提出来的。江青说，你要早点去，要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为什么要赶在外宾之前去？”

“主要怕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把问题的真相向毛主席讲清楚。”

“你们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你去长沙是不是讲过周总理等？”

“这话是10月12日之前，约一个星期，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来对我讲，她夫看了周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入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的提名观点。’并且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经常到总理那里说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江青起初还能装下去，一语不发。但是，很快就不自然了，翻着白眼瞪着王洪文，她觉得背后几百双火辣的眼睛马上就要把自己的焦了。她突然站起来，叫了一声：“我要上厕所！”

江青回来后心情稍为放松了点，之后，一直翻着白眼听完王洪文的证词。

法庭宣布：“本次调查结束，把被告江青带下去！”

出人意料，江青竟赖着不肯走，并摆脱法警的手臂，尖声叫嚷：“关于

这个问题，我还要进行申辩！”

直到被法警带出法庭大门还气势汹汹地叫嚷：“骗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是假的！王洪文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对质？”

这一天的审讯，江青就开始胡搅蛮缠了。

回到监狱后；她的情绪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说：“《刑法》上讲过可以对质，可以申辩他们不让，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好了……王洪文就讲了一句实话，就是上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的。上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

她又蛮横地对监管人员叫道：“我知道你们向他们去汇报，他商量下次怎么对付我。我不怕，我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我就坚持到底。”

这天，江青的血压升得很高。

1980年12月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再次提审江青，调查江青私设专案组诬陷刘少奇等人的罪行。

江青走进法庭，抚平衣服，理理头发，仍旧大模大样地一屁股坐在她那固定的椅子上。

在开庭前的短暂空隙，江青毫不在乎地环顾观众席。

观众席的前排，一位身穿绿呢衣、脖子上围块黄方中的女人，正盯着江青。当江青的目光扫过她时，江青的心一虚：啊，王光美！

法庭单刀直入，问江青：“1967年5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两个主犯，由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是不是事实？”

审判长的审问像一把利剑直刺江青心窝，她定了定神，用手按住耳机，骄狂地抬头看着台上，说：“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而且，而且……我当时是助手。”

这时，她狡辩说，“现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人呢？”

几位法官异口同声高喊道：“往口，江青？”

后来，她竟神经质地反复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庭当众展示证据，播放江青录音讲话，出示江青亲笔信，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为了制造伪证，逼取诬陷刘少奇、王光美的假口供，从1967年5月至10月，江青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受害者就达11人。这是一串罪恶的历史：

1967年5月30日逮捕曹亮、梁漱德夫妇；

6月8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

6月29日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

7月21日关押审讯1929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群；

7月27日逮捕夫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

8月30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钧；

10月3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

这些她犹觉不够。为了逼供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江青决定在全国大批逮捕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的就达到64人。

铁证如山，江青死气白赖。坐在旁听席上的人愤慨了。人们低声议论：

“真是无耻透顶！要算起来，受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的，何止这些！”

有人开始掰手指计算：“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受迫害占76.7%，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受迫害占82.4%，中央军委副主席占85.7%；三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受迫害占70%；国务院副总理受迫害占86.7%；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受迫害占80%；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受迫害占75%……”

若是算上一般干部群众，那就数以万付了，人们用心灵在审判：“江青，这笔血债，你永远赖不掉！”

法庭对江青的审问前后共进行了6次，12月24日，转入第二阶段，就指控被告人江青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举手：“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审判长说：“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念着长长的起诉书，又一次控告江青：“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江文的控告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勾结林彪，害死了贺龙、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建国初期逝世，罗荣桓元帅“文革”前去世，他们躲过了劫难，可他们的家属仍未躲过江青一伙的魔爪。实际上，周恩来、陈毅也是被江青迫害死的。

江青的迫害欲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害到毛泽东头上。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把未过门的儿媳刘思齐认作女儿。因感情笃深，刘思齐十年不嫁，毛泽东一再劝她改嫁，并亲自托人为刘思齐物色对象。

当时，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被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派人了解后，对杨茂之很满意，就介绍给刘思齐。刘思齐对杨茂之也有好感，也就同意了。1962年2月，两人正式结婚，婚后杨茂之常陪刘思齐去看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居然指使人把杨茂之、刘松林（刘思齐改名）关进监狱。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责令江青，“立即放人！”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有过一段污秽的历史，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曾派人调查过，但被康生隐瞒掉了。为了不影响她的政治生活，江青把当时知情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全部打成特务害死，把了解她底细的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舒绣文害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被关了起来。潘汉年夫妇冤死狱中，杨帆侥幸活下来，但被折磨得双目失明、精神失常。多么惨痛的人间悲剧啊！

江青的脸色煞白，两手发抖，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指着江文谩骂：“你

这个讼棍，你们是法西斯！……”

江文轻蔑地扫了江青一眼，继续控告。

江青知道宣判自己末日的时刻到了，她能用来挣扎的最后一招就是：泼妇骂街的手法，撒泼耍赖，无理取闹。

在近两个小时的庭审中，她一会儿说：法庭指控她的那些罪行“都是小事”，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一会又说：“逮捕我，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会儿把自己装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宣扬自己如何一直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一会儿又叫道：“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会儿又大言不惭他说她30年在上海的“历史是光荣的”。总之，东拉西扯，乱说一气。

检察员江文高声指控：“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刑。”

讲到这里，江文清了一下嗓子，特别提醒法庭：“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检察员发言完毕，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一听，顿时咆哮起来：“我不要什么陈述，就按你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严肃他说：“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撇撇嘴，嘲弄他说：“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演不成啊！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曾汉周大声严厉地申斥。

江青越发放肆起来，尖叫道：“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再一次警告她：“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非但不听警告，反而进一步大叫大嚷，侮辱法庭。曾汉周不得不按铃警告她：“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这时，江青站起来，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法庭允许了。

江青把嗓门提高了八度，尖声尖气地念了起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这是一篇狗屁不通十分可笑的文字，标题叫《我的一点看法》，读完，她阴阳怪气他说：“打狗看主人，就是说啊，打狗要看主人……”

此时，曾汉周不得不以江青不服从法庭指挥、违反法庭规则而宣布辩论结束。

听到“退庭”两个字，江青双手死死抓住铁栏杆，不肯离开，并且大声呼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最后，她几乎是被两名女法警拖出法庭的。

华国锋与邓小平产生分歧

辩论全部结束。法庭量刑宣判举世瞩目。

中国法律有别于外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调查、辩论结束后，由法庭合议给予被告量刑，而不是由法官根据调查、辩论结束直接做出裁决。

早在 12 月中旬，法庭尚在辩论阶段，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有人专门翻阅《刑法》有关款项。逐条对照，提出量刑意见：黄永胜、吴法宪判 17 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 15 年有期徒刑……

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复出后的总后勤部副政委李耀文建议：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王洪文判 15 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判处无期徒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应判 13 年到 20 年有期徒刑……

尤其是军队，长期以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较深，遭受迫害的同志也多，所以，对“两案”主犯的量刑更为关心，在京西宾馆，88 名全军指战员代表正在为 10 名主犯量刑进行投票表决，其结果，形成近 10 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 33 人，死缓 48 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 36 人，死缓 46 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 65 人，20 年徒刑 11 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 17 人，24 年徒刑 49 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 32 人，20 年徒刑 27 人，死缓 15 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 43 人，20 年徒刑 22 人，死缓 11 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 15 人，20 年徒刑 35 人，15 年徒刑 24 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 10 人，有期徒刑 11 人，20 年徒刑 38 人，15 年徒刑 11 人，7 年徒刑 1 人；

邱会作：死缓 13 人，无期徒刑 11 人，有期徒刑 12 人，20 年徒刑 28 人，15 年徒刑 21 人；

江腾蛟：死缓 25 人，20 年徒刑 39 人，15 年徒刑 13 人。

许多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群众，也直接写信给特别法庭庭长、审判长、审判员和法庭。

广东省紫金县的一位中学教师在信中说：“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岂能平民愤、伸张正义！如果谋杀前国家主席和副总理等多人的罪犯都不处死，那么，我国就应宣布免除死刑……”

普通职工、国际友人、法学专家、在校学生等等，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杀”，一时间，全国一片“杀”声。

当然，这无数的“杀”声里，有法制的观念，更有感情的成分。

“必须依法量刑！”法庭庭长江华、伍修权，审判长曾汉周、黄玉昆已经达成了共识。

调查事实定罪占据了法官们的大量时间，哪些是罪？哪些是非罪？哪些证据不确凿？法官必须根据法庭调查、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的辩护、被告的申辩和最后陈述来认定。法官们对 44 场法庭调查进行了重新审核、认定，认定的罪行从起诉书减少了 16 条，另外新增加 7 条。

罪行认定后，就是量刑。法官的“尺度”也受到全国上下情绪的影响，一种主张轻一些，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一种主张从严从重，一定要判死刑；

还有人主张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

1980年12月5日，吃完午饭，邓小平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秘书接到电话，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在量刑问题上遇到难题，已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包括华国锋在内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华国锋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发表各自的意见，而且分歧很大，邓小平主张，对10名主犯罪大恶极的该判死刑就判死刑；华国锋的主张，不判死刑。很显然，中南海里的中共核心人物已开始关注此事了。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清清楚楚写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参与法庭决策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党中央的态度是谨慎的，经过表决，依据法律，只判10名主犯中首犯死刑，其他则为无期和有期徒刑。

1981年1月23日，在30余名审判员对10名被告人的处罚按照会议意见逐个表决后，进行了神圣而庄严的签字仪式。

下午4时整，修整得干干净净的法官们依次开始签名：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判决书一式三份。签名毕，用特制卷宗封存。

庄严的时刻终于到了。

1月25日，北京城还在严冬的包裹中，最低气温为零下摄氏15度。

多月前已打探到宣判日期的人们，一大早便从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涌向公安部机关礼堂，围观特别法庭宣布对10名主犯的审判。

8时许，800多名持有“旁听证”的观众提前入庭。

9时整，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宣布：“现在开庭！”

10名法警把10名主犯押解入庭，一字排开在审判台前，他们的排列顺序是：自右至左为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10名主犯个个缩着脖子弓着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庭长江华站起来庄严宣读判决书：“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死刑……”

曾自诩自己有“五不怕”的江青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开始咆哮，一副可怜巴巴的怕死相。

江华接着念道：“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听了，顿时面露喜色。

接着，“咔嚓”一声，江青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又是“咔嚓”一声，法警给张春桥戴上手铐。

特别法庭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这7名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宣判快结束时，江青正要举手挠挠头发，可是双手被铐住了，她从惊恐中转醒过来，扯开喉咙，攒足了劲尖叫起来，法庭早有准备，立即命令法警把江青押出法庭。

不久，北京和上海的法院开庭，公开宣判毛远新、聂元梓、蒯大富、韩

爱晶、王大宾、王秀珍、徐景贤等人。江青、张春桥等 10 名主犯被押到秦城监狱服刑。

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着她一个人。虽被判极刑，生活还不差，也没有人来揪斗她。楼下一大块空地，江青每天放风时就在这里走来走去。

判刑之后的江青，开始有了读书的嗜好，女儿李讷每次去探监时，都按江青开的书单，捆上一包，供她阅读。

此外，李讷每次还给江青带来大量可口的食品。

1983 年 1 月 25 日，即对 10 名主犯宣判整整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江青、张春桥由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的老年病症越来越明显，头发照样乌黑，相貌照样白皙，但行动越来越迟缓，监狱当局根据中央决定，由李讷担保，接江青出秦城监狱，保外就医。

90 年代初，江青的身体每况愈下，除了乳腺癌以外，还患有多种疾病。疾病的折磨并没有磨灭她的幻想，她念念不忘中南海的那栋房子，给中央写了许多封信，一再要求回到那里去住。

1991 年 6 月，江青的癌症发作得很厉害，在病痛和绝望之中，她用一条带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洪文在服刑期间患了肝癌，死于狱中。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于 1983 年保外就医，并允许他们同爱人并带 1 名子女在指定城市安置。

黄永胜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不久病逝。

吴法宪随妻子住在济南，每天写回忆录，陪妻子买菜做饭。周围群众对他还比较客气，菜场营业员还经常让“吴老头”不要排队，提前上来买菜。

李作鹏住在太原，每月有 200 元生活费。他一人独住省委两套新修宿舍，因与邻居发生口角，差点儿被邻居扫地出楼，后经省委和省公安厅作工作才平息风波。

邱会作安置在西安，每天写回忆录，每月有 200 元生活费。她的妻子胡敏是个大夫，精心照顾他的起居，邱会作经常对邻居说：“我举双手赞成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

江腾蛟安置到太原，山西省体委给了他一套单元房。

黄、吴、李、邱刑满释放后，都拿着释放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报了户口。

第二十七章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伟人功过。邓小平表示：毛泽东纪念馆不拆

毛泽东画像被悄悄摘下

1980年的盛夏，改革开放已进入第2个年头，全国人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们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创造发明、考研出国，正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悄然地进行着一个行动。

7月30日，北京繁忙而酷热，过去一向不许车辆随便靠近的人民大会堂前，轰隆隆开来了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这一异常情况引得行人驻足，惊得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伸头探望。

在吊车的吊斗不断升高，把吊斗里的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工作人员伸手摘下了画像。

行人中有人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

紧接着，大吊车用钢绳拴住人民大会堂前两块永久性的巨幅标语，用力一拔。标语从人民大会堂的墙面上脱下，露出两块新痕。这又引来一阵责问声。

同样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间相继开展。

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门眉上摘下来，从教室里取下来，毛泽东的塑像被拆除，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要么被覆盖，要么被清洗。总之，一句不留。

十几年前，各地比着把毛泽东塑像雕得坚固宏大，现在拆除可带来了大麻烦。据说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队，因塑像太坚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药。

西方舆论界的种种评论开始了。有的报刊评论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的报刊则大叫：“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早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研究如何评价毛泽东。

这是从一幅反革命标语引发的深层次的思考。当时，几个思想极右的家伙，打出一幅反革命标语，要求“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

这种自由化思潮使邓小平警觉，中国不宜再神化毛泽东，该让多年来被十亿中国人民神化了的毛泽东从九重天上重返人间，回到人民中间，但也不允许陷入另一个极端狂热，彻底否定毛泽东。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坚持“少宣传个人”。其中，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宣传毛泽东的

问题。通知说，毛泽东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种做法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97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决议》起草小组，指定由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为组长，邓力群等20名理论工作者参加起草。

邓小平在事前把他们找到办公室，对胡乔木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吸了两口“熊猫香烟”，若有所思，缓缓地说：“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的措词十分严谨，不轻易他说“是”或“非”，而是要求科学地、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久，邓小平又重提他在同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明确树起来，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乱。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苦战了几个月，拟出了《决议》提纲，3月19日，送给邓小平审阅。

邓小平逐条逐字逐句斟酌，之后，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大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邓小平又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邓小平盯住胡乔木，讲《决议》总的要求、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对《决议》的第二条意见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和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过去有关的事情。

邓小平强调，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邓小平还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但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为了让提纲起草工作的同志深刻领会这三条要求的含义，准确把握住历史上几次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又对一些历史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邓小平自己作了回答：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岗、饶漱石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至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

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表明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推倒，采取搞阴谋、搞交易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总之，高岗、饶漱石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搞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邓小平讲到这里，把口里的烟雾吐出来，目光锐利的指出：“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再次对《决议》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一次，他主要是谈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

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程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

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了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

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惜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

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很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决心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客观、科学、辩证地评价好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胜利者的身份访问了共产党苏联。当时，斯大林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你们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但是，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他的接班人就对他责备了。赫鲁晓夫激动得近乎发疯地列举了斯大林的诸多罪状。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热衷搞个人崇拜的狂人，甚至是一名屠杀党内干部的凶手。他咬牙切齿地批判斯大林的一切，把斯大林的遗体逐出列宁墓，把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改名。斯大林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身后竟会遭到如此对待。

苏联发生的政治变幻，影响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看法。毛泽东则能“冷眼向洋看世界”，坚持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曾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

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邓小平正是循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轨迹来评价毛泽东的。他说：“我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唯一的旗帜是毛泽东，唯一的象征是毛泽东，“毛泽东时代”曾经是中国人的整个世界。

他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又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他十分坚决的指出：“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辩证地处理好了维护毛泽东思想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使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权威性的结论。正如他日后所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果然如邓小平所说，嗅觉灵敏的外国记者来到了中国，而且是世界著名的、以采访领导人物著称的意大利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

邓小平表示：毛泽东纪念馆不拆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驶进中南海。

这是一位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她以独特的方式采访过全世界几十位著名活动家，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美国、越南战争正酣时，她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后再单飞华盛顿，弄得美国官员头疼。

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他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

东、西德国暗送秋波，眉目传情时，她又出现在波恩、柏林；西班牙风云变幻时，她又“转战”到了西班牙。现在，当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时，她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在北京。

这天，邓小平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访，见不见？”

邓小平抬起头“哦”了一声。他的思维在快速运动。

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后，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国家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会见记者，成为一个独特的习惯。在这种场合，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就代表国家，这对外国人来说往往不可理解。

1936年夏秋，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中国革命及中国工农红军取得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从那时起，这种习惯就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当时苏联要求中国与蒙古和苏联同时发表一个声明，揭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离间中、苏、蒙三国关系。苏联、蒙古发表了，中国没有书面文字，只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谈了中国的意见。结果苏联人很不高兴，指责中国人说后不算数。其实，苏联人还没有习惯中国这个独特的风格。

邓小平清楚他要会见法拉奇每句话的份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国家。同时，他又想让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借一位名记者宣传出去。

于是，他果断他说：“见！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他的富于挑战精神的选择。邓小平曾听说过，外交场上十分厉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以致于事后慨叹：“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76岁的邓小平精力旺盛、思维敏捷，稍作思索，已准备了如何对付法拉奇的难题。迎接法拉奇的“考试”。

法拉奇来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她居然不讲一点客套，开口就提要采访的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问。

法拉奇单刀直入，邓小平也十分干脆，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稍作停顿，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又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明白法拉奇的暗示，他毫不躲避地答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他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坚定他说：“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他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主贵财富。”

法拉奇又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提到这个问题，邓小平的观点很明确：“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是不对的，是违反毛泽东本人意愿的。但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从这点来说，他能原谅华国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毛泽东临终前把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定为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美梦，当时江青仗着特殊身分，借毛主席丧事大闹大吵。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会议室里，为谁致悼词意见分歧很大，气氛也很紧张。从当时的地位、排名论，华国锋致悼词最合适，但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都想致，因为谁致悼词就意味着谁在党内的地位高。

会议室里，你望我，我望你，谁都不讲话。谁都不想被动，谁也不想遭到反对，成为靶子。关键时刻，老帅叶剑英自有主张，绝对下能让“四人帮”致悼词。叶剑英毅然提出：“国锋同志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国锋同志致悼词了，洪文同志就主持会吧。”

“好，就这么定。”李先念等老同志纷纷赞成。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尽管不满，但无法反对。张春桥看着华国锋，推推眼镜，阴阳怪气地说：“国锋同志，你是第一副主席，我问你，主席的遗体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憨厚地咧嘴笑笑，说：“中央不是作了决定吗？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阴险地眨巴眨巴眼睛，逼问一句：“可是，我听专家说，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过了三天的遗体，便无法永久保存了。国锋同志主持工作，为什么不采取防腐措施？”然后，他语气阴沉地说：“医生说，主席的遗体已经变质，无法保存了。”

“无法保存。”这句话产生的震动不亚于8级地震。保存不了那就得烧掉，意味着伟大领导毛主席将永远不复存在了。工农出身、感情朴实的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

张春桥一点题，江青马上响应，她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大骂：“华国锋，你为什么耍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这

事你得说清楚！”

张春桥接着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说：“国锋同志，主席这么信任你，而你却对主席的感情这么淡薄。主席的遗体因你而毁坏，我们政治局无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不可饶恕的错误啊！”

王洪文、吴德、陈锡联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指责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这是“四人帮”在借机滋事，一时又找不到反击的方法，只好耐心、诚恳地一遍一遍解释。王洪文以为华国锋害怕退却了，更加盛气凌人地紧逼一句：“这些话你别对我们说，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

华国锋几乎被逼到了死角，此刻，他只有以守为攻，破釜沉舟了。他一拍桌子，怒吼道：“这个责任我不能负，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职！”说完，他站起来就要走。

华国锋是当时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尽管也是两派都不满意的人物。他若真的辞职不干，政治局必然会发生混乱，可能导致全党、全国混乱。

叶剑英伸出手，拦住华国锋，说，“你不能辞职，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决定，我看谁敢推翻主席的决定？”他威严地目光扫射会场，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给镇住了。

叶剑英对着大家说：“越南胡志明主席的遗体是过了三天后越共政治局才决定保存的，现在不是很好吗？何况主席的遗体还不到三天呢？”

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几人面面相觑，一句话说不出口。

叶剑英去守灵，见门外无人，叶剑英轻声提醒华国锋：“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主席遗体。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

“好，好，我马上护送主席遗体去医院，以后请你多帮助。”华国锋十分感激地说。

华国锋立即护送毛泽东遗体去 305 医院作防腐处理，一面让人给越南发电报，请火速派专家到北京。

9月11日深夜12时，华国锋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越南专家组到北京了。这使得华国锋大受鼓舞。

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叫嚷：“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华国锋此时已是成竹在胸，不动声色他说：“好！好！等一会就开。”

江青使劲地挤出几滴眼泪，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把火烧到华国锋身上。

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

江青又一次大叫起来：“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表演。看他们几人表演得差不多了，华国锋站起来问道：“你们闹够了吗？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员们一听热烈鼓掌。刚才还在难过流泪的几位工农出身的政治

局委员，脸上露出了笑容。

等了几分钟，会议厅安静下来，华国锋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会议厅里又是一阵爆豆般的掌声。

西方人不了解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以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就会拆掉毛主席纪念堂，邓小平摇摇头，回答法拉奇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以巧妙地探寻风云人物本人力对象，使采访对象不知不觉进入她的“圈套”。但是，前两个问题，邓小平都是从宏观地、历史地角度回答，她这一次不得不正面提问，直攻邓小平的薄弱处。

她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这句话，使邓小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想起自己三出三进中南海，其中每次被“贬”或被打倒，都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

远的不说，就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就是没有按毛泽东的要求办事，抓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在作历史的沉思。当年，毛泽东批邓的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了是非。“阶级斗争为纲”不正确，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正确，“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不正确。“大官们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手中的香烟快要燃光了，他从历史中收回思维的野马，很平静地对法拉奇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法拉奇正在等着邓小平讲下去，以为下面接着就是批评了。岂知，邓小平话锋一转，说：“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趁邓小平侃侃而谈之兴，突然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与你不同，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邓小平知道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来，不等她说完，他就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对法拉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法拉奇极力尝试把话头扭转到邓小平自己身上，她问：“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邓小平当时说的话，9年后做到了。邓小平主动提出辞职请求。

198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中南海内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新上任不久的江泽民总书记把一份辞职信传给常委们看。这就是邓小平的辞职请求。

辞职请求写得非常恳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等人脸上都露出了庄严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震撼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终于，邓小平在他85岁高龄之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但在决定中对这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

会主义新中国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

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90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一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法拉奇的采访继续进行。今天，她与40多年前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感受相同，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讲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转化到历史之中去了，使记者提问的个人问题奇妙地转移了。

最后，法拉奇以其独特的机智，提出了一个让邓小平不能轻易使其转化的问题。她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怪思索脱口而出。

“你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跟着追问了一个难题。

邓小平很坦诚，毫不回避，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扪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法拉奇如获至宝，快速在采访本上记下邓小平的原话。

法拉奇两次采访共进行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在对她的提问回答中，邓小平不推脱责任，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客观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后来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法拉奇的采访报道，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时间，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有的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下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有的外电评论：“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5年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在会谈的间隙，邓小平笑着对客人说：“贵国的女记者法拉奇真够厉害的，一连串问了我许多难回答的问题。”

纳塔赞赏地说：“听说您的回答让她很满意。”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邓小平高兴地笑道。

有人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过比较，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平淡无奇是他的敌人。而邓小平则冷静、坚毅，在平淡无奇中可以咀嚼出复杂的意味，面对风浪依然心平如镜，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毛泽东功过

对毛泽东的评价，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清建国 30 多年的历史的大是大非。所以，不仅仅是邓小平，全党都是十分慎重、严肃的。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首先提出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重大问题和毛泽东的功过问题。

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可是，会场中的气氛已经不平静了。

陈云说：“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 1949 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从全国解放到五七年鸣放运动力止；其中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六五年止；其间毛主席在六一年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六六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会场沸腾了。江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不分是非地完全赞成毛泽东所作的一切。他们纷纷发言，反对陈云的发言，一时间，会议厅诸人各持己见，几乎到了争吵的程度。

197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针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五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讲话分几个层次进行。

1980 年 7 月，起草小组把《决议》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修改过的讲话稿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上任的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讨论会，书记处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人参加了讨论。他们都主张《决议》一定要客观、历史，功与过一定要分清。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1980 年 10 月，《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扩大到党内军、部级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讨论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现象，特别有的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

高尚。”

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者是极左主义。”

还有人激动他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决议》起草小组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于10月25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发觉人们思想认识上有偏颇现象，必须统一思想。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讲到这里，语气很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多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他又说：“党的历史总的来说还是光辉的历史。对《决议》，要压缩篇幅，做到两点，可以下说的去掉，应该说的突出重点。”

中共中央许多老同志也纷纷发表讲话，表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1980年11月，老将军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话，坦诚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的夫误发表了看法，黄克诚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上谈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黄克诚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今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讲到兴奋处，向中央领导呼吁：“再不要搞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来，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畅所欲言，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以向党和国家负责的忠诚态度发表个人看法的。

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对毛泽东的口味，尽管毛泽东本人在会议开幕时已说过：“大跃进”可用三句话概括：“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断定，彭、黄、张、周等人的信和发言，是怀疑党中央指导思想，是针对“三面红旗”来的，所以，他决心进行坚决的“反击”。

8月13日至15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揭发”和“批判”，让彭、黄、张、周公开作检查。并开始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追查。

毛泽东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毛泽东一表态，党内许多思想较左的同志大肆批判彭德怀等人，很快得出结论：彭德怀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接着，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反党集团”的非组织活动，逼着他们交代如何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

彭、黄、张、周等人在不断近逼围攻下，只得在先阐述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违心地给自己扣上不切实际的大帽子。

黄克诚在会上检讨说，“由于我本人的政治水平不高，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主张人民公社迟办一点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怕急怕猛、怕有副作用’，特别是当用猛烈的群众运动、急风暴雨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基础和精神阵地时，自己就动摇、彷徨、担忧。当一些地区出现某些比较严重的现象，如浮肿病、饿死人、流亡时，我甚至到了睡不好觉的程度。”

最后，黄克诚被迫承认，“我的这些想法，都是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思想在头脑中的反映。”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历史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了祸首。

8月17日，八中全会结束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天的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

尽管从1959年起，黄克诚就受到了“左”倾错误的长期迫害。但是，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承担责任，这样作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四千人的讨论意见，将修改后的文稿提交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再次征求意见。

陈云在同《决议》草稿起草小组副组长邓力群谈话时提出了宝贵意见。陈云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陈云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

1981年5月，经过修改的《决议》讨论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用10个半天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当作《决议》的前言部分。

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当成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

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功绩。《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通过回顾建国前 28 年的历史，很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公认的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前进和胜利的旗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 32 年，乃至今后，把各项事业向前推进，夺取胜利，必须坚持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阶段为预备会，用 8 天时间讨论《决议》。

针对当时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诬蔑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诬蔑毛泽东的观点，常委们建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决议》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 10 个方面，论述各行各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决议》写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正当中共中央在讨论《决议》的时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取得成功，广东作为经济开放的前沿，经济建设正如火如荼，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一种认识，认为：现在允许并推行包产到户，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证明当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会主义搞早了，否则，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早就会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在讨论《决议》稿时，意见分歧，争论很大。最后，还是邓小平最后为起草组确定了思路。

邓小平讲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写成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魄，客观公正、科学历史地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决议》写道：“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

但是，《决议》也不回避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写道：“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但是，发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使党和国家、人民均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应该受到彻底否定与批判，但是，又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这里就要很好地解决《决议》中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问题。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找来《决议》起草组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邓小平对前期的稿子不满意，并用深刻的见解解决了起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对邓小平的这段话反复推敲，精心斟酌，把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现出来，堪称为有史以来政治评论的“绝唱”。

胡乔木在《决议》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就十分巧妙地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了。

所以，《决议》按历史顺序如实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指出毛泽东在此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没有抹杀毛泽东做过一些好事，认定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肩负重任，呕心沥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每有一次指示，他都要花大量心血设计方案，稿子拿去讨论之前，胡乔木都要认真地修改一遍。《决议》的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自己亲自动笔写的。在《决议》形成过程中，胡乔木由于劳累过度，几次病倒住院。

为此，邓小平曾动情地对胡乔木说：“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煞费苦心。”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再次对《决议》稿进行认真的仔细地讨论推敲。会上，邓小平再次谈了对稿子的看法。

邓小平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问题的讨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从此走下了高居多少年的神坛，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第二十八章 “爱竹子的刚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红墙之内，于若木含情忆陈云

骨灰埋撒在八宝山一棵雪松下

中南海有一幢长方形的平房，中间一条走廊，两侧是一个个房间，一律土黄色的房门。这便是陈云生前的办公室兼住处。

如今，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幅巨大的陈云遗像，每逢佳节，遗像前还会放着鲜花。有机会光临这里的人，也能见到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她与陈云自1938年3月在延安结婚，共同度过了漫长的56个年头。

70多岁的于若木，头发灰白，待人谦恭而亲切。陈云身高1.70米，在男子中算是中等个子，她与陈云身材相仿，在女子之中，算是中等偏高了。从她的谈吐中可以感受到，她颇具文化修养。谈话时，习惯性地略低着头。回忆往事时不时陷入沉思。她说话的声音不大，思路清晰，记忆力很好。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亲切地喊她“于阿姨”。

问起陈云去世的情况，于若木说，陈云死于肾衰竭引起的心衰竭。

199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因病于1995年4月10日14时0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邓小平同志在讲述中共历史上的领导集体时，对陈云的历史位置有过明确的定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论及“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回忆中共发展的历史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还没有形成这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9页）

如讣告所说：“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纵观陈云的一生，如同翻阅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一页一页的历史；风风雨雨、波澜壮阔。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按照陈云同志家属的愿望，陈云同志的部分骨灰已埋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茂盛的雪松下，另一部分的骨灰将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延安时期的中共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是一位很特殊的角色，尤其是在陕北延安根据地时期，人员急剧增加，外来投奔人员背景各异，机构或不全或重迭，工作环境、条件又恶劣。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前提下，中央需要一位精明干练、年富力强，又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心胸豁达、令人信服的组织部长，来主持这一摊百废待兴的工作。于是陈云被作为理想之选，从新疆召到了延安。是年他 32 岁。

陈云 1937 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 年 9 月，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这篇讲演是他就任组织部部长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用人之道。

他用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开头，指出作为干部、领导者，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分四个问题、12 个字概括出他的观点：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这篇讲演侧重点在要求党的干部要有气量，团结人，爱护人，但正如他在演讲结束时说明，不是说铁的纪律就可以不要了。1939 年 5 月，一个新入党的叫刘力功的训练班学员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组织分配，向组织提出这样那样的无理要求，并声明否则就要退党。再三说服教育无用，中组部决定开除其党籍。陈云为此专门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第 73 期，说明经过，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任何党员都必须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当党员个人强求组织服从他个人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陈云说，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从 1937 年 5 月开始，陈云着手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一些基础的工作，指明党的工作中心等，在当时很好地配合了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组织建设的系列教材。

陈云不仅亲自撰写大量的学习材料，发放广大党员学习，他在任中组部长期间，自身也特别注重学习，并带动身边的同志一块学习提高。李富春和王鹤寿后来就经常回忆起陈云组织大家学哲学的情形。

陈云说毛主席提示和希望他学习哲学，因而他下决心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共六人的学习小组，他是组长。请了一位青年哲学家和培元作学习哲学的辅导老师。

陈云规定的学习办法是，对很厚的一本哲学书，从头至尾一章一章地一段一段地读，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到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如实报告是否精读了规定的章节，谁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节，这是学习的纪律。然后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在学习小组学习哲学结束后，按照学哲学的办法，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毛主席著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这个学习小组一直坚持了 5 年。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坚持不懈，既展现出陈云的学习精神，也显示了他的坚强毅力。

陈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的出色工作，招致了党内一位以理论家、笔杆子自居的康生的关注。其间发生的几桩事件，虽未导致正面交锋，但暗中

的较劲已是公开的秘密。“文化大革命”才开始，陈云就被江青、康生集团挤得靠边站，就与那段时间的恩怨想有牵连。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王鹤寿曾多次回忆此事。党中央扎根在陕北后，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扩大解放区，在陕北延安建立了吸引和训练成千上万青年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以及训练党员干部的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当时领导党校工作的是康生，负责党校干部工作的是曹轶欧。中组部介绍到党校的同志，有些却被退回，退回的理由，大都是该党员家庭出身不好，或该党员本人的社会关系复杂。这种情形报告给陈云后，他指示王鹤寿找曹轶欧提出批评，指出：是不是好党员，决定于该党员本身，家庭关系绝不能作为党员合不合格的条件，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白区党内的党员，在旧社会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够认为他们接触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陈云叫王鹤寿向曹轶欧讲：“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收，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根据陈云的指示，王鹤寿与曹轶欧和党校党委其他几位负责人，严肃地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才打掉了康生在中央党校培训党员干部工作领域里“左”的干扰。

又一桩，康生是党内的社会部长，他经常向中央组织部要些干部到他那一部门工作，组织部了解他们需要的干部条件，所以介绍去的党员干部都是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认为是政治思想比较好，有些社会经验和能力比较强的干部。但是每每是介绍去七八位同志，常常要退回三四位，理由也是家庭关系复杂。社会关系复杂等等。被退回的干部当然受到很大刺激。但这些同志确是党内的优秀党员，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都逐渐成长为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王鹤寿把这种情况报告陈云后，他认为这是党内“左”的思想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问题上的表现和危害。他进一步说：“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干部，包括在你干部科工作的干部，不是也有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的吗？你看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个人作风，不是都很好吗？在选择提拔干部问题上，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你去社会部和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商谈一次，把中央组织部向他们推选干部的情形以及他们退回的情形说明，并可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们对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下从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考虑，只要家庭或社会关系复杂就下接受，那么中央组织部今后就只介绍一些农村干部给你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简单，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会经验也差一些，下一定适合社会部的工作。我想李屯农同志是下会有那种极左的观点的。”王鹤寿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与李克农谈过后，他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观点，不同意那种极左的思想和作风，同时表示他负责纠正他们那里在这方面的思想错误。

陈云在延安时与王明有过一场纷争，因矛盾的焦点在“女子大学”学生的分配权，后曾被人有意无意地蒙上一层欲说还“羞”、会心一笑的神秘色彩。其实这纯属陈云以一身正气、组织原则立场与霸道行为的一场交锋，并无上不得台面的隐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女青年（包括党员与非党员）陆续奔赴延安。中央组织部把这些青年大部分介绍到“女大”学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

各部门，或做妇女工作、或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当时“女大”的校长是王明。开始两期学习结业学员，都是按照规定的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一部分给中央妇委，请他们分配做妇女工作，绝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根据需要情况，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党委工作。但是后来这种分配原则行为通了，因为王明决定，在“女大”学习结业的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的革命女青年，都由他直接分配。对这种不合理的事，组织部根据原则与“女大”具体负责同志交涉，无效。他们声称这是校长王明的决定。情况报告给陈云后，为此陈云给王明写了一封信，请他改变他的决定。而王明坚持己见，声言他是“女大”校长，他有权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分配。组织部对王明的无理态度很不满，因而向陈云建议：如果“女大”不改变他们的方针，我们就不再介绍女青年去“女大”学习。陈云经过郑重思考后说：“我同意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办法，你们再和富春同志谈一下，如果他也同意，就照此办理。”李富春听后完全同意。因此，对到延安学习的党员与非党的女青年，基本上就很少介绍去“女大”，而直接介绍到陕公、抗大、鲁艺、党校、自然科学学院等院校学习，这样，“女大”的学员来源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了陕北地区的女青年直接由党的西北局介绍去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

这下王明急了，怒气冲天地指责中央组织部的做法。陈云于1941年2月13日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主要内容是：

一、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二、女大、青训班、鲁艺、自然科学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在高级班中留百分之五十，低级班中也留百分之五十，作为妇运干部、青运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自然科学工作干部。其余一半，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以后各校新入学的学生，亦照此比例分配使用。

王明2月13日接到这个决定，当天就来信责问陈云，反对这个决定。陈云第二天就给王明回了这样一封信。信中所写透出陈云的机智辩才不说，所用之词也是一般党史文献不可能见到的，颇有异趣，披露如下。

二月十三日信收到，答复如下。

（一）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不论高级班和低级班，知识高的和低的，身体好的和坏的，有小孩的和无小孩的，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只在上述各种人中各要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可与边区中央局和军委政治部具体商讨如何抽一半。

你提出女大学生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例如，最近几天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女生40名到中央医院去工作，就是证明。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二）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女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她们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其他任何干部的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此外，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的女学生一律送女大的决定。同时，也国为过去

除女大提交中组部或书记处调动的学生，或因老公他调而需随去的女大学生外，中组部实际无权调动女大的学生，另一方面，各方要人只能向中组部要。因此，中组部有过这种情况，即除一部分应送其他学校外，确有一些女学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这丝毫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调动容易，因为其他各校调动学生都不必经过书记处通过。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办法，但造成我们本来不愿意而又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对待另一不合理的办法，勉强还可得到不完备的“合理”。我个人希望在党内双方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使干部的培养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有空时希望面谈一次。

王明接到这封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冠冕堂皇而又柔中带刺的回信，哭笑不得。一个“毛头后生”对他如此不恭，他觉得这口气咽不下。为此，他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兴师问罪来了。正巧王鹤寿正在陈云处报告请示工作，而王明也不管不顾，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组织部不向“女大”介绍学员是不合理的。王明不久前刚从国外回国，他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自以为谁都不能违背他的意见和决定。针对王明这种气势汹汹，陈云不紧不慢地说：“这事我知道，为这事给你写过信，说明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女干部。你说军事部门不需要吗？他们的机要部门、医务部门、政治工作部门，不是大量需要女干部吗？你能不知道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政府各行政部门都需要大批女干部吗？各省各地的党委都是清一色的‘阳性’好吗？‘女大’的学员毕业后，中央组织部的分配方案是按一定的比例交给中央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的，此外就根据党政各方面的需要分配，这是从党的事业考虑的分配原则。现在‘女大’毕业生的分配，不能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分配，因而中央组织部不能再介绍女青年到‘女大’学习。介绍到其他学校培训学习，是完全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的。从形式上看，我们不再向‘女大’介绍学员，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这种从党的事业角度出发，采取的不得已的‘不合理’，对待你老兄那个违反党的利益、党的原则的不合理，这样才能求得一个比较的合理、相对的合理。”王明听到陈云这番不软不硬的回答，所讲理由、原则都没办法辩驳，因而开始气焰渐收，最后只得说：“那好吧，就按组织部的办法，但是你们分配时一定要给中央妇委一个大的比例。”陈云同志直率地说：“好，你既已同意，就一言为定，过去对‘女大’学员的分配，就是照顾妇委的需要，有一定比例交她们分配工作的。不过最后我还想向老兄进一言：你在国外太久了，你回来后无论出什么主意，最好先了解一下党的组织原则和各方面的情况，免得和各部门‘卡壳’。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他对一切重要的事，也都是多方面听取意见，才作出决定的。”王明听到此处，脸色难看极了，又不好发作，只好表示告辞。陈云客客气气送王明出窑门后，回到窑洞内办公桌前还在自言自语地说：“无论是谁，在党内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搞霸道主义绝对不行！”随后对王鹤寿说：“你回去见到富春同志，向他讲一下刚才的情形。在你们干部科内，只说向‘女大’继续介绍学员就可以了。”

陈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7年，这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著名的“延安

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多为建设性的，且集中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问题，陈云终身关注，只要发现任何问题，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尤其是当某种风气较为大面积、有普遍蔓延趋势的时候。

陈云就党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作过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解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这些思想大多收录在《陈云文选》中。

中国“鸟笼经济”的创造者

“鸟笼经济”这个词多见于港台报刊，海外的华文报刊多以一种略带嘲讽、调侃意味的语气称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鸟笼经济”，而且几乎每次出现都和陈云联系在一起。大陆的出版物是很少见这个词的，似乎这个概念不怎么雅气，给人一种意境不好的联想，对陈云老人不够尊重，重要的是，其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不够确切。而“鸟笼经济”的当事人陈云却对这话题乐此不疲。那么，究竟这个“鸟笼经济”的含义是什么呢？还是用当事人陈云自己的话来做一解释吧。以下是他1982年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中的一段：

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

这带点神秘色彩的“鸟笼经济”，其实原理原来这么简单明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中国，妇孺皆知。

老年的陈云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在杭州拍摄的，廊院里，老年陈云满面春风地坐在藤椅上打算盘。赵朴初观后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唯实以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九八一年一月观陈云同志打算盘照片喜题。”

那就让我们寻着“老谋深算，国之所倚”的陈云的轨迹，一睹中共这把“铁算盘”的风采。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陈云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1944年，他卸任组织部长后，在延安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贺龙）兼政治部主任期间，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发展农牧业，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发展内部贸易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争取做到基本自给。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担任过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支持解放战争、恢复东北的经济，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创建后，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等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总是深入调查，反复推敲，协助中央作出英明决策。在建国前后四次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局面中，陈云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华和指挥艺术，控制了局面，打击了投机奸商，建立起稳定物价的新秩序。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修改以及重大项目的抉择，陈云同志耗费了很多心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鞍钢三大工程、武钢和包钢的建设以及一批军工厂的建设，特别是机械工业，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等新中国第一批重工业基地，从厂址选择到方案的制定，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提出，经中央确定后，组织各方面力量以惊人速度完成的。

陈云同志对于经济的发展，总是从实际的可能出发，主张集中兵力，稳扎稳打。1959年他对粮、棉、钢、煤四大高指标不赞成，有保留意见，多次提出这些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不要在报纸上公布。后来毛主席委托他调整钢铁指标，他经过调查研究，并经过毛主席、党中央同意，把钢铁的计划指标降了下来。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良好愿望，而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衡，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说，国民经济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云认为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是一国总体的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他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他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设上可以缩短工期，经济上见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要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说搞好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保证”。

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就是说，制定工业发展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由于1956年的冒进，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的调整，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变成了负增长。正是鉴于这些教训，陈云深刻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都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按比例是经济规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是陈云长时期来对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和平衡发展，陈云同志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他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问题，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陈云特别强调三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确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

关于按什么原则来平衡的问题，陈云同志明确反对按长线平衡的观点。他主张按短线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度；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老、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建国初期，陈云的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和调整工商业对此有大的触及。1955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反映：过去总说广东是前线，不能办工厂，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包袱还得省里背，不是长久之计。天津反映：20万元的基建投资，建什么都还要中央批；许多部委强调垂直领导，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使企业很难办。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回京后多次强调经济管理体制要改革，要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内容有：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原则；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工业管理等。

1957年初，中央成立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专事落实这一决议。后来小组提出意见书，主要有：（1）实行“大计划，小自由”；（2）分级管理，层层负责；（3）简化计划程序和必要的表格；等等。

1961年10月，陈云受周恩来委托调查工业状况时，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过一次煤炭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薛暮桥，以及各大煤矿的党委书记等。当座谈会议论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陈云滔滔不绝他说：根本问题是条条块块，尺寸没有搞正确。然后他回顾历史，说开国十二年几个东西倒来倒去未倒出好办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开始有必要，以后放一点，经过毛主席批评，每次开会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业都要分一点成。1956年讲了十大关系。1957年，一个开了企业分成的会议，讲企业分成；一个是地方财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30日企业大量下放。以后每一次会又议“全国一盘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没有集中，讲了三年之久，庐山会议决定集中一点。究竟集权和分权到什么程度，并未解决，从工业建设来说，没有集中统一不行，一个省一个大区都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毛主席讲，中国大，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只开各部的会，不开省委书记会，会说都是上面下来的。省委书记代表当地的统一领导。当地不出一把力，平顶山、包头是搞不起来的。同心协力是应该的，但应给的权力、物资没有给。地方提出项目，并不只是为地方办工业，也是为大企业服务的。那时地方毫无机动余地，搞到财政分成很高兴。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该给你的就是你的；该为大企业服务的就要为大企业服务。市委的我不动，我的就是我的。给你的真给。钱，要紧的几样都给，给了不打主意，中央的东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资要相当统一，否则不能进行建设。

陈云的这番话，已具“鸟笼经济”的意味。

1956年9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原则意义的方针、政策。他主张要及时纠正在改造过程中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主张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级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生产归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等等。他的这些主张是要求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把经济搞活，市场搞活。

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

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他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1982年，大年初一的上午，陈云在他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约请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座谈经济工作问题。

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五位同志先后来了。互致节日问候以后，陈云同志用浓重的上海口音作了开场白：“今年北京春节喜气洋洋，鞭炮放得特别多。”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谈谈怎样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也不例外，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认为农业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就可以不要计划了。”

“过去一直有个老问题，经济作物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就会缩小。这个问题要正确处理。农业只有按计划经济办事，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建设好。”

“全国建设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哪些该先，哪些该后，这都要按计划办。不然，这儿一摊，那儿一摊，就不行。”

姚依林接着说：“现在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统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因为这样，才能逐步做到管而下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真正按照社会主义需要来组织和发展生产。”

“看来有的地方有点急，想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这是柴树藩同志的分析。

听了大家的话，陈云又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干，经济发展就快；如果急于求成，经济发展就慢。”

这短短两句话，是30年来经济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付出了巨大的“学费”而换来的。陈云讲得语重心长。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提起陈云，很多人会对他的这样一句名言脱口而出，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再要加一句的话，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党内许多干部把陈云的这 15 字格言当作座右铭，受益终身。

陈云是党内的理论家、组织家，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加之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长的生涯，使他谈起这个问题来，理论联系实际，头头是道。

早在 1947 年 2 月，陈云在东北局工作时，一次在辽东分局会议上给干部作报告，就谈到“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个历史经验的推论。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清楚、更深刻。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这是陈云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工作方法。其实，早在延安整风时，陈云考虑如何才能不办错事、不整错人就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他说：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假设一个对立面，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批驳，以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些。他还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的思考。由于陈云同志把听取不同意见看成是克服片面性从而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方法，因此，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

陈云在党内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著称，在他面前讲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50 年代初期，一些做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感到工作中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很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一讲，又怕他们没有时间。这个想法反映到陈云那里，他爽快地说，好哇，有意见就讲，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五次，总可以了吧！他很快就安排时间听汇报，连续听了两次，让这些同志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人都会讲，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同志口头上讲民主，但听不得不同意见。陈云不是这样。他对某件事情有了一

个意见之后，总是先放一放，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认真听取，展开讨论；没有不同意见，他还要启发别人讲不同意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意见符合实际，更加完整。对于曾经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他不扣帽子，还注意保护。有一次，一位副部长因提了不同意见被所在单位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得知后，马上告诉下面的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反对陈云，不要抓住不放。

1982年，一位干部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对某项政策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思想有压力，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说了一段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陈云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的支持，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他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并提出应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经常书写赠送传播。

在1978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应该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彻底改正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还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

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多进口一些粮食，以便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

陈云的上述各点意见，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与会同志的拥护。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在讲话中指明：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共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即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认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陷害。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纪委还按照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陈云于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论点，对广大党员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随后还提出下列两个论点。

就党的领导机关来说，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章规定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陈云非常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毛泽东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81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陈云提出，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应该增加建国以前党的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

陈云从1979年3月到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要我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他说，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早就主张，分配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他从来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的做法。他也从来不赞成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他在1981年底又提出，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他认为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也就是说，积累要控制，消费也要控制，都不能盲目膨胀。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云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他针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多次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他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下巩固的。

1992年7月，陈云在悼念李先念一文中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晚年喜欢书法，且喜赠人条幅，内容大部为他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15字箴言：“不唯上，下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1991年5月，在上海，他一连写三幅，分送朱镕基、吴邦国，黄菊。

1991年6月，由王光美联系。于若木支持，陈云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赠墨宝一幅，系他当年书写的集唐诗句，截取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中的四句：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仕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此四句诗的大意是用周公、王莽两人的事例，说明做人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只凭一时一地的现象就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作篡位者，把王莽当作谦谦君子。

据说毛泽东生前也喜欢书写这首诗。

但这两位高举“实事求是”大旗的战友，在建设新中国的实际纲领性领导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却有过几次截然不同的意见。

雄心十足的毛泽东几次对陈云极力不满，虽未点名号召进行批判，却使陈云多年“靠边站”。

本来，陈云对毛泽东是极度佩服、言听计从的，在延安时，毛对他说要学点哲学一句话，使他毕恭毕敬学了好几年，受益匪浅。

但是进入新中国的建设阶段，陈云完全进入了领导经济建设的角色，一头扎了进去，着手稳扎稳打地制定长远的规划；由于底子薄弱，他真的埋头“实事求是”去了，而毛泽东在当时“冷战”的严酷国际政治局势面前，以其诗人政治家的眼光，强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逐渐的，政治斗争的运转模式套进了经济领域，使经济建设难以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而陈云对此不理解，继而不满，居然有点不买毛泽东的帐，这使毛泽东开始对他不满。

1957年，中央领导层开始对经济建设的“冒进”政策产生怀疑。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甚至发表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含义明显，到年底，陈云等在制定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反冒进的倾向已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很恼火。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到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十分欣赏。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恩来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这一番言辞激烈的话，使大家心里都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三人谈话，此时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

1月19日晚，周恩来力顾全大局，在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事已至此，陈云、李先念等只好跟着作检讨。

毛泽东对“反冒进”还作了很多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反冒进不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不讲全面，下抓本质和主流。作出反冒进的方针，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因为国务院也是两种意见，只有财经贸系统想少搞，工业部门是想多搞的。

他还说：反冒进中强调的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

他对“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极为赞赏，认为在用词上少了被攻击的把柄；他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认为，“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他还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

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

“政治设计院”是“大鸣大放”中章伯钧攻击共产党的一个用词。毛泽东借用这个词来批评国务院和陈云领导的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下让中央政治局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小范围不行，就开中央全会，总要有点压力。2月18日，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马上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听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干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下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重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对毛泽东这番话，很多人诚惶诚恐。主席的批评显然是针对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的，批评有些过火，周恩来作为总理，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又把责任揽到他头上去了。

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话：“尽管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

显然，毛泽东的邪火不在于向他汇报的多与少，而在经济工作政策的内容下合他的胃口，因而引出了这番牢骚。

而作为被批评的陈云的反应呢？不得而知，好像是什么也没说。

“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

这本是列宁的一句话，毛泽东也用上了。

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是历史形成的。随着对他信仰的提高和普及，个人崇拜现象也渐渐滋长起来；而毛泽东自己呢？于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就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了。他不仅接受个人崇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个人崇拜的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1956年，中共八大时、提出过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到1958年批判“反冒进”时，他对八大会议决议精神表示了不满。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

而陈云对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对党内把一切都

依赖毛泽东个人身卜的思想和风气一直怀着深深的忧虑。早在 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发言在谈到“党的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防止出现张国焘似的野心家”时说过这样一段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话：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就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这一段与世风格格不入的“奇谈谬论”，而且是在中央全会上讲话，除了陈云，不作第二人想。毛主席对陈云这股“倔脾气”也是心存顾虑，没有办法。他讲的句句在理上，来一番大实话，毛泽东只有在心里耿耿于怀，找到一个什么借口，矛头就对着陈云来了。陈云呢，毕竟干过多年的组织工作，原则性强，组织纪律观念也很强，他既不像周恩来等立刻就会当面违心地检讨，也不会像彭德怀那样叮叮地当面骂起娘来。他有他的方式，对策就是住医院，或是到苏州听评弹去了。

毛泽东讲过，经济工作下像写诗，要越做越细。他话说得至圣至明，却常以诗人气质和态度来要求经济建设。陈云就经常不买帐。大炼钢铁时，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信，针对认为钢材定为 900 万吨太少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下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下到，反而会泄气。

当他的上书没有丝毫作用时，他只有以沉默对抗。他不会管毛泽东是否高兴。过于违心的事他决不会做。这一点他与邓小平差不多，1959 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彭德怀上书，被毛泽东号令批斗的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就称病不参加。他们二人不参加，应是极不正常的事情，而毛泽东竟未予理睬，无所谓。

党内一位高级领导人曾私下对人说过：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

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对毛的神化，思想上形成框框，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而陈云在这阴云弥漫的气氛中，却仍保持了清醒的态度。他的这种“软抗”的方式，毛泽东也奈何他不得。

1962 年 1 月中旬至 2 月上旬，中央在北京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请陈云讲话，陈云说对问题摸得不清，不讲。

而在会议结束后的 2 月下旬，由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一般称“西楼会议”，三天里，主要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陈云在会上大讲特讲，他认为困难表现在：1. 农业减产；2. 基建规模过大；3. 钞票发得过多，通货膨胀；4. 投机倒把现象严重；5. 城市生活水平下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陈云提出 6 条措施：1. 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段，前段恢复，后段发展；2.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3. 制止通货膨胀；4. 保证城市最低生活需要；5. 把力量用于农业生产；6. 计划调整，加强农业。

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

这个“财经小组”几起几落，1957 年成立，陈云组长；1958 年恢

复一次，仍是陈云组长；这次又是危难之时，又启用他。大家知道他是理财能手。他的工作方法和实绩，得到上上下下的公认，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所以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他主持解决问题。当时，一些同志把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但是，陈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极不合拍，所以往往形成财经小组完成解决问题的使命后，又不被重视，中上工作，问题来了又恢复，几起几落。

很多人对此抱不平，陈云却对之毫不在意，平时兢兢业业，“靠边站”时就当休息，听听评弹。他的态度似乎是在对“任劳任怨”作彻底的注解。

个人生活规律近于刻板

毛泽东生前这样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的确，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陈三以严谨、自律著称。他对自己、对别人，待人接物常常刻板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

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曾开玩笑他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他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对陈云又敬重又感激，为表心意，纷纷来看望他。一次一位老战友带来一纸箱葡萄，让他收下，他决绝地说：“带回去。”老同志脸上挂不住，反复推让，他改口了，“那好，我尝5颗。”他果真摘了5颗葡萄，然后送友出门。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下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他更反对办事送礼、走后门，他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前几年，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下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他要工作人员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嘱咐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如此，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看到，陈云的客人来访，经历了由多送礼，到少送礼，到不送礼的过程。渐渐地，来访客人均空手登门了。

这在各级干部中传为佳话。

陈云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他总说：“大家都挺忙，走那形式干嘛！”他的作风是：“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他的不善客套的作风，其执行之严格，时常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让人下不来台。春节时把未约好来家拜年的老战友拒之门外、坚决不见的事常有发生，让老同志尴尬得下不来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3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他一面也不要紧么。”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地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

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

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3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下去报，我就不走，首

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了！”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只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作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作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作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三面前，“咔”地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陈云会客限3分钟的事众人皆知，也有不少人效仿，却每次都是碍于情面，难以做到，陈云做到却毫不费力，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有一次倒是顺利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在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屈服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只手在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下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抬腕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

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出一行字：“3分钟谈话时间已到，”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所以，没有正事要谈，很少有谁会去陈云那里浪费他的时间。

他的这一“刻板”习惯一直陪伴他到最后，他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医院度过的。当时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他家里分两批到医院拜年，每批也就是几分钟，他就催大家回去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来看望他，他们很了解陈云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江总书记告别时，陈云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表示他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他就要人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陈云的自律，自我节制的毅力是人所皆知的。曾有人对他的饮食习惯这样描述：吃菜，他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下能多，也不要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

这确非夸张，他的“教条”常令人叹为观止。1952年，他戒掉了在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从此一口不抽，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陈云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80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到90岁，10年如一日。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10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他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陈云锻炼身体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散步。晚年由于病情发展。他的步子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短，而耗费的精力却越来越大。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不坐轮椅，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开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卧室、饭厅是分开的。后来，书房、卧室、饭厅三者合而为一了。他坚持走路以活动筋骨的这种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陈云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所以晚年他不看电视。但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医生来检查占去了时间，他也从不放过收听或者补听新闻联播。后来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收听时间赶不上，工作人员就给他录了音，这样他就方便多了。他收听新闻是非常认真的，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下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他的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告诉工作人员，要他们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而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查一查。后来他的听力确实跟上下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他要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在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任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但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陈云喜爱评弹，达到“发烧”票友的程度。无论到外地，还是有病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4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收音机，是必备的物品。最后在北京医院的300多天里，当然也下例外。病房走廊两旁都存放着用木盒装的评弹磁带。这些磁带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4台老式收音机的维修，也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承包，由于机器太老了，每年总要维修一两次才能正常运转，陈云去世后，还特意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到北京来参加悼念活动，他们的心情非常悲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云同志走得那样快，因为不久前陈云同志还要工作人员打电话问过，上海电台有没有“闯王进京”的评弹录音，如果有，他想听听。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不止一次书写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一生都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早在1945年，他就这样评说过“功劳”二字。第一，人民的力量；第二，党的领导；第三，个人才智，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了。

陈云同志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我国5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中央的五位书记使用。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车被换成了“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他说，我不能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一样。对于工资级别，他也是这个态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他们五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級，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了二级。他从不愿参加各种可以下参加的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

1994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提出，199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90寿辰，是否再请示一下陈云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

邓小平等同志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他的那本画册也该出版了吧。陈云的画册已经编好七八年了，因为他不同意出版，就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向陈云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再去请示，勉强同意，说这次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大家很高兴，马上转达了他的意见，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第二天，陈云又说，画册上的照片不要光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他们，也要有群众。当被告知画册都有，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陈云的后事，他自己早在50年代就交代过。1959年2月10日，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199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陈云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陈云出生农家，苦水里泡大，深知生存之艰辛，他一生平民意识极浓厚，生活简朴，从不允许有丝毫奢华。

1949年5月，他进京后住在北长街。这条街上有个很小的理发店。刚进城时，陈云每次都在这个理发店理发，后来被组织上发现了，不同意他这么做，一定要请他到指定的地方去理发，但他坚持要在这个小店里理发。弄得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抬出组织决定来说服他。陈云同志最尊重组织决定，从那以后，他就在家里让警卫员理发。后来有人曾经好奇地问过他的女儿，警卫员都是农村来的小兵，他们会理发吗？她的女说：不会就学吧！于是有人说，陈云必定是对警卫战士非常慈祥的人，否则，充当理发员的小战士结他理发时手一定会发抖的。

陈云家住在北长街71号（现58号），一住就是30年，房子从来没有大修过。1976年唐山地震后，房子出现裂缝，还震飞了一块砖，房管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房子应该翻修了。但陈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地震期没有过去，他的女儿只好带着陈云的姐姐到他的一个战友家躲地震。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部长们的房子都已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有关管理部门不得不进行修缮。但陈云却不愿意国家力他花钱，他说，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重新出任中央领导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增加了，住房不够用了，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

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棉坎肩，它的主人就是陈云

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棉坎肩，那黄里泛白的颜色，记录着悠长岁月的风尘洗礼，至于它本来的颜色，人们几乎辨认不出了。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有心人曾仔细数过，各种大小补丁计有32块。

从1946年到1984年，陈云年年穿用它，整整度过了38个春秋。

那还是在1946年10月，陈云在东北与萧劲光一起指挥艰苦卓绝的四保临江战役。其时正值严冬，地处长白山麓的临江城，冰封雪盖，地冻天寒，

气温一般在零下 40 多度。陈云在一所简陋的房舍里办公，批文阅电，筹划指挥，昼夜操劳，虚弱的身体常因受寒染病。但当时战事紧张，任务艰巨，即使卧病在床，陈云也仍然坚持工作。同志们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焦虑，都为陈云的身体担忧。当时担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唐凯便特意找人缝制了这件棉坎肩，鹿皮作面，内絮厚棉，送给陈云。陈云贴身穿上棉坎肩后，感冒发烧次数逐渐减少，保证了繁忙紧张的工作顺利进行。从那以后，陈云与棉坎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寒冬季节日日贴身，共同度过了南满斗争的艰苦岁月。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此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战争年代无法相比的，按说那件棉坎肩也可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然而，它的主人并没有遗弃它，而是一如既往，年年与它相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

在陈云受排挤、“靠边站”的风风雨雨中，这件补了又补的棉坎肩仍给他遮风挡雨。

1985 年 11 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赴京收集史料文物。在陈云家里，他的夫人于若木指着棉坎肩说：“这件棉坎肩，在南满时首长（指陈云同志）一直穿用，磨破的地方就让我补一补。解放后，首长还是舍不得换下来，还是年年穿，破了就让我再补一补，一年又一年，不知缝补过多少次了。别人常劝首长换件新的，首长总是说：‘补一补还能穿嘛！’直到去年冬天（指 1984 年），棉坎肩已经破得不行了，孩子们开玩笑说，这件棉坎肩该进博物馆了，首长才勉强同意换下来。”

结果，这件棉坎肩果然进了博物馆。

陈云有块手表，陪伴他几十年，他却仍舍不得换掉。1982 年 4 月的一天，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在夫人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风和日丽、杨柳青青的白堤、孤山散步。他们信步来到“苏堤春晓”的碑亭前，夫人提议休息一会。于是大伙围坐谈笑。陈云一边谈古论今，一面慢悠悠地给他的手表上发条，百余下仍未停手。当地一位陪同感到惊讶，悄声问身旁的陈云的秘书：“首长用的是什么表？”秘书笑着说：“这块表已经用了 30 来年了。前几年上百来次发条，还能走 24 小时。现在要上一二百次，还走不了一昼夜，光是上发条都吃力哩！许多人建议他买块新的，他却说这表还能走，何必更新？今后实在不会走了，到时买块怀表好了。”

众人听了正在发感慨，陈云“霍”地一下站起身来，看了看上紧发条的表，说：“11 点零 5 分了，回去吧！”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全都哑然失笑了，说：“首长，你的表又比昨天快 5 分钟了！”

陈云自己的生活简朴至极，他身后没有积蓄，也没有自下什么财产，如果一定要计算遗产数额，只有不到 2 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 1336 元，各项目补贴约 250 元，每月上交所得税 31.05 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 5 月份起就下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 10 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 13360 元。这就是人他一生的全部积蓄。

现在走进他的书房兼办公室，仍是他生前的样子。一面墙上一排书柜，里面有领袖著作、鲁迅全集等。陈三是建国后我党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一见过鲁迅的人，他一生敬重鲁迅。对面墙上的书柜上均力木匣子，里面有摆放整齐的上百盘评弹磁带。一桌一凳一对沙发，一个老式收录机。仅此而已。

陈云自己的生活像个苦行僧，但他对老百姓的疾苦却非常上心。1994 年

1月初，他在上海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员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钱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了这16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员告诉于若木马上去办。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子和床单。他听了很高兴。当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贵州遵义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这时，他专门把于若木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

陈云有5个子女，2男3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结果。他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踏车，从他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

“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北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文革”开始，不能考大学了。她的同学陆续有了工作岗位，而她因父亲戴上了“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高帽，许多工矿企业不敢招她，最后，她只能去怀柔县。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伟华很盼望能走一回运，分到条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区。

“你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到喇叭沟门、碾子那种贫穷山区去。”父亲虽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里，仍沉稳地这样告诫女儿。

她听了父亲的话，抱着最坏的打算去怀柔了，被分到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是教“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的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春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搓着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她觉得心里很冷，那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来的勇气，没有请假，也不管学校里还有课，径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伟华觉得一言难尽。

“你应该回去。”父亲很坚决。

“爸爸！”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尽管委屈，第二天她还是返回了辛营。说也奇怪，当地再度踏进这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子上的陈旧的窗纸，连车子走上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开始力自己一时的软弱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访问，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伟华变了。她不仅成了一名先进教师，更重要的是：她本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刚去农村时，人家来看她，她都不知道该站起来。可后来她理解了乡亲们，感受到了农民身上所涵有的质朴、深厚的人情，她对辛营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东奔西走，用很多时间去帮乡亲们代买东西。回去时大包小裹，连长途汽车的司机都认识了她，见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个只知读书的学生，可在和孩子们相处中，她心中升起了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县里，正赶上满天风雪，为了不误给孩子们上课，她顶着风雪步行几十里赶回辛营。

淳朴的乡亲，在伟华身上看到了陈云同志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拉着伟华的手，实在地让她转告她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父亲，父亲的眼睛里闪出温暖的笑意。

1974年，正当陈云一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辛营公社党委毅然作出决定：批准陈伟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天，她激动地落下了泪。只有到这时，她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她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辛营的人民和党组织亲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亲多次对她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话，她要记一辈子。

曾有人采访陈伟华：“你父亲送过你什么？”

“送过我一本书——《世界知识年鉴》。”

“你送过你父亲什么呢？”

她笑了：“两个核桃。”

原来，这书和核桃在这父女之间各有着它们的故事。

在农村时，每次伟华回京探亲，父亲都叮嘱她：“有空要看点书。”

1970年冬，伟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书。她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写来了回信。父亲的欢欣和鼓励浸透了那张纸：

“南南（伟华的小名——编者），十二月八日的信爸爸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读书了……”

“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

这封信使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都没有给予她什么表扬。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这之后不久，陈云专门就读书问题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女儿，为了能够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系统的理论，最好先阅读有关他们的传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背景，然后再由浅入深，阅读原著。另外，学习要有计划，要坚持，不光学习马列著作，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眼界开阔。

最后，他问伟华，“现在都读了什么书？”伟华告诉父亲，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父亲目光炯炯。

“消灭私有制！”女儿干脆地回答。

父亲满意地笑了。

后来，他专门选了本《世界知识年鉴》送给女儿。等她看了一部分后，就提出一些思考题，让她回答。就这样，伟华在父亲感染下，眼界开阔了，养成了自己独立学习的习惯。

陈云还曾设想把家人组织起来，召开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讨论会，但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伟华很挂念父亲，特别是夜深入静之时，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时与父亲相处的情景：

父亲很忙，没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不认识他。

大些了，她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她咯咯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那感觉似乎还留在她脸上……

她默默地在心里祝愿父亲平安、健康。

后来，父亲手关节有了毛病，医生说手需要常活动。伟华立即想到，应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在手里摸着活动。她在乡下，在许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拣出两个最好的带给了父亲。后来，那两个核桃被父亲磨得亮极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很高兴，嘱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

这一年，伟华30岁整，听到消息，她又兴奋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许她真要面临一个转折了。她曾多么渴望读书深造，可由于父母的问题，她的追求只是个梦。如今机会来临，她却又这么措手不及，距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自己在乡下，一无材料，二无人指导，能行吗？然而这机会对于已不年轻的她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她来不及细想，匆匆给母亲写了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

母亲的信很快来了，信中说：“爸爸说这叫走后门。”

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唉呀，自己怎么不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她从朋友那儿找来复习资料 and 课本，开始准备。当时，她正参加农村工作队，只能在晚上复习。农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书，只有屁股下的一块是温热的。有时她子脚冻木了，伸下开，就钻进被窝里看一阵，暖和了，又怕睡着了，再坐起来披着衣服学，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她去考试了。

她考上了。这时，父亲对女儿的报考志愿发话了：“国家需要教师，你

报师范吧。”当地踏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却远比自己年轻、活泼的同学时，她感慨万千。可她的内心是平静的，自己能成为大学生，靠的是自己。

毕业时，这一届大学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干部的各国家机关工作。本来陈云同志很希望女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可听说组织上已将伟华分到劳动人事部，他反过来开导女儿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经常教育伟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的钱，从不坐父亲的车，从没有“非份”的念头。当时，他俩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还要负担请阿姨带孩子的费用。他们过着和同龄青年一样的朴素的生活。

有时，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高兴地拿出早就备好的山楂片，并拉着外孙的小手让他摸自己的胡子，问“扎不扎？”听到小外孙说“不扎”，他笑了。

看着父亲含着笑意的皱纹，伟华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呵，父亲！”她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父亲的爱而感到幸福。

1985年5月，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年轻女教师。老教师们一眼认出，这不是陈云同志的女儿、我校毕业生陈伟华吗？听说她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怎么又来当教师呢？

“我是师范毕业的，我愿意回到教育战线干点事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上。”陈伟华真诚地告诉老师们。

“当教师比做机关工作辛苦得多，你知道吗？”老师们好心地告诉她。其实，教师的甘苦陈伟华是有亲身体验的。十年动乱中，她曾在北京郊区当了十年的乡村教师，她爱活泼、纯朴的孩子们，喜爱教师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她虽然服从国家分配走进了机关，但对教育事业的喜爱却没有减弱。全社会都要关心、重视教育，党中央还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事业的春天来到了。陈伟华酝酿已久的想法也成熟了，她决定回到教育战线。她说：“父亲听到我这一决定非常高兴，他对我大学毕业时没有回到教育战线曾经很遗憾。母亲的一家很多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支持我当一名教师。”

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遇到了母校的一位老师，听说她是学历史的，老师告诉她，学校历史组里几位老师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而分配来的年轻历史教师很少，欢迎她回母校任教。

经过学校考核合格，陈伟华终于成为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从这学期开始，她教初一两个班的历史，并担任班主任工作。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原则是：读好书，做好人。他对部下子女的教育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遵纪守法，读好书。

早在1949年，他在一封给战友的儿子的回信中就明确要求：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

对凡来看望他的部下，他都要间及其子女的情况，谈加强教育，要走正道。尤其在他晚年，高干子女经商之事在社会上弄得风风雨雨，议论颇多。

这将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他对部下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我还会批评你。”

陈云一生的言教、身教为他的子女、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去世后，1995年4月18日，京西宾馆，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代表全家对前来参加悼念父亲活动的工作人员、朋友、亲属表示感谢。她情绪激动，声音哽咽：“我的父亲不在人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子女永远怀念他，怀念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育，怀念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会继承父亲的遗愿。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关切对第三代领导人

陈云对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人当中阐述得最多的一个。许是多年的组织工作生涯，阅人甚多，对这个问题想得多一些，当年龄大了，眼看着同一代的战友一个个撒手西去，硕果仅存的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实际上，在接班人选的问题上，除了邓小平，他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1983年，陈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时说：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以上、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像我们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我们每个同志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1987年10月，陈云在中纪委九次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果然，在中共十三大后，陈云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一直关注国事，尤其关心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从新版《陈云文选》增收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关切程度。《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是1988年8月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是1988年10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因此，在经济活动权力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谈话还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1989年反对动乱的关键时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会议，要求老同志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正确决定。他说：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陈云还专门写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一封信，谈“秋后算帐”问题，他说：

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 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

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事件，也是我们党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中国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的明确态度，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陈云更加关注国际国内局势，在重大政治决策中，与邓小平、李先念一起，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一开始就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6页）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是陈云1989年9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看来并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他在杭州、上海休养期间，多次对许多负责同志强调要“不唯上，下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赠以条幅。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问题》是1990年4月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是陈云1990年6月对张光斗、陈志恺合著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写的批语。批语指出，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下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工作要抓实》是陈云1990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同时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谈到加强中央的权威性时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大多，议而下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

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9 页）

的确，对全国一盘棋、中央必须具有权威等论点，陈云是坚持始终的。

在他晚年，他更是觉得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认识到坚持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放过机会对地方负责人宣讲这个道理。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陈云 1994 年 2 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作者指出，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作者认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谈话最后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患难夫妻情深意笃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知道她的人不多。这和党内有的领导人家庭“夫贵妻荣”的现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一些场合，或是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新闻传媒报导时会提及于若木这个名字，冠以营养学家的头衔，但也仅此而已，个中原因，当有陈云家人要求自律甚严的缘故；而于若木自己的说法是：“或者是受陈老的影响，或者我的个性与他有相似之处，不愿出头露面。”

让我们从她与陈云的传奇婚恋、她与江青的公案及她作为营养学家对陈云的照料等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位老人。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于若木在济南念完小学，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完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内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哥于道泉当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于若木16岁时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她决定和妹妹于陆琳（后来改名为于璐琳）一起前往延安。

她离开山东时，从中共山东省委开具组织介绍信。到了延安，她便持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后来才知道，那份介绍信很被看重，因为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少，但是很多人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带组织介绍信，这样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要对这些党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于若木由于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表明她历史清楚，所以颇得组织的信任。

到延安后，她改名为于若木。在报到之后，于若木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

而她与陈二的结识，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从小就有出异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血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五队呢？因为五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厂来意。经过五队党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向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声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

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只是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里西山的一个小四合院，三孔窑洞，两间平房，十几个干部。陈云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于若木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没有，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 19 班。

没有第三人知道，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一切都那么地自然。两人在一起，自然要说些话，陈云开始问她的历史，她回答了。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自己的身世。

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她唱起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一句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当时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回忆了发自肺腑的一段话：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的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的原名“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才能到陈云那里，“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了五十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多是延安名家。陈云也来讲课，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3年。

这期间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极为浪漫的故事，是他们二人世界的秘密，外人本无从得知。但陈云去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偶然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三封信，这三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薄熙成所关心的不是信封上的30年代的邮票，而是这三封非同一般的信，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3封信。

这是三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

这3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内容涉及二人的婚恋，还有一封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收信人是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他在英国伦敦。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能。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然后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者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应该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弥足珍贵的信件，从其中可窥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形之一斑。

1941年，于若木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不久，她生下了长女。按二人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则由于若木取名。于是，她为女儿取名陈伟力。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这样，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

从此，二人风风雨雨，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熟知江青的人都知道，其人为遮掩自己的历史，借“文化大革命”之风，不知害过多少知情者。许多的文章都披露过江青如何整治和她一同从延安走出来的夫人们，尤其是知晓她的一些劣迹、对她有过非议的。而于若木居然在1970年江青如日中天，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飞黄腾达之时，贴出了针对江青的大字报，自然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其中的是非恩怨，还是录述于若木于1980年的自述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经组织介绍，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开始听说了江青这个人，当时她在12班，我在19班，同班同学告诉我，她叫蓝苹，演过《大雷雨》，是有名的电影明星，红极一时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见她在党校自编自演了《弃儿》等节目。后来我进了马列学院，江青也进了这个学院，恰巧分到了同一个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认识了。那时她为了个人的一些事情，经常跑中央组织部找人谈话。

1943年春，由于陈云长期劳累，身体比较虚，组织上决定他到枣园休息。到了枣园，我们和王稼祥、朱仲丽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枣园的另一处，江青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看看，还常让朱仲丽给她看病。当时，延安的许多干部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十分看不惯，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从不议论。江青也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谈话中对我表示赞许。那时，延安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待遇差距并不很大，就穿衣来说，一般人领平纹布的衣服，而领导干部是量体做斜纹布的衣服，我从来未与别人计较这些，只是按制度领普通衣服。江青说，你不与别人讲平均主义，不计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讲平均主义。

到了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这个人越发不像样了。从保健医生、护士那里听到，江青一个人要一个专职保健医生、三个护士日夜轮班照顾。我十分气愤地说，许多老干部资格比她老、功劳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没有这样做，她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何况她身体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嘛！

1962年春的一个夜晚，我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幢房子。刚一进门，就觉得眼前异常豪华，尤其是四周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连桌子也是用绿绒包了的，进了厕所，就连马桶盖、马桶的垫圈也用绿丝绒包了。陈云说，这幢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完全变了。随员解释说，这栋楼重新作了修整，是专门为江青准备的，后来她不住了。我听了才恍然大悟。住进去后，我仔细作了观察，窗帘有两层，下层是遮光用的，这层窗帘在白天能够把光线完全遮住，就像洗像片的暗室一样，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听说江青只有这样才能睡午觉。这层窗帘是用三层布缝制的，向室内的一面是浅草绿色的线绒，中间一层是棉绸，外面一层是黑卡其布。此外，还有一层淡绿色的乔其纱，这层薄纱是为了便室内光线柔和的。据招待人员说，在修整时，窗

户都按要求改成了落地窗，而且安了双层窗。一、二楼，凡是主人活动的范围，从走廊到卧室、会客室、活动室、餐室、卫生间，所有的窗帘都是一样布置的。落地窗，从房顶到地面大约有3米多高。我数了数窗子的数目，大约估计了一下用布数量，恐怕不下几十匹布。我对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十分看不惯，非常不满，不断地向陈云嘀咕：“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跟陈云说了之后，我觉得并未解决问题，要按组织系统提意见。一次，警卫处处长找陈云谈问题，他一出来我就找到他，对他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潢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市场供应这么紧张，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去供应群众。”处长回答我说：“那还要问问江青同志，谁知她还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还告诉我，这种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还有3处。我一听，毫不客气地说，这真是开了眼界，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

谈话之后，我曾在陈云的随员中提过倡议。我说，咱们联名提提意见，起草个意见书，大家签名。但是，对我的倡议，他们一笑置之，谁也不敢理我这个岔儿。但是，我总在想，江青这样铺张浪费、挥霍财物难道就是合法的，应该的，不该揭发么？难道她就可以例外么？我觉得她简直像高踞于党组织之上的太上皇，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多数人对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靠边站了，后来下放到湖南衡东国家科委“五七”干校。1969年党的“九大”时，江青进入了政治局，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深为不满。第二年6月，干校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联想起1962年的所见所闻和其它一些事情，感到江青这种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对她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虽然江青当时已经红得发紫，搞了所谓“八个样板戏”，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宝座，有的人还提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的口号。但我想，只要坚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为题，向党组织写了揭发材料。7月3日，我又在和一些群众共同商量的基础上，写出了一张题为《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在干校公开张贴出来。大字报从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露出她的灵魂本质，特别举出了1962年我在上海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我一针见血地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在她身上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使用的语言中，我觉得她完全是这样一种人物。

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中轰动了，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它寿命不长，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北京来了人，可能是带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离了。后来，我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大会小会地进行批斗，罚干重活等等。最后，他们甚至召开全干校大会，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我被“专政”了，艰辛的日子虽很长久，但是我也从许多同伴的态度上看出来，他们并不是真正把我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违心地念稿子。有些群众还乘没人的机会，偷偷安慰我，有的人还暗暗地给我送维生素B，问我要不要零用钱……我从内心中感到有温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这一类坏人总是长不了的，党和人民总要胜利的。

于若木的这段自述，虽然还带有当时的一些政治色彩，但我们已经足以明了她与江青之间的一段公案。

于若木在政治高压下没有屈服，她在1970年12月向组织写的思想汇报中，明确地说：“我和江青之间并无任何个人冤仇。我和她的斗争，其实质

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吃点小小的苦头，是为了避免将来吃大苦头，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然让江青这类修正主义分子掌了大权，我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1971年10月4日的思想汇报中，于若木更尖锐地揭露江青：“以她那样恶劣的思想意识，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就有使我们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时候如果不挺身而出，坚持斗争，就会误了党的大事，葬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

到了1972年7月，于若木在向组织汇报思想时，更是指出：“江青这个走资派就是现在党内最大的一个隐患，是名副其实的赫鲁晓夫。”

后来，于若木随着干校同伴一块回到北京，但是，仍然被限制自由。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经过几番周折，于若木的女儿陈伟力打听到了她的消息。经过申请，北京市科技局白介夫批准同意，她们母女俩相隔多年后，终于重新见面了。1973年初，陈云从江西被接回北京，打听于若木的情况，几经周折她才能够回到家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关心着于若木，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见到科学院领导同志，问起于若木的问题怎么样了，说，你们是否搞得过份了一点？李先念副总理也关心过此事。可是，在江青、康生一伙横行的日子里，于若木虽被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还留了一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

1976年12月22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喜庆日子里，于若木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决定：撤销学院党组原来对于若木的错误处分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号召全院同志向她学习。听到这一消息，于若木热泪盈眶，知情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众所周知，陈云是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长寿者。这其中原因何在？

其实陈云的体质并不好，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云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先天营养就不足，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够，陈云主要靠吃米粉长大。这样，造成他的体质从小就差。

陈云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别怕感冒，衣服总是比别人多穿。

长期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瘦弱。到延安后，陈云的生活比较稳定，条件也有了改善。不过，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于工作紧张，他抽烟比较多。那时，他的手指头都被香烟熏得呈褐黄色。他的脸色也不好，苍白。

进了北京之后，生活变得安定。于若木向他反复宣传吸烟的害处，使陈云下决心戒烟。陈云意志颇强。他下了决心戒烟，也就戒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到了晚年，陈云曾说，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自从1952年戒了烟，又遵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吃“斯米当”，陈云很快就开始发胖，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比往日好得多，所谓“斯米当”，其实也就是稀奶油。这种“斯米当”很容易消化。那时，他每天早餐吃面包、抹“斯米当”和果酱，再喝杯牛奶。

于若木开始精心照料陈云的饮食起居，其核心内容归结为八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陈云通常在每天晚上 11 时做就寝的准备，11 时半上床，12 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 8 时起床，8 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他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

他的饮食是严格科学搭配的，主要包括三十方面：一是搭配好主食和副食的关系，要以主食为主，副食为辅；二是搭配好荤菜和素食的关系，要以素食为主，荤食为辅；三是搭配好主食副食的品种关系，要多种多样，宜杂宜粗。陈云爱吃米饭，但从不吃精白米，只吃籼米。所谓适量，一是指进食适量，他主张饭吃八分饱，使每顿饭前都出现一定的饥饿感，这样吃起来更香，有利消化吸收；二是要求厨师做得适量，吃多少做多少，每顿饭做到吃光不剩，杜绝浪费。于若木说，定时饮食是比较难做到的，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都尽量做到一日三餐准时进餐。

按照这些原则，于若木和医生替陈云制订了食谱。他一天的进餐安排是这样的：早餐，一杯豆浆，两片面包，加少许果酱、黄油，再加一小碗稀粥和一小碟煮花生米。中餐是一荤一蔬一碗饭：荤菜大都是用各种肉做的丸子，即猪肉、牛肉、鸡肉或鱼做的丸子，大约 75 克；蔬菜一小碗，大约 150 克；一碗 100 克籼米的米饭。晚餐是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和一碗米饭：一个豆制品是一小碗南豆腐或豆腐于丝等豆制品菜，大约 100 克；一蔬是一小碗炒蔬菜，大约 150 克；一碗籼米饭，75 克。

这是陈云每天 3 餐的基本安排，几十年来都认真实行，很少破例，每周的食谱只是调换品种。有一次，他在杭州过春节。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要不要改善一下伙食多做几道菜尝尝？陈云幽默地回答大家说，我天天过年，中午吃“楼外楼”，夜饭吃“天外天”。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杭州的“楼外楼”是以做西湖鱼闻名的餐馆，灵隐寺的“天外天”则是以素菜著称的餐馆，陈云这样说的意思还是按老食谱吃，午餐一荤一素，晚餐一豆一蔬。

于若木曾向人介绍说，陈云爱喝豆浆，豆浆是家庭自制的，每当他出差外地，我们都把一个小石磨子和黄豆带上，第天早晨替他做一杯鲜豆浆，有一次，厨师做午餐菜用豆腐作素菜，陈云见了就问：“怎么没有蔬菜呀？”厨师说：“豆腐不是素菜吗？”陈云笑笑说：“豆腐是素菜，不是蔬菜。豆腐中蛋白质多，蔬菜中维生素多，这种素菜不好代替那种蔬菜。”厨师恍然大悟，立刻补炒了一小碗蔬菜来。

于若木说，为了使这种比较合理的饮食安排收到好的效果，陈云还养成了“三不”的习惯：一般不参加宴会，因工作需要非参加不可时，他在筵席上也只是选择适合自己吃的菜点稍稍品尝，回到家里，还是吃他的一荤一蔬或一豆一蔬；二不吃零食，他除了吃好一日三餐，并在餐后吃些水果外，不吃任何点心或零食；三不喝饮料，他每天只在午后喝一杯茶水，其它时间只饮用白开水。

于若木认为，陈云这种俭朴的饮食生活，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她说，他们曾经计算过，陈云一天饮食总量所提供的各种营养素数量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国人群日均营养素摄入量标准大致接近，是营养结构比较平衡的膳食。这种平衡膳食，可以有效防止或减少因饮食营养不当而引起的各

种病症，使身体的生理活动保持良好的状态。陈云虽然 50 年代就患有冠心病，但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心脑血管疾病症状，身体的其他各项生理指标也长期保持正常，感冒等小毛病也较少发生。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陈云数十年坚持科学合理安排饮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曾有人这样直问于若木：“你是研究营养学的，陈云同志饮食生活完全由您替他安排吗？”她笑笑说：“不能这么说，陈云同志自己对饮食、营养、养生方面有自己的体验和见解，他是从自己的饮食爱好，根据自己的消化能力，再参照营养科学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饮食生活的。当然，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同他的保健医生共同商量一些保健措施。例如，他平时爱喝龙井茶，当我们知道陕西紫阳出产一种富硒茶，就在龙井茶里配上一些富硒茶。这种茶的硒含量很丰富，而硒对人体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它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并抗衰老。又例如，他每天早晨喝豆浆常用蜂蜜作调味剂，我们后来看到一种花粉精，就建议添加花粉精作豆浆调味剂。因为花粉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和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如锌、锗、硒等，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和抗衰老作用。”

有妻如此，陈云安能不长寿。

于若木对陈云的身体状况最有发言权，这已是公开的秘密。1990 年 11 月，外界传言陈云病重，已成植物人。恰巧于若木赴深圳参加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等活动，大批港台记者蜂拥而至，纷纷问于若木关于陈云的情况，她否定了外间的传言，介绍说陈云仍关注国事，坚持读书看报，看文件材料，生活很有规律。对外界关于中共元老中独陈云未来深圳，系他不赞成深圳特区发展方向的传言，于若木说纯属猜测，毫无根据，其主要原因不过是陈云年事已高，不宜远行。

第二十九章 一股旋风，从南卷起。中南海吹起时代的号角，神州又一次沸腾了

春天含情地记载

时光进入 1992 年，一股改革开放的旋风，由南向北，从东向西，迅速席卷中华大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 88 岁高龄，不辞劳顿，携家南巡，再一次掀起神州大地的改革浪潮。《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关于邓小平在深圳访问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自 3 月 30 日以后，被新华社和各地报纸纷纷转发、转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改革热情。现将此文摘编如下：

1 月 19 日上午 8 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在 9 时正，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 8 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 8 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邓小平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与邓小平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 1979 年 4 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邓小平当然十分关注。1984 年 1 月，邓小平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 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随行人员说，邓小平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 10 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邓小平提起他在 1984 年 1 月 26 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1984 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 1 月 24 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 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 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这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 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邓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 20 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车子不知不觉到了皇岗口岸。皇岗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欢迎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介绍说，皇岗口岸是 1987 年初筹建，1989 年 12 月 29 日开通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 180 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 5 万辆次和 5 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 7000 辆次和 2000 人次。邓小平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

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并齐喊“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坐下来后，他先看一张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李灏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是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要多于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大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谈话约谈了30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当邓小平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

邓小平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离开国贸大厦后，邓小平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

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先后到

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邓小平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50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邓小平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1946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5月离开延安直到1953年，叶正光于1952年到1960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邓小平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去年10月12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500万张，视盘150万张，激光视、唱盘放送机5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锃亮的激光视盘给邓小平观看。这种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10.8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邓小平听了，十分感兴趣，问：“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他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邓小平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小平同志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平同志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接着，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为邓小平演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他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当邓小平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30米长的过道时，许多职工在过道侧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

邓小平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邓小平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

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当邓小平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邓小平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临离开车间前，邓小平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 50 万张激光视盘，250 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 OK。总产值可达 3 亿多元，利润 8000 万元。”邓小平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邓小平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对记者说：“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关怀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1 月 21 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上午 9 时 50 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

在广场西侧，邓小平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邓小平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邓小平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族舞蹈。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邓小平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邓小平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邓小平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

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邓小平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邓小平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今天，邓小平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上午9时4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邓小平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邓小平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邓小平和杨主席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主席说着扳着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

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全场大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和杨主席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了据说距今已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欏。

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璋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邓小平说的那棵很大的水杉，是1946年薛纪茹先生发现的。他采集了标本，1948年，定名为水杉，公开发表，轰动了当时国际植物界。人们称此树种为活化石。这棵树胸径2.4米，高35米，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谋道这个地方。

接着，邓小平和杨主席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

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邓小平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邓小平指着“光棍树”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仁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声喧。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开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像绒布。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主席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杨主席也在以极大的兴趣，观赏着各种奇花异草。他观看猪笼草、鸟巢蕨时，鸟巢蕨那活像鸟巢的模样令他十分开心。他问这植物开不开花？靠什么繁殖？植物园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这里有一种兰花，很奇特，叫“跳舞兰”。植物园负责人指着一朵兰花给邓小平介绍：“这兰花样子像个姑娘。这是头、身子、裙、腿。它在跳的土科哩。”邓小平笑着说：“是，很像个姑娘在跳舞。”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邓小平和杨主席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邓小平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里，绿色主宰了大自然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邓小平说，“这里的环境真优美。”杨主席赞叹道：“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主席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长青树——高山榕。邓小平和杨主席挥锹培土。接着，邓小平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邓朴方在旁人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锹土。然后，邓小平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浇水。

杨主席同邓小平一家栽好树后，又领着自己一家在不远处种下另一棵高山榕。杨主席和家人一道培土、浇水，动作非常敏捷。

高山榕是一种亚热带植物，桑科榕属，是广东省的代表树种之一，生长快，树冠大，四季长青。

邓小平和杨尚昆主席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荫。深圳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记住他们为建立新中国、为改革开放所作的卓越贡献，记住他们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记住他们那长久而深厚的情谊。

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乐也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高兴的镜头。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邓小平和杨主席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时，坐在

前排的有：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邓小平握手，邓小平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邓小平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 1997 年访问香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向邓小平敬礼、问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向邓小平介绍说：“朱敦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是个连长。”邓小平笑笑说：“那时还是个娃子哩。”在淮海战役这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了：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8时30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邓小平。人们都依依不舍，多么希望邓小平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邓小平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邓小平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

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车子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邓小平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邓小平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海上世界”对邓小平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邓小平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3.5万吨的船，准备建成停5万吨船的码头。妈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5万吨的。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1400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邓小平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天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邓小平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邓小平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握别。

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1992年1月19日至23日，邓小平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邓小平初到深圳

正当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情况广为新闻界介绍的时候，一则关于他初到深圳的内幕也为报刊披露，请看上海《文汇报》4月28日的报道：

198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驶入深圳狭窄的老街，停在深圳迎宾馆的门前。一个穿着黑色呢大衣的人走下车来，向门卫递上介绍信——“中共中央警卫局”！

门卫立即进入岗亭，拿起话筒。

“接待处张荣吗？中央来人有急事找你。”

接待室，穿黑色呢大衣的人对张荣说：“请记录一下，我口授。”张荣有点紧张，顺手拿过一张纸。“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及杨尚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人们记起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这回，他真的来了。

1月24日，从北京开往南方的一列专车急驰深圳。

车到深圳，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梁湘、周鼎等人在车站迎接，然后陪同乘车驶往迎宾馆。路上，邓小平几次掀开窗帘，望一望车外繁忙的工地和正在兴建的高楼……

坐在后面一辆轿车中的深圳市委领导人，兴奋之余又不免有点儿紧张。

5年来，他们只是照建设需要的做了。做得怎么样？这样改革行吗？这次，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会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

汽车驶入迎宾馆桂园别墅。一进别墅门，老人的小外孙就嚷着：“外公……这儿好漂亮，在这儿照相。”

邓小平招呼家人：“喂，喂——命令照相呢，好，照——”“咔嚓”——邓小平笑了。

几个紧随的深圳官员悄悄议论：“他似乎心情不错。”

下午3点，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深圳市委向邓小平汇报情况。

“开始吧——”邓小平手拿着全体市委常委的名单说。关键的时刻到了。

市委书记站在特区规划图面前，把特区5年来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改革推进情况都作了汇报。

“我们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尤其是离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希望相差甚远……大家早就盼望您来看一看，今天总算盼到了。”

一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那位身材不高、但十分硬朗的老人身上。

没有裁判的声音——

“我们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市委书记再也憋不住了。

“你们讲。”老人说，“我听。”

嘀嗒、嘀嗒……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听得见窗外法国梧桐树叶迎风摇曳发出的沙沙声。

“那么——散会吧。”市委书记说。

他为什么不表态呢？

下午4时50分，邓小平等乘坐大型客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

他登上刚刚竣工开业的 22 层国商大厦天台，近处的深圳全景，蜿蜒的深圳河，远处隐藏在雾气中的香港，一下都落在他眼底了。其时，天气骤然转凉，阵阵北风呼啸。随行人员中，有人取出一件大衣，邓小平摆摆手，依然扶着栏杆，远望南方的香港。他，在深思……不久，他对旁边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25 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富甲一方的深圳渔民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早已在村口等候。上次胡耀邦来访渔民村，看见老吴穿着旧唐装，脚踏凉鞋，曾说：“你也应当穿漂亮一点。”所以今天吴柏森特意穿上崭新的呢大衣，皮鞋也叫老伴给擦得乌黑发亮。

“欢迎您，欢迎您。”吴柏森激动地握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引进家门。

双层的小洋楼。房内有冰箱、彩电、洗衣机、全套不锈钢炊具、电子煤气炉……这个村 1983 年人均年收入 2800 多元，户户是万元户。吴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女儿邓林在一旁说：“深圳也要那么久吗？”旁边的深圳市委领导急忙插话：“有您的领导，一定会很快。”邓小平：“那也得要 50 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回想起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要 50 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着……

25 日下午，邓小平参观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老人发现，电脑能同人下棋，于是眼中闪出年轻的火花，立刻坐下来同电脑下棋。原定安排 15 分钟参观时间，延长到近一个小时。

薄暮开始降临，汽车载着邓小平驶回桂园别墅。

深夜桂园别墅楼上的灯光闪亮，深圳的许多干部群众还站在宾馆外，远远望着那小窗前的灯光……

他，在做什么？是在处理国家事务，还是已经休息？深圳，在他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深圳人的心情。明天，老人将去蛇口，据说随后要去珠海，然后经过广州回北京了。如果他一句话也没说，如果几年来深圳人一切“大胆的尝试”都得不到肯定，结果将如何？

第二天一早，当汽车的马达声响起，邓小平的小轿车轻松地滑过桂园别墅的林荫道驶向蛇口时，人们心中留下来一串沉重的问号……

不久，从珠海传过来消息：邓小平到了珠海，并给珠海题词：“珠海特区好”。

紧接着，又有消息传来，邓小平已到广州了。

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

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讯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副市长，题了！”话筒中是原深圳接待处长张荣激动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吩咐他。

张荣：“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他题的是：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1984年春节，凌晨。

当欢乐的第一枚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杜鹃格外火红，金桔黄得格外耀眼。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后来，有人这样说：“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不说，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一下倒出来。”

现在我们容易理解了！这不是一般的题词，而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进行一次高度概括的历史性总结！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而作出的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

这就是邓小平！

这里有件小事需要顺便说一句，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在深圳的日子—1984年1月26日。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

邓小平在珠海

1992年1月23日上午，风和日丽，辽阔的珠江口微波荡漾。刚刚结束深圳考察的邓小平，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前来珠海。

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快艇劈波斩浪，在浩瀚的伶仃洋划出一道浪花飞溅的银练。在船舱中，邓小平坐下后，陪同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打开了广东省地图。邓小平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谢非和梁广大同志汇报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政策给广东和珠海带来的可喜变化。

1984年1月，邓小平曾来广东和珠海视察。当时，全国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如今，南粤大地已旧貌换新颜。深圳、珠海这两个位于珠江口两岸的经济特区勃发生机，由边陲小镇突变为充满现代气息的海滨新城，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同样以现代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名扬中外。粤西、粤北地区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起直追。一个从沿海向内陆山区递进的全方位开放架构已经形成，由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已成为南粤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谢非同志汇报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指发展中等的粤东、粤西平原地区，“第三世界”指大片山区。广东正努力缩小贫富地区差距，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邓小平说：“要得。”

在听完谢非、梁广大同志的汇报后，邓小平谈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提醒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在快艇上的谈话中，邓小平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就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快艇已经接近珠海市九洲港，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淼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快艇航行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也不停地与省市领导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艇靠岸了，他和艇上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然后在谢非和梁广大等同志陪同下踏上了阔别8年的珠海大地，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副省长凌伯棠，以及珠海市领导何仲云、卢炳雄、麦庚安、李焕池、关玉嘉、雷于蓝等同志握手致意……

1月24日晨，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的干部职工早早地来到厂里，等待着一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的到来。

上午9时40分，一列车阵急驰而来，稳稳地停在厂门口。邓小平在广

东省领导谢非、朱森林、凌伯棠和珠海市领导梁广大等陪同下，从一辆中巴上走下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频频招手。

厂总工程师迟斌元疾步走上去，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们全厂职工盼着您来啊！这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幸福。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够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邓小平听到后，微笑地摆摆手说：“过奖了。”随后，邓小平听取了迟斌元同志的汇报，并拿起该厂的产品“凝血酶”提出询问。

生化制药厂开发生产的“凝血酶”是一种特效止血药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这个厂以一流的技术开发出一流的产品，并创造了一流的效益。去年这家仅有80人的企业完成了3000多万元产值，人均创税利达12万元。当邓小平听说“凝血酶”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时，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

接着，邓小平笑容满面地慢步参观了该厂的生产车间。在一个车间门口，他透过玻璃门，向里面起立鼓掌的科技人员亲切招手，并对陪同的省市领导和厂负责人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每一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10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10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方法。

走到一座楼梯的转弯处，邓小平看到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他停下脚步，轻声地念了一遍，然后，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邓小平走到工厂门口，四周出现了更多兴高采烈的职工。他站在台阶上，对迟斌元说：“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你们，请转达我对全体职工的感谢和问候。”

一阵阵欢呼声在邓小平的周围响起，几名女工流着激动的泪水，向这位慈祥的老人挥手致意。邓小平向已经启动的中巴走去，突然，他又停下来，对大家殷切地嘱咐道：“希望你们珍惜荣誉。”

1月25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

邓小平一下车，看到公司门口站立着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人啊！”

他走进公司大厅，在一张长桌前坐了下来。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同志汇报到亚仿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游景玉同志回答：“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邓小平听后，对大家说：“就是要靠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随后，邓小平又亲切地问游景玉，“你是留美学生吗？”游景玉同志说，我曾经去美国接受培训，负责引进仿真技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

过。他们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决心把祖国的高科技事业发展起来。

邓小平沉思了片刻，深情地说：你们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接着，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公司的计算机房。只见不久将要交付使用的两组分别为 330Mw 和 200MW 的模拟火力发电机组正在调试。这是具有 9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它凝聚着亚洲仿真公司全体科技人员一年来日夜奋战的辛勤劳动。

参观中，游景玉同志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 20 多万元。”邓小平马上接着道：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 90 年代，进步得更快。游景玉同志告诉邓小平，他们公司 105 人中，80% 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邓小平听后，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科技人员感慨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 50 年代好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你们的要求也更多、更高了。

邓小平在机房内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邓小平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当然老科学家是很重要的。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接着，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走出计算机房时，邓小平高兴地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邓小平走向大厅，这里已站了好几排等待与他合影的科技人员。他亲切地走上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时间长达几分钟。这时有的同志说，差不多了，只有几个站在后排的年轻人还没有握手，邓小平听到后，一定要绕到后排与这几位年轻人握手。

“咔嚓”、“咔嚓”，照相机摄下了这难忘的场面。合影后，邓小平还十分关切地问道：“都照了吗？”人们顿时从心底迸发出美好的祝愿：“小平同志，祝您身体健康。”激动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邓小平不停地对大家招手，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亚仿”的职工依依不舍地目送邓小平向汽车走去。邓小平边走边问游景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51 岁。”邓小平听后，笑道：“好啊，正当年嘛。”临别，游景玉同志握着邓小平的手说，希望您不久再来我们公司视察，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我们国家的高新科技搞上去。邓小平深情地说：“这是共同的愿望。”

离开亚仿公司后，邓小平在车上依然谈锋甚健。他说：“真高兴啊，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 100 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差不多就有

100人，学历比那时高得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同志接过话题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邓小平点点头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怀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梁广大同志汇报说，去年已有不少在国外的科技人员要求来珠海工作。谢非同志也汇报说，广东省已制定政策允许留学生来，也允许留学生走。邓小平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事实上，回来的，绝大多数都能学有所用；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叶选平同志一起，来到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这天，激动得一夜未眠的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一大早便来到工厂。一路上他还在想着该如何向邓小平汇报“江海”7年的发展历程。清晨出门时，他没忘记把家里最上等的优质龙井茶带上，准备给邓小平品尝。

上午10时15分，邓小平来到了江海公司。邓小平下车后，首先与先行到达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以及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握手致意。

在公司的职工俱乐部里，邓小平、杨尚昆、叶选平等同志听取了丁钦元同志的汇报。1984年7月，江海公司从旧仓库、旧石房开始了自己的建设事业。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江海公司不仅全部收回当年的500万元投资，还向国家上缴了2900多万元的税利，并积累了2000多万元的家产。现在，他们的生产设备99%是国产的，而自己开发和生产的录音机机芯88%出口海外，仅去年就为国家创汇2600万美元。在艰苦的环境下，“江海”以自己的自觉、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过得硬的职工队伍。

邓小平听了十分高兴，并带头鼓掌，对丁钦元同志说：你讲得很好，特别是不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做的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和全体职工。

丁钦元同志说，我们就是按照您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干的。邓小平接着说道：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并回过头来对梁广大同志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随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机芯总装车间。路上他问丁钦元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丁钦元回答：“60岁了。”邓小平风趣地说：“很年轻嘛。”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敞怀欢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告诉丁钦元：“1984年我来过珠海。”丁钦元同志说：“那时还没江海公司呢，但您那时写下的‘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是在您视察半年后来珠海创业的。”

在厂区等候已久的“江海”部分员工终于迎来那难忘的幸福时刻。邓小平向他们走来，并对身旁的丁钦元同志说道：“这么多年轻人。我很高兴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又操着浓重而亲切的川音对大家说：“我们拉拉手吧，拉拉手。”他边和在场每一个职工握手，边说：“谢谢你们。”有些员工当

场激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那些被人们称为“打工仔”的职工，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和这位伟人握手。

在回住地的路上，邓小平对梁广大同志说，这个厂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方法也对。看得出来，他们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发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 365 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的最高建筑物之一，距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 400 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 月 25 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又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 29 层的旋转餐厅。

邓小平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兴致勃勃地听取谢非、梁广大同志的汇报，并亲切交谈。谢非同志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力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10 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邓小平沉思一阵后，说道：“这 10 年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二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在谈到改革开放给珠海这个昔日边陲渔镇带来历史性的变迁时，梁广大同志汇报说，改革开放前，珠海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逐步过上了富裕日子，不少外流的珠海人也陆续回来了。邓小平说，“这好嘛。”

30 分钟过去了，旋转餐厅转到了与澳门相对的地方。邓小平毫无倦意，他眺望着远处的海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正是从邓小平深邃的目光和深刻的阐述中，人们再一次深深领会到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

时间已是 11 点 35 分了，邓小平走进下行的电梯。邓榕同志对他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见您！”邓小平高兴地说：“好，我要去看看他们。”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闻讯前来的群众多达几千人，他们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来游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一起自发地维持着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一眼这位伟人的风采。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不少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您好！”一位站在

后面的40多岁男子，忘情地跳起来，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

邓小平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手、点头。他看到了，看到了这些用双手在荒滩上盖起一砖一瓦的特区人的风貌、特区人的情感和特区人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珠海人民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所倡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决策是正确的，人民是衷心拥护的。今天，人民所得到的一切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人民与邓小平自然地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邓小平在珠海的日子里，足迹几乎踏遍了特区的土地。他老人家先后三次驱车专门考察珠海特区的城市建设，观看了拱北、吉大、香洲及唐家一带的市容。

他不停地考察，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考察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工厂后，乘车游览了吉大、香洲和唐家一带。一路上，小平同志仔细欣赏着这座海滨新城的绮丽风光，同时回忆起1984年1月来珠海时看到的情形。当车经过宽阔的九洲大道中段时，邓小平指着—处地方说：“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座小桥，一条小路，现在没有了，变了。”

车队在市区内前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宽阔的大道，车窗外闪过了一幢又一幢风格清新的建筑。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邓小平又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只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了新大楼了，变化真大呀！”参观过程中，梁广大同志汇报了珠海市严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做法，当了解到珠海市政府为保护依山傍海的自然风光，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时，邓小平赞同地点头说：“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

梁广大同志接着汇报说：珠海的投资环境已吸引了很多外商前来投资，1991年就签订了500多宗合同。邓小平幽默地说：“要是我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随着他老人家的话音，车内响起了一片笑声。

当梁广大同志汇报到去年珠海市工业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时，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们这个发展速度很快了。”梁广大同志说：“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走过来的。我们一定坚决把您的决策贯彻到底。”

邓小平笑着说道，“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离开芳园大厦后乘车前往珠海度假村。路上，当他看到一幢幢漂亮的居民和农渔民住宅时，不禁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多少？”谢非同志回答说：“去年全省人均收入1100多元。”邓小平说：我看不止这个数。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洋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汽车经过景山路，一座座厂房从车窗外闪过，邓小平高兴他说：现在总的基础不同了，我们10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都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必须的设备和这些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哪，不一样啦！

由此，邓小平再次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

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接着说道：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5年的加速发展？那5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5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1992年1月，在珠海特区建设的发展史上，记下了最珍贵难忘的7天。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身着中山装，与国家主席杨尚昆一起，在广东省领导谢非、朱森林、郭荣昌等同志陪同下，接见了珠海市五套班子领导和专程前来看望邓小平的佛山、中山市委领导，与大家亲切握手，依依话别，并与他们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当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顺德具考察。

欢乐的上海

在深圳、珠海视察之后，邓小平乘火车经广州前往上海。

1992年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同前几次相比，今天春节在沪期间，邓小平情绪更高昂，活动更频繁，发表的讲话也较多。

2月3日，欢快、祥和的除夕之夜，邓小平与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并与各界人士欢聚—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吴邦国、黄菊代表上海1300万人民向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拜年，祝他们新春快乐、健康长寿。邓小平、杨尚昆含笑说：向你们拜年！向上海人民问好！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高达50米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十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杨尚昆又驱车来到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工地现场，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老人家来视察工作。邓小平听取了工程负责人的汇报，观看了大桥的模型，再三勉励大家要精心施工，把这座世界上同类型桥梁中最大的桥建设好。

2月8日晚上，邓小平、杨尚昆乘车观看了南京路夜景，并乘船游览了黄浦江。近几年，南京东路商店的霓虹灯已贯穿全街，外滩建筑群装上了新型泛光灯。入夜，到处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呈现—派“不夜城”的气象。邓小平、杨尚昆兴奋他说，南京路和外滩大放光明，上海大有变化。

2月11日，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迎来了邓小平、杨尚昆—行。看到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已经在这里落户，并投入正常的运行，邓小平对陪同的上海市官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2日上午，邓小平、杨尚昆先后视察了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随行人员怕邓小平过于劳累，听取汇报后就催他走。邓小平摇摇手，“我还有话要讲。”他对已经起身又坐下来的陪同人员说，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个问题，姓“社”，不姓“资”。农村改革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始有不同意见，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1/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现在工业、城市、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实践来回答。当闵行开发区的总经理告诉邓小平闵行开发区5年累计上缴的税金已经达到用于基础建设总投资的2.8倍时，邓小平说，你们的实践有点说服力，但还不够。现在，有人担心浦东开发出乱子，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乱子，担心的人也讲不出会出什么乱子。

2月1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住地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对

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了许多重要讲话。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一年就有很大的变化，3 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对于浦东建设，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 4 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

吴邦国、黄菊向他汇报说，90 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我们正根据您老人家的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抓紧工作。这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 1995 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2 月 18 日（正月十五），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神采奕奕，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商店游览购物。今天，他兴致勃勃，健步行走在商店里，还为孙儿选购了两块橡皮和四支铅笔。闻讯前来的群众尽管素不相识，但都自觉地维持秩序，并面对面排成两行。当邓小平微笑着健步走来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热烈鼓掌，都为自己有幸目睹这位伟人的风采而高兴。不少人忘情地高呼：“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挥动右手向群众频频致意，还抱过一名小孩，亲热地吻了她的小脸蛋。事后，家人问邓小平在店里看到些什么，他幽默地说：“我看到的是一片人噢！”面对创造着上海今天和明天的人民群众，老人家心中荡漾着无限的春意。

2 月 20 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沪返京。

中南海的号角

1992年3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月9日，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

会议还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还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一次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为使海南再造一个“香港”，国务院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992年3月13日）正式批准海南吸收外资开发洋浦，确定海南特区“大开放”方针，洋浦开发起步。此外，为加速开发浦东，国务院再给予上海浦东五项优惠政策。上海打出“中华”牌，以开放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3月20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大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4月7日，国务院下达《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确定科技体制改革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推动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轨道。

5月7日，乔石在第九次全国检察会议上指出，政法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更自觉、更主动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5月16日，江泽民、李鹏视察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充分肯定开发区建立四年来的成绩，勉励大家为推动高新技术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月20日，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七次年会召开，会上传达李瑞环同志重要意见：不能搞空头政治和“两张皮”，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两个中心或多中心，妨碍和干扰经济的发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他就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九个方面作出阐述，强调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中央作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外资投资领域有了新突破。国务院6月份批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与日本八佰伴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在浦东开发区兴办商业零售网点。

6月19日，我国又有河北、甘肃的45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在此之前，国务院已决定黑龙江黑河、绥芬河；吉林珲春；内蒙古满洲里4个边境城市和广西南宁、凭祥、东兴镇和云南昆明、畹町、瑞丽、河口进一步开放。至此，我国已有799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

7月15日，乔石在中央党校夏季毕业典礼上强调，落实邓小平谈话精神，开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局面。

时代高昂的主旋律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浪潮再一次涌起，以经济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再度成为时代高昂的主旋律！短短数月，中国步入加速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1992年3月9日，珠海给该市91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一批科技人员颁奖。迟斌元、沈定兴、徐庆中3人获奖奥迪小车一辆，住宅一套，奖金百万元。开创了建国以来重奖科技人员的先河。珠海重奖科技人员在全国激起反响，各地纷纷出台重奖科技人员措施：四川重奖10名科技人员，分别奖励现金5—10万元；湖南奖励“两系法利用小麦杂种优势”课题组10万元；湖北规定，企业科技人员，可从投产后新增利润中一次性提取5%至8%作为个人报酬。辽宁、北京、山东、云南、上海、贵州等地也相继推出了重奖政策。不久，中科院推出更加开放的留学政策。从今年起，该院每年拿50万美元设立择优支持专项经费，并按照国际惯例，制订了留学人员与研究所之间双向选择的有关规定。

4月8日，劳动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为加快劳动制度改革，劳动部决定调整就业结构，不再向国营大中型企业硬性塞人。不久商业部透露，1992年商业企业已有20%进入“四放开”经营，到年底将全面推开。

4月13日，首都理论界在中央党校座谈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龚育之、厉以宁等60位著名学者围绕对姓“社”姓“资”问题的认识展开讨论。

4月20日，中科院学部委员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动员全国科学技术专家，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不久，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科技体制改革一定要迈大步，创造科技人员发挥才干的社会环境，把科技人员从大院、大所里吸引、分流出来，大办高新技术产业，以多种方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4月22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计划体制进行一项重要改革——以经济的自然联系和资源、区位优势互补为纽带的区域经济规划工作开始起步。区域经济规划包括：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二、珠江三角洲地区。三、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四、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五、西北地区。六、中原地区。七、东北地区。从而构筑起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框架。

广州市委书记高祀仁在4月23日的市委工作会上说：广州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个目标可以确定。

截至4月底，我国对外开放海陆空一类口岸160多个。其中水运口岸89个，空运口岸31个，铁路口岸30个，公路口岸30个。

上海市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将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12个区，并以土地批租办法筹集资金，4月份就批租成交18幅地块。

陕西加速发展旅游、外贸，1992年1—4月，外贸出口、引进外资、旅游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甘肃在“放开出口、放开进口、放开引进外资及合资办企业”的三放开思路指引下，头4个月全省新批准三资企业已超过去年全年总数。

新疆推出“对西开放”战略，在与8个国家接壤的5400多公里边境线上开放10多个口岸。1至4月，进出口贸易额达8333万美元，相当1991年

的 2.5 倍。

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安徽省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 4 市，外商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1 至 4 月已有 25 家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落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2 倍。

5 月 15 日，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工作会议在山东泰安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

5 月中旬，农业部提出科教兴农两条新思路，一、农业科研单位要引进竞争机制，大力精简机构，充实科技开发第一线力量。二、科研单位内部科技人员逐步分流，充实科技开发队伍。

5 月 21 日，上海宣布取消涨跌停 5% 幅度的限制，正式放开全部股份制企业，自 1979 年底外资银行涉足北京以来，外国银行驻华各类金融机构已达 270 余家。新兴的房地产业也深为海外看好，已有 200 多家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运转。

新华社 5 月 22 日报道，我国将加快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推广土地有偿使用办法。

5 月 28 日，物资部与上海市共同主办的上海金属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物物流通体制改革迈出的新的重要一步。

5 月 29 日，拥有 8 亿元总股本的上海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社会公开溢价发行首批 3.2 亿多元股票，这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正式投入运行。据不完全统计，到 1992 年为止，全国已有股份制企业 3220 余家，其中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有 89 家，股金总额 58.1 亿元。

保税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领域：继上海、天津、深圳设立保税区后，1992 年 5 月，我国又兴建了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正在筹建保税区。

广西形成开放新态势。1992 年 1 至 5 月，广西与越南接壤的 7 个县市边境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8%。

“三资”企业迅猛发展：1992 年 1 至 5 月，福建平均每天新批准外资企业近 5 家，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北京市几乎每隔两天就有一家合资企业诞生；近 5 个月来，汕头特区平均每天有 3 家外资企业落户；天津、浙江、山东等省首季外商投资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据国家工商局资料，1992 年第一季度，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就达 3837 户。

四川推出拓展外向型经济新方略，借“边”出境，借“船”出海。1992 年前 5 个月共引进外资 6000 多万美元，外资企业已达 650 家。香港中渝公司一次投入 5 亿多元，对面积为 133 公顷的重庆市新城开发区进行综合开发，创下内陆城市利用外资大面积进行土地开发的先例。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 6 月份决定：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 5 个开发区进行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点。

6 月初，武汉市公安机关推出力“三资”企业服务的新措施：改变过去对“三资”企业的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出入境和户政管理部门实行 24 小时签征服务等。

6 月 10 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严禁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案。

6 月 11 日，新华社报道，撤销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成立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朱镕基兼任办公室主任。

6 月 14 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原国务院

生产办五部门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

经济升温，人才需求骤增，1992年高校本科毕业生56.4万，研究生毕业2.6万，社会需求量达90万人，各地爆发人才争夺战。

1992年第13期半月谈，还对邓小平南巡半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新态势做了以下记录：

财政部决定：从1992年起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9个省、区、市率先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国营大中型企业进入转换机制改革轨道：上海1992年又有300家企业、60万职工进入类似“三资”企业运行的“快车道”，北京40%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比照“三资”企业政策或发展股份制改革。四川、辽宁紧紧跟上。全国实行劳动、人事、分配制度三项改革试点企业已逾1000家。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加速县级机构朝着“小机构，大服务”方向前进。全国已有23个省、市、区确定了290个县（市）改革试点。

民办科技实业登上新台阶。由以贸为主转向以技术开发为主，一些民办科技企业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生产基地。全国民办科技企业已有2万家，从业人员50万，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沈阳三家高科技企业首次发行内部股票，专利和科技成果等知识产权可作价入股，体现了知识和技术的价值。

湖北提出推进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加上“三江”（长江、汉江、清江）、“两线”（京广、汉渝）开放开发新战略。

“沿海、沿边、沿江”经济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陆纵深发展，芜湖、九江、重庆等长江沿岸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

江苏实施“三沿”推进战略，即充分利用沿海、长江沿岸和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优势，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长江沿岸各市纷纷自费兴办开发区，实行成片开发。

西藏确立扩大开放基本战略：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大力发展毗邻多国的边缘优势，以发掘青藏高原旅游资源为突破口，推进改革开放。

为步入国际经济大舞台，山东决定走好广开国外筹资渠道、抓紧现有企业改造、鼓励乡镇企业涉足国际市场等四步棋。

福建推出两大开放新举措：一、加速山区开放，在山区搞经济开发区；二、将沿海地区300多个乡改为镇，使其直接享受开放政策。同时抓紧落实厦门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北京市下放500万美元以下外资项目审批权，努力吸收利用外资，北京成为台。外商投资新热点。

天津提出新规划：通过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实现大发展。经过十年左右努力，把天津市建成我国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

内蒙古确定“两带一区”沿边经济发展战略：4000公里边境线上的18个旗、市和已经开放的13个口岸力沿边开放带；以铁路沿线的呼和浩特、包头等6城市为沿线经济技术开发带；以资源富集的伊克昭盟等地区为资源开发区。

北起丹东，南至青岛的中国北方“黄金海岸”——环渤海地区冲破等靠思想，迅速兴起自办开发区、自费开发项目建设热潮。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 1992 年首季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季度乡以上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18.2%，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36.6%，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6.3%。这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已由去年的稳步回升转入较快增长。

我国第一季度进口增长高于出口。据海关总署统计，前三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287.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7%。

改革开放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台湾经济界人士承认“大陆经济发展超过台湾想象”。台湾大中型企业纷纷“抢滩”赴大陆投资，掀起又一波“大陆热”。首季大陆批准台资项目 528 个，协议金额 3.2 亿美元，分别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100% 和 89%。

随着农业全面升温，1992 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总产预计可接近历史上夏粮总产最高的 1990 年 1008.5 亿公斤，是历史上第二个夏粮丰收年。到 5 月份为止，中国已有社会总产值超亿元的乡镇 2200 个。

经济列车持续快速行进：工业生产速度今年来一直保持较旺势头。4 月份增速又达 18.2%，与前几个月基本持平。5 月份国民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物价总水平涨幅开始回落，出口、进口均比 1991 年同期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比去年同月增长 28.8%。

以天津、上海、厦门和广州为中心的沿海地带四大城市群迅速崛起。它们共拥有若干十全国性以至国际性特大城市和 60 多个大中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 52%。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邓旋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其强劲雄风早已越过大陆，越过亚洲，影响遍及整个世界。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不断上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海外资金流入急剧增加；在台湾，“邓旋风”引发了又一波投资“大陆热”；在亚洲乃至全球，人们分明感受到这股旋风的强势，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在世界新格局中更加光彩照人

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第三十章 什么都干过，只是没有打过仗“平民总书记”江泽民入主中南海

江泽民是李先念的女婿吗？

“六·四”事件之后，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新鲜、贫穷但无时无刻无处不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冉冉升起。他的名字叫江泽民。

他是一个典型的江苏人，肩体宽厚、额头饱满，在一付极具特色的宽边眼镜下面，有一双睿智的眼睛，一双具有洞察力的眼睛。

炎热的夏天，北京人拼命吃着雪糕，喝着冰镇汽水，或呆在有空调办公室里不肯走出门一步，5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正在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会议的气氛是非同寻常的，头发迅速变白的总书记，往常喜欢操一口河南话的赵紫阳，今天神情不对，他似乎有些心事。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脸上的表情也告诉人们，就要发生重大的变故，一个对全中国都有影响的变故。

果然，会议开始了，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后离开人民大会堂时，他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了，但他享受退休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生活待遇。

由于“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也做了不少工作的河南人被中共中央撤销了职务。当他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他是感到轻松还是有些失落，这些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赵紫阳离开中共最高领导职位时，62岁的扬州总书记江泽民带着自信的微笑登上主席台，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第5位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前面是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江泽民是李先念的女婿……

这个莫名其妙的传说如同空穴来风不知自何处诞生之后，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开来，有人甚至提供了不少细节，把这件事描绘得活灵活现、神乎其神，简直就像是江泽民亲口对他讲的似的。

江泽民真的是李先念的女婿吗？

江泽民站出来辟谣了。

这个传说在1985年江泽民调任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时，已经开始流传。当时江泽民听到了这一传说后，一笑置之，未予理睬。后来，这个传说越传越盛，流传于中国并被一些好事之众传播到海外，于是乎“江泽民原系李先念之女婿”之类的粗黑字标语出现在港台报纸的版面上来，弄得个不亦乐乎。

江泽民站出来了，他在上海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辟谣说，外间传说我是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我今天郑重其事地向各位说明，这纯属谣言，是无稽之谈。

江泽民的爱人姓王，名冶坪，也是江苏扬州人。她和江泽民从小青梅竹马，后来成了恩爱夫妻。

王冶坪父亲曾在上海经营一家中小型工艺美术品制作工场，收入虽不丰厚但家里也不算困难，老人供女儿读到中学毕业。江和王于解放后结婚，婚后生有两子，江于1956自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归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副总动力师，后来调到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

冶坪便随丈夫一起调该所工作，起初任文书，后来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此后，江泽民工作调动频繁，王冶坪始终留在上海，直至退休。

王冶坪在 1985 年以前的 30 年间，一直带着两个儿子同老母亲居住在普陀区曹杨新村，那还是 50 年代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时电器科学研究所分给他的宿舍。王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后再协助老母做饭，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她和同事、邻居的关系处得很好。直到 1985 年江任上海市长后，家才搬到康平路市委宿舍。

新任总书记脸上的悲伤

秋的中南海，美丽而清爽。秋雨把天洗得干干净净，令人心旷神怡，一簇簇的树叶开始由绿转黄，但依然饱满厚实；微风吹来，湖面上涟漪荡开去，荡开去，几只鸟儿幸福地啁啾着

江泽民乘车进入中南海，工作人员为他打开车门，将他让进了那个幽静的小院。工作人员有些奇怪地发觉，江总书记的眼角微微有些湿润，心中不免纳闷。

江泽民同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了么？工作人员想不明白。

原来，江泽民的哥哥江螭君去世了。

1988年初夏，江泽民去江苏视察上海在那儿的三线企业——梅山炼铁厂。由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书上，在跟同行的3位随员闲聊时，他说他到了南京以后，想顺便去看望一下兄嫂。他的哥哥因患癌症，已住院了，但本人还不知道是得了绝症，要他们到时候说话留点神，言语间颇有几丝凄楚之情。

江泽民的哥哥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学者。由于父亲不幸早逝，家庭的担子很早就压在大哥江螭君的肩上，为了把弟弟抚养长大，多年来他兄嫂一家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重负和艰辛。然而，无论境况如何困难，哥哥江螭君也从未放弃学业上的进取，他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心血终于成为一位学有所长的社会科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供职于南京博物院。

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一位同志曾问他：“有句古诗‘烟花三月下扬州’，这‘烟花’二字到底是指什么？”江泽民想了想说：“这句诗大家都熟悉，但‘烟花’的确切含义，我也解释不了，这样吧，你去问问我的哥哥，他是个文人，写过书本，在文学上比我强多了。”江泽民的哥哥听了提问后，对“烟花三月下扬州”这句诗作了解释，“烟花，即柳絮似烟，桃花如云。”博得众人一致首肯，看得出江泽民对他哥哥的感情很深。

其实，江泽民与哥哥并非在一家长大。少时，江泽民被家里过继给了叔父江上清作“儿子”，叔父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江泽惠、小妹江泽玲。

到南京后，视察工作之余，江泽民抽出一天时间，去医院看望了哥哥，把他接出医院到夫子庙玩了一趟。一日相处，他哥哥消瘦的脸上时常漾出丝丝笑意，江泽民与他哥哥手足情深，不料想这便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第二年秋，他的哥哥江螭君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享年70岁，此时的江泽民初赴北京担当重任。

江泽民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他是多么希望能抽出时间来到哥哥的灵前痛哭一场以表达对手足的痛惜之情，好让哥哥在天之灵感到安慰。

可是他不能。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他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属于中国人民，他是中国人民的公仆，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中央领导的日历上是没有节日假日，没有星期天的。”工作人员这样对有幸进入中南海采访的中外记者这样介绍。

现在，江泽民无法前往亲自力亲爱的哥哥奔丧了，他派人送去一块匾，以表达他的哀悼之意。

江泽民就这样送走了他的哥哥。

总书记的故乡情

1990年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江泽民与前来访问的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一行亲切交谈，江泽民问陈映真：“陈先生祖籍是哪里？”

陈映真回答：“在台湾，我已是第八代了。”

江泽民说：“我听不出你有福建口音。你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我还带有扬州方言的尾音呢。”

接着江泽民又说：“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各地都有不少文物古迹。唐朝诗人杜牧的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写的就是扬州。我小时候一直找这二十四桥，直到昨天晚上，家乡来人告诉我说，二十四桥如今已经恢复了原貌。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到扬州看看。”

三天后，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总编辑朱克曼采访时，又谈起扬州。

扬州曾举行过一次盛大的产品展销会，展厅正门上悬挂着一块鎏金匾额，上面镌刻一幅江泽民的亲笔题词：

古城扬州是我的可爱的故乡。祝愿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青春。

江泽民在题词中用了一连串美好的词语，表达了对故乡扬州的挚爱深情。

扬州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文汇处，在主要依靠水运的古代，便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重要港埠，号称“东方四大商港”之一。经济繁荣，贸易频繁，成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奢华之地，一时间万商云集，楼台遍地，社会昌盛，人文荟萃。

江泽民1926年出生在扬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是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画家，其父亲和叔父也是当时较有地位的文人，而且，江家与大散文家朱自清有通家之好。

扬州出名人，可是第一个著名的政坛人物，还算是江泽民。

江泽民在扬州生活了十六七个年头，江家原住在扬州东城的五谷巷内。

江泽民的小学是在五谷巷仅隔一条街的“东关中心小学”念完的。这所小学对面即是扬州著名的古迹“琼花观”。相传观内在南朝时有琼花树一株，天下无双。据说隋炀帝三下扬州，就是为了观赏这珍奇的“琼花”。“琼花”现已成为扬州市花。

江泽民的中学初中都是在扬州城西南的“育才小学”上的。“育才小学”过去不叫这个名，其前身是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真理女学堂”，由女传教士慕究理女士主持执教。该校创办的初期只收女生，目的是培养教会女干部。学校开初只设刺绣、圣经、钢琴三个班，校规很严。用圣经故事传播教义，从三年级开始设英语、国文等课，教师大都为美国女教徒。1904年，慕究理回国后病逝，为纪念她，学校改名为慕究理女子学堂。抗战期间，扬州沦陷，学校改为兼收男女学生，并增设初中部，招收初中生，江泽民就是在此期间进校读书的。这所学校的早期英语教育，对江泽民日后英语的造诣有很大帮助。

江泽民的高中生活是在扬州中学度过的。

1941年，江泽民考入赫赫有名的扬州中学。当时，中国教育界有个口头

禅：“北南开，南扬中”，扬中就是指扬州中学，扬中创办于1902年，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已培养学生近3万人，校友遍布海内外。以国家科委顾问武衡为首的12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曾先后毕业于这所学校。中国运载火箭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黄韦禄，曾任美国政府校管会首席科学家、现任国际原子能发展技术顾问汤琅孙等，更是扬中同学中的佼佼者。

扬中还培养出许多政坛、文坛的人才，如著名作家朱自清、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毕季龙、台湾前“经济部长”赵耀东等。

每年夏季，扬中招考新生，中国各地应考者蜂拥而至，远至四川、湖南，近及江淮、苏皖，人数之众，旅店不够了，当地居民便腾出自己的居室暂做“旅舍”，供芸芸学子投宿，情景之壮观，使人咋舌。

江泽民就是在那万人翘道、百里挑一的竞争中考入南方这所重要学府的。他于1942年至1944年在扬中上学。

抗战时期，扬中成了日军的司令部，原扬中部分迁往上海租界，一部分逃往泰州，日军后来让出校舍，当地人又办起扬中，仍名“苏北公立扬州中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也曾将此作其“市党部”之类的衙门机构，后在社会舆论压迫下，不得不迁出，让扬中的师生回校复课。

有这么一段曲折反复的历史，便培养了青年学生们的民族精神。江泽民说：“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了前有一副对联，叫做‘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常常在梅花岭下徘徊，凭吊“死而下倒”的民族英雄。

江泽民在校读书时，学习十分用功，成绩大多名列前茅。江泽民活动能力很强，善讲演，有号召力，能团结人，有学生领袖之称。

江泽民“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是和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分不开的。他经常花大笔钱买书，“文革”初期在武汉任职，尽管“读书无用”横行，但他的单身宿舍床上，有一半的地方留给了层层叠叠的书籍，外出旅行的路途上，他的大部分时间也是花在看书上。江泽民不仅爱看电机专业书，也喜欢看文学书，且记忆力极佳，再加上江南“诗书礼义之邦”的滋润，难怪有人要误以总书记是文科出身呢。

今日扬州正以崭新姿态，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最具吸引力的是扬州的开发远景。扬州地区资源丰富，各项建设兴旺发达，外商到扬州投资日益增多，铁路，港口、机场正在筹划中。可以预见，名城扬州将以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平民总书记

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时，曾说：“我与前任的老市长不同，我是一位平民市长。”

“平民市长”江泽民的意思是，他没有扛枪打仗的阅历，也没有爬雪山过草地的资历，虽然父亲是一位革命烈士，但江泽民的生活还是跟普通中国人没有什么商样。

江泽民 40 年代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长期在机械研究和工业部门任职，本人的职称是高级工程师。

在出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的几年中，他又掌握了有关电子方面的专业知识。

江泽民还能用英、俄语对话、写作，看得懂罗马尼亚、法、日文书籍。他还任外事、对外经济管理部门以及国外工作过。

但是，这位新市长在上海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后却这样说：“我长期在基层和中央部门工作，没有地方。城市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缺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工作经验，今后要虚心学习。”

平民市长自有平民市长的风采。许多江泽民的生活故事在民间和新闻报道上流传、出现，一个个鲜活生动，饶有兴味，又令人深思。

江泽民是个爱惜财富的人，这在他对待粮食的事情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一次，江泽民在南京。一天早餐，招待所供应豆浆、馒头、酱菜和每人一个荷包蛋，一位同志因血脂偏高，平常不吃荷包蛋，这次照例不吃。江泽民吃掉了自己那份荷包蛋，便对那位同志说：“一个鸡蛋，有多少胆固醇，我看你偶尔吃一次，没什么关系，不然，岂不是浪费掉了吗？”他又笑着说：“要不，你不吃，我把它吃掉吧，我还有点饿呢。”大家哈哈大笑，那位同志在笑声中开了戒，吃一个鸡蛋当然不至于出什么毛病。中午、晚上在招待所吃客饭，江泽民就像他多年来在家里、食堂一样，不喜欢桌子上剩菜，他自己带头，每顿都叫大家把菜吃光，不要浪费。

江泽民爱惜粮食，就连他最心爱的小孙子“毛头”也不允许例外。

在家里，江泽民最疼爱的，是他独一无二的小孙子“毛头”。有空的时候，他喜欢将孙子抱在怀里，逗逗他，亲亲他。用爷爷的慈爱，多少弥补一点远在大洋彼岸的大儿、儿媳未能直接给予“毛头”的温情，这使他自己被绷得紧紧的大脑神经也得到片刻松弛。

不过，江泽民从不赞成对小孩给予过分的溺爱。“毛头”长到一岁半，要进托儿所了，奶奶想把他放条件好些的机关托儿所，爷爷发话说：别让他进机关托儿所，人家知道他是我的孙子，会另眼相看，这不好，还是放别的什么托儿所吧，让他从小跟普通居民的孩子打成一片。于是，“毛头”就进了所在街道办的“沪港托儿所”。

家里吃饭时，小孙子总是坐在他的旁边，孩子年纪尚小，难免有米粒掉在桌上，爷爷就叫孙子把掉在桌上的米粒一颗颗捡起来吃掉。有时小孩子胃口不好，实在吃不下去了，江泽民就自己三两口地把孙子的剩饭吃个碗底朝天。

江泽民是个非常和气的人，平易近人，但有一次，他却非常例外地发火了。那是 1989 年初夏，江泽民的夫人因病住院。家中的保姆自小红走后就断

了挡，这一来江家的生活节奏骤然被打乱了。市委工作人员为了让王治坪能安心养病，同时也让江泽民能力家里事少操点心，就一面忙着帮他家找保姆，一面决定让行政处的一名小青年小杨去医院照顾王治坪。谁知小杨才去陪了一天，第二天江泽民就把行政处长叫到办公室，很不客气地训了他一顿，“今天，我要严肃批评你。我家属住院，你派人去护理，看上去似乎是帮我忙，实际上是帮倒忙。假如单位有10个人20个人的家属都生病，你都能派人去护理吗？今后你叫我怎么说？你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家庭有困难，会通过我的小孩或家里的兄弟姐妹来解决的。”这位处长申辩说：“机关职工生病住院，如家里有困难，我们也派人去照顾的。”江泽民也许觉得刚才自己的火气大了点，这才稍稍降低调门说：“对职工可以，对我就不能这样，这个头不能从我身上开。”

这是江泽民同志来沪4年对行政处同志的唯一的一次严肃的批评。行政处长挨批的当天，就把小杨从医院里撤回来了。

江泽民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特别是与夫人相敬如宾，在他工作过的上海，广为流传着江泽民为夫人喂饭的故事。一天中午，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江泽民住医院的夫人工治坪，只见江泽民正在病床旁为夫人一口一口地喂饭，吃的是医院供应的病号饭：蛋花面条，冬笋炒肉片。喂完饭，江泽民又轻手轻脚地把夫人从床上搀扶起来。陪她上厕所时，他温存地对夫人说：“王治坪同志，你辛苦了一辈子了。你这次身体不好，家里的事一切不用管了，一定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这天中午，江泽民刚开完了一个会，饭也没吃，就赶到医院里来的，等他告别夫人回家，时间已很晚。不少同志知道这件事都很感动：江泽民夫妇真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江泽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江家的副食品供应，是由管理科代办的，油盐酱醋、肉鱼禽类，基本上都按市场价买进，都有发票，一个月结一次账。江泽民经常叮嘱他们，不要去弄什么便宜货，不要专门去搞什么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吃什么，为他代购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还关照工作人员说：“我在上海工作，有时稍不谨慎，便会造成不好影响。上海群众来信多，这是件好事，说明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强、觉悟高。我们要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他们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有各种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做好三条，一是以身作则，二是集体领导，三是群众监督，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千万不要帮倒忙，你们不但要力领导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起监督作用。”有一次，管理科跟江家结伙食账时，王治坪听说上个月吃掉500元，吓了一跳，就把一个月的订菜单、发票都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说：“一个月吃掉500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猪肉吃太多了，要限制一些。小品种也要减少，以后多来点大路菜。”

江泽民到北京就任党中央总书记后，有几次回到上海；头一次是跟市委交接工作，报纸上登了消息。他来上海几次，没住宾馆，没搞宴请，仍住在家里，吃在家里，跟过去没什么两样。

他头一次回到上海时，老同事们问他：“你现在更辛苦了，回上海是客人了，在生活上可有什么要求？”

他说：“没什么要求，一切像过去一样。”

老同事们说：“你已离开上海了，上海也是你的家乡啊，你吃想些什么，就说吧，换换口味也好。”

他想了想，最后说：“上海有几样小菜特别好吃，一样是毛豆、青椒炒

肉丝，一样是凉拌茄子，茄子凉拌了特别好吃，还有，上海的鸡毛菜也很好吃，这几样东西，可经常为我家代购一点。还有，扬州的‘狮子头，也很好吃。我最喜欢吃。也带一点。”

王冶坪在一旁说：“扬州‘狮子头’太肥了，你还吃肥肉啊？”

江笑笑，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说：“好，好，王冶坪同志不让我吃，那就下吃吧。”末了，他还要他们代购一点活鱼。

他的这点要求，简直算不上是什么要求，无非是几样很普通的家常菜嘛，确实跟他没去北京前一个样。至于代购的开支，也依然像过去一样，跟他家里结账，有一分算一分。

他这趟回上海，把驾驶员、警卫员等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同为他购菜送菜的工人师傅、为他家帮忙饶过菜的伙房炊事员，都一起请到家里，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饭。第二天，他还跟这些同志合影留念。这对于江泽民本人固然也是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这对于这些普普通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更是留下终生难忘的与一位极平常又极不寻常的人物相处4年的美好记忆。

江泽民到底会几门外语

江泽民到底能讲几门外语呢？说法不一。这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比较一致的是，江泽民精通英语和俄语，有人说他能够用流利、娴熟的英语与外宾直接对话，能够用英语和俄语写作。他在外事、对外经济管理部门和国外工作过，他粗通罗马尼亚文、法文和日文，能看懂这三种语言的书籍；有的报刊说他会的是英、俄、法、罗马尼亚语。总之，江泽民是一位精通外语，开放型、世界型的领导人。

江泽民的书确实不少。古今中外，经史文哲，少说也有二三千册吧。工作人员为他做了好几个书橱，原以为足够他放的了，结果还是堆砌得满满的。在上海工作时，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者，首推嗜书若渴的江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了。

那么多书，绝非只是摆设，从早到晚，公务之余，只要有一点时间，除了听听音乐，逗逗孙子，他大多用来看书。遇上出差，他也总往随身带的包里装上几本，一上火车便一书在手，分秒必争。他的知识面很广，外语也有相当的水平，在“文革”中学《毛泽东选集》他读的就是英文版。有一次他与上海的大学生对话，有学生大谈美国的《独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泽民说：“你仔细读懂了《独立宣言》没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语把《独立宣言》都背出来。工作人员力他订了《华盛顿邮报》等几份英文报纸。他提出还想看一份俄文报纸，于是工作人员又补订了《真理报》。

钢琴、笛子、男高音

冬到中南海。

一场大雨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很快就把窗外的世界装扮得洁白一片。江泽民在大办公桌上批改了一大摞文件之后，伸伸胳膊，活动活动腰，好舒服啊。

“噢，下雪了。”江泽民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心里很高兴，这一场雪过后，北方冬麦区的灾情又该大为好转了，下雪就是下粮食啊！

他推开椅子，走出办公室，来到另一间屋子里，看着依墙而立的那架钢琴，嘴角露出了愉快的微笑。这是一架聂耳版钢琴，立式的。看到这架钢琴，江泽民想起了这架钢琴的来历。那还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喜欢音乐，自己也能弹一手钢琴，多年来一直想买一架钢琴，可是由于家里人口多，开销大，积不起钱，一直没买成。有一天，王冶坪下了狠心，把到期的存折都拿出来，又向在上海的亲戚借了点，凑足2000块，这才买了一架聂耳牌立式钢琴，了却了丈夫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江泽民是学理工的，毕业后不久就搞起了行政工作，他还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这真应了扬州自古多才子的俗语了。他兴致好时，能用浑厚的嗓子引吭高歌，听过江泽民唱歌的人说，江泽民还是个挺不错的男高音呢！

除嗓子不错和擅长弹琴以外，江泽民还会吹笛子，对绘画书法也颇有鉴赏力和爱好，只可惜，他的业余时间太少了。

现在，他忙里偷闲，打开琴盖，准备即兴弹奏一曲。

他先试弹了几个音，不错。然后就即兴弹奏起来，一股清澈优美的钢琴声就这么从屋里传了出去。

“总书记弹钢琴呢”院子里的工作人员听到钢琴声都高兴起来了“他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江泽民此时完全沉浸在钢琴曲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眉飞色舞，俨然是一位专心致志的艺术家。

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份急需总书记指示的文件，听到琴声，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悄悄走到门口，站在那里，看见总书记弹得那么沉醉，那么专心致志。

“拿来吧。”江泽民停住了在琴键上飞舞的手指，把脸转向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总书记，他牺牲了自己多少生活乐趣。

他也受物价上涨影响

一道厚实高大的红墙，把中国的领袖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隔离开来。墙外的老百姓总是这样揣测，里面住着的高级干部们该没有普通人那么多烦恼吧，譬如说，物价……

其实，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有谁能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呢？江泽民也不例外。

江泽民在上海时，特别喜欢到市场上去走走。看看菜价和供应情况等，耳朵里自然也直接听到了来自顾客的各种各样的牢骚、议论。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谈起物价问题，两手一摊，不无感叹他说，物价上涨，老百姓骂娘，我也有同感啊，只是我不好骂娘，谁说我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我家里的情况你们都知道，这么多人都吃我的、刮我的，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过去荤菜吃多点，现在荤菜吃少点了……

果真如此吗？的确如此。

江泽民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工资、奖金、津贴等加在一起收入并不算高，十之七八，都被全家近十张嘴吃掉了。因为吃饭的人多，菜的品种花样也就难以讲究了，早餐通常是家里烧点稀饭，食堂里买点包子或馒头，中午随便吃点，晚餐一般为一荤三素，逢到周末，有时叫保姆去食堂买一支烤鸭，这已算是改善伙食了。

或许为了节省开支，或许只是口味和爱好的原因，江泽民特别喜欢吃面条，竟在上海留下了“面条市长”的美称，这个挺不错的习惯必定带进了中南海，只是大家还不曾叫他“面条总书记”罢了。

那时江泽民还在上海，身材结实，肩膀宽挺，脸庞方正，前额饱满，给人一种以醇厚敦实的感觉。他那一口带点苏北味的普通话，以及偶尔插科打诨来上几句蛮道地的上海话，使人觉得亲切中带点幽默感。而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很有特色的深色边框的大眼镜，镜片后面那双深邃的眼睛，则又显露出一种富于机智和涵养的学者风度。

1985年秋，数月前由北京电子工业部部长调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举家搬进康平路市委大院来了。

搬家这一天，工作人员跑去问江泽民：可要为你家准备午餐？江说：搬搬弄弄，怕是没有时间自己烧饭了。这样好喽，就请食堂为我家一人来一碗盖交面吧，别的什么也不要弄。工作人员又问：面条烧好，要不要给送来？江摆摆手说，不要添麻烦了，我们到食堂来吃，讲好了，就来一碗盖交面，别的什么也别弄。

中午，食堂像往常一样开饭，蒸饭、馒头、四五种菜，供应市委印刷厂和机关的七八百号人分批用餐，忙乎了一阵子。等到就餐者都走得差不多了，伙房里也稍许空下来，工作人员就请大师傅准备下面条，同时请江泽民一家来吃午饭。老老少少，他家来了8口子，到食堂一坐下，江泽民就叫他的一个媳妇去买饭菜票。老少无欺，每个3两5角，当场付掉。面条端出来，一人一碗，浇头是肉丝、笋丝、盐菜丝。江泽民看上去胃口挺好，呼啦呼啦吃得挺香。一面吃，他一面对行政处的一位同志说，“听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罗？噢，沔阳，那是洪湖赤卫队的老乡罗。”说到这里，他腔调一转，讲起像模像样的湖北话来：“我在湖北工作过，接触的人也不少，你们湖北人很聪明。湖北人喜欢吃辣，湖北的豆豉也很好吃，我最喜欢吃湖北的豆豉了。

今天，我吃到上海的面条了，也很好吃，你们食堂搞得不错，大饭店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面条哟。”

吃完面条，江泽民叫家人先回去，他走进伙房，与几位大师傅一一握手打招呼：“你们辛苦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啦。”王师傅满手油污，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江泽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说：“老师傅，麻烦你啦。”他在伙房的各个角落和食堂的楼上楼下都转了一圈，顺便了解食堂的供应情况。余庆路上的市委机关食堂是一幢二层楼房，原先只开上面一层，后来就餐者不断增加，过于拥挤，遂将原来堆物用的底层也辟为餐厅了。等江泽民一走，几位大师傅打开了话匣子：“看起来，这位新书记没什么架子，待人倒是挺和气的。”

后来，江泽民有时去外滩市府办公，会议往往又多又长，遇上来不及回家吃午饭，通常就到市府食堂买上3两盖交面，呼啦呼啦吃个精光。有开玩笑者为此送了他一个谑号：“面条市长。”

江家保姆珍贵的回忆

在安徽，有个叫小红的姑娘，她有着令人羡慕的经历——曾给江泽民当过保姆，说起那段生活，这位清秀的女性眼睛忍不住湿润起来。

江泽民在上海期间，家中先后用过两个保姆。头一个是从北京跟来的小红，安徽人，刚到上海时还不满20岁。干了二、三年，未婚夫催小红回去成亲，此时她已对江家有了感情，不忍离去，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但不能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呀，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让她走了。小红走后，江家有很长时间没用保姆，扬州一个姑妈曾来帮着烧烧饭，家务事大部分都由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挑在肩上。后来王冶坪生病住院，这才由行政处安排，临时找了个小王，帮江家烧烧饭，料理一点家务。

江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保姆同桌吃饭，保姆不到，饭桌不开。举家上下，皆把保姆看作自家人，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江泽民的岳母，家人都称她“老阿大”，80多岁了，身体尚健，一天到晚闲不住，不管家里用不用保姆，她不是帮着捡捡菜，扫扫地，就是帮着抹抹桌子、收拾碗筷。按国家规定，省市负责人每月有若干元保姆费，江家把这笔钱如数付给保姆下算，还贴上几十元凑个整数。用江泽民的话说“他家里人口多，零零碎碎的家务事总归多一些，按劳付酬，不能亏待了保姆。”

小王从常熟来，比小红大10岁，第一次踏进江泽民的家门时，心里很紧张，想象不出这么大的官儿家里，是何等排场，有哪些规矩，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差事。江泽民见她手足无措的样子，便安慰她说，“你不用紧张，只要把饭菜烧熟，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家，王冶坪身体不好，你给我们烧烧饭，就帮了我们最大的忙了。”江泽民边跟她打趣说：“我们都是家乡人，你是常熟，我是扬州，老乡带老乡。”

小王在江家干了3个月，因为心脏发病，根据医生的意见，回老家养病去了。临走时，王冶坪送了她一袋水果和麦乳精，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还一再嘱咐她回去后要养好身体，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来玩。小王是个很朴实的城镇妇女，她含着泪水，与江家依依而别：“我刚来时，非常紧张，路也不敢走，还怕烧不好饭菜，3个月下来，想不到你们吃住都这么普通，待我都这么好，我真感到离不开你们了。”

根据江泽民夫妇的意思，小王走后，行政处专门跟小王所在的常熟支塘镇取得了联系，请镇上对她的治病与工作安排给予适当的照顾。后来，小王与丈夫到上海来看望江泽民及家人，江家热情接待，晚上就让小王夫妇睡在他们家里。

“第一夫人”的笑话

在装修房子期间，王冶坪闹过一个笑话。那时江泽民刚到上海，临时住虹桥迎宾馆。一天中午，王冶坪吃过午饭，用童车推着爱孙“毛头”，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宾馆看望一位北京来的老同志，到了宾馆门口，被门卫挡了驾，不让进。王冶坪说找北京来的住某某号房间的某某人，这位门卫打了电话，证实某某房间确有某某人，这才同意放她进去，但要她填一张会客单，对于不乘轿车进出者，这也是例行公事。这时，坐在门房间的另一位门卫发话了：“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说着，北京的某某同志从里面走出来了，一见到王冶坪，就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说。“喔，江书记的夫人来了。”两位门卫面面相觑，颇为尴尬。王冶坪一笑了之。也难怪门卫有眼不识泰山，王冶坪平时衣着极为普通，且不烫发，不施脂粉，这一天上身穿的是一件很平常的棕灰色毛衣，下穿藏青色裤子，脚上一双平口布鞋，又推着一辆童坐车，跟出现在某些电影、电视片中的那种雍容华贵的官大大相比，实难对得上号。

这位后来的“第一夫人”曾多次向公家借铺盖，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冶坪头一次开口向管理科借两条被子时，工作人员都很诧异：借被子干嘛？原来，江家有亲戚从扬州来上海，主人打算在家里摊两个地铺，留客人住上几天。

工作人员建议，可以往行政处的小招待所嘛，路不远，也不是宾馆，一共30来个床位，弄得还算干净，收费也较便宜，本来就是为机关一般干部的亲戚朋友来上海临时住上几天派用场的。江泽民说：“不找你们麻烦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再说家乡来的人，住在一起谈谈家常，也更亲热些。”后来，工作人员不再把王冶坪向管理科借卧具看成稀罕事了，这似乎也是江家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老家来人，就在家睡地铺。他家亲戚来上海的不算少，一年总有五六次，每次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人，王冶坪一年也就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卧具，冬天借被子，夏天借席子。平心而论，江家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2、3楼3个房间，加起来50多平方米。一问是江泽民的办公室，摆着一桌、一椅、一橱和一个沙发，后来还放进了那架新买的钢琴，一间是他的卧室，住着江氏夫妇和“毛头”3个人。还有一间住着二媳妇与她的女儿。底楼二房一厅，一间住着“老阿太”与保姆，一间吃饭用，中间的厅作了会客室，也是全家人包括保姆吃过晚饭围着看电视的地方。遇有老家来人住宿，就在客厅或办公室里打地铺。底楼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小房间，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师设计房屋结构时，这种正房之外的小间是让佣人住的。现在的主人考虑这个小房间的光线、朝向都比较差，没让保姆住，往里面堆堆杂物，偶尔才临时住上个把人。

总书记回“母校”

金秋的一个上午，旭阳初照，两辆面包车开进了西安交大校园，江泽民总书记来了！

刚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潘季、史维祥等校领导同江泽民总书记紧紧握手。江泽民总书记身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衫，步履轻捷，满面红光，显得格外精神，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里，江泽民同志赶上了走在前面的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手杖的老人。他就是1947年江泽民在交通大学就读时，教过他“电机设计”课的老师严教授。江泽民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严老师，您好。”83岁高龄的严教授同他这位学生上一次见面是在50年代中期。时隔30多年，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江泽民还一眼认出了他。

会议室洋溢着欢声笑语。总书记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他的老师们，向前欠起身子，关切地询问着他们的身体，拉起了家常：“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钟兆琳教授，现在住在华东医院，我在上海时，几乎每次去华东医院，都要去看望他。”接着他深情地谈起了几位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老师们。他说：“当时念的什么书，作者是谁，我都记得。我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的时候，严老师、沈老师、蒋老师去了，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在长春饭店吃了便饭，后来还合了影，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几张照片。”说到这里，江泽民环顾在场的人加强了语气。他说，“我讲这些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想说明尊师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好的传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开始就受到多少教师的培养，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讲这个意见，就是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发扬这个传统。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直到现在，包括在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时，见了钟老师总是毕恭毕敬的。”

当潘季、史维祥汇报了校园建设，谈起迁校和迁校后的巨大发展变化时，江泽民强调说：迁校那是周总理亲自做动员。他感慨他说：“现在是一片郁郁葱葱啊。”他转过身，对坐在身旁的苏庄同志说：“这是你很大的功劳。”

这时，学经济法和半导体的两个同学匆匆走了进来。江泽民站起身，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询问他们念什么专业。当一位同学告诉他是学经济法的，江泽民高兴他说：“太好了，我们缺少搞经济法的人才。”

见到年轻的同学们，仿佛又勾起了江泽民对自己学生时代的眷恋，他重新坐回沙发，接着说：“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读的电机系基本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严教授是我的老师，教我‘电机设计’，沈教授，教我‘照明学’，蒋教授高我几班，他当时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师，我昨天晚上就在想，应该来看望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师。”他转向同学们接着说：“你们没来之前，我讲了一番尊师之道。老师是很重要的。我进来之后，很羡慕你们，当年在上海时的交大校园可没这么好。”他转过话题继续说：“我们要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啊，我看要有两条。一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天乱哄哄的搞什么建设，我们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11亿人啊，吃饭是个大问题，而且11亿人的吃饭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必须靠我们自己。所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个大问题，我们大家必须共同维护好安定团结。第二条，中国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国人脑子都聪明的很啊！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看我们应该很好重视科技教育，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没有现代化的技术、科学，不教育培养出

许多知识分子，四化是搞不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把经济搞上去了，任何外国人，评头论足也好，反对我们的也好，最后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一个是要维护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个是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这就要依靠我们的科技教育，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还谈起一件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前几年给我出了个题目，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座谈一下，来传授传授经验，就是你怎么从一个学电机的当上了上海市长。1986年，我到上海交大去了。我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里有市长系。我怎么当市长呢，就一条经验，干什么学什么。”说到这里，江泽民又对那个学经济法的同学讲，“你学的经济法，我们国家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法制。要讲民主就要讲法制，讲民主没有法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有些人还缺乏民主法制观念。比如说新闻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新闻自由？美国所有报纸都控制在各个财团手里。假如你当他那个财团的新闻记者你骂他，他第二天就‘炒鱿鱼’喽。”

江泽民的风趣又引起一片笑声。

40多分钟的聚谈结束了。江泽民站起身来，同老师们——握手，亲切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电机系等几位学生走过来向江泽民间好。江泽民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希望你们把书念好。”

江泽民当教授

3月，上海已是春意盎然了，红黄蓝……各色各种花卉开成了一片又一片，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男女大学生一个个健壮、美丽，欢声细声下时扬起来，那携带青春信息的声音飞入天空，溶入无限的时空之中去了。

上海交大今天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位从上海交俭毕业的优秀学士今天要被上海交大聘为教授之衔了。

这是母校所能给予的最大荣誉了。

现在，江泽民忸然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在受聘仪式上作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与主要的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

在长达两小时的学术报告中，江泽民对全球普遍关注的能源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他在着重分析了我国能源的状况及能源消耗的特点后指出，我国能源的供需矛盾和紧张状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出路在于节能，要树立起长期节约能源的思想。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节能的三项主要措施，即加强节能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节能意识；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改造；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加强节能的综合管理，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促进节能工作的开展。

跟记者交朋友

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叫李安定，是个高个子中年男人，他撰文披露了自己与江泽民长达数年、久经考验的友谊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清晨从落地窗望出去，阳台栏杆、院子里的白皮松都披上了厚厚的银装。雪片仍在密密匝匝地落着，香炉峰则被雪幕完全遮住了。

住在香山饭店的是一批中国汽车界的巨头和元老，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正在这里举行理事扩大会。本来通知说，江泽民总书记上午9点半要来看看老朋友——他曾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过7年，可是人们估计他今天不会来了，因为雪大路滑，听说山下的公共汽车都已经停驶了。

快到9点半，我想还是到门口看一看，这只是出于一种记者的责任感。没想到刚出电梯，就听人们在说，“来了，来了。”走过去看，果然是江泽民总书记和众人一道正在往会议厅走去。我们正好迎面相遇，他认出我，越过身边的警卫和我握手。随后，他指指我开始显出中年人体态的腹部：“注意啊，不要和我一样了。”

他先会见了和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又到会议厅看望全体与会代表，他完全没有总书记的架子，并表现出一种用语言和情绪把握群众的才能，使会场里充满一种老友重逢的松快气氛。他说：“中国人有个道德观念：不能忘本。算起来，我在一汽工作和生活了7年。人生几何，7年，可不算短，看见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们，我又想起我们的老厂长饶斌同志，当时的一汽集聚了全国的人才，是个培养人、锻炼人的大熔炉。”

按安排，本来是礼仪性会见，可是江泽民坐下，海阔天空娓娓谈了一个多小时，谈汽车，谈行业公会，谈国情资源，谈世界风云，无遮无掩，谈笑风生，会议厅里不时响起一片笑声。最后他打住话头：“今天我们是老朋友会见，讲话‘滑边’之处在所难免。”说到此，他抬眼四下里寻找，“安定同志，我们达成协议（今天的讲话 not）to be reported（不供发表），你需要采访什么，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谈。”

对于这位中国目前党的最高领导人，我局限于视野有限一无从作出全面评价，但我和江泽民认识近10年间，他待友真诚、念旧思故给我印象颇深。

我初次接触江泽民是在1981年秋，在他作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任上。当时我受副总理谷牧之派，跑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部门间互相扯皮的调查报告，众多中央负责人在报告上作了指示，由于报告所涉及的是一个出口企业的扩建问题，国务院确定由江泽民主持处理。我作为采写这个报告的新华社记者，也获准参与处理工作。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报告中涉及的1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坐在一起，由于有可能对具体责任者进行追究，与会者个个像立起芒刺的刺猬。要分清责任，真是谈何容易。处理过程长达3星期，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我在一边旁视，暗暗佩服江泽民这位主持人协调和分析问题的才干。处理的结论，已经和初衷有了很大不同，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而把板子打在体制上，即：我们体制的现状，如同—筐螃蟹，彼此牵制，无法顺利运作。这是一个深刻而又人人能接受的结论，一场各部门剑拔弩张的风波遂告平息。这下我才懂得，处理危机的确是一种艺术。

处理的结果，江泽民要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要据此写一份材料。因此每次会后，他常常留我一起商量。他对我这个当时还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不摆架子，完全作平等的合作者，字斟句酌地推敲，有时过了开饭时间，他就带我到楼下食堂买两个冷馒头和一角五分一份的熬茄子草草地对付一餐。

当时，国家机关高层领导里，像他这种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型、技术型领导者还并不多。与他们接触，会强烈感到一种务实的、不打官腔的快节奏。

不久，进出口委撤销，江泽民作了电子部长。一次电子部某公司有北京莫斯科餐厅开

成立招待会。我因故去晚了，主人已经开始致词，我在最后一桌找空坐下，远远看见江坐在主宾席，只见他几次抬起手臂，我也并没有在意。致词后，午餐开始，我看见江部长起身径直向我的身边走来，“安定，好久不见，”他拍拍我的肩膀，“看见你进来，我一直在招呼你。”他说。我连忙站起来说：“实在对不起，没想到您是在招呼我。”真的，如果说，招手致意是礼貌的举止，离席来和我叙旧，则让我感到了种具有人情味的亲切。

1985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次年3月，他作为补选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我当时作驻会记者，在日常报道之余，《了望》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江市长的专访。他在上海刚接待新西兰总理朗伊，晚到一两天，一来就很忙——赶到北京开会，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和各部门接洽。去采访的记者很多，但他对秘书说，对于老朋友，无论如何要挤时间谈。

我每次和江泽民谈话或采访，总有个印象，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应付记者，也不是按他需要的调子让你凑成一篇稿子。我们谈话总是放得很开，写他家乡扬州的诗词到他在市长任上碰到的怪事。

由于主人开了绿灯，我获得了专访机会。刚刚坐下，又巧遇副市长们来汇报工作。

江市长忙把他们往客厅里让，一面说：“安定等了我好几天了，你们请坐一下，我先和他谈。”这下，我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你们研究的是大事，你们先谈，不介意的话，我旁听如何。”于是大家落座，市长们讨论，我边听边记。顾及我能听明白，有时江市长还转向我作一些简明的解释。他捧出一本精美的规划图册告诉我：“这次规划试图摆脱过去‘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摊大饼’的老作法，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了城乡一体化的通盘考虑。总的布局，由中心城区、卫星城、小城镇、农村集镇4个层次组成。”他特别提到浦东：“上海的中心区包括现在的市区和将要开发的浦东，以此为主体，把吴淞、嘉定、闵行、金山等7个卫星城连起来，形成指状形态。在伸开的五指之间，规划成大片楔形绿地。”边说，他边伸出粗壮的大手，因此，这个形象的比喻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副市长们告辞已是深夜，江市长往沙发上一靠，说：“终于静下来了，可以回答你的提问了。”当晚我的最后一个是：“据我所知，以前你并没有作市长的经验甚至思想准备，那你靠什么当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的市长？”江泽民沉思片刻：“我是上海的第一个平民市长。历任的上海市长，从陈老总的大将风范到我的前任汪市长的博学之才，他们都是在建国前就具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前不久，交通大学同学会来信，约我谈谈怎样从一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成为市长的。我的答案是一句话：干什么，学什么；干一行，爱一行。我从交大毕业，在食品厂当动力师，上海解放后我当厂长，正逢国民党轰炸、炸坏了发电”，那时，我每天两点钟就起来，自己动手发电。我没有想过以后要当部长、当市长，只想把手里的工作干好，不要等老了再叹青春荒度。”当晚，我离开时，已经凌晨一点钟了，但江泽民始终精力充沛，没有丝毫不耐烦。事后我为《了望》周刊写了一篇专访《上海应当向世界，面向未来——访上海市长江泽民》。

1990年3月，中共中央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的采访，担任美方翻译的是一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美国姑娘，她告诉江泽民：“早在1986年，我就在《了望》上读过关于您的文章。”江回答说：“那是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撰写的，我们是老朋友了。”

给总书记讲课的年轻人

1994年12月10日上午8点50分，飞往上海的1501航班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乘务员向乘客分发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机舱后部一位穿着普通的乘客面前停下来，乘务员看看手中的报纸，又看看这位三十八九岁的乘客，他不就是昨天给江泽民总书记讲课的曹建明老师吗？

他正是曹建明。此刻，他有些不好意思：不知不觉间，自己已成了新闻人物。

1994年12月9日上午，曹建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作为第一课的主讲老师，为中央领导讲授“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中厅，这是政治局委员开会的地方，中央椭圆形会议桌四周，摆放着22把椅子。

国务委员彭珮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早早来到怀仁堂，曾庆红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他热情地向曹建明表示欢迎。他怕曹建明紧张，一再鼓励道：“你要放开讲，我们都是学生，你是老师，你要像老师对学生那样。”

接着，曹建明看着陆续进来的领导同志刘华清、任建新、司马义·艾买提、李铁映、李瑞环、胡锦涛；8点59分，乔石、江泽民进入怀仁堂。司法部长肖扬向江泽民介绍：“这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教授曹建明，今天的主讲老师。”江泽民亲切地和曹建明握手。

乔石同志落座时，对坐在身旁的刘华清说：“当学生，我是积极的！”刘华清同志接着说：“我比你来得还早！”乔石同志风趣他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引起一阵笑声。中央领导平易近人的风度和说笑，驱散了曹建明心头的最后一点紧张，他精神抖擞地坐在江泽民总书记对面的主讲席上。其他听讲的同志分左右两侧入座，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简明的讲稿，大家同桌而坐，气氛亲切自然。

讲课正式开始，江总书记用了5分钟致主侍词，曹建明认真听着，江总书记鲜明地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给他无形的鼓励。

曹建明讲得很潇洒，丰富的理论和生动的实例相结合，引用大量的最新数据，虚实兼顾，侃侃而谈，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时而凝神听讲，时而提笔记录。曹建明准确无误地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在讲课中谈到侵权商标问题又谈到反倾销问题。江泽民说：“外经贸部的同志到没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好好研究，要好好听一听。”

中央领导同志听课之后，像认真的学生一样开始自由发言，还提出一些问题，如“中国复关的法律障碍”、“企业无序竞争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失”等。讨论中，曹建明认真地进行了解说，并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觉间，已经11点多，学生和老师仍意犹未尽。在江泽民同志提议下，学生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曹建明老师表示了谢意。

大家陆续退出中厅，曹建明低头忙着整理自己的讲稿，有人悄悄告诉他，江总书记还等着向他致谢，曹建明抬头一看，江泽民同志已站着等候了好一会儿，看到他整理完毕，马上向他走来，曹建明激动地迎上前去。江总书记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谢谢老师！”这时胡锦涛也走过来，握着曹建明的手说：“你是南通人吧？你的课讲得很好，谢谢！”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看到这些年龄比自己大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重视知

识，尊重老师，曹建明心里十分感动，他感到作为一名年轻法律工作者的重任。

曹建明生长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当了 30 多年厂长，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1972 年初中毕业后，他在安徽绩溪工作几年，后来到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处任政工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曹建明在办案中意识到，一个国家，多么需要健全的法制建设啊！1979 年，他参加高考，填了 8 个志愿，有 6 个是法律专业。

随着华东政法学院的恢复重建，作为第一批学生，曹建明在这里迎来了我国法学界的春天，他发愤刻苦钻研，获硕士学位；又教书 8 年，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都是破格晋升，在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领域成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近年来，他主编和参加编写的法学著作有 19 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90 多篇，他还是上海市 1990 至 1994 年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法学著作的唯一获得者。

1989 年 8 月，正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曹建明，应瑞士著名法学权威胜雅津教授邀请到瑞士洛桑的比较法研究所访问。

8 月的洛桑，花园般美丽，而曹建明访问的一周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和胜雅津教授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率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谈中国法律的发展……胜雅津教授从书架上抽出曹建明的《国际产品责任法》和他主编的《论文集》，说“我很喜欢你对学术的认真研究精神”。看到教授这么关注一个中国青年学者，曹建明非常惊讶，同时内心充满了感激。

临行前，两人已结下深厚的友谊，曹建明感谢教授的盛情款待，他开玩笑他说，“这一星期，我喝了你这么多可口可乐。”胜雅津教授用流利的汉语说：“不要谢我，你喝了我的可口可乐，我从你这里喝了许多知识可乐。”两人大笑起来。胜雅津教授认真他说：“你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有一点可惜，你没有在这里读博士学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为你介绍。”看着教授那诚挚的目光，曹建明确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1989 年 10 月 27 日，曹建明从比利时回国，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挚爱和对中国法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白天紧张工作，夜间挑灯夜战，每学期他完成的教学工作总是比规定的高出 2 至 3 倍。领导关心他的身体，几次安排他去休养，他都推辞了。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立法咨询专家，他大量的数据来自调查研究。这几年，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多少星期天、节假日都是在调研、讲课中度过的。

1993 年 7 月，曹建明应邀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地区国际法会议”，会议第二天，他登上了讲台，用英语作了《中国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的报告。他从改革开放后已开办 10 万多家外资企业讲到中国 500 多部涉外法规的特点：从经济特区讲到浦东新区；从中国鼓励外商投资领域的扩大到现行投资法规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切都使各国教授和专家感到极大的兴趣，尽管在他之后发言的还有两位教授，但大会讨论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

曹建明在国外获得如此殊荣，却没有半点改变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办公室很简陋，五六张办公桌挤在一起。作为系主任，他的办公桌靠窗放着，桌上摆满了讲义、文件和各种资料，电话铃此起彼伏，他忙得不亦乐乎。新

年前夕,他要赶赴台湾,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生前曾亲笔邀他去参加“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将就中国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作专题报告。从台湾回来后,他还将赴北京,为有关部长、厅局长再举办讲座。他有干不完的事情,身上焕发着勃勃朝气和活力。

江主席心系亿万人民健康

肝脏在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中，担负着物质代谢、解毒排泄、造血和凝血等数千种功能，是“人体化工厂”和“营养库”。

然而，肝癌作为一种高发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无情地蔓延，肆虐，吞噬着人民的生命。

在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患者达 13 万之众，已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大敌。

为了制服这一病魔，心系 12 万人民健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吴孟超，围绕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亲切的交往。

1995 年 10 月 6 日，北京京丰宾馆广场。江泽民主席会见参加全军后勤科技大会的代表，当走到吴孟超教授面前时，脚步停住了，他一面与吴老握手，一面捏了捏吴老的衣服，关切地问：“您怎么穿这么少的衣服，可别冻着了啊！”江主席转身向刘华清副主席介绍道：“这是吴孟超教授，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刘副主席笑道：“认识，认识。”

1995 年 5 月 20 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江主席会见驻沪三军师以上干部，讲话一开始就说：“离开上海几年来，由于干部的成长与交流，你们当中好多同志我都不认识了，但吴孟超同志我是熟悉的，他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1994 年 3 月 1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吴孟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他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受到了江主席的亲切会见。

1992 年 1 月 18 日，驻沪某部礼堂。江主席在会见驻沪三军领导干部时，左右环顾，一时没看到吴老，便关切地问道，“二医的吴孟超教授来了没有？”当听到站在后排的吴老应声答到时，江主席向他招手致意。

1991 年 5 月 10 日，江主席在总后会见全军医学科委会成员时，握着吴老的手介绍说：“我和吴孟超教授是老朋友了。”

在吴老的书房，珍藏着近 5 年来江主席 12 次会见他的照片资料，仅 1992 年就达 5 次之多，人们不禁会问：江主席怎么这样关心吴孟超教授？

个中奥秘，就是，江主席心系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健康和中国肝胆外科事业，而吴孟超在该领域功勋卓著。正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一代名医连在了一起。

早在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吴孟超就与江泽民同志有过交往，老一辈外交家宦乡因肝癌在第二军医大学治疗时，江泽民同志曾数次前去探望，在此期间，他与吴孟超教授就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以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从而也有了对吴孟超教授的了解。

1994 年盛夏，吴孟超被评力“全国侨界十大杰出人物”。

6 月 14 日，江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与“侨界十杰”一一握手，然后坐下合影留念。正巧吴孟超站在江主席座位之后。江主席刚一落座，吴孟超便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江主席，非常感谢您给‘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题名。我们将不负您的重托，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努力去攻克肝癌这个堡垒！”江主席听后点头微笑，并转过头对吴老说：“我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那是吴孟超和他的助手及学生在肝胆外科手术方面实现了世界性突破之后，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运筹，建造起来的一幢造价达 2300 多万元的专科大楼。它以宏伟的规模、先进的设备、优雅的环境和一流的技术著称，吴老在这里首创了一个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医教研为一体的崭新模式。1993 年 4 月，吴老将这一喜讯用电话报告江主席办公室，并通过总后提出，希望江主席为院、所题名。接到总后的报告后，江主席欣然挥笔，写下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两幅浑厚有力的大字，并由总后转送到吴老手里。

5 月 3 日，当大楼落成剪彩，人们看到江主席的这一手迹时，无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江主席的题名是对吴老发展肝胆外科规划的肯定和支持，包含着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把“吴氏刀法”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学生，让他们成功地为患者摘掉毒瘤。吴老深知，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手术仍是对早、中期肝癌患者治疗的最好办法。为把“吴氏刀法”传给他的弟子，他将如何选刀，如何目测，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预防和处理各种险情，对学生进行严教细训，一丝不苟。近几年来，已有 400 多名进修学员，从这里带着“吴氏刀法”分赴全国各地，从病魔手里夺回无数条生命。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下大气力抓基础理论研究。他说：“我开了一辈子刀，对肝癌病从只能是通过手术救治。如果能通过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防治肝癌，那将是广大肝病患者的福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和他的战友与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攻关不止。目前肝胆外科承担着 5 项总经费达 313 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并已在基因工程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独辟蹊径，运用多种高新技术向肝癌这一顽症进军。近几年来，他和他的助手及学生一起，将新兴的生物高新技术和医学新材料等引入肝癌非手术治疗领域，成功地探索出了单克隆抗体导向杀伤木等 5 种新技术捆绑式联合疗法，使一些中晚期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病。今天，吴老所领导的肝胆外科已发展成为拥有一个现代化实验室、5 个病区、一个手术室和监护室、200 多张病床的具有一流水平的临床和实验基地。

1995 年 5 月 20 日，江主席在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市长徐匡迪，原总后勤部部长、现任总参谋长傅全有等陪同下，亲临吴孟超所领导的肝胆外科视察。傅全有对吴老说：“江主席这次在江浙沪等地视察的途中，就说一定要来你们这里看看。”

上午 9 点 45 分，江主席一下车便与吴老亲切握手。随后江主席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肝胆外科展览室。展室里挂了一张我国肝癌发病分布图。吴老指着图说：“肝癌在我国是高发区，85% 的肝癌患者是由肝炎转化而成，极大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江主席问：“为什么？”吴老讲明原因后，江主席在图前沉思良久。当吴老说肝癌诊治的重点是早期诊断和防治时，江主席插话说：“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肝癌的早期诊断和防治上。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吴老说：“一是要对群众进行科普教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三是要加强医学人才的培养。”江主席连连点头。

紧接着，江主席参观了“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该中心主任郭亚军教授，兼任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院、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医学院教授和

美国国家“肿瘤转移免疫治疗研究室”主任。他每年一半时间在美国工作，一半时间回国工作，带领中美学者穿梭在两个实验室之间。这种中国与外国进行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吴孟超院士和他的学生郭亚军教授共同创建的“哑铃模式”。当江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关切地问道：“你们和美国的这种‘哑铃模式’，的机制怎么样？”郭亚军回答：“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外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我国国内的人才优势与病例资源，做出我们国内缺少而又无条件进行研究的東西，出了成果两国分享，并拿回这里继续研究和向临床使用过渡，使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医疗技术，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

江主席听了高兴他说：“这个方法很好。”为了给江主席节省时间，郭亚军教授打算只请首长看几个实验室，而江主席说不急，要一个一个地看。他每走进一个实验室，都要认真地看每台仪器，和教授、研究生一一握手，问年龄多大了，正在做什么实验。郭亚军说：“这儿都是吴老带出来的博士和博士后，除了我刚到40岁外，其余都30岁左右。”江主席说：“噢，吴孟超同志后继有人啊！”

江主席视察后，吴老抚今忆昔，心潮澎湃：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和战友们一起在肝胆外科领域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虽然开创出今天这样的局面，但要最后战胜凶顽的肝癌，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任重道远，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有生之年要多给后人留点东西，以报答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不负江主席对我的期望和重托。想到这里，他挥笔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

从此，吴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顽强地拼搏在攻克肝癌的前沿阵地上。

吴老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天涯海角，国内国外，请他开刀，等他会诊……不管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终坚持主管病区，亲自查房，亲自力病人做手术。70多岁的老人有时一天接连做两三台手术。有一年，他出差25次，乘飞机53次。每次出差前，他总是要把病人的医疗方案逐一过一遍，对重病患者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方案；出差在外地时，尽管天天都要接待病人，但晚上一定要挂长途电话到病房，让值班医生汇报当日的医疗情况；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直奔病房……

对于吴老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广大患者无不感动，各级领导无不称赞。1996年元月，江主席签发命令，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当组织上将此事正式通知他本人时，吴孟超无限深情地说：“我这双当年在南洋拿过割胶刀的手，今天能操起手术刀攻克肝癌顽症，完全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这个殊荣不仅属于我，同时也属于我们肝胆外科的全体同志，属于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凝聚着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吴孟超不会忘记，1956年，当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后，他与肝胆外科攻关小组一起，刻苦攻关，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第一”。1963年11月，吴孟超第一次应邀走进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巨大的关怀给吴孟超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吴孟超不会忘记，1978年后，他两次聆听了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教诲，出席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他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脏解剖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邓小平同志的教诲，科学春天的到来，极大地激发了吴孟超勇攀医学高峰的斗志。

吴孟超更不会忘记这些年来与江主席的交往。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实现江主席的重托，为攻克肝癌、制服亿万人民健康的大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一位没有打过仗的军委主席

1990年春天，数百名人民代表齐聚高大而宽阔的人民大会堂，为通过一项重要决定，他们在谨慎地行使着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

80多岁的邓小平坚决地提出了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个辞职要求被接受了，没有人有权不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退休，他已经做得很多，他最有权力提出休息。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必须有新的军委主席出来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被授予指挥这威武三军的权力。这可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担子呀！

江泽民上大学时，学的是理工科不是军事，1949年后，他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等职务。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务。1985年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他似乎什么都干过，但却从没带兵打过仗。不过，说他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是歪曲事实，当他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同时是当地武警部队政委。关键是人民代表选举了他，他就负担起了这一重任。

一年前，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有人问他：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何时引退？这样的职位又将由谁来接替？江泽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由党和国家来最后决定。”

在江泽民总书记及其他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德国广播电台记者问：在不久的将来，中央军委主席有可能发生变化吗？

江泽民说，他注意到国外报纸这方面的报道，这不是个奇怪的问题。

他说，邓小平曾几次提出来，希望新常委能很好地负起责任，“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即引退）。

江泽民称邓小平是“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久经考验的”，是中国这1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他指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国家的军委主席的变更则要经过全国人大。

现在，人大代表们把他举到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事实上，他是先被中共中央选举为中央军委主席的。

许多人对江泽民在电视上首次以军委主席身分露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是1989年11月的一天，空军隆重集会，庆祝人民空军成立40周年。江泽民首次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分出现在会场。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以及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等新的军委领导成员。江泽民身着中山装，杨尚昆身穿毛料大衣，主席台上其他人士均身着戎装，肩佩军衔。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大会说，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空军在军委邓主席、杨副主席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号召空军将士团结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空军现代化、正规化而奋斗。

杨尚昆代表江泽民主席致了贺词。

江泽民关心国防建设二三事

1991年，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离开上海已有两年多了，但他关心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好作风，仍在浦江两岸流传，在军官内外传颂——

上海的人民群众说，上海的军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好，江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部队官兵说，军委江主席对军队建设一直很关心，他和我们军队早就心心相印。

作为一个统揽全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的关心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的。江泽民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对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心血。

1987年8月1日。吴淞口。

江泽民率上海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武装委员会的100多名领导同志，来到驰名中外的军事要塞、当年民族英雄陈化成抗击英军的吴淞炮台、当年淞沪战役的重要战场，进行国防教育。他们听了警备区领导关于上海战略地位的介绍，观看了民兵军事表演，还兴致勃勃地来到海军某部，登上军舰，度过了一天难忘的军营生活。

国防教育要深化，首先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要增强。在江泽民的倡导下，上海市委常委确定，把“军营一日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让全市在职的数千名局级以上干部在几年内普遍到军营体验生活，加深对军队的了解，进一步懂得“天下虽安，国不可一日无防”的道理，更好地关心、爱护、支持军队建设。

江泽民调北京工作后，上海的“军营一日活动”还在延续。

1989年“八一”前夕。上海市领导率全市116名局级以上干部，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驻地，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八连的内务，观看了八连官兵3公里武装越野、跨越百米障碍、战斗班敌人下运动。官兵们走独木桥、翻“土墙”、跨壕沟、钻铁丝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个个汗流浹背。那敏捷娴熟的动作，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往无前的精神，局级干部们看了连声赞叹：“难以忘怀，难以忘怀！”

几年来，全市参加“军营一日活动”和各类军事活动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1万余名。

为了增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江泽民总是身体力行。在上海工作的几年间，凡是比较大的军事活动，他都挤出时间参加。仅1988年至1989年5月，他和市委领导一道参加军事活动，看望部队就达10多次。在江泽民的提议下，上海市委确定，每年7月，常委集体听取警备区军事工作的汇报。1988年，市委将“全市各级党政领导都要重视国防教育工作”写进了五届七次全会文件。

在对全市人民开展国防教育中，江泽民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市民的素质，提高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力振兴上海作出贡献。为此，市委把国防观念的培养看成是城市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1988年6月6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礼堂。

江泽民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吴邦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等领导接见了来沪治病的“钢铁战士”刘琦，并请他为

上海的党员干部作了报告。

市委组织部将刘琦的事迹编成《生命之树常青》的小册子，把他的报告制成录音磁带，发到全市各基层党组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刘琦的自传体小说《去意徊徨》。

1988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解放军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文章。他指出：“应当认识到，开展全国防教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思想教育总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应当把它纳入到这个总体系中去。”他还对如何解决全国防教育社会化，如何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问题作了论述。

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江泽民的这篇文章，这对深化上海的全国防教育无疑起了“推进器”的作用。

几年来，上海的国防教育方兴未艾。

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军队建设十分关心。他经常告诫“一班人”，既要看到上海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要看到上海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千万不能把当年陈老总留下的军政军民团结的好传统在我们手里丢掉，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军民团结，不能掺进一粒砂子。

1988年1月4日，他在上海警备区常委扩大会上指出：“保持部队的稳定，对上海市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保证作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把部队当作一个很大的依靠。

“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看这是一个真理。如果我们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团结一致，我看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市委、市政府为上海的驻军和优抚对象办了许许多多有利共睹的实事：

1986年，市政府拨出2000平方米统建公房指标，解决军队转业干部住房问题；拨款300多万元支持第二军医大学营房建设，并划出7000多平方米地皮给二医大长征医院；拨款90万元解决上海警备区云峰剧院和85医院的人防工事建设。

1986年5月，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几十名从事人武工作时间较长、家属子女户口在外地的军官需要在移交时办理随军随调手续，但这与当时上海的有关落户政策不相符合。正在驻军和有关部门感到为难时，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提出，对于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要作为支持部队精简整编的一项政治任务，给予“特事特办”。他强调指出：“中央5号文件的各项政策、规定，如干部的移交、职工的安排、家属的随迁随调等，是针对人武部改归地方这一特定情况而制定的，它同平时一年一度的军队干部转业和家属随军的规定是不同的。”经过“特事特办”，使这部分军官的实际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1986年至1987年，经江泽民签发，上海市政府连续下发了3个有关支持部队建设的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做好现役军人家属工作，支持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的意见》、《关于妥善解决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住房困难的意见》和《上海市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办法》，从而使上海的拥军优属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法规化。

分管全市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黄菊一再对经济战线的同志说，上海对国防

现代化负有重大责任，在国防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为部队服务应贯彻“微利保本”的精神，有时甚至准备吃点亏。从保卫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笔帐是合算的。

从 1988 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在地方财政也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为驻军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免税两年，并为驻军提供了近千万的无息、低息贷款。上海警备区 14 个以安置随军家属为主的小型企业，上海各有关单位从技术力量、设备到产、供、销等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扶植，使这些家属工厂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江泽民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不仅关心上海市民的“菜篮子”，而且十分关心上海驻军连队的“菜篮子”工程。在上海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市政府想方设法满足部队的需要，做到了“标准内保证供应，紧俏商品照顾供应，特殊需要优先供应”。

1988 年底，部队老战士推迟退伍，给地方的优抚安置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为此江泽民同志专门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地方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部队做好工作，并请副市长倪鸿福深入区、县，具体部署落实。

每逢征兵，江泽民都亲自作动员，并向全市市民发表电视讲话。这个传统被后来的市委领导传了下来。

1986 年 9 月 19 日，江泽民在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天，我做市长的亲自过问，你们区长、县长要上行下效，回去后也要亲自动员，征兵是以命令的形式传达的，命令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命令就要坚决执行！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征兵任务，为部队送好兵，送强兵，上海市政府实行了“三招服从一征”，即招生、招工、招干服从征兵的政策；对应征青年实行了入伍、招工“两张通知”一起发的规定。1989 年 2 月 28 日，市政府颁发了《上海市征兵工作惩处规定》。1989 年 4 月 16 日，市政府又下发了《上海市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政策和规定，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征青年和家长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征兵任务的完成。近几年，上海市无责任性退兵，被南京军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江泽民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拥军优属工作也很关心，经常过问，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江泽民还对预备役和民兵十分注重。

1987 年 3 月 12 日。连绵的春雨刚停。上海南京路民兵正在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十里长街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下午 2 时，江泽民等市党政领导来到南京路上，视察民兵为民服务活动。当江泽民听到南京路民兵自 1981 年 3 月以来坚持每月 20 日上街义务设摊为群众做好事，他连声称赞道：“好，很好！南京路民兵带头传播社会主义新风，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上海市服装商店门口，江泽民见上海市民兵建设精神文明标兵陶依嘉正在开展免费为群众测血压、小病问询等服务活动时，他握着小陶的手说：“你们雷锋精神学得好！”

接着，江泽民来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见到民兵正在为群众修补雨鞋、雨伞，他风趣他说、“你们真是送来了‘及时雨’呀！”在场的群众鼓起掌来，掌声在十里长街回荡。

南京路民兵为民服务已坚持了 10 年，被誉为“不穿军装的好八连”。

1987 年 3 月，春雨蒙蒙。

江泽民和上海警备区领导驱车来到位于嘉定县的上海冶金设备制造厂，视察了普陀区长风民兵高炮团。

警备区和普陀区人武部领导向江泽民汇报了全市民兵和长风民兵高炮团的情况：上海民兵实现了三级武器管理网，已连续三年安全无事故，受到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的表彰；长风民兵高炮团在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组织的实弹射击中，4次取得了优秀成绩。

江泽民听了介绍，非常满意。这时，雨越来越大，他情绪高昂地冒雨观看了民兵高炮射击演习。

接着江泽民又到普陀区人武部和地处长宁区的上棉五厂，视察了民兵武器库。他仔细询问了民兵武器管理情况，要求各单位管好民兵武器，做到万无一失。

江泽民事务繁忙，有多少军民关心的事需要他操心啊！然而，他对民兵武器管理着实没有少操心。

在1988年1月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作了有关加强军民团结的重要讲话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了，他突然又说，等一等，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说一下，武器管理可是一件大事，千万要管好，决不能出事啊！上海各级人武部门没有辜负期望，上海的民兵武器管理，已连续7年安全无事故。

1988年3月，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后民兵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撰写了关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文章。文章分析了上海具有较强的产业和科技优势，较强的城市综合功能，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等特点，全面论述了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指出：“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切实重视和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使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企业要抓好生产，离下开安全工作保障；一个国家要搞好建设，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保证。”

1988年12月9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联合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八纳入”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指出，我们虽然处在相对缓和时期，但并没有排除发生局部战争和边境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应当居安思危。

他告诫大家，上海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大城市，一定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保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局面。各种敌对势力，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随时都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建设进行破坏、干扰。我们要提高警惕，要警钟长鸣，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他提醒各级领导说，为消除上海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要充分发挥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骨干作用。民兵、预备役人员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是有义务的。真正有了紧急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民兵，确实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已被历史并且将继续被历史所证明。我们决不能把民兵、预备役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只有在平时重视和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鉴于当时的形势，这篇讲话的全文没有见诸于报端，今天看来，确实意味深长。

对学生军训工作，江泽民极为关注，多次指出：“学生搞不搞军训大不一样。”

1988年8月30日，黄浦区体育馆。

刚从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回沪的江泽民，还顾不上处理各种事务，就检阅了上海市高一新生暑期军训队列会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看了同学们的队列会操，我被同学们的青春活力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所感动。组织学生军训，有利于学生学习解放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有利于增强国防观念。希望全市的学生军训逐年开展，一年比一年搞得更好！”

上海掀起了空前的“军训热”。大学生要求军训，中学生也要求军训～

上海新客站落成后服务质量要求达到第一水平，于是，铁路局也要求开展对职工军训。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确定了“两个引进”的方针：对外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内引进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传统。于是，2000多名青工分期分批在上海警备区“叶挺团”帮助下搞军训，他们以新的风貌上岗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管理。

希尔顿、太平洋、锦江、和平、华侨、国际等上海著名涉外宾馆饭店的800多名职工先后组织军训，使这些在豪华大饭店工作的年轻人，思想上有了一根国防的“弦”。

1988年以来，上海20余所大学近10万大学生参加了军训，近12万中学生接受了军训。新一代国防后备军正在浦江两岸茁壮成长。

1989年4月，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在上海考察后作了这样的评价：“上海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同样也了不起！”

江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将载入史册。

江主席冒雨登上了望塔

1995年6月的一天，对某部边防连官兵来说，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

几天前，连队接到通知，江泽民主席要来哨所看望指战员。喜讯传来，干部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可这里地处边界，路途远路况也差，又赶上连下了三天雨，官兵们不免有些担心。

高高的了望塔上闪现出一双双翘望远方的眼睛。渐渐沥沥的雨，把还有积雪的山岭滋润出一层新绿，也使山路更加泥泞。上午11时，哨兵从望远镜中发现，缭绕山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一辆中巴，在风雨交加中缓缓向哨所驶来。半小时后，一个魁梧的身影从车上走出。是江泽民主席！江主席冒雨与列队的边防连全体官兵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这里的“老边防”们不止一次见到过江主席了。1991年冬天，江主席曾冒着零下摄氏30多度的严寒，登上过高高的了望塔。时隔四年，江主席又一次来到边防部队。他驱车4个多小时，行程数百里，顶风冒雨，风尘仆仆，来看望官兵。江主席四年两次到这一带边防，一寒一暑，两个时节，一样的深情：边关战士的冷暖时刻装在军委主席的心中，边防团团长紧紧地握住江主席的手，激动地说：“边防团全体官兵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雨没有停。江主席下顾长途驱车的劳顿，向高高的了望塔走去。

哨所排长见江主席步履稳健地登上了77级台阶，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主席报告了哨位执勤情况。江主席笔直地站在雨中接受报告后，走上前去，与哨所刘日行、单晓伟等7名战士亲切握手，详细地询问战士家在哪、当兵几年了、在这里生活习不习惯，当江主席看到战士们的衣服被雨淋湿时，握着哨兵韩文明的手说：“衣服穿少了吧，这里气温低，当心感冒，执勤时一定别忘带雨衣……”这时，韩文明看到，江主席的上身也全都被雨淋湿了，裤子上还溅着泥水。被雨水打湿了的韩文明虽觉透心凉，可胸中涌动着有一股暖流。

在高的了望塔上伫立远眺，四周树木葱笼，一片翠绿，江主席连连称赞，年轻的士兵们用青春和热血在建设着美丽的第二故乡。团政委向江主席介绍了这个边防连的光荣历史：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解放后，风雨兼程，开赴这里，结茅为屋，筑起了新中国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凭着对祖国赤诚的热爱，历经几代人艰苦创业，才把脚下这片土地建设得如此美丽。江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他欣然走到界碑旁，以身后的巍巍青山为背景，让记者照了张相。手抚那座界碑，极目远方，江主席赞扬边防连官兵：“过去你们在捍卫和平保家卫国中立了功，现在你们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枕戈边关，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当江主席从了望塔下来，踏着泥泞走到连队营门时，36名官兵肃立雨中。江主席朗声地问，“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这问声同战士们“为人民服务！”的应答声一道，融入山谷，在山中回荡。进了连队荣誉室，江主席左手拉着连长的手，右手拉着指导员的手，让这两位戍边的带兵入坐到自己身边后，准确他说到连队多少人，其中有多少干部、多少战士。指导员感到又惊奇，又敬佩，总书记日理万机，却对一个边防连队了解得这般详细。当指导员汇报党支部按照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建设连队的情况时，江主席连说：“好，好，你们长年驻守边防，非常辛苦，请你们向今天没在场的同志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此时，江主席心里还惦记着在哨位上冒雨为祖

国和人民站哨的战士们。

午饭时间早过了。江主席来到了连队饭堂同大家一道就餐。江主席不停地给同桌的战士朱海、刘培强、廖宏剑夹菜，指导员给江主席倒了一杯饮料，代表全连官兵向主席敬“酒”，主席见指导员站起来，也放下手中的碗筷，站起来说：“我也站起来喝，这样才平等嘛！”指导员又给主席夹了一块肉。主席问：“肉是买的吗？”指导员说是自产的，连队每月保证杀一头猪。主席说，“这很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历来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随后，江主席又拿起水杯，逐一向各桌连队官兵敬“酒”，还说“我主要是敬战士们一杯‘酒’。”这时，饭堂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副团长杨立成唱了一首《小白杨》，主席边听边轻轻合掌击节而歌，对身边的军区司令员说。“部队有人才啊……。”随后江主席又提议北京来的同志也唱一首歌。于是，随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唱起了大家熟悉的《说句心里话》，送给边防指战员。“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官兵们听着这亲切的歌声，想到祖国内地来的亲人没有忘记他们，这样理解他们，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

13时零5分，江主席乘车离开连队，全连官兵列队欢送。江主席打开车窗，挥手致意。斜风细雨飘进车内，又一次打湿了江主席的衣服，可他仍不停地向战士们挥手。

中巴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茫茫雨雾中，却在边防战士心中……

离开连队后，总书记还牵挂着了望塔和哨所的77级台阶。在车上，他嘱托同行的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和连队驻地省委书记说：“一定要把哨所前的77级台阶削掉，把那条小路修成一条可以4人并肩行走的水泥路，便于战士执勤。放哨，边防战士太辛苦了……”第二天，江主席又说起哨所修路的事，并和有关领导同志详细地商定了修路的时间，经费等事宜。

边防哨所的那条小路连着北京，连着中南海，总书记和边防战士心心相连啊。

10天后，当总书记听说哨所那条新修的水泥路已经破土动工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百年不遇大洪水

1991年春天，北京一位女高中生在日记上这样发出疑问：北京的春天为什么这么湿润 / 就像我那失恋的心。

这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一入夏，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在北京郊区某县轰然发生，把北京人吓了一跳。之后，安徽首先被泡在大水之中，江苏的无锡、常州“金三角”也被洪水弄得面目全非，湖北、湖南也到处一片汪洋，后来黑龙江也凑上了热闹……这一年，是中国大水年，太湖、淮河流域的大洪水是百年不遇的。

当时针指向7月15日零点，已横流成灾的太湖水位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一位记者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

此刻，京城已悄然入梦，而唯独这个小小的角落却依然灯火通明，电话铃声和人的呼话声响成一片。

国家防总办公室设在一座旧楼的三层，这里上通中南海，下连全国江河湖海，在与当前这场多年未遇的洪涝灾搏斗中，这里是指挥全国防汛抗洪的中枢系统，是党中央、国务院指挥抗洪决策的总参谋部。

防总值班室的墙上，挂着大幅淮河、太湖、滁河流域水情图；桌上摆着一叠叠各地的汛情报告，十几部红、黄、白色电话机和数部文传机不断传来各地汛情。十几位值一般说来人员，接电话的，绘制汛情图的，作汛情记录的，各司其职，一片紧张忙碌气氛。

零点30分，随着电传机的嗒嗒声，传来安徽省防汛指挥部紧急报告：淮河干流龙子湖站地段右岸有500米地段发生渗水、滑坡。解放军舟桥部队已在抢险……

值班员郭孔文马上问：“方邱湖行洪区内人员撤离没有？”

对方回答：“5万多人已全部撤离。”

当晚值班负责人是水管司司长周振先。1点多了，他和防办副主任陈德坤带着5位工作人员，赶写给党中央的当前灾情汇报。他们中大部分人已七八天没回家了，实在困了，就在椅子上躺一会儿。饿了，就啃块干面包。

陈德坤的眼里布满血丝。快2点了，他点上一支烟，长吁一口气对记者说：“咳！这两天轻松多啦，老天可让我们缓口气了。”

可不是么，一个月前的这个凌晨，这里确实确实是另一番样子，那时，淮河干流水位迅猛上涨，上游频频告急，若蒙洼分洪区不分洪，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而这时，分洪区里群众还未完全撤出。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坐镇防总值班室，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王守强、周文智和防办几十位同志齐聚值班室，水情处一小时报一次淮河水情。桌上十几部电话响成一片，接连传来淮河大堤的告急声……这一切虽已成为过去，但灾情的危急和因而带来的焦虑，何尝消减半分呢？

清晨6点，红机电话响了，值班员刘宝军急忙拿起电话。他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很早打电话来询问灾情。电话是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来的，对防办给中央的灾情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刚躺下不久的周振先连忙起床，叫起张志同，两人一起修改报告。

此时，设在四楼的水调中心已是一片忙碌，水情处的值班员在汇总截至6时收到的各地水情，那一个个水位、雨量的数据来自遍布全国江河湖海的1500多个水文站，那是数万名水文观测员顶风冒雨观测后发来北京的。

郭孔文也睡眼朦胧地从椅子上爬起来，与刘宝军一起利用计算机，收集水调中心输入的全国最新汛情。

9点整，值班室隔壁的会议室里，水利部长杨振怀主持每天例行的汛情汇报会。来晚的人在屋里坐不下，就搬个椅子坐在会议室门口。

会议室的墙上，一幅利用遥感技术拍摄的巨幅淮河流域影像图格外引人注目。那大片大片表示洪水的黑色图块，显示出安徽省受灾的严重性。

值班员介绍的最新汛情表明，防洪形势依然严峻：大湖水位居高不下，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安徽灾区一片汪洋……

9点40分，杨振怀起身去接电话。他回来后立即宣布散会。陈德坤主任悄悄向记者透露：一会儿可能中央领导要来。大家七手八脚一阵忙碌，几位副部长也一起动手，搬走堆在地上的文件箱，挂上几张大幅防洪图。

10点20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首先来到会议室，他一落座，就对一张卫星云图仔细察看起来。稍后，李昌安副秘书长也来了。

10月40分，李鹏总理来到防总会议室，李鹏总理上午刚从国外访问归来，没顾得上休息，立即来防总了解全国汛情了。

李鹏在国外期间，曾几次打电话到国内询问灾情。现在，他坐在防总会议室内，心情仍很沉重。他问，“安徽灾区的群众有吃的吗？”

杨振怀说：“已经运主救灾食品，有些群众吃盐水煮麦粒，吃不上菜，”杨振怀接着说：“安徽排涝是当务之急，请求胜利油田帮帮忙，支援一批大型抽水泵。另外，灾区急需草袋子，湖北省连粮食袋子也用上了。”

田副总理插话说：“要尽快定做一批草袋子。”

李鹏又问：“长江的情况怎么样？”

杨振怀答：“长江底水高，汉江正涨水，就怕两个水碰水。”

李鹏点点头：“历史上几次长江大水是由于川江发大水，长江值得注意哟。”

李鹏又询问了大湖的情况，他说：“防汛总指挥部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表扬，‘七下八上’才是主汛期，长江、黄河要特别注意。今后要做的事还很多呀。”

李鹏、田纪云和李昌安离开防总会议室后，防汛汇报会继续进行。

14点，大家吃着买来的蒸包算作午餐。

防总办公室当然成了新闻“窗口”。下午，意大利安莎社、台湾联合报、香港明报记者相继打电话来，询问灾情。

16时，防办给安徽省打电话，传达杨振怀部长对新华社两份反映安徽灾情材料的指示，要求省防汛指挥部立即与当地驻军联系，速派舟桥部队带橡皮舟解救被洪水围困的三河镇群众。

晚8时，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王守强来到防办，会同周振先、陈德坤一起研究湖北荆江大堤和湖南洞庭湖防汛问题。22点，杨振怀部长来电话，询问安徽最新灾情。

中南海时刻关注着各地灾情。23点10分，防总办公室接到田纪云副总理处转来江苏扬州市郊出险的急报。王守强马上给江苏省打电话，情况很快核实：扬州市郊七里河通运闸被洪水冲开一个40米宽的口，洪水威胁近郊几十家工厂和几十栋宿舍楼的安全。已有3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前去抢险。

16日零点，防汛办发出一道物资调配令，批准安徽省防汛指挥部调用储

备橡皮船 80 只，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洪水还在继续上涨……

怀仁堂里的座谈会

每当中国逢到大灾大难大喜大悲时，怀仁堂是最好的见证。

今天，怀仁堂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人，大多数白发白须在灯光下耀动着毫光，他们分别代表中国大陆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们都议论纷纷，这次大水到底怎么样，灾区的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江泽民总书记走进了怀仁堂，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里闪烁着沉静和自信。

“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灾害频繁，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抗洪救灾取得了伟大成绩。目前，已进入主汛期，我们要再接再厉，振奋精神，加强领导，团结协作，自救互助，战胜灾害。”

江泽民接着说，近一个时期以来，各民主党派的同志对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关心，今天向大家通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并征求意见，齐心协力战胜困难，夺取救灾工作的胜利。

会议室里悬挂着《全国雨量等值线图》、《淮河流域图》、《太湖流域洪涝受灾面积图》、《滁河示意图》。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向大家介绍了当前的汛情和抗灾的措施后说，灾情是严重的，绝大部分是涝灾。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指挥得力，广大军民团结奋战，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大大减轻了洪水造成的损失，现在灾区群众人心稳定，社会安定，抗灾救灾工作正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战斗力的，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会上介绍了各地的救灾情况。他说，在我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积极开展自救互救，对战胜自然灾害充满了信心。他感谢全国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对灾区的捐助。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今年的灾情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抗灾救灾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强柱石。

江泽民说，战胜灾害，最重要的是要自力更生，动员全社会各方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自救和生活自救。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抗灾救灾，国家要从资金、物资和其它方面给予支持。

江泽民在慷慨陈辞，下面的听众下动声色，心里却在想，稳坐在中南海就能把这么大的洪水击退吗？

当然不是。

走出中南海

大雨拼命地浇灌着淮河两岸，只有淮河大堤在暴风骤雨中巍然屹立着，像一位古代战士和英雄……

大雨使白天也像黄昏。几辆车冲破雨幕驰上淮北大堤，从车上走下几位中年人，穿着雨衣，拿着地图，暴风骤雨使他们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大声地叫嚷着谈论雨情、汛情。中间那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他已无法在中南海办公桌旁稳坐，他此时只觉得淮北大堤才是他真正的位置。

站在淮北大堤上，只见左边是汪洋一片的淮河干道，右边是一片汪洋的内涝积水，河水高于内水，形成百年少见的“关门淹”。在“两水一线”的堤防上，近看，灾民临时住的窝棚，土灶绵延不绝；远望，露出水面的材梢、屋顶星星点点。

被水围困 20 多大的 1.7 万多个村庄、500 多万灾民，吃的、住的安排得怎么样？饮水卫生有没有保障？看病方便不方便？江泽民心里十分牵挂。

田园被洪水吞没的凤台县曹集乡孙台子村，村民全部挤住在堤上的窝棚里。江泽民踏着稀泥，躬身走进一个棚户，见有一位老大娘和一个小孩，立即深情地问道：“家里还有粮食吗？”大娘含着泪花说道：“麦子淹光了，有政府救济粮。”江泽民又问：“吃水干净吗？”大娘说：“用政府发的漂白粉打过。”江泽民俯首指着躺在床上的小孩问道：“病了吗？看病方便吗？”两人都说：“没病，医疗队就在坝坝上。”

江泽民对站在身边的凤台县、乡领导说，灾民的吃、住、一定要安排好，饮水要注意卫生，千万不能喝生水。

“江泽民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飞速而来，掌声不断。江泽民一边挥手，一边高声说道：“你们辛苦了！同志们受累了！”

江泽民登上抗洪指挥艇，在波阔流急的淮河中巡视一程之后，又来到耕地被淹光的颍上县鲁台子村。他踏着泥泞小路，走村串户。

他看到路边帐篷里有一个医疗站，立即赶去。他问刚看完病的伍昌荣老大娘：“得了什么病？”这个纯朴的妇女看到江泽民这样关心人民，激动地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江泽民路过一道水沟，又走进 62 岁的老农鲁中强家，拍着他的肩头问：“有吃的吗？”“有政府的救济面（粉）。”鲁中强的嫂子、86 岁的胡士英老太太告诉江泽民，旧社会发大水，淹死人、饿死人，都没有人管，今年这样大的水，有共产党和政府关心，村里没死一个人，也没有人饿肚子。她连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江泽民离开鲁台子村时，周围几个村的灾民都赶来了，站在淮河大堤上，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为江泽民送别，江泽民挥手高声说道：“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慰问大家！我们同心协力，团结抗灾，一定能战胜这场灾害！”人群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江泽民乘坐的抗洪指挥艇驶离河岸、驶至淮河中流时，站在岸上的数千灾民，仍在用力拍手，目送着江泽民一行，久久不愿离去……

江浙灾区，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水漫金山，一片汪洋。

农田被淹，民宅进水，道路中断，工厂停产……严重的灾情危及太湖流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牵动着北京中南海。

7月8日，刚刚在安徽察看了灾情的江泽民总书记，又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一起，风尘仆仆地来到洪涝灾害严重的浙江杭嘉湖地区。一下飞机江泽民顾不上休息，便乘坐面包车径直驶向嘉善县察看灾情。

烈日当空，暑气蒸腾。随行的同志为了给江泽民遮荫，递上了一顶草帽，江泽民摆摆手示意不需要，尔后，急匆匆地朝西塘镇6号大桥走去。

在杨秀泾镇沈道村农民了志林家，江泽民同这位憨厚的农民一起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拉长叙短。从他家有几个劳力，到承包土地面积，从受灾损失，到如何补救，一一询问，体察入微。

“我同你交换个看法怎么样？”江泽民用征询的口吻商量道：“这次洪涝灾害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育，就是水利建设搞不好，农业的基础就不稳固。所以，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基本建设，才能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不知你以为如何？”

“江泽民的意见我完全赞成。要是早搞起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遭灾了！”丁志林深有同感地回答。

“是啊，这件事关系到百年大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这件事办好了，那么农业生产就有了可靠保证，用上海话讲就是‘笃定，了。’”

江泽民的一席话，说得了志林连连点头。

在练塘镇王家村口，江泽民徒步走上正在加固加高的堤岸。由于泥上被水浸泡过，踩在上面拔脚都显得有些困难。

工地上派热火朝天景象，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和“叶挺团”的解放军战士正同当地民工一起挥汗如雨，搬运草袋，筑堤固坝，并肩抗洪。“军民团结奋斗，夺取抗洪胜利”的红色标语鲜艳醒目，“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此伏彼起。

“同志们辛苦了！”当穿着一条绿军裤的江泽民走上堤坝时，战士和民工激动得欢呼雀跃：“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站在堤岸上，江泽民放眼望去，只见前一天还是“鱼米之乡”，如今已成为汪洋一片。2000多亩良田，2000多农民，为了整体利益，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用20多年开发建起的美好家园。

望着这些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乡亲们，江泽民上前紧紧握着他们那满是泥浆的手说，“为了全局的利益，你们作出了牺牲，谢谢你们！只要大家都能够做到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齐心台力，团结治水，就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临走时，江泽民特意叮嘱青浦县领导：一定要代他转达对全县人民的敬意和问候。

离开青浦，江泽民又马上驱车赶赴苏州。一到劳动路，江泽民下车后即趟着没膝深的积水，大步向胥门变电站走去。

江泽民走进变电站，只见前来支援抗洪抢险的几十名解放军官兵，正在

紧张地扛木桩、运草袋，为变电站垒筑防洪围堤。

市供电局的同志向江泽民介绍说：“多亏部队及时支援，帮助排水、筑堤，才使得变电站水位下降，输电线路始终保持畅通。”

江泽民听后上前紧紧握住战士们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解放军，你们不愧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

在一台变压器前，江泽民俯下身仔细地察看水泥柱上洪水浸泡后留下的水渍。当看到水位已经明显下降后，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神情。

似火的烈日，闷热的天气，汗水浸透了江泽民的衬衫。混浊的泥水渗进了雨靴，溅湿了裤脚，但他全然不顾。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尽全力保住电站，以确保苏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用电。

听说不远处冶金厂的职工宿舍也被水淹了。江泽民又趟着积水走进厂区的一幢住宅楼。尽管楼门口推起了高高的草袋，但楼道里还是存满了积水。

江泽民跨过草袋，“哗哗”地趟水来到厂助理工程师杜捷和顾宁华的家。他环顾屋内，只见全部家具已被水浸泡，有些东西零乱地堆放在床上。

“彩电、冰箱等贵重物品转移了吗？”江泽民关切地问。

“转移了，已经搬到楼上去了。”

“这场灾是多少年也没有过的，你们吃苦头了！”说着，江泽民抱起杜捷妻子怀中的孩子，目光里充满了慈爱。

“总书记看望咱们来了！”江泽民涉水察灾情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掌声一阵接一阵。

江泽民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热情问候，表达了党中央情系灾区民众的一片深情。

李鹏，江泽民的战友

淮河南岸，安徽省寿县县城。肆虐的洪水，围困着这个千年古城已近一月。随时有破城的危险。

7月20日下午1时50分，直升机降落在县体育场。

“李鹏总理来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李鹏一走下飞机，就关切地询问当地领导同志：“灾民安置得怎样？”“群众吃住如何？”他没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

烈日当空，寿县39摄氏度高温。在高的堤坝上，帐篷、庵棚一个接一个，李鹏逐个察看。他对灾民们说：“大家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大家表示慰问！”闻讯钻出帐篷的灾民们有的鼓掌，有的擦着眼泪。

用毛竹、塑料布和麦秸搭成的小棚是灾民王新富的家。李鹏总理和王新富挤坐在一起攀谈起来：“你现在还有没有吃的？”

“粮不多了，暂时还不会饿肚子。”

“你们要相信，有党和国家的关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这时王新富15岁的儿子端着碗来到李鹏面前：“总理，天太热，你喝口水吧！”

李鹏接过碗说：“谢谢！”

走出王新富的棚子，李鹏又连续看了三四家。一个老太太盘腿坐在竹床上吃饭，李鹏走过去看她吃什么：“哦，大米饭，炒土豆。”老太太听到来人是国务院总理，连忙放下碗。

李鹏扶住她：“老人家，身体还好吗？”老太太眼眶湿润了。

“总理，我们粮不多了。”

“总理，我家的房子被冲垮了。”

灾民们围着李鹏诉说着。

一个30多岁的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哭着说：“我家五间大瓦房被冲垮了，东西全没了，我还有病……”

李鹏问：“你是什么病，找医生看了吗？”

望着一个个受灾的群众，李鹏大声地说：“今年受大灾，现在大家很困难，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加上你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李鹏拍着一个小伙子的肩膀说：“房垮了，人还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现在，我们要振奋精神，坚定信心。”

在高挂着红十字旗的临时医疗站，李鹏问医务人员，“现在灾民们身体如何？主要是什么病？”

医务人员告诉他：“主要是肠炎、腹泻和脚溃烂。”

李鹏对医疗站的医生说：“前面有个妇女病了，你们去给她看看。”

在医疗站前李鹏当即给随行的卫生部长陈敏章说，要尽快调一批药品支援灾区。他对医务人员说：“大水之后，又接高温，疾病很容易流行，你们责任重大，要做好预防和治疗工作。”

汗水顺着李鹏的面颊淌下来，后背都湿了，他继续在大堤上朝前走着……

苏北粮仓里下河遭受特大洪涝灾害，460万亩稻田受涝，5900多家工

厂进水……

这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牵动着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心。

7月21日上午，李鹏总理等乘坐直升飞机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经扬州，过高邮，到达灾情最重的兴化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慰问受灾群众。

兴化是里下河的锅底洼。走下飞机，李鹏问扬州市委书记姜永荣：“兴化市的水退了没有？城里通不通车？老百姓生活怎么样？”

面包车沿着两侧一片汪洋的兴盐公路南行，李鹏见到这里稻田行舟、街道通船，忙问，“这种状况在里下河地区占多大面积？”

姜永荣说，“兴化大部分，高邮一部分，江都有几个乡。”

李鹏说：“灾情很重啊，老百姓受苦了。”

透过车窗，李鹏看到一些群众顶着烈日正在筑圩排水，抢种秋稻；一些工厂正在抢运物资，努力恢复生产，赞扬说：“你们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很好。现在时间紧迫、季节紧迫，要争分夺秒，能抢一块，就抢一块，就保一块，要把受灾损失降到最低点。”

指着一段新修复的河堤，兴化的同志告诉李鹏：“这一段河堤在暴雨中缺了口，是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才挡住洪水的。”

李鹏说：“在抗洪救灾中，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

走下面包车，李鹏察看了灾情。

在《扬州市灾区范围示意图》前，姜永荣向李鹏介绍了兴比受灾的情况：“自从5月下旬以来，兴化连续下了10次大暴雨，在55天里累计雨量是常年的5.7倍，经济损失达15亿元以上。”

李鹏感慨地说：“这里地势低洼，下了这么多雨，灾可大了。但是，你们这里的广大干部吃苦在前，带领群众抗洪救灾，精神可嘉。我相信，只要你们坚定信心，干群团结，就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李鹏等在兴比中郊垛田乡，看到河边停靠着一些灾民临时居住的小船，便上船询问灾民的生活。在灾民孔令香家的小船上，李鹏蹲着同主人攀谈。他问灾民们粮食够不够吃，生病了怎么办，晚上有没有蚊帐。李鹏说：“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加上你们努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夺取抗洪救灾的胜利。”围拢过来的灾民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总理对他们的关心。

在河边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李鹏和扬州、兴化的干部、群众挤坐在小木凳上，商谈起抗洪救灾，生产自救等问题。兴化市委书记吕振霖告诉李鹏总理，当前灾区急需解决饮水消毒、粪便处理、防病治病、倒房修复等问题。

大雨继续下着，一条抗洪的心的长城已在总书记、总理、灾区群众、全国人民中间矗立起来，这是一条摧不垮的长城。

金秋10月，江泽民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在春夏两季的一场又一场的大雨之后，这种晴朗更显得弥足珍贵。对此，江泽民深有体会，颇有感触。

轻轻的叩门声，工作人员悄悄地进来，“总书记，国家统计局的报告。”

江泽民快速地把统计报告看了一遍，把手一拍：“好，大灾之年大丰收。”

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中国，1991年粮食灾年不减产，仍取得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灾区千万灾民温饱无虞。

无数双眼睛羡慕地看着中国！

情暖灾民心

1996年7月20日，中午12时30分。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洪涝灾害严重的重灾区——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林场三面被水环绕的一块空地上。

“李鹏总理来看我们啦！”望着从飞机上走下的身影，围拢在空地四周的乡亲们惊喜地奔走相告。这些桃源县三叉港乡周湾村等几个村的居民，几天前被肆虐的洪水夺去了家园，现在正安顿在林场附近的县委党校内。

“乡亲们好！乡亲们受苦啦！”李鹏亲切地向大家挥手表示慰问。

空地四周响起一片掌声。

近一个时期，南方一些地方洪水泛滥，江河陡涨，房屋被淹，城市被围，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面临威胁……

灾情牵动着中南海的心。7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主持了防汛工作会议。7月20日，李鹏总理就来到了灾情严重的湖南。

上午10时40分，李鹏没出长沙机场就换乘直升飞机前往洞庭湖区察看灾情。飞机盘旋在湖区上空，只见四同一片洪水茫茫，一些地方只能见到被洪水淹没的树梢和屋顶，有的村落成为四面环水的孤岛。

看到这一切，李鹏提出：到重灾区去，看看那里的乡亲们。于是，直升飞机又飞到了桃源县。

离开飞机降落的空地，李鹏首先来到了三叉港乡的木塘垸。从堤坝上垒砌的草袋、沙包可以看出，这里前不久的保堤之战相当激烈。

堤坝上站立着三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虽然他们的制服上大都留有泥土的痕印，他们的眼中还有血丝，但从那高扬的士气、抖擞的精神不难看出，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中有来自长沙炮兵学校放弃假期的学员，有年轻的武警干警和当地的公安干警。正是他们一起奋力抢险，保住了堤坝，救出了群众。

李鹏总理来到他们面前，向他们在抗洪斗争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慰问。他说：“虽然抗洪救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还有非常繁重的任务等着你们去完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帮助人民战胜洪水，夺取最后胜利。”

“保证完成任务。”响亮的回答表达了这些抗洪斗争的突击队员坚定的信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察看完堤坝，天空渐渐沥沥下起了小雨。李鹏又来到安顿了1000多名房屋被淹灾民的桃源县委党校。

虽然这个临时的“家”十分简陋，但精神面貌良好的乡亲们仍然以热烈的掌声迎接着总理的到来。

灾民集中的大礼堂里，李鹏仔细察看着他们的衣被等生活用品。在周湾村村民彭千进跟前，李鹏与他聊了起来。

“在这里吃得饱吗？”

“吃得饱。”

“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毛病。”

“家里的损失大吗？”

“损失不大，东西差不多都搬出来了，就是房子还被水泡着。”

当听说全村没死一个人时，李鹏宽慰地点点头，“那就好。”

边走边看边问，李鹏与众多的乡亲交谈着。当他亲切地向一个老太太问

起生活情况时，老人激动地拉着李鹏的手：“堤破了，两万多人一个都没死，这全托党的福啊。没有党和政府，我们就完了。”

李鹏说，“你们遭了灾，党和政府肯定要帮助你们的。”他嘱咐老人好好保重身体。

站在礼堂中央，李鹏高声对乡亲们说：“这次沅水特大洪水给桃源县造成了很大损失，乡亲们受苦了。向大家表示慰问。”他说：“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大家都看见了，党、政府和解放军是真心诚意为大家办事的，是和人民心连心、站在一起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李鹏动情地说：“看到大家的生活基本有了保证，吃、住、医疗都有了安排，我心里踏实多了，你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情况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乡亲们为李鹏总理的话语所感动，礼堂里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礼堂门口，县医院的院长正带着几名医生专程赶来为乡亲们检查身体。李鹏关切地向院长询问着检查的结果。当听说只有个别人患有轻度的感冒和皮炎时，李鹏叮嘱说：“要及时检查，及时治疗，尤其要防止出现传染病。”

时间已是下午1点半了，天还在下着雨。告别乡辛，从党校出来，李鹏又在车上听取了常德市和桃源县的汇报。他告诫市县干部们：一定要把受灾群众的生活安顿好，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别生病。

洪水无情党有情。李鹏总理给灾区群众带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的信念，灾区群众更从李鹏总理的到访中增添了战胜洪水、重建家园的信心。

这一天，李鹏总理午饭的时间是下午3点。在长沙听取了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抗洪的汇报后，5点半，他又飞往湖北省武汉市继续察看抗洪抢险的情况。

规划宏伟蓝图、建构美好明天

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1996年3月5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

李鹏总理向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和提请大会审查的《纲要(草案)》，向我们的人民，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今后15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宏伟蓝图。

人们一定还记得，1995年金秋，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今天，党的这一建议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纲领和指针，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成为团结、动员、鼓舞、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胜利迈向21世纪的伟大旗帜。

未来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

“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 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李鹏总理的报告，勾划出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如潮的掌声一次次在万人礼堂内响起。这是12亿中国人民向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豪迈旋律。

李鹏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和提请审查的《纲要(草案)》，是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起草的。人们注意到，《报告》和《纲要(草案)》在奋斗目标、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表述上，与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完全一致，坚持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同时，从政府工作的角度，突出强调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认真解决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计划要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四方面的工作重点，特别指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建议》提出的奋斗目标作了具体的阐述。

作为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这个《纲要(草案)》与以往的中长期计划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即：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重点突出，不是面面俱到。计划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除若干对国民经济全局有重大意义的重点骨干工程外，总体上没有涉及建设项目特别是地方项目，主要是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明确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人们注意到，在2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总理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这在过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少有的，表明我国在集中力量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反映了政府对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我国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把握更

加准确，对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视。

李鹏总理报告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回顾“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时，毫不隐讳地谈到了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谈到今后 15 年的奋斗目标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既看到我们面临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着的“严峻挑战”，强调：“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是成熟、自信、清醒、冷静的标志。这是在向世人昭示：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按照这一《纲要》提出的目标阔步前进，胜利迈向 21 世纪。

附录：

资料来源举要

第一章 取材自孙伟《新中国诞生琐记》(河南日报 1992 年 5 月 30 日);舒云《开国纪事》(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王鹤滨《紫云轩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李廷瑛《在宏伟的历史画卷外》(团结报 1989 年 10 月 14 日)等。

第二章 取材自舒云《开国纪事》(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晓郡《国庆日的来历》(档案工作 1989 年第 9 期);王鹤滨《紫云轩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李廷瑛《在宏伟的历史画卷外》(团结报 1989 年 10 月 14 日)等。

第三章 取材自《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名人传记 1988 年第 2 期);《李克农传奇》(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广西日报 1983 年 9 月 13 日)等。

第四章 取材自尹家民《百战将星——陈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周毅之、曲爱国《陈质在 1950 年越南边界战役中》(香港文汇报 1993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2 日)等。

第五章 取材自衡学明《毛岸英的最后 50 天》(《追求》1991 年第 6 期);阎长林《毛泽东与儿女》(《读者文摘》1987 年第 1 期);刘宝海《疼人的父亲毛泽东》(天津日报 1991 年 7 月 20 日)等。

第六章 取材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李慎之《万隆精神和周恩来》(人民日报 1985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免遭空难纪实》(报刊文摘 1989 年 2 月 21 日);《谋杀周恩来未遂始末》(香港文汇报 1992 年 2 月 27 日);成元功《周恩来历险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3 月版)等。

第七章 取材自降边嘉措《毛泽东诚会达赖班禅佛》(《中华儿女》杂志 1995 年 10 月 18 日版);李威海《历史一页——达赖、班禅晋京纪实》(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等。

第八章 取材自刘丽丽、董保存《八大无帅受衔中南海》(《中华儿女》1993 年第 4 期);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毛泽东带头不要军衔》(香港文汇报 1996 年 8 月 1 日)等。

第九章 取材自李越然回忆、权延赤整理《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始末》;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 1 版);文摘报《毛泽东赫鲁晓夫谈接班人》(1989 年 9 月 21 日)等。

第十章 取材自孟云增口述、安一整理《彭总在中南海》(工人日报 1982 年 9 月 20 日);马铭、佩璞、马泰泉《含冤走出中南海的元帅》(《热河》1989 年 7、8 期合刊);彭梅魁《最后的斗争——回忆伯伯彭德怀》(《中国青年》1980 年第二期);《彭大将军最后的日子》(广州日报 1989 年 3 月 15 日)等。

第十一章 取材自卢弘《陆定一蒙冤记》(羊城晚报 1993 年 1 月 10 日);刘水耕《陆定一寻女记》(《记者文学》1992 年第 7 期);《陆定一简历》(新华社 1983 年 6 月 17 日电);李友斌《陆定一父女南昌团聚》(有色金属报 1988 年 2 月 18 日);《陆定一和“双百”方针》(戏剧电影报 1995 年 1 期);范涌《陆定一在政治局内被斗记》(报刊文摘 1980 年 12 月 23 日)等。

第十二章 取材自林青山《少奇同志被打倒内幕》(《追求》1986 年第 6 期);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 1980 年 12 月 5 日至 8 日);吴振英等《刘少奇同志的故事》(中国青年报 1980 年 3 月 15 日);郑理《揭开帷幕抓出元凶》(北京日报 1980 年 11 月 28 日);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真相》(人民日报 1979 年 2 月 26 日)等。

第十三章 取材自郑笑枫、舒玲《陶铸传略》(《名人传记》1998 年 5 月期);权延赤《陶铸之谜》(《西南军事文学》1995 年第 4 期);宋锋《被押送到合肥囚室》(香港文汇报 1986 年 8 月 23 日);陶斯亮《合肥行》(香港文汇报 1979 年 1 月 23 日);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广州日报 1986 年 10 月 27 日);牧惠《陶铸罢“宴”》(人民日报 1988 年 7 月 1 日);权延赤《照片“换头”事件始末》(香港文汇报 1992 年 4 月 12 日)等。

第十四章 取材自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陈伯达和他的前妻》(广州日报 1989 年 2 月 13 日);“陈伯达略传”(报刊文摘 1980 年 11 月 25 日)等。

第十五章 取材自熊蕾《历史的注脚》(《新观察》1986 年第 18 期);穆欣《隐蔽战线上的通讯社》(《新闻业务》1992 年 6 月 5 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没》(解放军报 1980 年 11 月 24 日—26 日)等。

第十六章 取材自魏史言《新中国接待第一位美国总统》(人民日报 1993 年 12 月 11 日);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昆仑出版社 1992 年版);张瑞霭《我为总理开专机》(人民政协报 1993 年 7 月 13 日)等。

第十七章 取材自《中国首位领导人访日》(香港文汇报 1994 年 8 月 29 日版);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 3 月版);张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等。

第十八章 取材自巴拉奇《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力平《女儿笔下的邓小平》(香港文汇报 1993 年 7 月 31 日);王宁《毛泽东与邓小平》(香港文汇报 1995 年 1 月 4 日)赵忠祥《我所认识的邓小平》(香港文汇报 1996 年 7 月 12 日)等。

第十九章 取材自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光明日报 1988 年 12 月 28 日);谢国明《“解放”175 位将军始末》(组织人事报 1992 年 1 月 23 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冶金报 1992 年 6 月 11 日)等。

第二十章 取材自彭程、王芳《“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局大曝光》(《热河》1989 年 7—8 期合刊);王一年《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2 版);权野《周恩来逝世前后》(香港文汇报 1989 年 12 月 17 日)等。

第二十一章 取材自彭程、王芳《“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局大曝光》(《热河》1989 年 7—8 期合刊);王一年《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权延赤《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高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人民日报 1986 年 1 月 4 日)；范硕《叶剑英在 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舒群《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青海日报 1987 年 8 月 14 日)等。

第二十二章 取材自师东兵、佑村《决定中国命运的 28 天》(《时代文学》1989 年创刊号)；范硕《叶剑英在 1976》(今晚报 1990 年)；《“文革”中经济损失知多少》(中国妇女报 1990 年 8 月 24 日)等。

第二十三章 《文革浩劫人口爆炸谁更可怕》(青海日报 1989 年 11 月 10 日)；《“文革”中受迫害的人知多少》(文摘周刊 1989 年 10 月 21 日)；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冯健、曾建徽《中南海春天》(《了望》1981 年第 1 期)等。

第二十四章 杨中美《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 1989 年 5 月)；顾保孜《地下天上胡耀邦》(《中华儿女》1996 年第二期)；张飙《记者眼中的胡耀邦》(《中华儿女》1995 年精萃本)等。

第二十五章 马志刚《大冤案与大平反》(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韩尚于《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等。

第二十六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叶永烈《江青的铁窗生涯》(《黄金时代》1993 年第 6 期)等；李灵《共和国特别审判：秘情与纪实》(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等。

第二十七章 张圣芬《毛主席遗体保存纪实》(《健康世界》1993 年第 9 期)；《发自毛主席纪念堂的内部报告》(南方日报 1990 年 11 月 10 日)等。

第二十八章 取材自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 321 天》；新华社 1994 年 4 月 11 日电《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新华社 1994 年 4 月 17 日《陈云同志遗体在京火化》；石肖岩、黄国平《陈云夫人谈江青》；叶永烈《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香港文汇报 1996 年 2 月 12 日)等。

第二十九章 取材自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文汇报 1992 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初到深圳》(文汇报 1992 年 4 月 28 日)；朱涛《南海春潮》(南方日报 1992 年 4 月 17 日)；《邓小平在上海考察》(香港文汇报 1992 年 5 月 7 日)；《邓小平南巡之后》(《半月谈》1992 年 13 期)等。

第三十章 取材自李志勇、陈毛弟《记上海新市长江泽民》(新华社 1985 年 7 月 28 日电)；张光强、廖亚岚《总书记回母校》(陕西日报 1989 年 9 月 17 日)；冬晓、山洪《我们眼里的江泽民》(香港文汇报 1990 年 4 月 7 日—14 日)；李安定《江泽民和一位记者的故事》(香港文汇报 1990 年 8 月 22 日)；曹斌、韩胜定《江泽民在上海期间关心国防建设记事》(解放军报 1991 年 1 月 1 日)；《江泽民的家庭》(农民日报 1990 年 2 月 24 日)；穆娴静《给总书记讲课的年轻人》(《河南日报》1995 年 1 月 22 日)；王文杰、徐晓鹏《江主席冒雨登上了望塔》(《解放军报》1995 年 7 月 17 日)；张宿堂《情暖灾民心——李鹏总理看望湖南洪水灾区群众》(新华社 1996 年 7 月 22 日电)等。

